【弗洛伊德文集】5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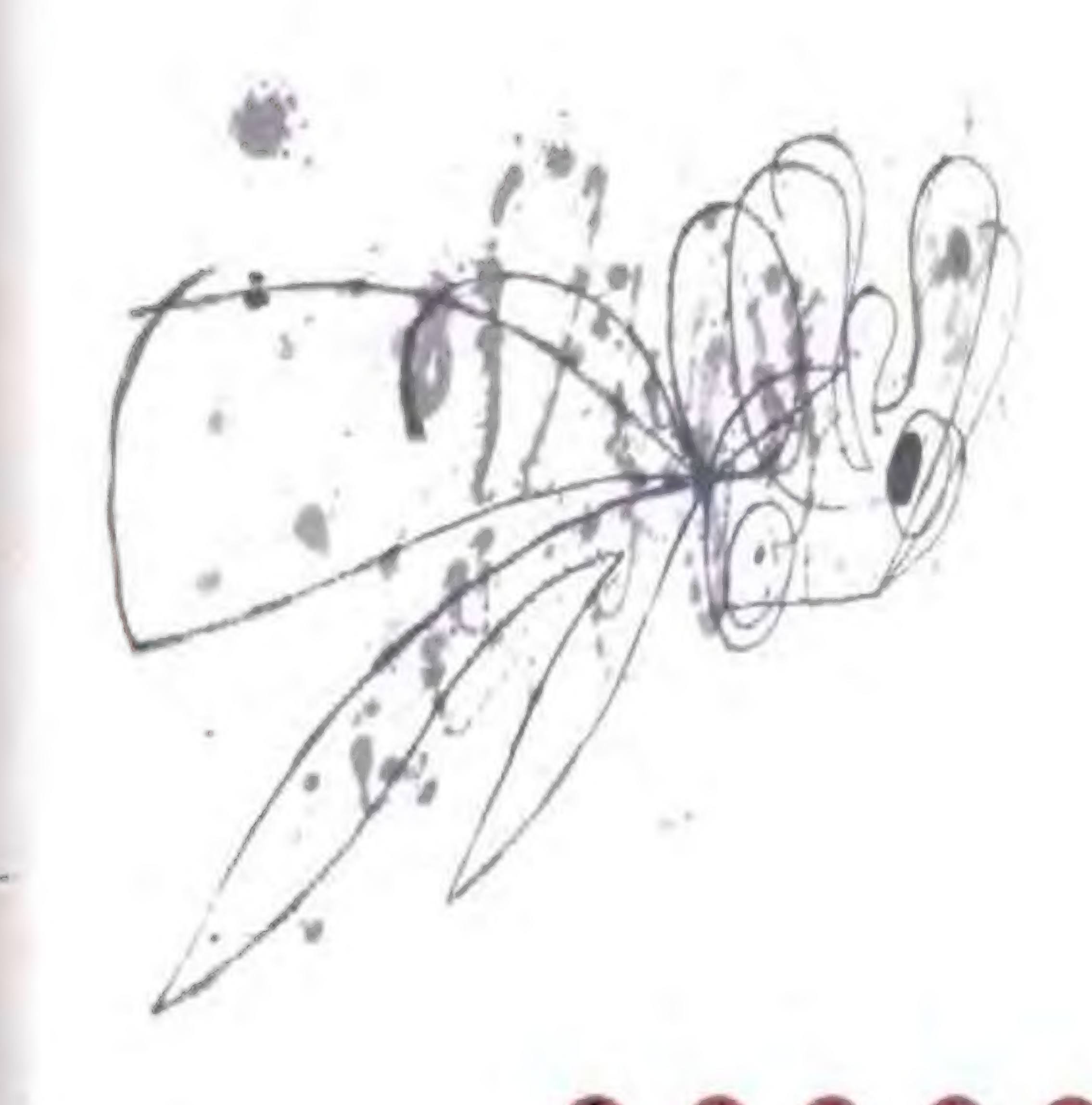
Selected Works of

Sigmund Freud



精神分析新论

主编/车文博



本卷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专著《精神分析导论》的补充、完善和发展。包括4部论著：(1)《精神分析新论》，是对梦的本质、形式的运作，人格结构中的自我与本我、超我的关系，焦虑的性质与本能的种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有重要的修正、补充和发展的专著。(2)《精神分析五讲》，是弗洛伊德最早论述精神分析主题和发展的著作。(3)《精神分析运动史》，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总结性著作。(4)《精神分析纲要》，是弗洛伊德最后对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概论性著作。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责任编辑　张中良　封面设计　王国擎



ISBN 7-80604-625-9/B·7　定价(全八卷)：498.00元

The Selected Works of Sigmund Freud



弗洛伊德文集 5

精神分析新论

主编 车文博



长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洛伊德文集/（奥）弗洛伊德（Freud，S.）著；车文博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5
ISBN 7-80604-625-9

Ⅰ．弗…　Ⅱ．①弗…　②车…　Ⅲ．①弗洛伊德，S.（1856～1939）文集②精神分析—文集
Ⅳ．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31221号

责任编辑　张中良　　封面设计　王国攀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1377号·邮编：130061）
网址：http://www.cccbs.net
业务电话：8563443　发行电话：8561180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56.75印张　3200千字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册　　定价（全八卷）：19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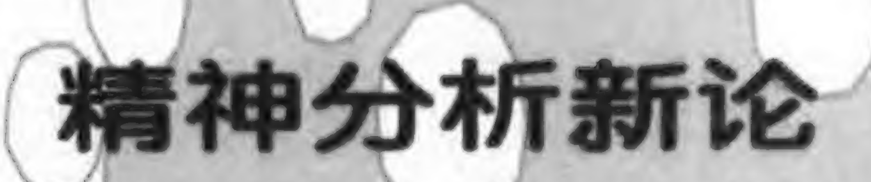
1885 年，大约在此时，弗洛伊德被任命为编外讲师。



1922年，与护卫弗洛伊德"委员会"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弗洛伊德、费伦茨、萨克斯；后排左起：兰克、阿伯拉罕、艾丁顿、琼斯。



目 录



精神分析新论

(*1933*)

汪凤炎
郭本禹 译
邵迎生 校
郭本禹 修订

按 语

本书是《精神分析导论》的姊妹篇,也是弗洛伊德的主要代表作。它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 1932 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 15 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其中,对梦的本质、形式的运作,人格结构中自我与本我、超我的关系,焦虑的性质与本能的种类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均有重要的修正、补充和发展,并对宗教、教育、宇宙观等问题发表了他心理玄学的独到见解。但对马克思主义和妇女等问题的看法则有明显谬误。

英文版编者导言

我们从琼斯（E. Jones，1957，第186～187页）的叙述中得知，尽管该书扉页的标期为“1933年”，实际上它早在1932年8月就已发行——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述一下《释梦》的历史。

1932年初，维也纳精神分析出版公司陷入财政困境，于是弗洛伊德便产生用一组新《精神分析导论》（德文标题是“Neue Folge”）来资助它的念头。第1讲和最后一讲都是5月底准备的，但全书完成于8月底。

这些讲演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原来的《精神分析导论》，这还在于它们绝不是为讲演而作。正如弗洛伊德在他的序言中所指出的，它们不能自成体系，而基本上是补充性质的。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本身在性质上的区别。一方面，尽管第1讲（论梦）几乎完全是原来的《精神分析导论》中关于梦的部分的概略，但另一方面，第3、4、5讲（论心理结构、焦虑和本能理论、女性心理学）却引进了全新的材料和理论；并且，第3、4讲还深入到对一个回避了15年的难题进行心理玄学的和理论的探讨。剩余的3讲（第2讲和最后两讲）探讨一些仅间接与精神分析有关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并且是以一种通俗的方式进行探讨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毫无价值的——远非如此——但是，它们要求读者用不同于它们同伴的另一种态度来阅读它们。无论读者希望了解什么——是想了解弗洛伊德关于传心术、教育、宗教和共产主义的观点；还是想了解弗洛伊德关于超我、焦虑、死的本能和幼女的前伊神普斯阶段的最近期的观点，在这些讲演中，他一定都能找到大量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序　言

我曾于1915～1916年和1916～1917年两个冬季学期在维也纳精神病诊所的讲堂讲演过《精神分析导论》，当时听众是大学教师。讲演稿的前半部分系即兴演讲，事后立即撰写成文；后半部分是在萨尔茨堡度暑假时写就的，并于冬季逐字讲述。那时我还拥有极佳的记忆力。

与以前的讲演稿不同，这些新讲演稿我从未讲述过。同时，我的年龄已使我摆脱因与大学相关戚　即使是表面上的关戚——而负有演讲的义务；而且，我曾接受的一次外科手术，也使我失去了向公众讲演的可能性。因此，在阐述下面的内容时，如果我要再次像上回那样置身于讲堂，那也仅仅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它也许可使我在深入阐述我的主题时，不致于忘记我对读者所负的责任。

这些新讲演稿绝不是要取代早前的讲演稿。它们亦非任何意义上的独立实体，以期拥有它自己的读者圈；它们是旧讲演稿的续编和补充，依照它们与旧讲演稿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15年前已论及的题旨，但因知识的深化、观点的更新，从而不得不重新加以论述——即批判性的修订。另外两类则真正是旧讲稿的扩充，因为它们有第一次的讲演稿中没有论及或因当时所知太少而不能另列专章的材料。必须指出，如果新讲演稿中有些部分兼有这几类特点的话，那也是无可避免的，也不必遗憾。

我还根据给新讲稿以接着旧讲稿的章节编排，从而表明它与《精神分析导论》的依存关系。譬如，此讲稿的第1讲被相应地标为第29讲。一如既往，此讲稿也极少为专职精神分析学家提供新的材料，它的对象是那些对这门新科学的发现和性质抱有好感甚或半信半疑的受过教育的人们。我的主旨仍是，不愿有所删节以求表面的简洁或完美，不掩饰问题，也不否定缺陷和疑问的存在。在其他的科学研究领域或许不需要标榜这种谦虚的意图，因为普遍认为它们是不证自明的，公众也不会对它们提出过分的要求。例如，天文学著作的读者就不会因为著作中有关宇宙知识的说明尚有含混之处而感到失望或轻视它。而心理学则不然，人类科学研究能力的匮乏将在此暴露无遗。似乎人们对心理学的要求，并不在于通过它来获得知识的进步，而是得到另一种满足。一切尚未解决的问题，一切谁都承认的疑难，都可化做反对心理学的理由。

任何热爱心理科学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些不公平的评判。

弗洛伊德

1932年夏于维也纳



第29讲 梦的理论的修订

女士们，先生们：

相去15年多之久，我又能与你们会聚一堂，共同探讨精神分析在这15年里的新进展和新改进了。从好几个观点看，我们首先都应把注意力投向梦的理论，这是合理而适宜的，因为它在精神分析史中不但占有特殊的地位，更标志着一个转折；精神分析能从心理治疗法演化为深度心理学，这是与梦的理论分不开的。自其诞生以来，梦的理论也一直是这门年轻科学的最具特色的理论，我们的知识中没有任何别的内容可与之匹敌，它是从民俗和神话手里夺回来的新领域。它所必然提出的种种观点的奇特性，使它充当着判断标准的角色，依此辨别谁是精神分析的追随者，谁将永远不能理解精神分析。对我自己来说，在过去，每当我处于研究的困境时（即当一些精神症的不确定事实与我的缺乏经验的判断相混淆时），我发现梦的理论常是我最后的依恃。每当我开始怀疑这些摇摆不定的结论的正确性时，只要我能成功地把一个毫无意义且杂乱无序的梦转译为梦者内心的合乎逻辑且浅显易晓的心理过程时，我就会重新相信自己走的路是正确的。

所以，特以梦的理论为例，一方面探讨精神分析在这15年间的变迁；另一方面研究当代世界对精神分析的理解与评价的进展，这对我们具有特殊的趣味。但我也可以立即告诉你们，你们不久就会在这两方面大感失望。

不妨翻阅一下《国际(医学)精神分析杂志》各卷，自1913年以来，关于精神分析的权威性文章大多刊登于此。在较早期几卷中，你们将看到每卷都有一个“论梦的解析”的分标题，这之中包含着许多关于梦理论的种种观点的文章。但是，当你们越往后看，这类文章就越少，以至于最后这个分标题完全消失了。从精神分析者的行为来看，他们似乎不再对梦有所论述，似乎梦理论没有什么可以再补充的了。但是，若你问起梦的解析有多少已被外人所接受——包括许多利用我们理论的精神病学者和精神治疗学家（顺便提一下，他们对我们的好意不是很感激的）、那些惯于擅用科学中较新结论的所谓饱学之士、文人和普通大众—— 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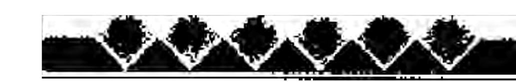
案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关于梦的理论，其内容中有少数观点是大家普遍熟知的，这之中有些我们从未提出过，例如所有的梦都具有性的属性的论点；但关于梦的那些真正重要的观点，诸如梦的外显内容和梦的内隐思想的根本区别；焦虑的梦与梦的满足欲望的功能不相矛盾的认识；若非知道梦者在处理过程中的联想就不可能解释梦；最重要的是，关于梦的本质即梦的工作过程的发现等等——正如30年前一样，这一切仍不为外人所认识。我这样说是有理由的，因为在过去的这15年里，我曾收到过数不胜数的信件。来信者呈述自己的梦以求获得解释，或者询问梦的性质。他们宣称已读过我的《释梦》，但从其字里行间可看出，他们对梦的理论缺乏了解。不过，这一切并不会阻止我们对梦再做一次详细的论述。你们会记得，上次我们关于梦的全部讲演，都是用来说明我们是如何逐步理解迄今尚未得到解释的心理现象①。

随后，我们设想某人——例如一个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一个梦。我们将假设他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同我们进行一次沟通，表明他决心开始接受一次精神分析治疗。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沟通所采取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因为梦本身既非社会话语，也非信息传递方式。而且，我们并不知道梦者试图要对我们说什么，在这一点上，他自己也并不比我们更清楚。现在我们不得不立即做出一个决定：一方面，非精神分析的医生向我们断言，梦是做梦者睡眠不佳的征兆，它表示大脑的每一部分并非均能同样在休息，大脑的某些区域在未知的刺激影响下，力图继续工作但又仅能以一种相当不完全的方式进行。倘若如此，我们就可不必再从事这种毫无心理价值的、对夜间失调的产物的研究了，因为我们无法从研究中获得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很显然我们已做出了相反的决定。我们做出假定，并将它看成一种前提——必须承认，这个假定是非常独断的——那就是，即使是这种难以理解的梦也肯定是一种完全正常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心理活动，在精神分析中，我们能够像使用别的任何信息一样使用它。只有我们的实验结果才可以证明我们有无错误。如果我们成功地把梦转化为那种有价值的话语，我们就显然有希望了解到新的东西并获得某种沟通，而此种沟通用其他方法是不易获得的。

可是，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却是此项任务的种种困难和题材上存在的种种迷惑性。我们该如何把梦转变为一种正常的沟通，如何解释在患者话语中所呈现的那种对他、对我们而言都是晦涩难懂的表现形式呢？

女士们，先生们，正如你们所知，这次我不拟解释这个问题的起源，而是采取独断的说明。第一步，我们要通过介绍两个新概念和新名词来建立对梦的问题的新态度。对于我们称做梦的东西，我们将描述为梦的内容或显梦，而对我们所

①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二编全文。



寻找的，即我们所怀疑的梦的背后的意义，我们将描述为隐梦的思想。这一步完成后，我们再说说随后的两个任务：即我们必须把显梦转化为隐梦，并解释在梦者的内心里，后者是如何变为前者的。第一项是一个实践性工作，因为它需要靠对梦的解释来完成，它要求一项技术；第二项是一个理论性工作，其任务是解释假设的梦的工作，它只算做一个理论。释梦技术和梦的工作的理论都必须重新创立。

然后，我们应以上述二者中哪一个问题为起点呢？我认为应从释梦技术开始；它将把一个更为具体的形象呈现给你们，并给你们留下更生动的印象。

那好，患者给我们讲述一梦，我们且来解释这个梦。我们静静地倾听，而无须进行思考[①]。下一步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决定应尽可能少地关注我们所听到的东西，即显梦。当然，这个显梦所呈现的种种特性并非完全与我们无关。它可能是有如文学作品一样，前后一致，结构流畅；也可能是差不多像谵言妄语一样杂乱无章，不可理解；也可能像迷雾一样朦胧；各种差异非常大的特性可能在同一个梦中出现，分散在梦的不同部分；最后，梦可能伴随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情调，也可能伴随着最强烈的快乐或悲痛的情感。你们不要假定我们没有思考显梦的这种无穷无尽的变化性。在后面，我们再回头研究这种变化性，那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东西是可用以释梦的。但目前且把它暂置不论，而专注于梦的解释这一主线。也就是说，我们也要求梦者从显梦的印象中摆脱出来，而把注意力从作为整体的梦转向于其内容的各个不同部分，并把他所想到的每一件与上述各部分有关的事一一告诉我们。因为如果他把注意力分别集中于梦的每一部分，则梦自身的联想就会展现在他的脑中。

这是一种奇特的技术，不是吗？这不是那种对待沟通和话语的常用方式。毫无疑问，你们会揣测在这个过程背后是否存在着明确表述的种种假设。但还是让我们接着往下讲吧。我们应该让患者采取哪种顺序阐述其梦的各部分内容呢？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有多种顺序。我们可以简单地采取梦的各部分在梦的阐述中显现的先后顺序。这是一种可称为最严格的经典方法。或者，我们还可以直接引导梦者寻求梦中所有的“白天的残余”；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差不多所有的梦都残留着做梦的前一天中某些事件（或数个事件）的记忆或暗示；而且，我们若能追踪这些联系，通常就能很快地从虚无飘渺的梦境转向患者的真实生活。或者，我们还可以告诉患者从梦内容的这样一些元素开始陈述，这些元素由于特别清晰且具有感觉强度，而使患者产生较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元素是特别容易引起他的联想的。我们采取哪一种方法来探讨我们正在寻求的联想，这是无关

---

① 在《释梦》（1900a）第二章的类似方面，有一些关于思考的说明性评论。



紧要的①。

接下来，我们得到了这些联想。这些联想带给我们丰富多彩的内容：有对做梦的前一天或当天的记忆，有对过去事情的记忆，有反思，有争论（伴随着赞成与反对），有自白或探究。患者讲述其中一些，同时对另一些又一时想不起来。其中大多数都表明了与梦的一些元素有一种清楚的联系，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些元素正是联想的出发点。但有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即患者用这些话来介绍他们的联想："这个联想好像与我做梦根本没有关系，只是因为我想到了它，才把它告诉你。"

如果一个人能聆听这些丰富的联想，他很快就会注意到，与其说它们与梦的出发点有相同之处，不如说它们更与梦的内容相同。它们出人意料地解释了梦的各不相同的部分，填补了梦的各部分之间的空隙，并使各部分之间奇怪的排列得到清晰的解释。最后我们还应弄清楚它们与梦的内容的关系。梦被看做是这些联想的简缩部分，此种选择是依据我们仍无法了解的规则进行的，而梦的元素就像是从民众选举中产生出的代表。毫无疑问，我们的技术已使我们掌握了某种为梦所替代的东西，而梦的心理学价值就在于此，但这种东西已不再是令人困惑的、古怪的和混淆的了。

然而，你们也不要有任何误会。梦的这些联想还不是隐梦的思想。后者隐藏在这些联想中（就像碱之含于母液中），但又不完全包含在其中。一方面，这些联想所提供的材料远不止于我们阐述隐梦的思想所需——即它们包含了患者在其探索梦的思想过程中，智力所必定产生的全部解说、转化和联系。另一方面，一个联想通常恰巧止步于快要触及真正的梦的思想的时候：它仅仅是接近于梦的思想，并且仅仅是通过暗示与梦的思想发生联系。在这点上，我们就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了，我们追寻暗示，得出不可否认的结论，并把患者在其联想中仅能触及的东西明确表达出来。这乍听起来，我们好像在投机取巧随心所欲地处理梦者为我们提供的材料；又好像在滥用材料，以期把梦者的话解释为他所没有表达出来的言语。用抽象的话语来说明我们这种释梦的程序的合理性并不容易。但是，假设你们能亲自做一回梦的分析，或者在我们的著作中选一个好例子来研究，你们将会对用这种程序进行释梦表示信服。

假如说在解释梦的时候，我们一般主要是依靠梦者的联想，那么在处理有关梦的内容的某些特定元素时，我们则采用一种非常独立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如此，因为在这种情况中，梦者通常不能对这些材料产生联想。从前我们就曾意识到，这种情形常与一些相同元素有联系；而这些相同元素通常不是很多。并且，我们的多次经验表明：这些元素应被看做或解释为某种别的事物的象

① 《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中，记载着对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法的细微差别的表述。



征。在与梦的其他元素的对照中，我们可以将一种固定的意义赋予它们，但这种意义不必是明确的，其范围是由我们所不熟悉的特殊规则决定的。由于我们知道如何解释这些象征，故而下面这种情形很可能会发生：当我们一听完梦的内容，乃至在我们尚未试图去解释它们时，我们就已明了这个梦的意义，而对梦者本人来说，梦却仍是一个谜。但是，在我以前的讲演中，我已经详述了象征意义、关于象征的知识以及它所置于我们面前的问题，今天，我就不再赘述了①。

上述所讲之内容，就是我们释梦的方法。然后我们来探讨有关问题。第一个合理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利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所有的梦？"②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能，根本不可能。但我们已用这种方法解释了许多梦，故而我们相信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但为什么不能解释全部的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告诉我们某种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马上就要把我们引导到构成梦的心理上的决定因素："因为在进行释梦的工作时要反对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或者无足轻重，或者不能克服（至少以我们目前的方法的力量是远不可及的）。"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是不可能忽略这种抵抗现象的。有时，患者毫不犹豫就可产生联想；并且，第一个或第二个观念就足以解释梦了；而有时，患者可能要先停顿或犹豫一下才能产生联想。如果这样，我们经常就须听取一长串观念，然后才能获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梦的东西。我们认为，联想的链索越长越曲折，抵抗的力量也就越强，这种看法肯定是正确的。我们发现，在梦的遗忘中这些影响仍起作用。在患者身上经常会发生这种事：即无论患者怎样竭尽全力，他仍然无法回忆起他的某一个梦。但是，一旦在一项精神分析工作过程中，我们能够去掉干扰患者与这一精神分析相关的困难时，被遗忘的梦就会突然再现。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及另外两种观察。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开始时梦的一部分内容被省略了，但随后又作为附录被补充进去。这种情况应被看做是一种遗忘该部分的企图。经验证明，这是最重要的特殊片断。我们猜想，在传送它的途中，它遇到的抵抗比梦的其他部分遇到的抵抗要更大些③。而且，我们发现梦者为了防止其所做的梦被自己遗忘掉，常在醒后立即记录下他的梦。我们可以告诉他，这样做是无用的，因为尽管他想强制地摆脱抵抗而保有梦的原貌，但这种抵抗却会移植到梦的联想上，并且使显梦无法得到解释④。从这些事实可见，假使抵抗进一步增强以至于完全压制了联想，从而使梦的解释彻底失败，我们亦无须感到吃惊。

从上述我们可推知，在释梦工作中我们所遇到的抵抗，也对梦的构成起着作

①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0讲。

② 弗洛伊德在《关于解释的可能性的限制》（1925）一文中加了一个特殊注释。

③ 参阅《释梦》（1900）。

④ 参阅《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1911）。

用。事实上，我们可以将梦分为两类[1]：一类是形成于轻微抵抗下的梦，一类是形成于高压抵抗下的梦。但是，这种压力也可在同一个梦里由一个部分移至另一个部分，它造成了梦的裂痕、晦涩和混乱，从而可能破坏甚至是最精巧的梦的连贯性。

可是，是什么正在形成抵抗呢？抵抗又旨在反对什么呢？嗯，对我们而言，抵抗是冲突的明确标志。梦中必然存在着一股力图表现某物的力量，同时又存在着一股企图阻碍其表达的力量。作为显梦，便是这种冲突的结果，它包括了这种冲突的所有结果，而且，这种冲突是以凝缩的形式存在于这些结果中。在某一点上，其中有一种力量可能成功地表达了它想说的东西；而在另一点上，其相反的力量或设法完全销毁其所欲表达的东西，或用某种不留痕迹的东西取代了其欲表达的东西。梦的构成的最常见且最有特色的情况是上述冲突以调和告终，以致使那种要求表达的力量虽确实能言所欲言，但却不是用它所想用的方式表达，而仅能用一种削弱了的、歪曲的和无法辨认的方式表达。因此，假如梦不能如实地表达出它的思想，假如需要用解释工作来填补梦与思想间的裂痕，那便是那种相反的、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力量造成的结果。而那种力量的存在，我们已从释梦时所感受到的阻力推知到了。如果把梦作为独立于类似的心理构成物的孤立现象加以研究，我们就可称这种力量为梦的稽查者[2]。

你们很早就已意识到，这种稽查并非梦的生活所特有的机构。你们知道，两种心理作用间的矛盾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精神生活（这两种作用我们可以大致地描述为“被压抑的潜意识”和“意识”）；你们还知道，对释梦的抵抗（即梦的稽查标志）就是这种因压抑而引起的抵抗。通过压抑，这两种心理作用被隔离开来。你们还知道，这两种作用的冲突可能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其他的心理结构，它们像梦一样也是调和的结果。我想，你们并不期望我在这里重述我在精神病理论的介绍中已讲过的内容，以论证我们对形成这种调和的关键性因素的认识。你们已知，梦是病理的产物，是包括癔症症状、强迫症和幻觉[3]等在内的种类的第一号成员。但梦又因其短暂性和在正常生活中出现而有别于其他症状。让我们在心中牢记，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梦是我们睡眠状态过程中心理活动的一种方式[4]。睡眠状态包括一种远离外部真实世界的状态，并且在那里我们找到了精

---

① 参阅《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1923）中第二部分。

② 弗洛伊德在此用“稽查者”（Zensor）这一拟人形式取代非人格的“稽查”（Zensur）一词，这是鲜有的一个例子。请见《精神分析导论》第26讲中的编者脚注（标准版，第16卷，第429页）。

③ 这句话几乎逐字照搬弗洛伊德《释梦》（1900a）第1版《序言》中的第2句话（标准版，第4卷，第2页）。

④ 《释梦》同上，第4卷，第2页。



神病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严重的精神病的最仔细的研究，并未给我们揭示出这些病理条件的更典型的特征。然而，在精神病中，患者通过两种方式脱离现实：或由于被压抑的潜意识变得过于强烈以致于压倒了依附于现实的意识①；或因为现实太令人痛苦而不堪忍受，以致于受到威胁的自我在抵抗失败后，便投入潜意识本能力量的怀抱中。无害的梦的精神病是意识造成的、仅是暂时脱离外部世界的结果。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旦恢复了，它就会消退。在睡觉的个体与外部世界相分离时，其心理能量的分配也发生了变化，通常用以抑制潜意识而消耗的压力，现在可以节省一部分下来，因为如果潜意识利用它的相对自由而积极活动，它就会发现其活动的通路已被关闭，而只有导向幻觉满足的无害的通路才是敞开的。因此，现在就可形成梦了，但梦的稽查这一事实表明，即使是在睡眠中，人们仍保留着足够的因压抑而引起的抵抗。

梦是否也有一种功能，是否负有一种有价值的任务？现在我们有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睡眠状态希望建立的免受刺激的休息状态受三个方面的威胁：由睡眠时外界刺激偶然引起的威胁，由尚未中断的前一天的诸种兴趣引起的威胁，以及由积极寻找发泄机会而尚未得到满足的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威胁。由于在夜间压抑作用被削弱，就有可能出现下述情况。这就是每当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刺激成功地与潜意识的本能能量发生联系时，由睡眠提供的休息就会受到干扰。做梦的过程允许这种形式的合作产物通过无害的幻觉经验得到发泄，并通过这种方式保证睡眠的继续。梦有时会使睡眠者伴随着焦虑醒来，这与梦的上述功能是不矛盾的；或者说，这可能只是稽查者认为其中情境过于危险而又自觉无力控制的信号。而更多的时候，当我们仍处于睡眠之中，我们常产生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以免惊醒：“这毕竟不过是一个梦。”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我要与你们讲的梦的解释，其任务，就是引导我们由显梦去推求内隐的梦思想。就实际的精神分析而言，在这一切工作完成后，我们对于梦的兴趣就差不多结束了。我们把以梦的形式获得的信息补充到患者的其他信息中，并继续加以分析。然而，我们有兴趣对梦再详细论述一下。我们打算研究内隐的梦念转化为显梦的历程，我们称这一历程为“梦的工作”。你们会记得，我在较早期的讲演②中就已非常详细地描述过，故而在此可以只做一最简单的概述。

梦的工作历程是完全新奇的，与过去所知的一切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使我们第一次窥探到发生于潜意识系统内的历程，并可知道这些历程完全有别于我们

---

① 这个观点在弗洛伊德最早期的心理学文章中就已有，即其第一篇名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标准版，第3卷，第55页。

②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第11讲。



从意识思维中所认识的历程，而且，与后者相比，它们必会显得非常荒谬。要是我们知道神经症症状的形成与把内隐的梦念转化为显梦有着相同的机制（我们尚不敢称之为“思想过程”），那么，这一发现就更加重要了。

对于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我就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种提纲挈领的表达方式了。我们假设：在某种特殊情境中，我们观察到了我们面前所有的内隐思想，它们或多或少伴有情感色彩，当对外显内容的解释完成后，显梦就被这些思想所替代。然后，我们就可明显地看到，各种内隐的思想之间存在着一个差别，而这个差别可以给我们以帮助。几乎所有梦念都能为梦者认出或承认；他承认他在当前或别的时候一直有这种想法，或很可能有过这种想法。只有一种思想是他拒绝接受的，该思想对他来说是奇怪的，甚至可能是令人厌恶的；他可能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情感反对它。现在就我们而言，很显然，其他思想是意识的各部分；或更确切地说，是思维的前意识系列的各部分。它们很可能也是在清醒时所思考过的，也很有可能是在前一天就已形成。然而，这种被否定的思想（确切地说是一种冲动）是夜间的产物，它属于梦者的潜意识，故而遭到梦者的否定和反对。它不得不等到夜间压抑放松时，才能获得某种表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种表现都是微弱的、被扭曲的和伪装的表现，如果我们不做释梦工作，我们就无法发现它。这些潜意识的冲动幸而与其他的无可非议的梦念联系，因而能在难以觉察的伪装下，溜过稽查的屏障；另一方面，这些前意识的梦念也多亏有了这些联系，故而有能力在睡眠中也能占据精神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潜意识的冲动是梦的真正创造者；它提供了梦的构成所需的心理能量。与其他任何本能冲动一样，它也只是追求自身的满足；释梦的经验告诉我们，做梦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在每个梦里，本能欲望必须得到满足。心理生活人夜即脱离现实，并有可能因此退回到种种原始的结构中，这样就使梦者能在目前情况下，以一种幻觉的形式，体验到这种梦寐以求的本能的满足。由于同样的倒退作用，观念在梦中被转化为视觉影像；换句话说，也就是内隐的梦念变得生动和形象化了。

这种梦的工作使我们知道了梦的最显著、最独特的特征。关于梦的形成中的事件发展可再复述如下。作为先导的是睡眠的欲望和脱离外界的意图。接下来，两个心理机能方面的结果便产生了：第一，在倒退过程中，出现了更为古老而原始的活动方式的可能性；第二，由于强加于潜意识之上的压抑而导致抵抗的削弱。由于后一个因素，便使梦的形成成为可能；并且各种突发事件、正在活动的内外刺激便利用了这个因素来制造梦。以这种方式制造的梦已是一个调和的产物。它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适应自我，因为通过排除干扰睡眠的刺激，它可以满足睡眠的欲望；另一方面，它允许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以愿望在幻觉中实现的方式在这些情境中获得满足。然而，由睡眠中的自我所允许的整个制梦过程仍然受到稽查员的控制，这种控制是由仍在起作用的压抑的残余部分所施予的。我不可能



将制梦过程描述得更为简单，因为制梦过程本身亦不太简单。但现在我可以继续描述梦的工作。

让我们再次回顾内隐的梦念吧。它们最有力的元素即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这种冲动是在偶发刺激出现的基础上，通过向白天的残余物转移的方式，在梦念中为自己创造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这种表现形式是被削弱了的、被伪装了的）。与其他种种本能冲动一样，它也强烈希望通过活动得到满足，但其活动通道被隐藏在睡眠状态下的生理调节机制所堵塞，它被迫退回到一种相反的知觉途径，即只是一种幻觉的满足。这样内隐的梦念就被转化为感觉形象和视觉情境的混合物。沿循这条道路前进着的梦，其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显得那么奇特和古怪。由于无法表达它们，所有那些我们用以表达比较微妙的思想关系的语言工具——连词、介词、名词、形容词、代词的变格和动词的时态及语态的变化——就都被省略掉了。这就像原始语言一样，在原始语言中并无语法，只有粗陋的思想材料可以表达出来，而抽象的术语则转化为构成其基础的具体的术语，这导致梦的剩余部分有可能缺乏联系。而梦中用以代表特定事物或过程的象征被大量采用，则是与心理机能的原始倒退和稽查员的要求相协调的，但与意识思维却水火不容。

但是，梦念元素中还有其他变化比上述变化更为重要。凡是在某一方面具有相互联系的元素都被凝缩为新的单元。在梦念被转化为影像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这种组合与凝缩是优先采取的。犹如有某种力量在起作用，它使梦的材料受到压缩和聚集。由于凝缩作用，显梦中的某一元素可能相当于内隐的梦念中的许多元素；但反过来，梦念中的某一元素也可为显梦中的许多影像所替代。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梦的另一个过程，即移置或重点的转移，这在意识思维中，我们只在错误的推理或玩笑方式中才会遇到。诚然，梦念中各不相同的观念具有各不等同的价值，它们都各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情感性，并且各自的重要性和值得关注的特性也是不同的。在梦的工作中，这些观念与依附于它们的情感相脱离了。这些情感被独立处理，它们可能移置于他物上，也可能保留于原物上，还可能发生了变化，或者根本没有在梦中出现。由于梦的影响具有感觉强度，故而这些被剥夺了情感的观念的重要性又重新在梦中得到了恢复。但我们观察到，其重点已从重要的元素转移到了一般的元素上。这样，那些在梦念中仅起微小作用的东西似乎被推向了梦的前台，从而成为重要东西；相反，梦念的本质只有在梦中那些附带的、不清晰的表达中显现。正是梦的工作的这个部分，使得做梦者认为其梦是如此古怪，以致于难以理解。在梦的歪曲中，移置是一种常被采用的主要方法，而在稽查作用的影响下，梦念必须服从于这种梦的歪曲。

当施加在梦上的这些操作完成之后，梦就差不多形成了。一个不太稳定的因素——以"润饰"（secondary revision）为我们所知——在梦已作为一种知觉客体出现于意识面前之后，便开始作用。在这一方面，我们就像一般习惯于对待知觉



内容那样对待梦：我们填补裂痕，增加联系；而这样做时，我们常因犯有严重的错误而感到内疚。但这个行为可能被描述为文饰行为，而它至多不过提供了一个不能符合于梦的真实内容的、平滑的外表，故而这个行为也可能被忽视，或仅仅在一个最为恰当的程度上得到表现。在这种情况中，梦就会公开地显示其一切缝隙与裂痕。另一方面，不应忘记，梦的工作并不总是以相等的能量展开的，它通常把自己局限于梦念的某些部分进行，而其他部分则允许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梦中。在这些情况中，我们可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梦在进行着最精细、最复杂的智力活动；它从事思考、开玩笑、做出决定和解决问题的工作。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正常心理活动的产物，它们可能在梦的前一天和做梦的当夜就已形成了，与梦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表现梦的特征。在这里，再一次强调梦念本身的区别，即潜意识冲动和白天的残余物的区别，这不是多余的。后者显示了精神活动的多样性；而既然前者（即潜意识冲动）是形成梦的真正动力，则它无可避免地要寻求欲望满足的出路。

15 年前我可能就已告诉你们上面这些内容了，而且事实上，我也相信，在那时我的确已告诉你们了。现在我想专门讲讲这 15 年来关于梦的理论的变化和新发现。我曾说过，恐怕你们会发现收获极少。或许你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你们两次听同样内容的演讲，我自己又为什么要重述。这是因为 15 年的光阴过去了，我希望这是与你们重新建立联系的最佳方法。而且，我讲的这些内容对理解精神分析都具有关键意义，所以再次听听，可能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而 15 年来它们大多无所变动，可见它们具有为人了解的价值。

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献中，你们可以找到大量的可证实材料和详细的论述。在此，我也只打算给你们提供一些例子。此外，我还可以顺便告诉你们一些早期已知的材料。我们所要讲的主要是梦的象征作用和梦的其他表现方式。现请大家认真听听。仅仅在不久前，美国一所大学的医学师生就曾拒绝承认精神分析的科学地位，因为他们认为精神分析缺少实验证据。他们也许可以对天文学提出同样的反对，因为事实上，有关天体的实验是相当困难的，天文学家只能求助于观察。不过，维也纳的研究者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有关梦的象征作用的实验。早在 1912 年施罗特（Schrötter）博士就发现，假如指示一个被深度催眠的人梦见性的材料，则这些在梦中出现的性的材料已为我们熟悉的象征物所替代。比如，让一个妇女梦见和一个女性朋友性交。在她的梦中，这个朋友是携带一个旅行包出现的，包上贴有“女性专用”的标签。贝特海姆（Betlheim）和哈特曼（Hartmann）1924 年进行了一个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实验。他们对那些患有柯萨科夫（Korsakoff）紊乱性精神病（confusional psychosis）的患者进行实验，给他们讲述一些粗鲁的性行为故事，然后要求他们复述，并观察复述过程中的歪曲。结果，那些为我们所熟悉的性器官和性交的象征物再次呈现，其中还有阶梯的象征物。



关于这些，正如这两位实验者的公正评论，它们从不可能通过有意识的歪曲愿望来形成①。

西尔伯莱（H. Silberer，1909，1912）的一系列有趣的实验说明，在梦的工作将抽象思想转化为视觉影像时，一个人可以控制梦的工作。当他处于疲惫和昏昏欲睡的状态之中，如果勉强自己做一些理智工作，那么思想就会消失，而由一种显然是其替代物的幻像所替代。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西尔伯莱说："我考虑过必须对一篇论文中的一段不通顺的文字加以修改。"其幻象是："我看见自己在刨平一块木头。"实验中常发生这种情况：幻象的内容并非是被思考的思想，而是他正努力着的主观状态——这种状态替代了思考对象。这种情况被西尔伯莱描述成一种"功能性现象"。一个例子就可以使你马上明白这种现象的含义。这位作者力图比较两个哲学家关于某个特殊问题的观点，但在他处于睡眠的情境中时，他总是忘记其中一个观点，最后产生了幻象：他正在向一个伏案的冷漠的秘书打探消息，而这个秘书开始是不理睬他，然后又厌恶地白了他一眼表示拒绝。进行实验的条件自身就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实验所引起的幻象如此经常地代表一种自我观察的活动②。

象征问题的讨论还没有结束。有些象征，我们相信我们已认识它们，但它们仍然困扰着我们，因为我们不能解释这种特殊的象征物怎样变成了那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于其他领域诸如语言学、民俗学、神话和宗教仪式的证实必然受到特别欢迎。外套或斗篷（德文"Mantel"）这一象征物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说过，在女人的梦中，这代表一个男人③。赖克（T. Reik，1920）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你们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赖克说："在贝陀因人（the Bedouins）的极端古老的结婚仪式中，新郎把名为'Aba'的特殊斗篷披加到新娘身上，嘴里说下述礼节的话语：'从此以后，除我外，不许有他人给你披戴。'"[引自艾斯勒（R. Eisler，1910）] 我们也发现了几个新的象征物，至少可告诉你们其中两个。据阿伯拉罕（Abraham，1922）说，梦中的一只蜘蛛象征着一位母亲，但这是儿童的阳具欲期的母亲，是我们所害怕的母亲；故而对蜘蛛的恐惧，表明了害怕与母亲的乱伦及对女性生殖器的恐惧。或许你们知道，神话的创造物，美杜莎（Medusa）的头，能追溯到怕被阉割的同样动机④。我想告诉你

① 《释梦》（1900a）第六章第五节中对这些实验有更详细的描述（标准版，第5卷，第384页）。

② 弗洛伊德1914年在对《释梦》（1900a）的几段补充中，对西尔伯莱的实验做了更充分的说明，并附有大量的引文（标准版，第5卷，第344～345页；第503～504页）。

③ 《精神分析导论》中曾论述了象征作用，但这种适用于女性的梦的事实，仅在一些较早期发表的《观察与实例》（1913）中提及。

④ 参阅弗洛伊德去世后发表的对该论题的注释（1940c，1922）。

们的另一个象征物是桥，费伦茨（S. Ferenczi，1921，1922）曾对此做过解释。首先，它意指男性生殖器，该生殖器在性交中使父母相联结；但此后，它从第一个意义中派生出更深一层的意义。由于男性生殖器的功劳，我们才能够脱离羊水而来到这个世界上，故而桥即成为从另一个世界（未出生状态，子宫中）到这个世界（生命）的通道；而且，由于人们也把死描述为回归子宫（回归水中），所以桥也获得了某种通向死亡的意义；最后，在与其原始本意更远的意义上，桥代表在一般情况里出现的过渡或变化。所以，它与下述情况相符：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克服成为男人的愿望，她就经常会梦到桥很短，以致于达不到彼岸。

在梦的外显内容中，我们经常发现令人想起童话、传说和神话中的那些熟悉题材的画面和情景。因此，对这些梦的解释，有助于理解创造这些主题的原始兴趣，尽管同时我们不应忘记，随着材料在此期间的改变，其意义理所当然也发生了变化。这样说吧，我们的解释工作就是揭示这种原始材料，它经常足以在最广泛意义上被描述为性的性质，但在后来的诸种适应当中得到非常多样化的应用。这类溯源容易引起全体非精神分析的学者对我们的愤恨，好像我们试图否定或低估后来建立于原始基础上的一切。但是，这种种发现是有意义的和有趣的。追溯雕像艺术中特殊题材的起源，情况也是如此。比如，艾斯勒（M. J. Eisler，1919）受其患者的梦的启发，就对普拉克西提（Praxiteles）创作的雕像《赫尔墨斯》（Hermes）中描绘的那个与小男孩戏耍的年轻人进行了精神分析性解说。最后，我要指出，我们经常用梦的解释阐明特殊神话题材的含义。例如，神话中的迷宫可被看做是肛门出生的象征：弯弯曲曲的小路是肠子，阿里阿德涅（Ariadne）线团[①]是脐带。

随着研究的更加深人，梦的工作（即数不胜数令人眼花的材料）所采用的各种表征方法也越来越为我们所熟悉。我再给你们举一些例子。例如，梦中刺激物的重复象征着频繁性。下面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典型的梦。她梦见自己走进一个大厅，并发现厅中有个人坐在椅子上；这种情景反复出现了6次、8次或更多次，而每次这个人都是她的父亲。根据该女子提供的一些补充细节，在我们的解释中，发现这个大厅象征着母亲的子宫，那么，这个梦就易于理解了。该梦是少女们常有的幻想：认为当她的母亲在怀孕时，她们的父亲就参观了子宫，故而在她们处于胎儿期中就已遇见过她的父亲了。在梦中有些东西是颠倒的——其父的“进人”移置到她自己身上了，你们不要被这种情形所迷惑，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形自身也具有一种特殊意义。父亲形象的反复出现仅可能表明，有关事件是反复发生的。

① 西腊神话中弥诺斯（Minos）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曾给了忒修斯（Theseus）一个线团，帮助他逃出了弥诺陶洛斯（Minotaurus）的迷宫。——中译者



最后，我们得承认，梦在通过反反复复[①]表示频繁性时，其自身并无多大意义。我们只须找出后一个单词的原始意义；现在该词在我们看来意味着时间上的重复，而它却来源于空间上的堆积。的确，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有可能，梦的工作都把时间关系转变成空间关系，并这样表述它们。例如，在梦中一个人可见到这样的情景：其中两个人看起来非常小，并且离我们很远，就仿佛是把望远镜倒过来所看到的情景。在这里，空间上的微小与遥远具有同样的意义：所表示的是时间上的遥远；并且我们应该懂得，这个情景是来自遥远的过去的。

你们也许还记得，在早期的演讲中，我就已经告诉你们（并用例子阐明事实），为了我们的释梦工作，我们甚至已学会利用显梦的纯形式特性了。这就是，将它们转化为来自内隐的梦念的材料[②]。就像你们已经知道的，凡同一夜晚所做的梦都属于同一体系。但是，对梦者而言，这些梦是连续一贯的，还是被分成几个部分及分成多少部分，这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这些部分的数目通常与内隐的梦念的结构形态中分离聚点的数目一致，或与梦者心理生活中的各种斗争倾向相一致，这些倾向的每一种都可在梦的某一特殊部分获得主要的但又非惟一的表现。一个短小的序梦与一个紧接它而来的更长的主梦的关系通常是条件与结果（条件从句与结果从句）的关系，在旧的《精神分析导论》中可找到非常鲜明的例子[③]。实际上，一个被梦者描述为“莫明其妙插进来”的梦可能相当于梦念中的一个从句。亚历山大（P. Alexander，1925）对成对梦的研究表明，若把同夜的两个梦合起来考虑，则它们是在两个阶段上实现对欲望的满足，从而分别完成梦的任务的，尽管每个梦独立时并不产生这种结果，但上述情况并不少见。例如，假设梦的欲望在其内容中对某个特定的人要作出非礼的行为，则在第一个梦中，此人将毫无伪装地出现，而对其欲采取的行为则被羞羞答答地暗示出来。在第二个梦中就完全不同了。这种行为将毫无伪装地显现，但该人或者无法辨认，或者被另外的毫不相干的人所替代。你们会承认，这种情形给人的印象确实是巧妙。我们还可发现联成对梦的另一种类似关系：其一代表惩罚，另一个代表罪孽深重的对欲望的满足。这就相当于说：“如果一个人愿意为此接受惩罚，那么他就可以继续放任自己做出那种遭禁忌的行为。”

关于这些一般的发现或释梦在精神分析工作中的应用的讨论，我就到此为止吧。我相信你们急于听到，我们对梦的性质和重要性的基本观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已经提醒过你们，正是关于这一点，我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在梦的整个理论

---

① 即德文中的“Häufigkeit”和“Häufung”这两个词。它们都来自于“Haufen”，这一词根，意指“堆积”。

②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第11讲，也可参阅《释梦》。

③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第12讲。所有的一切又可见于《释梦》。



中，争论最激烈的一点就是关于所有的梦都是对欲望的满足这一主张。门外汉不可避免地，而且已经提出反对：但还有这么多的焦虑梦呀。我想我可以说，关于这一点我在早期的演讲中已经彻底论述过①。尽管我们把梦分为愿望的梦、焦虑的梦和惩罚的梦，但我们仍保持着理论的完整性。

惩罚的梦也是对欲望的满足，尽管它们满足的不是本能冲动的欲望，而是满足内心的批判稽查和惩罚机构的欲望。假如我们面前有一个纯粹的惩罚的梦，那么一个简单的心理推演就能将它还原为愿望的梦，因为惩罚的梦是对它的告诫性反驳，而且，由于这种指责，这一惩罚的梦被显梦所取代。女士们，先生们，正如你们所知，梦的研究首先有助于我们了解神经症，并且你们将会发现，关于神经症的知识反过来又可影响我们关于梦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不久你们就会知道②，我们不得不假定，在我们内心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批判的和禁止的机构，我们称之为“超我”。由于认识到梦的稽查也是这个机构的一种功能，我们还应更加认真地思考超我在梦的构成中的作用。

梦的欲望满足理论仅有两大困难。尽管已很深入探讨这两个困难，我们仍未得出完全满意的结论。

其中第一大难题表现在下列事实中：那些经历过震惊、有过严重的心理创伤（trauma）——常见于战争中，并且是创伤性癔症的基础——的人们，在梦中通常倒退到创伤性情境中。依据我们关于梦的功能的假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以这种方式倒退到那种极端消沉的创伤性经历可能会满足什么样的欲望冲动呢？很难推测。

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我们差不多每天都遇到第二个难题，它所含的对我们理论的反驳并不如第一个那么重要。你们知道，精神分析的一个任务，就是揭开隐藏于童年最早期的遗忘症的面纱；并获得早期幼儿性生活的种种现象的有意识记忆。儿童的这些最初性经验，是与焦虑、禁忌、失望和惩罚的痛苦印象相关联的。我们能理解它们是正被压抑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理解，它们是如何自由地进入梦的生活的？是如何为如此之多的梦的幻想提供形式的？是如何使梦被那些来自童年景象的复制品和对它们的暗示所填满的？必须承认，这些性经验的令人不快的性质与对梦的工作中欲望的满足这一目的好像是相互排斥的。但也可能是，我们在这种场合中将这种困难人为地夸大了。毕竟，所有能消失掉却又无法满足的本能欲望，都与这些相同的幼儿经验相关，这些本能欲望终生为梦的构成提供了能量，并且我们毫不怀疑，这些欲望有可能伴随着把另外的令人痛苦的事件的材料有力地推向表面来。另一方面，这种材料的方式和形式的再现清楚地说

①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第14讲。

② 参阅《精神分析新论》的第31讲。



明，梦的工作会努力通过扭曲的方式直接否认不愉快，并将失望转化为成功。

就创伤性神经症而言，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情形中，梦通常以焦虑的产生而告终。我认为，我们不必害怕承认，在这里，梦的功能是无效的。我不想借用例外证明规律的说法：对我而言，这种说法的明智与否是值得怀疑的。但毫无疑问，这种例外没有推翻规律。如果我们为了研究而把某种特殊的心理功能（如做梦）从整体的心理机能中分离出来，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发现那些为其所特有的规律；但若我们再次把它放回到整体关系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规律由于与其他势力相冲突而变得模糊不清或被削弱了。我们说梦是愿望的满足，但假如你们想要考虑到上述后两种相反情况，那么你们也可说梦是满足欲望的一种企图。凡是能正确理解心理动力学（dynamics of the mind）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差别。在特定情形中，梦仅能获得极不完全的欲望满足，甚或完全抛弃这种意图。梦的功能的最大障碍好像是对创伤性潜意识固着。虽然睡眠者不得不做梦，但由于夜晚压抑作用的削弱，从而使创伤性固着得以进行向上冲的活动，这样梦的工作功能就失效了，而不能把关于创伤性事件的记忆痕迹转化为欲望的满足，在这些情形中，可能出现下述情况：一个人将会失眠，并会因害怕梦的功能失效而放弃睡眠。这里，创伤性神经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端例子。但我们也得承认，儿童期的经验也具有一种创伤性，而且，如果在其他情形中，梦的机能也出现一些比较细微的干扰，我们也不必感到奇怪①。

① 最后三段的主题最早载于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第二、三章。在本讲演后面第32讲中对它有更进一步的提示。



第 30 讲 梦与神秘主义[1]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将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前进，但这条小路却会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广阔的前景。

下面，我将讲述梦与神秘主义（occultism）的关系，对此你们不必感到惊讶。事实上，人们经常将梦看做是通向神秘世界的门户，即使在今天，仍有许多人把梦自身视为一种神秘现象，甚至连我们这些以梦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人，对梦与那些模糊事物有着一缕或多缕的联系也不加质疑。玄秘论（mysticism）、神秘主义——这些字眼是什么意思呢？你们不必期望我将试图用定义来表达这些模糊的概念。我们都大致了解，这些词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们意指某种“别的世界”，这个世界存在于科学为我们构建的受无情的法则支配的明亮世界的背后。

神秘主义断言，事实上，天地间存在的东西比我们的哲学所能想象的要多得多。所以，我们无须受制于学院哲学的狭隘成见；而应该相信：凡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东西都值得信任，

我们打算像处理其他任何科学材料一样来处理这些事物：一方面，弄清是否真能证实这些事物的存在；另一方面，即只有在这些事物的真实性无可置疑之后，才能设法对其加以解释。然而，无可否认，就理智的、心理的和历史的因素而言，我们甚至很难把这种决定变为实际行为。这与我们探究其他问题时是不相同的。

首先，是来自于理智的困难。且看看我对我的想法做的粗略浅显的解释吧。假定我们所讨论的是地球的内部结构。你们知道，对此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我们怀疑它是由白热化的重金属构成的。然后，我们再想象某人提出的一种论断：

---

[1] 在《精神分析与治疗》（1941）的编者语中记载着一系列弗洛伊德关于该主题的文章，琼斯（E. Jones，1957）在他的传记第 3 卷第四章中，对弗洛伊德关于神秘主义的态度作了综合概述。



地球内部是由饱含碳酸－　即苏打水的液体构成的。对这一论断，我们会毫不迟疑地说，这绝不可能，因为它与我们的一切预期相矛盾，而且无视那--导致我们接受金属假说的已知事实。但这种论断又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人能给我们提供论证苏打水假说的方法，我们会毫不反对地接受它。但是，假设现在有其他人郑重提出：地球的内核是由果酱构成的，我们的反应就会大不相同。我们将告诉自己：果酱并不是自然产物，而是人类烹制的东西，而且，果酱的存在是以果树和果实的存在为前提的，我们无法理解怎么能把植物与人类烹调术安放于地球内部。这些理智的反对结果将扭转我们的兴趣：不是立即着手研究地球内核是否真由果酱构成，而是思忖，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什么样的？或最多只问他得出此观点的由来。倒霉的果酱理论提出者将深以此为忤，责怪我们因为抱守貌似科学的成见而拒绝对其观点作客观的调查研究。但这对他无济于事。我们认为，成见未必总会受到非难；相反，由于它们使我们避免了无益的劳动，有时却是正确而有利的。实际上，成见也仅仅是从其他可靠的判断类推而获得的结论。

神秘主义者的所有主张给我们的印象，与果酱假说给我们的印象相同；因此，我们有理由不假思索地排斥它们，而不必进一步深人研究。但同样地，这种观点也并非如此简单。我所提出的这种比较，证明不了任何东西；或者说与通常的比较一样，只能证明极少的东西。这种比较是否符合事实仍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很明显，它的选择早已由我们傲慢的态度决定了。成见有时是有用而合理的，但有时却是错误而有害的。没有人能辨明，它何时属于前者，何时属于后者。科学史上的许多事例告诫我们：切勿过早做出定论。我们现在称为陨石的那些石头可能是从太空落到地球上的；蕴藏着贝壳残骸的岩石山脉可能曾是海洋的床底。长期以来，这些假说都被认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顺便提一下，当我们的精神分析提出存在潜意识推论时，也出现了相差无几的情况。故而我们精神分析者在运用理智的思考驳斥新假说时，有特殊的理由采取谨慎的态度；而且必须承认，理智思考并没有使我们消除厌恶、怀疑和不确定感。

我已经说到了第二个因素是心理因素（这使我们难以接近研究课题）。我指的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轻信倾向和对奇迹现象的信仰。在很早以前，当我们还处于生命的严格法则之下时，我们就产生了一种反抗，反对思维规律的严酷性和单调性，反对实在性验证的需要①。理性变成了敌人，剥夺我们享乐的种种可能。我们发现，只要我们脱离了理性束缚——哪怕只是暂时的－　－而非屈从于非理性的引诱，我们就享受更多快乐。学童喜欢文字游戏，专家们在科学会议结束后拿自己的研

① 即检验事物以看它们是真是假。这在《心理玄学对梦理论的一个补充》中有论述。又见于《精神分析导论》第23讲。

究取乐；甚至最严肃的人也喜欢听听笑话[1]。对"理性与科学——人类拥有的最强力量"[2]的更深的敌意正伺机发作；它使人们宁愿舍弃"训练有素"的医生，而求助于巫医或自然疗法的治疗者；它对神秘主义的论断情有独钟，只要其所提供的事实能用以突破规律和法则；它使批判主义智昏，它歪曲人的知觉，把那些得不到证实的观点和意见强加在人的身上。假如考虑到人类的这些倾向，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对神秘主义著作中提出的信息置疑。

我把第三个因素称为历史因素。我意在指出神秘主义世界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新的东西。那里一再出现的只不过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并载于古书上的所有迹象、奇迹、预言及稀奇古怪的东西；长期以来，它们被认为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或有意欺瞒的结果，是人类处于极端无知、科学精神尚在襁褓中的时代产物。如果我们接受神秘主义者宣称的、至今仍存在的所有事物的真实性，我们也就必须相信自古流传的那些传说的真实性。于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民族的传说与圣典都载有种种类似的神奇故事；宗教正是在这些神奇事件的基础之上，谋求着人们的崇信，并从中找到超人力量发生作用的证据。果真如此，我们就不禁要怀疑：神秘主义的兴趣事实上是一种宗教兴趣；神秘主义活动的隐秘动机之一就是，当宗教受到科学思想的先进性威胁时，给予帮助。而且，由于发现了这个动机，我们加深了对神秘主义的不信任，更不愿意着手研究这些想象的神秘现象。

然而，这种厌弃迟早是必须加以克服的。我们面临着一个实际问题：神秘主义者告诉我们的事情是真还是假？通过观察这个问题毕竟还是可以得到明确解决的。说到底，我们还是感谢神秘主义者。现在我们还无法证实自古流传的种种奇闻轶事。不过我们认为，倘若它们不能被证实，则须承认，严格地讲它们也不能被证伪。但是对那些我们能亲历亲为的当代事件，我们应该能做出明确的判断。假如我们深信这样的奇迹不会发生在今天，我们就不必害怕它们可能发生在古代这样的相反意见；如此，其他解释也就更有道理了。这样，我们就消除了疑虑，并准备对神秘现象进行研究。

但不幸的是，我们在此又遇到了对我们这真诚的意图极为不利的情况。我们的判断所应依赖的观察是发生在令我们的感官知觉模糊、注意力迟钝的条件之下；经过遥遥无期的无望后，可供观察的现象才在黑暗或朦胧的红光中显现。据说，实际上我们的置疑——即批判——态度可能阻止了预期现象的发生。故而，这些现象发生的情境无外乎是我们进行科学探究的一般情境的滑稽模仿。这些观察的对象即所谓的"巫师"（mediums）——那些具有特殊的"敏感"能力的人，但他

---

① 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一书第四章中，对这种"非理性快乐"有详尽论述。

② 引自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

们的智力或性格品质不过尔尔，他们也不像古时创造奇迹的人一样，怀有伟大的见解和高尚的目标。恰恰相反，甚至那些相信他们神秘力量的人，也认为他们极不可靠；我们已揭穿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骗子；而且有理由认为，其余的也会遭受同样的下场。他们的行为给人以儿童恶作剧或魔术师变戏法的印象[①]。在巫师的降神会上，还从未产生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向人们提供一种新能源）。实际上，尽管魔术师通过魔术从其空帽子里变出了鸽子，我们也不期望从中获取孵生鸽子的启示。我很容易理解这样的人：为了获得无偏见的评价，他便去参加神秘的降神会；但他不久就感到厌烦，并厌恶地摆脱他所期望的一切，而退回到先前所抱有的成见之中。人们可能会指责这种人的行为方式是不正确的：人们不应该预先规定其所欲研究的现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并且应该在什么情况中出现。相反，他应该百折不挠，重点放在采用最新的预防和监督措施以抵制巫师的不可靠性上。但不幸的是，这种现代的防备措施使易于接近神秘现象的观察宣告破产了。这样，神秘主义的研究成为一个专门化的艰难行当——一种无法兼顾其他兴趣的活动。在从事这些研究的人们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只能保留怀疑和我们自己的臆测。

在这些猜测中，最有希望的，毫无疑问是下述猜测，即假设神秘主义中存在着尚未为人知的事实的实在核心，而且在这个核心周围，欺骗与幻想已编织成了难以窥人的面纱。我们如何才能接近这个核心呢？从哪一方面入手才能有效研究这个问题呢？这里，我认为梦可以给我们以帮助：它暗示我们应从这种混乱中摄取心灵感应（telepathy）这个主题。

你们知道，所谓的“心灵感应”是指这种妄乱断定的事实：在某个特殊时间里发生的事件，不经过我们所熟悉的种种交流途径，而能几乎是同时地进入到远处某人的意识中。这里暗含着一个前提：该事件涉及到某人，且另一个人（信息接受者）对他有着强烈的情感上的关注。例如，甲遭受意外伤害或死亡，而与甲有密切关系的乙（如甲的母亲、女儿或情人），差不多可以在同一时刻通过视觉或听觉获知此事，就像有电话通知了他，而事实又并非如此；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无线电。在你们面前，我无须坚持这种事的可能性，并有很好的理由对大多数此类报告不加考虑；但所剩极少者却不能用这种方法轻易处理。现在，为明了我所述的内容，请允许我省略前面谨慎使用的“妄乱断定”一词，姑且认为，我相信心灵感应现象的客观真实性。但你们要牢记，事实并非如此，我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

实际上，我可以讲述的内容很少——仅有一个不起眼的事实。如果我告诉你们，梦与心灵感应几乎根本没有关系，这马上会使你们更加失望。心灵感应没有

① 参见《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第五章中类似的论述。



给梦的性质提出什么新的解说，梦也没有为心灵感应的真实性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而且，心灵感应现象与梦绝无密切关系；它也可能在清醒状态中发生。探讨梦与心灵感应之间关系的惟一理由是，睡眠状态好像特别适合于接受心灵感应的信息。在该状态中，人们会做所谓的心灵感应梦；在对其分析中，人们会形成一种信念：心灵感应的信息作用，与白天的其他残余部分的作用相同，并以同样方式被梦的工作所改变，从而为梦的工作目的服务。

在分析这样一个心灵感应梦时，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但我却非常感兴趣的事，我把它作为本讲的出发点。1922 年，我第一次论述此事时，手头上仅有一个观察实例。尽管此后我做了许多类似的观察，但我仍愿意采用第一个实例，因为它最易描述，而且由此我们将引导你们直接接触到这件事的核心①。

有一个显然很聪明的人（他自称毫不“喜欢神秘主义”）曾写信告诉我，他做了一个对他而言似乎非同寻常的梦。他首先告诉我，他远嫁的女儿预期 12 月中旬生第一胎。他很爱这个女儿，而且也知道，女儿非常依恋他。在 11 月 16～17 日夜间，他梦见自己的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接下来他讲了许多实际上解释不了的详细情节，在此我就略而不讲了。在梦中双胞胎的母亲是他第二个妻子，即他女儿的继母。他说，他并未指望他现在的妻子生孩子，因为她没有细心抚育孩子的能力；而且，在他做梦的时候，他已很久没有与她发生性关系了。促使他写信给我的原由，不是他对梦理论的怀疑，尽管该梦的外显内容可能有理由使他产生怀疑，即那个梦为什么违背他的愿望而让其妻子生孩子呢？而且据他所说，他也并没有任何理由担心这件违心的事会发生。促使他把梦告诉我的是下述情况：11 月 18 日早上他收到一份电报，电报上说他女儿生了一对双胞胎。电报是前一天发出的，双胞胎诞生于 11 月 16～17 日夜间，差不多就是他梦到妻子生双胞胎的时间。梦者问我，是否认为该梦与真实事件的巧合是偶然的。他没有冒昧地把该梦称为心灵感应梦，因为梦的内容与真实事件的区别，对他而言似乎是根本的东西——生孩子的人的身份。但他的解释之一说明，如果这真是一个心灵感应梦，他可能也不会对此感到诧异，因为他相信，他女儿在生孩子时一定非常想他。

女士们，先生们：我相信你们已经能解释这个梦了，并且也明白我为何要讲述它了。这个男人对他第二个妻子不满意，而宁愿她是像前妻所生的女儿那样的妇人，诚然，在他的潜意识中，这个“像……那样”是被删掉的。那天夜里，传来了他女儿生下双胞胎的心灵感应信息，而梦的工作控制了这一信息，并让潜意识欲望——由他女儿代替他的现妻的愿望——对它发生作用，从而产生令人困惑的显梦，它掩盖了欲望并扭曲了信息。我们必须承认，只有对梦进行解释，才能向我们表明：这是一个心灵感应梦；精神分析揭示了一个非此无可发现的心灵感

① 这个例子最早在《梦与心灵感应》（1922a）一文中有更加详细的论述。



应事件。

但你们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尽管如此，梦的解释并未向我们显示任何表明心灵感应事件的客观真实性的东西。同样，它也可能是一个可用另外方法解释的幻觉。这个男人的内隐的梦念可能是这样进行的："若正如我所猜测的那样，我女儿的预产期确实弄错了一个月，那么今天就应是她分娩的日期。我上次见到她时，她看上去就像会生双胞胎。我那已故的妻子特别喜欢孩子，倘若她看到双胞胎，该会多高兴啊！"（最后这个因素基于梦者的联想，我未曾提及）由此看来，梦的刺激可能是梦者本身有依有据的猜想，而非心灵感应的信息；不过结果都是一样。至此，你们能理解，就我们是否应承认心灵感应的客观真实性这一问题，即使是对该梦的解释，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该问题仅能依靠对相关所有情况所进行的全面研究才能解决。而遗憾的是，相对我们所接触的其他任何事例，对该事例进行全面研究的可能性并不会更大。即使心灵感应假说提供了最简单的解说，对我们仍无更多帮助。因为最简单的解说并非总是正确的；真理通常并不是简单的，在决定赞成这个重大假说之前，我们必须相当审慎。

现在，我们撇开梦和心灵感应这个主题，因为我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讲述。但是，请你们注意，并不是梦给予我们了解心灵感应的知识的，而是对梦的解释，即对梦的精神分析研究。因此，接下来我们可以把梦完全搁置一边，而寄希望于精神分析对其他的、被称为神秘的事件做一点解释。例如，有这样一种思维迁移现象，它非常接近于心灵感应，并且被认为就是心灵感应也不显冒昧。一个人的心理过程——观点、情感状态、意向性冲动——无须应用人们所熟悉的语言和信号等交流方式，就能够穿越无物空间迁移到另一个人那里。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发生，你们知道，那将是多么非同凡响，甚至可能具有多么重大的实用价值啊！但我们偶尔注意到：非常奇怪的是，这种现象在古代奇闻轶事里却恰恰很少提及。

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我形成了一种想法：职业算命者的活动隐藏着一个可对思维迁移进行观察的机会，而这类观察又是极不易招致非议的。那些人是一群无足轻重、乃至地位卑下的人，他们专心于这样一类活动①——摆开纸牌、研究笔迹或手掌纹路，或运用占星术推算——同时，在表明他们了解问卦者

① 在其死后出版的弗洛伊德早期论文《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41d（1921）]中详述了算命先生通过无意义的活动分散问卦者的注意力的意义，认为这是一种潜意识心理过程释放的方式。在此，他比较了在某些诙谐中类似"分散状态"的应用，这可参阅他的《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一书。更早期在其技术性文献《癔症研究》（1895d）中，他对几种特定的催眠术，特别对早期通过按压患者前额而使之遗忘的方法作了同样的解释。（同上，第2卷，第271页）这在其后《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讨论催眠术时有了进一步发展。也可比较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中对指向某种自动行为的注意力干扰此行为的表现这一事实的一些评论。

的过去与现在后，进而预测其未来。尽管这些预言后来都落空了，但问卦者对此活动仍表现出极大满足和毫无怨言。我已遇到过几例，并运用精神分析研究它们。随后，我将会告诉你们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令人遗憾的是，我因受制于医疗职业道德，而必须对许多详细情况保持缄默，从而削弱了它们的可信度。但是，我将设法避免曲解事实。现在请听听我的一个女病人的故事，她与算命者曾有过这样一种经历①。

她是一个多子女家庭中的长女，并一直强烈地依恋其父。她结婚早，并完全满意自己的婚姻。但惟有一事令她感到美中不足：她没有孩子。故而，她深爱的丈夫无法完全取代父亲在其心中的地位。当她经历多年失望之后而决定接受妇科手术时，她的丈夫却向她披露，责任在他：婚前一场疾病剥夺了他的生育能力。她深感绝望，患上了神经症，明显地陷入害怕被诱惑（对丈夫的不忠）的痛苦之中。为了使她振作起来，丈夫携带她去巴黎出差。在巴黎的一天，他们坐在旅馆的大厅里时，她忽然注意到旅馆服务员中引起了一阵骚动。她询问出了什么事，有人告诉她算命先生蒙西厄·拉（Monsieur le）来了，而且正在那边一个小房间为问卦者解答疑难。她便表示想去试试。虽然丈夫反对这一想法，但趁他没留意时，她溜进了那个询问室，并见到那位算命先生。她当时 27 岁，但看上去显得更年轻，而且她取下了结婚戒指。算命先生蒙西厄·拉让她把手放在一个装满灰烬的碟子里，并认真地研究她的指纹。然后他向她描述横亘于她面前的各种困难，并以一个安慰性保证结束谈话：说她还会结婚，并在 32 岁时会有两个孩子。当给我讲述这个故事时，她已 43 岁，罹患重病，生育孩子毫无指望。因此，那个预言并未实现；但她谈及此事时，非但没有丝毫痛苦，反而带着明显的满足感，好像正在回忆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显而易见，她根本没有注意到预言中两个数字（2 和 32）可能意味着什么或者是否意味着什么。

或许你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愚昧而费解的故事，并会问我为什么向你们讲述这个。如果——这是要点——精神分析尚不可能做到解释这个预言的地步，或预言的可信性恰恰不是来自于对这些细节的解释，我也会产生像你们一样的看法。这两个数字在我病人母亲的生活历程中可见。她母亲结婚晚——直到 30 岁出头——而且，她家人常说起母亲在急于补偿失去的时光上已取得了成功。她的头两个孩子（我的病人是其中年长者）是在间隔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即同一年里）相继出生的；事实上她 32 岁时就已有两个孩子了。因此，算命先生蒙西厄·拉对我病人所说的含义是："你还年轻、不必发愁。你和你母亲的命运相同，她也不得不等很长时间才有孩子，所以等你 32 岁时，你也会有两个孩子。"拥有母亲同样的命运、

① 此事在《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中叙述更为详尽，有几处微小改动，而在 1925 年的论文第三部分中则叙述较为简练。



取代母亲的位置、替代母亲与父亲的关系——这是她早年最强烈的愿望，而正是由于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她才开始患病。那个预言向她许诺，无论如何这个愿望都将实现；她怎会不对这个预言家感到亲切呢？但你们认为算命先生蒙西厄·拉有可能了解这个偶遇的顾客的家庭秘史吗？绝不可能。但他是如何获取信息，从而能够用含括两个数字的预言表达出我的病人最强烈但又最隐秘的愿望的呢？我看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我所听到的故事是假的，其实是另一副样子；要么思维迁移是真正存在的现象。毫无疑问，人们可以假设，相隔16年后，病人把上述两个数字从潜意识中引入到她的回忆中。我做此假设毫无根据，但又无法排除，而且我想，你们将倾向于相信另一种解释，而不是相信思维迁移的真实性。假如你们的确相信思维迁移的真实性，那可别忘了：正是精神分析揭示了这个神秘事实——当它被曲解到难以辨认时，精神分析恢复了它的原貌。

如果每个事例的问题都和我病人的那个例子一样，人们会一笑了之。任何人都不会仅凭一种观察就想建立一个意义重大的信念。但请你们务必相信我的保证：这并非是我遇到的惟一事例。我已收集了大量此类预言，并从中获得一种印象：算命先生只能根据问卦者的询问来表达问卦者的思想，尤其是问卦者的私欲；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些预言分析为问卦者的主观产物、幻觉或人们所提及的梦。当然，不是每个事例都有同等的说服力，也不是每个事例都有可能去排除更具理性的解释；但从总体来看，存在思维迁移的现象，是有很大可能性的。这个课题的重要性使我本应把所有的事例都告诉你们。但是，鉴于其中描述的冗长和对我职业道德的违背，我不能这样做。故而，我将尽量在良心许可的范围内向你们再多提供几例。

一天，一个高智商的年轻男子来拜访我，他是准备参加博士学位最后考试的一名学生，但他抱怨说，他已丧失了一切兴趣、集中注意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有条理的记忆能力；因此，他无法参加考试①。这种半瘫情况的历史很快就真相大白了：他在采取一种自我抑制的行动后就病倒了。他有个妹妹。他以一种强烈但又总是压抑的专注依赖着这个妹妹，正如妹妹对他一样。“我们不能结婚是多么遗憾啊！”他们经常彼此倾诉。但有个受人尊敬的男子爱上了妹妹；而且她也回报了他的爱情。可她的父母不同意这桩婚事。在为难之际，这对年轻人转而求助于她的兄长，而他也没有拒绝提供帮助。他使他们可以互相通信，最后还以其影响力说服父母同意了他们的结合。然而在婚约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而且其意义不难猜到。他和未来的妹夫进行了一次没有向导的、艰难的登山运动；在登山中，他们迷路了，并陷入不能安全返回的危险中。妹妹结婚后不久，他就跌落到这种心力枯竭的境地。

① 《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中，这一案例也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精神分析的作用恢复了他的工作能力，为了参加考试，他告别了我。但在那年秋天他顺利通过考试后，又回到我这里呆了一段时间。那次，他给我讲述了前一个夏季的非凡经历。他大学所在的那个城镇里，住着一个未来预言者，她非常受人欢迎，甚至皇宫王子在做重大事务前也去请教她。她的算命方式非常简单。她除了询问来访者的出生日期之外，其他什么也不问，甚至姓名也不问。然后，她开始查阅占卜书，仔细推算，最后向问卦者说出一个预言。我的病人决定求助她的神秘技术推测其妹夫的未来。他拜访了她，并提供有关日期。她推算后预言："所算的人今年7月或8月会死于小龙虾或牡蛎中毒。"我的病人用这句话来结束他的故事："这确实令人不可思议!"

开始时我非常生气。听完他这句感叹之后，便忍不住问："你看这个预言有什么神奇的？现在已是深秋了，而你妹夫并没有死，否则你早就告诉我了。因此，这个预言并没有变为事实。""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他回答道，"但令人吃惊的是，我妹夫的确酷爱吃龙虾和牡蛎，并且在前一个夏季——换句话说，在我拜访未来预言者之前——他已发生过牡蛎中毒，并差点死掉。"对此我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是感到恼怒。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且做过满意的精神分析）居然不能弄懂事情的原由。在我看来，我不相信能从占卜书中推算出小龙虾或牡蛎中毒，而更倾向于相信，我的病人仍没有消除对其情敌的憎恨，而对这种憎恨的压抑早先曾导致了他的疾患，未来预言者只不过表述了他的愿望："千万不要放弃饮食上的这种嗜好，终有一天，他会因此而死。"我必须承认，对这一案例我想不出其他任何解释；除非我的病人是在与我开玩笑。但是，据与他前后两次的接触看，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且他的话似乎是严肃认真的。

下面再讲另一个事例①。一个官居要职的青年与一妓女私通（liaison），这种隐私关系带有一种古怪的强迫特征。他时常被迫用嘲讽和侮辱的言语激怒她，直至令她彻底绝望。当达到这个程度后，他才感到轻松，便与她和好，送给她一件礼品。但现在他想要与她脱离关系，因为这种强迫似乎使他难以忍受。他也意识到这种私通正在损害他的声誉。他想拥有自己的妻子，建立一个家庭。但因为凭他自己的力量他无法摆脱这个妓女，所以他向精神分析者求助。在他已经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期间，有一次，在辱骂妓女之后，他让她在纸上写了些东西，为的是将它拿给笔迹学家看。据笔迹学家（graphologist）的报告看，这是一个极端绝望、在以后几天极可能自杀的人的笔迹。实际上，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并且这个妓女仍然活着。但精神分析却成功地使他摆脱了束缚。他离开了这个妓女，而倾心于一个年轻的姑娘，他期望这位姑娘会成为他的好妻子。但不久，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使他怀疑起这姑娘的人品。他弄到姑娘的手迹，并把它拿给同一位笔

① 《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中也有一些详述，但此处在有些方面更加充分。



迹学专家看，专家对她笔迹的看法证实了他的怀疑。于是他放弃了娶这个姑娘为妻的想法。

为了对笔迹学家的报告——特别是第一个报告进行评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病人的一些隐私史。在其青年早期，他曾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这与他的情感型性格相一致），尽管这女人仍然还年轻，但比他大得多。当她拒绝他时，他试图自杀，这个想法毫无疑问是发自他的内心。他能逃离死神已是奇迹，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护理，他才恢复过来。但是这疯狂行为给其所爱的女人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她开始喜爱他，于是他变成了她的情夫，从此，他与这个女人保持秘密的接触，并对她赤胆忠心。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当然，那个女人比他更老——他感到有必要离开她，让自己获得自由，过一种自己的生活，建一栋房子并组建自己的家庭，伴随着这种厌恶感，在他心中升起了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报复他情妇的渴望。既然他曾因为她拒绝自己而想自杀，故而现在他希望获得一种由于他离开她，而使她也想自杀的满足。但他仍然深爱着她，以致于这个愿望无法进入他的意识；而且，他也不会过分伤害她而使其自杀。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把第二个情妇作为替罪羊，以满足其复仇的渴望。他纵容自己对第二个情妇进行种种折磨，而这种种折磨本来是他想施加在第一个情妇身上、而使她痛苦不堪的。他对第一个情妇的报复暴露无遗，并不隐瞒他的背弃，而且把她引为自己新恋爱史中的密友及参谋。这个可怜的女人已从施舍爱情降至乞求爱情，她受他信任的痛苦可能远远大于第二个情妇受虐的痛苦。使他抱怨替罪羊的那个强迫感，亦即导致他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那个强迫感，当然已从第一个情妇转向了第二个情妇。他想摆脱而又摆脱不掉的是第一个情妇。在笔迹研究方面我不是权威，对从笔迹推断性格的技术也不很重视；更不相信用这种方式有可能预知书写者的将来。然而，你们知道，不管一个人对笔迹学的价值做什么感想，这样一个事实是绝没弄错的：当笔迹学专家许诺他眼前的笔迹的书写者会于几天内自杀时，也不过再现了询问者强烈的私欲。后来第二个报告也是同类事件，但那里所涉及的并不是潜意识欲望，而是从笔迹专家口里清楚表示出来的询问者的初发怀疑与担忧。附带说一下，在精神分析治疗的帮助下，我的病人成功地走出了他曾沉溺其中的怪圈，并在此怪圈之外找到了他的恋爱对象。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你们听到了梦的解释和精神分析一般是如何帮助神秘主义的。我已用几个例子向你们表明，正是借助于上述两种方法，原尚不为人所知的神秘事实才被公众所理解。对于我们是否会相信这些发现的客观真实性的问题——毫无疑问，你们对此问题有很大兴趣——精神分析不能给予一个直接的答复。但是，借助精神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材料，易给人留下一个完全有利于做出肯定答复的印象。然而，你们的兴趣不会到此为止。你们想知道那些精神分析没有涉猎的更加丰富的材料证明了什么样的结论。但在这里我无法满足你们的兴趣，

因为它已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我进一步能做的惟一事情是向你们报告几种观察，这些观察至少是和精神分析关系密切，是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甚至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可能得到的。我想举一个例子——后来该例在我脑中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我将详细地论述它，希望你们能留心其中许多的细节，虽然如此，可我不得不丢掉很多本可以大大增强该观察说服力的细节。在此例中，事实显而易见，而不需要借助精神分析进一步阐释。然而，在讨论它时，若没有精神分析的帮助，我们的讨论也无法进行。但我预先要告诉你们，在精神分析情境中，该例虽有非常明显的思维迁移，但并不排斥人们产生的各种怀疑，也不允许我们赋予某种资格以支持神秘现象的真实性①。

那么且听听看吧：1919 年秋的一天，大概在上午 10 点 45 分，我正在给一个病人看病，刚从伦敦来的弗西斯（D. Forsyth）博士②递过他的名片拜访我（我确信，假如我以这种方式泄露下面这个事实：他在我的引导下，用了几个月时间研究我的精神分析技术，我的这位来自伦敦大学的令人尊敬的同事，将不会把其作为一件不慎重的事情来看待）。当时我仅有匆忙招呼他一下的时间，于是约定以后会见他。弗西斯博士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因为战争缘故我与外界中断联系之后，他是来拜访我的第一位外国人，他给我带来了美好时光的希望。稍后，即 11 点钟，我的一位病人 P 先生来访。他是一个四五十岁、聪明而友善的人，他是以与女人有性交困难而开始拜访我的。他的病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很早以前，我就提议停止治疗，但他却希望治疗继续保持下去，这显然是因为他把对父亲的温柔的爱转移给我，并从中感到安慰。在那个时期诊金是毫不重要的：这种治疗费用很少。给他治疗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充满刺激和活力的，结果，没有考虑医疗实践的严格规则，精神分析工作往往延长到一个预定的时限。

那天，P 有与女人发生性关系的意图，并又一次提到一个可爱、泼辣而身无分文的女孩，他觉得，要不是她仍是一个处女这一事实挫消了他的任何严肃企图的话，他有可能会与她性交成功的。以前他也常向我提及她，但那天他第一次告诉我，虽然她并不知道他发生性交困难的真正原因，但她经常管他叫“Herr von Vorsicht”（预知先生）。听到这个信息后，我大吃一惊，弗西斯博士的名片还在身边，于是我就将此名片拿给他看。

---

① 该例应称为“第三例”被收录在《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中，在弗洛伊德的这篇论文中说明了它的省略情况，在编者导言中对它作了评述同上，第 175 页。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原始材料被保存下来了。它与这里所作的描述如此相似，以致于人们怀疑前者是对后者的复制。但应补充说明的是，自 1955 年这一卷的标准版著作出版后，那个原稿不幸再次莫明其妙地遗失了。

② 弗西斯（David Forsyth，1877～1941）博士是伦敦查林十字医院的咨询医生，他是 1913 年创立伦敦精神分析学会的最早成员之一。



这些都是该例的事实。我敢说你们会认为它们是毫无价值的；但请继续听下去，后面还有更多的事实。

在他年轻时，P先生曾在英国呆了几年，自那时起，他一直保留着对英国文化的不可磨灭的兴趣。他拥有一个藏书颇丰的英文藏书库，并且过去常常从那里带书给我看。因他之故，我结识了本尼特（Bennett）、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之类的作家，直到那时，我才拜读了他们的著作。有一天，他借给我一本题为《有产者》的高尔斯华绥的小说。故事在一个作者取姓为“福尔赛（Forsyte）”的家庭中展开。非常明显，高尔斯华绥本人也深爱这个家庭，因为在其以后一些作品中，他不断地写到这个家庭中的成员。最后他将所有有关这个家庭的故事汇集成册，取名为《福尔赛世家》。仅仅在我提到的那件事发生前不久几天，他还给我带来这套书中新出的一册。“福尔赛”这个姓和作者力求刻画的所有典型事件在我和P先生的交谈中也起重要的作用，并且成为两个彼此了解甚深的人之间容易形成的秘语的一部分。这些小说中的姓——“福尔赛”（Forsyte）——与我的来访者的姓——“弗西斯”（Forsyth）——差别非常小；而且按照德国人的发音，二者之间的差别简直无法辨别；有一个具有意义的英文单词“foresight”（预见）的发音方式，与上面二词相同，将它译为德文就是“Voraussicht”或“Vorsicht”。所以，P先生从他私人所关心的事实中选出这个姓，结果这个姓恰恰是在同一时期我所关心的；关于这一点，他是没有意识到的。

你们将会同意，现在开始看得更清楚了。但是，我认为假如我们分析阐明了P在同一时期的另两个联想，我们就会对这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有更强烈的印象，甚至能明晰其决定意义。

第一个联想：在这次见面前一个星期的一天8点钟，我没有等到P先生，便外出拜访弗洛英德（Anton von Freund）博士①。当我发现P先生恰好住在同一栋楼的另一层时，我感到很吃惊。由于这件事，我后来跟P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曾到他家去拜访过；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并没有告诉他我去那个公寓拜访的人的姓。现在，即谈到“Herr von Vorsicht”后不久，他问我，弗洛英德-奥特里格（Freud-Ottorego）——正在Volksuniversität②讲授英文课程——是否可能是我的女儿。在我们的长期交往中，他第一次如同我已习惯于被工作人员、官员和排字工误称的那样，将我的姓“Freud”误为“Freund”。

第二个联想：在同一时期结束时，他告诉我一个梦，他被该梦吓醒——他说这是一个十足的“恶梦”（Alptraum）。他补充说，不久前他忘了英文中“恶梦”是怎样拼写的，当有人请他说出英文“恶梦”一词时，他竟将“恶梦”一词说成

---

① 杰出的匈牙利精神分析者。

② 即“民众大学”，提供英国人所说的“成人教育”。



是“马厩”（a mare's nest）。当然这是很荒唐的；他继续说，“a mare's nest”意指某种不可信的谎言而“Alptraum”应译为“nightmare”（恶梦）。这个联想与先前的那个联想间惟一的相同之处好像就是同为英文。然而，我却想起一件发生在大概1个月以前的一件小事情。当一个来访者——我在伦敦的好友琼斯（F）博士——在久别之后不期而至时，P和我正坐在房间里。于是，我暗示琼斯先到隔壁房间等一下，等我与P谈完。然而，P立即就从候诊室里挂着的照片中认出了他，甚至表示希望被引见。琼斯是一本论恶梦的专著的作者，我不知道P当时是否熟悉它，他避免阅读精神分析的书籍。

现在，我想探讨通过对呈现于你们眼前的，关于P的联想的背景和动机的研究可获得什么样的分析性理解。“Forsyte”或“Forsyth”这个姓对于我和对于P有相似的意义；我把我对这个姓的熟悉完全归功于他。显著的事实是，由于新出现的一件事——伦敦医生的到来，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个姓对我而言非常重要，而仅在此后极短的时间里，他就把这个姓带进了正在进行的精神分析之中。但是，这个姓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出现的方式可能与事实本身一样，是非常有趣的。例如，他不说：“我正好想‘Forsyte’这个你在小说中熟悉的姓。”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姓的来源，但却能把它引入自己的经历中，从而说出它——这是一件很久以前就可能发生、但直到那时才出现的事。他当时所说的就是：“我也是一个福尔赛，那个女孩就是这样喊我的。”我们不难知道这句话所表达的，是嫉妒的需要和悲哀的自我贬低的混合物。假如我们用下述方式把这句话表达完整，我们将不会误入歧途：“你的心思如此专注于这个新来访者，这使我受到了感情伤害。再回头注意我吧，毕竟我也是一个福尔赛——虽然像那姑娘所说，事实上我仅是一个预知先生。”随即他的思路沿着“英国人”这个联想的线索，追溯到上述两个事例，这两件事能使他产生同样的嫉妒感。“几天前您曾拜访了我的公寓——但不是去看我，而是去拜访弗洛英德先生。”这一想法使他将“Freud”扭曲为“Freund”。由于作为一位英文教师，她提供了最明显的联想，故而来自课程表上的“Freud-Qttorego”必定在此出现；并且，几个星期前的另一位来访者现在也出现在回忆中，毫无疑问，他对这个来访者也是同样嫉妒的，但又感到自己不是这个来访者的对手，因为琼斯博士有能力写二本论恶梦的专著，而他自己至多只能做这样的梦。他所提及的在“a mare's nest”一语的意义上所犯的错误也与此有关，因为它只能意味着：“毕竟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就像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福尔赛一样。”

这里，我不能用不合适或不明智等词语来描述他的嫉妒感。他曾被告诫过，只要外国小学生和病人返回维也纳，他的精神分析治疗，还有我们的联系便可能结束，而且此后不久，事实也确实如此。然而，我们取得了一次如此成功的精神分析工作：对由他在同一时间内提出的、并为相同的动机所激励的三个联想进行了解释；这个解释与下述另一个问题没有多大关系：若没有思维迁移，这些联想



是否能够形成？这个问题都出现在三个联想中，并分为三个不同的问题：P能知道弗西斯博士刚对我进行了他的第一次拜访吗？P能知道我到他的公寓去拜访的那个人的姓名吗？P知道琼斯博士已写了一本论恶梦的专著吗？或者，这仅是我对出现于他的联想中的这些事的认识？我的观察是否能得出有利于思维迁移的结论，将决定于对这些不同问题的回答。

让我们把第一个问题搁置一下，因为另外两个问题更易于解决。我去他的公寓拜访一事，初看起来具有特别的说服力。我断定，我在简略而玩笑式地提到我曾拜访他的公寓时，并没有说到我拜访的人的姓。我想，P绝不可能在公寓里打听我拜访的那个人的姓名。我更相信他完全不知道那个人的存在。但这个例子所提供的证据价值被一偶然事件完全毁了。我去公寓拜访的人不仅叫"Freund"，而且还是我们大家的真正朋友①。此人就是弗洛英德博士，他的捐款使我们创建出版社变为可能。他的早逝，以及几年后我们的同事阿伯拉罕（Abraham Karl）的去世，是精神分析发展中的最大不幸。所以，我有可能曾对P先生说过："我在你的公寓里拜访了一个朋友（friend=freund）。"由于这种可能性，他的第二联想的神秘性便烟消云散了。

同样地，第三个联想在我们心中产生的神秘性印象也相当快地消失了。假如P从未读过任何精神分析的著作，他也能知道琼斯出版过一本论恶梦的著作吗？是的，他能。他拥有来自我们出版社的许多书，而且无论如何，他都可能看到过用于做广告的、登于封皮上的新出版物的标题。这无法证明，但也不可否定。因此，沿着此途径，我们不能得出结论。令我遗憾的是，我的这个观察像许多类似的观察一样，有着相同的弱点：记录得太迟，并且讨论时，我既不能再看到P先生了，也不能进一步向他提问题了。

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第一个事件，该事件自身就支持了思维迁移这一显见的事实。P能知道在他来之前，弗西斯博士曾与我会晤了一刻钟吗？他能知道弗西斯博士的存在或弗西斯博士到了维也纳吗？对这两个问题，我们不必马上做出否定回答。我认为有一种说法可对此做部分肯定的回答。毕竟，我有可能告诉过P先生，我正在期盼着一位来自英国的博士——他是我在战后的第一个和平使者——接受精神分析训练。这可能发生在1919年夏季，早在来前的几个月，弗西斯博士就与我通信预约。我甚至当时就向P提到过他的姓名，尽管这对我来说好像是不可能的事。鉴于这个姓名对于我俩还具有另一种意义，我们当时就一定对它探讨过，而且其中某些东西本应留在我的记忆之中。然而，也有可能当时探讨过，可后来我完全忘记了。因此，在对P做精神分析治疗期间，他说出的"Herr von

① 当然，"Freund"系德文中"朋友"之意。弗洛伊德曾为他写过令人感动的讣告（1920c）。



Vorsicht”使我大吃一惊而视为奇迹。假如一个人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怀疑主义者，那么偶尔也怀疑一下自己的怀疑主义是有益的。也许我也有一种对神奇事物的隐秘倾向，从而制造出神秘事实。

这样，假如结果是我们已排除了一种神秘现象存在的可能性，仍有另一种可能性在等着我们，而且常难处理。假设P先生知道有弗西斯博士这个人，也知道弗西斯博士正被期望能在秋天来到维也纳，那么，怎样解释正好在弗西斯到达的那一天，并且是弗西斯进行他的第一次拜访后不久，他便立即知道弗西斯来了呢?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偶然——无须加以解释。但是，我讨论P的另两个联想，正是为了排除偶然性，为的是说明他的确对拜访我的人怀有嫉妒的心态。或者，人们不应忽略一种极端的可能性，即假设P已观察到我显得异常兴奋（可以肯定，我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由此得出结论。还可以认为，尽管是在那个英国人离开后一刻钟到的，P在他俩都必须经过的一条小街上遇到了弗西斯，从他典型的英国人外表认出了他，并在一种永恒的嫉妒状态中想到：“哦，这就是弗西斯博士；他来了，我的精神分析治疗就要告终了。他很可能是直接从教授那里来呢!”我不能再进一步做这些理性主义的假设了。否则，我们会再次落得个“不可证实”的结局，但我必须承认，我有一种感觉：该例也是赞成思维迁移的。而且，绝不只我一个人在精神分析情形中经历过像这样的“神秘”事件。在1926年，多伊奇(Helene Deutsch)曾发表了一些类似的观察报告，并研究了它们如何受病人与精神分析者之间的移情作用的影响。

我相信，你们将很不满意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不完全相信但又准备相信。你们也许会对自己说：“这就是下述一种人的另一个例子：作为科学家他终身尽职尽责；但到晚年却变得低能、对宗教虔诚而且轻信。”我意识到有一些伟人一定是被包括在这类人中，但你们不应把我归于其中。至少我并没有变为宗教狂徒，我也希望自己不会轻信。如果一个人终身信服现实，避免与其产生痛苦的冲突，那么此人晚年时也应时刻准备信服新的现实。毫无疑问，你们喜欢我能保持一种温和的信念，并毫不留情地反对一切神秘事物。但我不能曲意奉迎你们，并且我要奉劝你们，对思维迁移和心灵感应的客观可能性应有一种较友善的想法。

你们不会忘记，在此我只想尽可能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处理这些问题。十多年前，当这些问题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由于认为它威胁着我们的科学世界观，故而我也感到一种恐惧。我担心，若某些神秘现象被证明是真的，那么科学世界观必定为心灵主义或神秘论所取代①。今天我的想法就相反了。在我看来，假如有人认为科学没有能力同化和重新产生在神秘主义者断言中的可能被证实为真的

① 弗洛伊德身后发表的《精神分析和心灵感应》(1941d)一文的引言部分，详细阐述了这些思想（标准版，第18卷，第177～181页）。



东西，那么就表明，我们的科学世界观不十分信任科学。特别是就思维迁移而言，实际上，它似乎是赞成科学的——或正如我们的反对者所说，机械的——思维方式扩展到难以把握的心理现象。心灵感应的过程被假定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激起另一个人同样的心理活动的产生。联结这两个心理活动的东西很可能是一种物理过程，在心灵感应的一端、一种心理过程转化为这种物理过程；而在心灵感应的另一端，这种物理过程又还原为相同的心理过程。将这种转化看成是类似于诸如打电话中听与说的转化之类的过程，是不会错的。只要想想，假如某人能了解这种心理动作在物理上的对应，那该多好！我认为，精神分析在物理的和前面称为"精神"的事件之间插入潜意识，因而似乎为诸如心灵感应之类的转化过程的假设铺平了道路。一个人只要使自己习惯于心灵感应的观念，就可以借它来完成很多解释——事实上，就目前而言，这种想法仅仅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众所周知，我们还不知道在一个昆虫大群体中共同意图是如何形成的，可能是通过心灵感应之类直接的心理传递形成的。由此可猜想：心灵感应是个体间的原始而古老的交流方法；而且在种系进化中，它已被借助由感觉器官收到信号进行交流的更好方式所替代。但这种更古老的方式应该仍然存在，并在特定的条件下仍能起到作用——比如在情绪激动的公众中。所有这些尽管仍不能确定，而且充满着未解之谜，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要害怕它。

假如心灵感应之类事物是一个真实的过程，那么，尽管难以证明，我们仍可假设它是一种相当平常的现象。假如我们能够证明它特别存在于儿童的心理生活中，那么它就与我们的期望相吻合了。这里，我们想起儿童频频出现的对这样一种想法所表示的焦虑：即父母知道他们未表露的所有思想——这与成人对上帝无所不能的信仰正好相似，或者是后者的起源。前不久，伯林翰（Dorothy Burlingham）——一个值得信任的见证者——在一篇论儿童分析与母亲的论文（1932）中发表了一些观察报告，假如它们能被证实，那么就能结束对思维迁移真实性所保留的怀疑。她利用一种不再稀奇的条件，对一位母亲及其孩子同时进行精神分析，并报告了下述一些值得注意的事件。有一天，在接受精神分析中，母亲说起一枚在她童年某一时期中具有特殊作用的金币。其后不久，当她回到家里时，她的10岁左右的小儿子跑到她的房间，带给她一枚金币，并求她代为保管。她惊讶地问他从哪里弄来的金币。他说是在过生日的那天得到的；但他的生日是在几个月前过的，没有任何理由让人相信，为什么恰好在那时她的孩子记起这枚金币。母亲把这个偶然事件报告给儿子的精神分析者，要求她找到孩子这一行为的原由。但孩子的精神分析者并没有对这件事作出说明；孩子那一天的举动与其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几个星期后，当母亲正遵循医嘱，坐在写字台前记录下这一经历时，儿子走了进来，并想要回这枚金币，因为他想在下次做精神分析时，将这枚金币拿给精神分析者看。当然，孩子的精神分析者也不能对孩子的这一行为做出解释。

而这些就促使我们又回到了精神分析中去——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想讨论的。



第31讲
心理人格的剖析[①]

女士们，先生们：

我知道，无论是与人还是与物打交道，你们都明白出发点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对精神分析也是同样适用的。精神分析是从症状出发的，而症状在所有的心理内容中，最为自我所不知，这一出发点与精神分析的发展过程或其所得到的待遇并非无关紧要的事情。症状源于被压抑的欲望，可以说它们是被压抑的欲望在自我面前的代表；但压抑是与自我完全不同的领域，是内部的异质领域——这就如现实（请原谅我用这种非同寻常的表述）是外部的异质领域那样。从这条途径可使症状通往潜意识、通往本能生活、通往性行为；由此精神分析便遇到了堂而皇之的反对：认为人不仅仅是性生物，还有比性更高尚更高级的冲动。也许还可以补充说，由于受到更高级的冲动的意识熏陶，人们常以为有权利做无聊的思考，并无视事实。

这一切你们是非常了解的。从一开始我们就说过，由于抗不住对本能生活的要求与自身对本能生活的抵抗之间的冲突，人类病倒了，我们片刻都没有忘记这种抵抗、反抗和压抑的因素，我们认为这个因素是由特殊势力——自我本能——武装起来的，并与大众心理学中的自我相一致。事实上，从科学工作进展的艰难性看，即使是精神分析，也没有能力同时研究每个领域，一时间对每个问题都发表观点。但是，当我们有可能把注意力从被压抑的内容转向压抑的力量时，最后我们还是能接近上述目的的。我们面对的自我，看上去如此不言自明，我们深信在这里将再次找到我们未能充分准备的一切。但是，要找到研究的第一人口是不容易的；这就是今天我打算告诉你们的主题。

---

① 此讲中大部分材料（和某些细节阐述）来自于《自我和本我》（1923）第一、二、三和五章。



不过，我先要让你们了解我的疑虑：我的关于自我心理学（ego-psychology）的论述和关于潜意识的讲演，将会对你们产生不同的影响。我无法肯定为什么会这样。起初我想，你们会发现我先前告诉你们的主要是奇怪而特殊的事实，而现在你们将听到的则基本上是观点，即猜测。但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在进一步思考之后，我就应强调指出，我们在自我心理学中对事实材料所做的理性研究，比起神经症心理学来，其程度并不更高。对于我所猜测的结果，我也不得不放弃别的解释：现在我相信问题在于材料自身的性质，在于我们还不习惯应付它。无论如何，假如你们在判断时远比从前更谨慎和小心，我是不会大惊小怪的。

在研究伊始我们遇到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示了研究的方法。我们希望将自我，即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作研究材料。但是，那可能吗？毕竟从本质上讲，自我是一个主体；它怎样才能变为一个客体呢？嗯，毫无疑问，它是能够变为客体的。自我可以其身为客体，一如对待其他客体那样对待自己，能够观察自己，批评自己，并且做无人知晓之事。这样，自我的这一部分是可以监督另一部分的。所以，自我可被分离；在其一些活动中，至少可暂时分离成不同的部分。随后，不同部分又可重新整合。这一看法其实并不新奇，虽然有时也还需对一种人所共知的观点做一不寻常的强调。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一观点并不陌生：病理现象可通过夸大或简化某些事情，而使我们注意到正常情形，否则我们将会忽略这些正常情形。凡在显示出裂口或缝隙的地方，在正常情况下是一个接合处。假如我们把水晶物体投掷到地板上，水晶的物体就碎了；但并不是碎成杂乱无章的碎片。它总是沿着一定的纹路裂成碎片的。这些纹路虽然是看不见的，但却已是由水晶的构造预先决定了的。心理病人（mental patients）就是这样一类的分裂体和破碎体。我们甚至无法不对他们产生某种类似过去的人对疯子所怀有的敬畏感。他们已从外部现实脱离出来，并为我们揭示许多通过其他途径我们无法知晓的事情。

我们将这些病人中的一类人描述为患有被监视的幻想。他们向我们抱怨说：甚至在他们最隐秘的活动中，也不断地受到莫名力量——可能是人——的监视和干扰，在幻觉中，他们听到这些人报告他们的监视结果："现在他将要说这个了，现在他正穿衣服准备出门"等等。这类监视虽然与迫害不同，但也与之相去不远，它说明人们不信任他们，并期望在他们进行违禁的活动时逮住他们，以便对他们进行惩罚。假如这些疯狂的人都是对的，假如在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中都存在这样一个机构，用以实行监视，以惩罚相威胁，并且明显地从自我中分离出来，错误地移植到外部现实中，那么结果会怎样呢？

对此问题的看法，我无法知道你们是否和我相同。由于对这次临床经验具有强烈印象，从此我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监视机构从自我中分离，可能是自我结构的一个正常特征。这种想法从未离开过我，它促使我进一步研究分离出来的



机构的特性和联系。我很快就要进行下一步研究。被监视的幻觉内容已经暗示：监视仅是一种为了评判与惩罚的准备，随即我们猜想，该机构的另一功能必定是我们称之为良心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几乎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像我们的良心那样，如此频繁地让我们与自我分离，如此容易地与后者相对立。我倾向于做那些我认为会给我带来快乐的事情，但考虑到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放弃了。或者，我屈服于一个过于强大的谋求快乐的欲望，从而做了某种违反良心的事情，而后我的良心用令人痛苦的责备处罚我，并让我为此行为感到羞愧。我可简单地说，这个我开始从自我中分出的特殊机构便是良心（conscience）。但保持该机构的独立，并假设良心是其功能之一，而作为良心评判活动的基本准备的自我监视是另一个功能，这是一种更为审慎的做法。既然我们承认该事物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们就赋予它自己的名字，从此以后，我将把自我中的这个机构描述为“超我”。

现在我准备着你们轻蔑地问我，我们的自我心理学是否沦落到只能在文字上或原始意义上去使用日常的抽象概念，使其由概念转变为实体——此外就一无所获？对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自我心理学要逃避普遍知道的东西是困难的；这与其说是关于新发现的问题，不如说是关于对事物采取新的观察方法和新的整理方法的问题。因此，你们尽可暂时保留着你们的轻蔑批评，静待我的进一步解释。病理现象和事实为我们的努力提供了基础，而在大众心理学中寻找这个基础是徒劳的。所以我将继续我的演讲。

假若我们已熟悉了超我这个概念，认识到超我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遵循自己的意图行事，并且在能量供给上独立于自我，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一种临床情境。它非常引人注目地表明了该机构所具有的严厉性、甚至是残忍性，表明了它与自我的关系的变化。我正在思考忧郁症的情境，更确切地说，是忧郁症发作的情境，即使你们不是精神病学家，你们也听过关于此症的许多事情，对该症的原因与机制我们仍知之太少，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超我——你们可把它叫做“良心”——对待自我的方式。尽管在健康期间，一个忧郁症病人像其他人一样，对他本人表现出或多或少的严厉性，但在忧郁症发作时期，他的超我就变得过分严厉，责备、羞辱、虐待可怜的自我，以最可怕的惩罚威胁它，因自我在很早以前所做的轻率行为而责备自我——似乎在忧郁症两次发作的间歇期内，超我就在收集自我的罪名，然后一直等到现在力量变得强大时，才一并宣布这些罪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做出责备性的评判。超我把最严格的道德标准施加给在其控制下的无助的自我；一般而言，超我代表着道德要求，而且我们很快认识到，我们的道德内疚感是自我与超我之间紧张状态的流露。理解道德是一种非常不平凡的经验，因为这经验被认为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故而深植于我们心中，作为一个阶段性现象（在这些病人中）发挥作用。数月之后，由于道德上的全部纠纷都结束了，超我的批判也沉默了，故自我重获其位置，而且再次享受人的所有权利，直至下一次忧郁症发

作。在此症的某些状态中，其发作的间歇期内的确会发生某种相互矛盾的事情；自我处于一种兴奋的快乐状态，它庆祝一个胜利，似乎超我失去了所有力量或消融进自我之中；这个被解放的、疯狂的自我允许自己所有的欲望得到真正的、没有任何约束的满足。这里就产生了很多的未解之谜。

毫无疑问，当我告诉你们，我们已发现了关于超我的形成——即良心的起源——的所有情况时，你们将希望我尽可能地多做一些说明。康德在一个著名的论断中，曾将我们的良心和繁星满布的天空相提并论：一个虔诚的人可能试图将良心与繁星满布的天空看做是上帝的两大杰作。星星的确是美丽的，但就良心而言，上帝却做了一件质地不均匀的和粗心的工作，因为绝大多数人与生俱来的良心为数甚少，甚或微不足道。我们绝没有忽视良心起源于神的论断中蕴含着心理学的片断真理，但这个观点需要解释。良心虽然存在于我们心中，但它并非在人生之初就已具有的。在这点上，它与性生活正好相反，性生活实际上是产生于生命之初，而非仅为后天形成。但是，大家知道，幼童是非道德的，对其追求快乐的冲动，幼童是没有内部抑制能力的。后来由超我负担的责任，一开始是由外部力量或父母权威来执行的。父母以示爱的方法和惩罚相威胁的方式支配着儿童，其中惩罚意味着儿童失去爱，而儿童为其自身利益考虑，必然害怕这种惩罚。这种现实的焦虑是后来道德焦虑的先河[①]。只要现在的焦虑还占统治地位，儿童就不能形成超我或良心。只是到后来，第二种情形即道德焦虑才会逐渐发展（我们常言过其实地将其看做是一种标准状态），这里外部的限制内化了，超我取代了父母这一职能，并采取一种方式——此方式与以前父母对儿童所用的方式完全相同——监视、指导和威胁自我。

结果，超我接管了父母这一职能的力量、作用和方法，但它不仅是该职能的继承人，而且是合法的继承者。它直接产生于该职能并继续发展，现在我们就来认识它的发展过程。不过，首先我们须评述二者之间的不同。超我好像已作出片面的选择，只选择了父母的严格与严厉、限制和惩罚的功能，而好像并未继承和保持父母的爱的关心。假如父母的确是用严厉来增强其权威；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儿童为什么会发展严厉的超我。但是，与我们预期相反，经验表明，即使父母的抚养是温和而友善的，并且尽可能避免威胁和惩罚，超我仍然会变得无情而严厉。后面，当我们处理超我形成过程中本能的转化时，我们会再来谈这个矛盾[②]。

对于父母权威转变为超我的过程，我无法将我想说的全部告诉你们，一半是

---

① “Gewissensangst”字面意思是“良心的焦虑”，在《抑制、症状与焦虑》的编者注中有关于这个词的论述（标准版，第20卷，第128页）。

② 参阅英文原版第109页。



因为该过程如此复杂，以致于对它的表述不适于纳入现在这个介绍性讲演的范围中，而另一半也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不肯定我们完全了解这个过程。故而，用下面的简单方式进行介绍，你们应感到满意。

该过程的基础就是我们所称的“认同”（或译自居）（identification）——即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自我的同化①，结果，在某些方面，第一个自我像第二个自我那样行动，摹仿后者，并在某种意义上将后者吸收到自己之中。人们不恰当地把认同比做是吞食别人的合并。这是一种依赖别人的非常重要的方式，可能是最早的方式，但认同与对象选择不是同一回事。二者的差别可用下列方式进行表达：假如一个男孩使自己认同父亲，他就想像父亲一样；假如他把父亲作为他的选择对象，他就想拥有他，占有他。在第一种情况中，他的自我是根据父亲的模型而变化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中，就没必要改变了。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和对象的选择是相互独立的；但一个人可能认同另一个人并根据他的模型改变自己的自我，也可能把此人作为诸如性的对象。据说性的对象对自我的影响，尤其常发生在妇女身上，并成为女性气质的特征。在早期的讲演中，我已向你们论及认同与对象的选择之间最具指导性的关系。无论在儿童身上或者在成人身上，在常人身上或在病人身上，这种关系都同样地容易观察到。假如一个人失去了对象或被迫放弃对象，他常通过认同该对象和在自我中重建该对象的方式来补偿损失，因而可说对象的选择在此回复到了认同②。

对认同的这些说明，我自己也感到不太满意，但是，假如你们赞同我的关于超我的构成能被描述为是对父母职能认同的成功事例的观点，那么上述说明也就足够了。明确支持该观点的事实是：这个产生于自我的更具有优势的职能与伊谛普斯情结的命运有密切的联系，以致使超我以对儿童具有极大意义的情感依恋的继承者姿态出现。就像我们所能看见的随着伊谛普斯情结的消失，儿童放弃了初期对父母所形成的强烈的精神贯注；但是，作为对失去对象的补偿，儿童就会进一步加强对父母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是已被放弃的、对对象的精神贯注的沉淀物，它在儿童后期生活中如此频繁地发生；但它在自我中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个特殊的位置，这完全与它在转化中的情感重要性一致。进一步的研究也向我们显示，假如对伊谛普斯情结的克服仅是不完全的成功，那么超我的力量与成长就会受到阻碍。在发展过程中，超我也接受那些步入父母位置的人——教育者、教师、被选做偶像的人——的影响。在正常情况下，超我与父母原型渐渐相背离；换句话讲，

① 如一个自我趋向于相似的另一个自我。

② 这个问题在《精神分析导论》中实际上只极为简单地提及过（参阅第26讲后半部分，标准版，第16卷，第427～428页）。认同是《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七章的主题；超我的形成在《自我和本我》（1923b）第三章中有详细论述。同上，第19卷第28页。



它变得更加非人格化了。人们也不应忘记，儿童在其生活的不同阶段对父母的评估各不相同。在伊谛普斯情结让位于超我时，在儿童心目中，父母是相当伟大的；但后来，父母就大大失去了威信，而后，认同产生于后来这些失去权威的父母，并的确常对性格的形成起重要作用；但那种情况中，它们仅仅影响自我，而不再影响超我，这个超我已被最早的父母意象所决定了①。

我希望你们已经形成一个印象：超我的假设已真实地描述了一种结构关系，而不仅仅是把诸如良心之类的抽象物进行人格化。还有一个归之于超我的更重要的功能没有提到。超我也是自我理想（the ego ideal）的载体，自我依照它来估量自己，竭力模仿它，力争满足它更加完善的要求。毫无疑问，这个自我理想是早年父母意象的积淀物，是那时儿童对父母所具的完美性的钦佩表现②。

我确信你们已听过大量关于自卑感乃是神经症的特征的论述。"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尤常见所谓的纯文学作品中。使用"自卑情结"这一术语的作者认为，通过这样做，他才满足了精神分析的所有要求，并使其作品上升到较高的心理学水平。事实上，"自卑情结"是在精神分析中很少使用的一个技术术语。对我们而言，它不具有任何简单的、更不用说是基本的含义。如果像以"个体心理学家"（Individual Psychologists）③ 著称的学派喜欢做的那样，将自卑情结还原为个体对感官缺陷的自我知觉，这似乎是一个鼠目寸光的错误。自卑感有强烈的性爱根源。假如一个儿童认为自己不被喜爱，就会产生自卑，成人也是这样。惟一被真正认为低下的肌体器官是萎缩的阴茎，即女孩的阴蒂④。但自卑感的主要部分却来自于自我与超我的关系；犹如犯罪是自我与超我之间紧张状态的流露一样。概言之，自卑感与罪疚感是难以分开的。把前者当做是对道德自卑感的性爱补偿，这也许是对的。精神分析对这两个概念的界限问题注意得很少。

仅仅因为自卑情结变得如此流行，我们才敢冒昧地向你们提及一点题外话。

---

① 这个观点在弗洛伊德《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一文中有论述，另外，在那里，编者注释处理了弗洛伊德对"意象"（image）这一术语的使用。

② 该段，尤其是《自我理想的工具》这部分有些含糊。当弗洛伊德在《论自恋》（1914）的文章中首次使用这个概念时，他区分了自我理想本身与"一种特殊心理功能，这种功能的任务是认识自恋从自我理想中获取满足的情况，并根据此认识，用自我理想监视和评价实际的自我"。与此相同，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6讲中，他论及一个人感到"自我中有一种支配性的功能，它根据理想自我来评价实际的自我及每个活动，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但在他后期的一些文章中，理想和执行理想的功能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了。在此，这种情形可能再现，超我可能被等同于执行功能。在其后3段（第66页）中术语"Idealfunktion"（理想功能）的使用产生了同样的问题，在《自我与本我》（1923）的编者导言中论述了整个主题。

③ 在后面第34讲论述了他们的观点。

④ 参阅弗洛伊德《论两性的解剖学区别》（1925j）一文的注脚。



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历史人物，尽管已退居幕后，但他仍活着。他的一条腿在他出生时就因受损而残废。一个相当有名的现代作家非常喜欢编辑名人传记，他就撰写了我正提及的这个人的生平[①]。现在写传记，要压制剖析人物心理深度的要求，这可能是不太容易的。因此，我们的作家进行了一个大胆尝试：他把主人公性格的全部发展过程都建立在其因生理缺陷而导致的自卑感之上。这样做时，他就忽略了一个虽小却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实：这就是那些不幸生下一个病弱或有其他缺陷的孩子的母亲，常常试图用超负荷的爱来弥补孩子所遭受的不公平的缺陷。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例子中，这个傲慢的母亲却行为异常：她因孩子的残缺而收回母爱。当孩子长大成为一个拥有强权的人物时，他用行动明确地表明，他从未原谅他的母亲。当你们认识到母爱对一个儿童心理生活的重要性时，毫无疑问，你们会对传记作家的自卑理论做一个心照不宣的修正。

但是，现在请你们重新回到超我上。我们已经分派给它三种功能：自我监视、良心和（保持）理想[②]。从我们关于超我起源的讲演中，可知它是以一个重大的生物事实和一个重大的心理事实为前提的：即人类儿童对其父母的长期依靠和伊谛普斯情结；这两个事实又是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的。对我们而言，超我是每一个道德约束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倡导者——简而言之，超我就是我们从心理学意义上所能把握的、被描述为人类生活更高层面的东西。由于超我本身可以追溯到父母和教育者等人的影响，故而，假如我们求助于这些起源，就可更加理解它的重要性。通常，父母和类似父母的权威者都按照他们自己的超我规范来教育儿童。无论他们的自我和超我达成什么谅解，在教育儿童时，他们都是严厉而苛刻的。他们已经忘记自己儿童时期的种种困难，而很高兴现在孩子能认同他们自己犹如认同他们的父母；在过去，他们的父母也是将这些严厉的约束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结果，儿童超我的形成实际上是以其父母的超我为模型的，而不是以其父母为模型。因此，超我的内容都是相同的，它成为传统的价值判断的载体，这些传统的价值判断以超我的方式代代相传。你们不难猜到，超我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如过失问题——有何等重要的帮助，甚至可能对教育赋予了实际的启示。所谓的唯物史观很可能就错在低估了这个因素。他们摒弃超我这个因素，而主张人们的“意识形成”只不过是同时代经济条件的产物和上层建筑。这是事实，但它很可能并非真理的全部。人类从未完全生活于现在。种族和民族的过去即传统，是存在于超我的意识形态中的；并且，这种传统仅是慢慢地屈从于现实的影响和种种新的变化；而且它只能通过超我的活动，才能在人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完全不依赖于经济条件（参阅英文版第 178 页）。

---

① 见埃米尔·鲁德韦格（Emil Ludwig）著《威廉姆二世》（1926）。

② 关于“Idealfunktion”（理想功能），参阅前面第 65 页的注释。



1921年我努力利用自我和超我间的分化研究群体心理学。我获得了这样一个公式：心理群体是个体的集合，他们把同一个人引人他们的超我，并根据这个共同的成分在各人的自我中互相认同，那便成为一种心理的集体①。当然，这只适用于有领袖的群体。假如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这类应用，那么超我的假设对我们而言，就失去了最后一点迷惑；而且，当我们熟悉了心理的底层领域，转而研究较高层面的心理结构时所产生的尴尬感，也就可以完全消除了。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分离出超我就完全解决了自我心理学的问题。这只不过是第一步；但这方面的困难，却不以第一步为限。

然而，现在我们应提出，在自我的相反一端还有另一问题等着我们解决。实际上在精神分析工作中，一个很早的观察已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该问题频繁发生，故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理解其重要价值的关键所在。就像你们所知，精神分析的整个理论，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对抵抗的理解之上的。当我们试图使病人的潜意识变为有意识时，病人就向我们表现出这种抵抗。该抵抗的客观标志是病人的联想失败或远离所涉及的主题。通过这一事实——当他接近该主题时，会有种种痛苦的感情——他可能主观上认识到抵抗的存在。但也可能没有这最后的标志。因此，我们对病人说，我们从他的行为中推知他处于一种抵抗状态；病人则回答道，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点，只是觉得他的联想变得更加困难。这证明我们是对的；但在那种情境下，他的抵抗也是潜意识的，就像我们正在探讨如何提升的压抑是潜意识一样。我们很早以前就应该提出这个问题：这种潜意识的抵抗来自心理的哪一部分？精神分析的初学者将准备马上回答：当然，它是潜意识的抵抗。这是多么模棱两可而且无用的回答。假如它意味着抵抗产生于压抑，我们必定反驳：当然不是！相反，我们宁愿认为被压抑的内容具有一种强大的向上冲的驱力，具有闯人意识的冲动。反抗仅能是自我的一种表现，自我最初实行压抑，并且现在又希望保持压抑。这就是我们早年一直采取的观点。现在因为我们已假定，自我中有一个特殊的职能即超我，它代表着各种约束和反对特性的要求，故而我们可说，压抑是超我的工作，或者由超我亲自实行压抑，或者由自我依其命令实行压抑，假如我们在精神分析中遇到的抵抗并未被病人意识到，这就意味着超我和自我在某些相当重要的情况中能够无意识地活动；或者——这可能更重要——自我和超我的某些部分本身就是潜意识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发现：一方面，自我（包括超我）不完全与意识相一致；另一方面，压抑也不完全与潜意识相一致。

女士们，先生们，谈到这里，我觉得应该歇息一下——你们也可能希望如此——在我继续讲演之前，我应该向你们道歉。我想对我在15年前发表的精神分析

① 参阅《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



导论做一些补充，我这样做，好像你们和我一样，在这15年里除了从事精神分析之外，别的什么也不做。我知道，这种假设是不恰当的；但我又别无他法，只好这样做。毫无疑问，这与下述事实有关联：一般情况下，要让一个非精神分析者深刻地理解精神分析，这是非常困难的。当我告诉你们，我们并不愿意给人一种是神秘团体的成员或从事神秘科学的印象时，你们应该相信我。但我们仍然得指出并表达我们这样一种信念：若没有亲身经受精神分析而获得那种特殊经验，他（或她）就无权加入精神分析的探讨。15年前当我向你们做讲演时，我试图省略我们理论中某些思辨部分；但是我今天要对你们讲述的新发现，却正是来自于这些思辨部分。

我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面对这样的疑问：是自我和超我本身就是潜意识的，还是仅仅产生了潜意识的结果？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赞成前一种可能性。并且，这也是一个事实，即自我和超我的大部分能够保持在潜意识状态，并且通常是潜意识的。也就是说，个体对其内容一无所知，而且为了使它们变为意识必须做一定的努力。事实上，自我和意识、压抑与潜意识并非一致的。我们须将对待意识——潜意识问题的态度进行一次根本的修订。起初，由于意识已表明它自己是如此不值得信任，故而我们非常倾向于降低意识的价值。但我们这样做可能是不公正的。正如我们的生命一样，意识虽然没有很多价值，但它却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没有意识本质的启示，我们就会在深层心理学的黑暗中迷失方向；但我们必须努力重新找到我们的方向。

什么叫意识，这是无须讨论的，因为它的含义很明确。“潜意识”这个词的最古老而又最好的含义是描述性的，即，无论何种心理过程，我们若根据其产生的影响而不得不假定其存在，但同时又无从直接觉察到，我们就把这种心理过程叫做“潜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它的关系，和我们与存在于他人身上的心理过程的关系一样，不同的只在于前者是我们自身实际所具有的。假如我们想要一个更正确的解释，我们可按如下陈述来修改我们的论断。这就是假如我们一定要假定一种心理过程目前正在进行着，而目前我们又完全没有意识到它，那么我们将这一心理过程叫做潜意识。这个定义使我们想到，大多数的意识过程仅仅在极短的时间内是有意识的，很快它们就变成潜在的，但能够很容易地再次变成有意识的。假如可完全肯定，即使在潜在的条件下，它们仍然是心理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说，它们已变成潜意识的了。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未了解到任何新的东西；也没有获得将潜意识的概念介绍到心理学的权利。但我们对动作失误已能进行一些新的观察。比如，为解释口误现象，我们觉得必须假定口误者心中有说出某种特殊的话的意图。从他言谈中出现的干扰，我们可以肯定地推论出这种意图；但这个意图本身并没有流露出来，结果它只是潜意识的。假如随后我们将此意图告诉口误者，他将觉得此意图对他而言是非常熟悉的，可见，对他来讲，此意图仅



暂时是潜意识的。但假如他否认此意图，认为此意图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便说明此意图将永远地成为潜意识①。从这一经验，我们获得了将前面被描述为潜意识的东西宜称为潜意识的东西的权利。鉴于这些动态关系，现在我们可以把潜意识分成两类：一类可以在频繁发生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地转变为意识的东西；另一类的转变则很困难，而只有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有希望，甚或根本就不可能。为了避免发生这类含糊性：即我们指的是前一类潜意识还是后一类潜意识？我们是在描述意义上使用该词，还是在动态意义使用该词？我们便利用了一种可允许的简单方法，我们称那类只是潜在的、因而容易变为意识的潜意识为“前意识”，而另一类仍称为潜意识。现在我们有3个术语：“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在描述心理现象时，我们可以妥善地运用这三个词。再重申一次：在纯粹的描述意义上，前意识也就是潜意识；但我们不能给它这个名词，除非在随便的交谈中，或者当我们不得不论证在心理生活中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潜意识过程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会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还不太坏，并且是便于理解的。但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工作发现自己被迫在另一种即第三种意义上使用“潜意识”这个词，并且，这的确可能引起混乱。我们形成了一种新而深刻的印象：心理生活的广泛而重要的领域通常是没有被我们认识到的，以致于这些发生在心理生活中的过程在真正的动态意义上只得被看做是潜意识。根据这种印象，我们开始理解潜意识也具有形态学的或系统学的意义；开始谈起前意识的“系统”和潜意识的“系统”，以及自我和潜意识（Ucs.）系统的冲突；并且，“潜意识”这个词越来越多地用以指心理领域，而不是心理品质。自我和超我的诸部分在动态意义上乃是潜意识的。这一发现尽管实际上使用起来不便利，但在这一点上是令人欣慰的，它有可能排除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觉察到，我们无权将异于自我的那个心理领域称为“潜意识系统”，因为潜意识的特征并不局限于此。既然如此，我们将不再在系统学意义上运用“潜意识”这个术语。我们将赋予它至今被认为是更好的名称，这样就无人再产生歧义。我们效仿尼采的用语，采纳格罗德克（Georg Groddeck，1923）② 的建议，将它叫做“伊底”③。这个非人称代词似乎尤其适用于表达心理的这个领域的主要特征——即不同于自我的这一事实。然后，超我、自我和本我——这便是三个王国、区域、范围，我们把个体心理结构就是分为这三个部分；还将在下面探讨三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④。

---

①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第4讲。标准版，第15卷，第64页。

② 德国医生，弗洛伊德被其不同凡响的观念所吸引。

③ 该词在德文中为“Es”，英文一般相应的词是“it”。

④ 弗洛伊德关于这个主题的观点发展的阐述见于《自我与本我》（1923b）的编者导言中。此外，自《自我与本我》后，缩写形式“Ucs.”就不再被使用，直至《摩西与一神教》（1939a）中出现过一次。

不过在此，我先插一小段话。我想你们并不满意我前面的论述，因为意识特征的三种特性和心理结构的三个领域并未合成和谐的三对；故而，你们可能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的发现变得模糊不清。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为此感到遗憾；而是应该告诉自己，我们无权指望有任何这样和谐的安排。让我给你们做个比喻；当然比喻无济于事，但可使人感到更加放心。比喻是：想像一个国家拥有各种不同构造的地形——如山区、草原和连串的湖泊——还有杂居的人口：德国人、马扎尔人和斯洛伐克人，他们从事不同的活动。现可将事情划分成这样：德国人居住在山区，以养牛为业；马扎尔人居住在草原，以种植谷物和葡萄为业；斯洛伐克人居住在湖滨，以捕鱼和编席为业。假如划分能像这样整齐而明确，威尔逊（W. Wilson）必将大为高兴①，地理课的教学也必将便利；但假如你周游到此，你将发现的划分是缺少顺序而混杂的。德国人、马扎尔人和斯洛伐克人到处杂居；山区也有农耕地，而牛群亦可在草原上放牧。当然也有少数事情如你所料，因为山地无法捕鱼，水中无法种植葡萄。你所携带的区域图总体上的确与事实相符，但你必须包容细节上的偏差。

关于本我，除了这个新名称外，你们不要期望我有更多的东西给你们。本我是我们人格中隐晦而不易接近的部分；我们对它知之甚少，而且所知也来自于对梦的工作的研究和神经症状形成的研究；它们大多数具有否定的性质，只能被描述为自我的对立面。我们用比喻来研究本我：我们称之为混乱，是一口充满了沸腾着的兴奋剂（excitations）的大锅。我们没想到它的底端与躯体的影响相通，在那里本我吸取各种本能的能量，以找到它们的心理表现②，但我们无法说明这在什么样的底层上找到。伊底充满了来自本能的能量；但它没有组织，也没有产生共同的意志；而仅有一种遵循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以使本能需要得到满足的欲望。思维的逻辑法则在本我那里是不适用的，矛盾律更是这样。相互矛盾的冲突并肩共存，并不彼此相互抵消或减弱，至多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法则的压力下，会聚在一起而做出种种妥协，以使能量的发泄。本我中没有东西能与虚无相比较；我们惊讶地觉察到，在哲学原理上空间和时间是我们心理活动的必要形式，而本我却是个例外③。本我中没有东西能与时间的观念相对应，也没有时间推移的认识，而且——一件引人注意的和有待用哲学思维去思考的事情是——

① 值得注意的是，仅在此文大约一年前，弗洛伊德完成了他和布莱特（W. C. Bullit）（在那时是驻柏林的美国大使）关于威尔逊总统的合作研究，他严厉地批判了威尔逊总统的政策，这项成果至今（1962）未发表。

② 此处弗洛伊德把本能视为某种生理的东西，心理过程则是它的表现。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编者语中有关于该问题的大量阐述。

③ 系指康德理论，参阅《超越快乐原则》（1920）。

时间的推移并未引起其心理过程的变迁①。种种从未超越伊底的愿望性冲动，还有种种因压抑而陷于伊底的观念，实际上都是不朽的；甚至过去几年后，它们的行动仍像是刚刚产生时的那样。它们只有经过精神分析工作而成为意识后，才可能被认出是属于过去的东西，才可能失去其重要性，才可能去掉其精神贯注的能量。精神分析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上述情况。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印象，我们在理论上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已确信无疑的事实，即被压抑的内容不随时间而改变。这个事实好像为通向最深奥的发现提供了一个研究途径。不幸的是，在这里，我自己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当然，本我是不知道价值判断的：它没有善恶，无所谓道德。假如你们喜欢，也可说与快乐原则紧密联系的经济的或数量的因素，支配着其所有过程。在我们的观点中，寻求发泄的本能的精神贯注就是本我中存在的一切。这些本能冲动的能量所处的状态似乎与心理其他领域的状态不同，前者更加好动，更容易发泄②。否则，移置和凝缩将不会发生，而它们是本我的特征，而且完全忽视受到精神贯注的事物——在自我中，我们将它叫做观念——的特性。对于这些事情我们愿意给予更多的说明。附带提一下，你们知道，我们可以将不同于潜意识的特征归之于本我，而且你们也可认识到，在不具备那种相同的原始和非理性的特征时，自我和超我的各个部分也有成为潜意识的可能性③。

通过研究自我和心理结构的最表层部分即被称为“知觉意识”(Pcpt.-Cs.)④部分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自我从本我和超我中区分出来，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更好地揭示实际自我的特征。这个系统转向外部世界，它是知觉因此产生的中介物，在它进行活动的期间，意识现象便从中产生了。它是全部心理结构的感觉器官；并且它不仅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刺激，而且也感受到来自心理内部的刺激。我们几乎不必寻找这个观点的论证：自我是伊底中由于接近外部世界而为其影响所改变的那个部分，它适合于接纳刺激，并作为一种防止刺激的保护物，其功用可以比做环绕于一个生命物质周围的外层。对自我而言，与外层的关系变成了决定因素；它接受了将外部世界呈现给本我的任务——这对本我来说是幸运的，因为本我盲目追求本能的满足时，常常会忽略最强大的外部力量，从而不可避免地导

---

① 在《论潜意识》第五部分中全面列出了弗洛伊德关于此问题的说明，并追溯了最早的文章。

② 弗洛伊德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及这一差异。特别可参阅《论潜意识》(1915)的心理玄学论文中第五部分和《超越快乐原则》(1920)。在两文中，他把这个区分归功于布洛伊尔(Breuer)，而且显然他打算为《癔症研究》(1895)作注释，以说明布洛伊尔的理论贡献。在《论潜意识》中他论述道，在他看来，这个区别代表着我们对神经症能量特征至今所获得的最深刻的认识。参阅其后第89页的进一步注释。

③ 关于本我的论述，主要根据《论潜意识》一文第五部分。

④ 即“Perceptual-conscious”(知觉意识)。



致自身的毁灭。在完成这个功能时，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把外部世界的精确图景存贮在它的知觉记忆里，并且通过实行“现实检验”（reality-testing）① 的功能，去掉任何附加于外界图景中的、来自内部兴奋的东西。自我在本我的命令下控制着种种联系活动的途径；但在需要与行动之间，插进了一个起到延缓作用的思维活动形式②，在这期间，它利用了经验的记忆残迹。用这种方式，它废除了无限制支配本我中事件的快乐原则，而代之以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该原则保证更强的确定性和更大的成功。

难以描述的时间的关系也通过知觉系统介绍进自我中，几乎毋庸置疑，该系统的运作模式就是提供了时间观念起源的东西③。但是，自我与本我的区别特别在于，自我倾向于综合其内容，综合其心理过程，而这是伊底完全缺乏的。当我们不久要开始处理心理生活的种种本能时，我希望我们能成功地发现自我的这个基本特征的根源④。它独自产生高度的组织（这个组织是自我为取得最佳成果所必需的）。自我从知觉本能发展到控制本能；但自我只有通过作为本能⑤的代表，并在一个相当大的集合体中为本能安置恰当的位置，再将它放进一个有条理的联系中，才能控制本能。用一句流行的话讲，自我代表理性和审慎，而伊底代表桀骜不驯的激情。

至今为止，对自我的优点和功能，我们已有了一个印象；现在是开始思考自我另一方面的时候了。毕竟自我仅是本我的一部分，是因接近外部世界、受其危险的威胁而产生的有利于自我改变的那一部分。从动力的观点看，自我是微小的，其能量是从伊底中借来的，而且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到这些方法——可称其为诡计—— 它利用这些方法，从伊底中攫取尽可能多的能量。例如，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认同实际的或被抛弃的对象。对对象的精神贯注源自于本我的本能欲望。首先，自我必须注意到它们。但通过认同对象，自我便取代对象而使自己受到本我的欢迎，并力求使伊底的力比多转向自我本身。我们已经看到（第 64 页）在自我的生命旅程中，自我常常从过去选中的对象的遗物中摄取大量的能量。总体看来，自我必须执行本我的意图，通过找到能使这些意图圆满实现的环境来完成它的任务。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可以用骑手与马的关系来比喻。马提供运动能量，而骑手

---

① 见英文版第 33 页脚注。

② 英文版第 89 页有进一步的论述。

③ 弗洛伊德在其论文《关于神秘的拍纸簿的说明》（1925）对此阐述了一些他的看法。

④ 实际上，弗洛伊德在这些讲演中似乎并未回到该主题—— 他已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第三章中详尽地论述了自我的这个特征，尽管他在后期论文中［特别是《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特别强调自我的综合倾向，但在自我的早期描述中，并未明确使用这个概念，例如布洛伊尔时期，对于受压抑的观念，他几乎总是使用术语“不相容”—— 即不能被自我综合。其《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一文的论述亦然。

⑤ 见前面第 73 页第 2 个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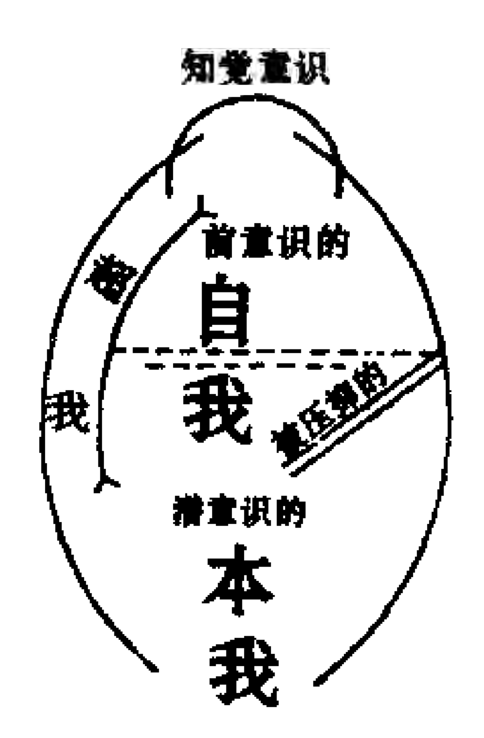


具有决定目标和引导这个强健动物的活动的特权。但在自我和本我之间，却常出现不理想的情形：骑手被迫引导马在马自己想走的路上奔驰。

本我中还有一部分，自我因压抑而产生抵抗，进而使自己从那一部分分离出来。但压抑并没有扩展到本我，于是被压抑的内容便并入到本我的其余部分。

有一句格言告诫我们，一仆不能同时侍二主。可怜的自我处境甚至更糟：它侍候三个严厉的主人，而且要尽力使三个主人的主张与要求达到彼此和谐。这些主张却总是背道而驰，且好像总是互不相容。因而自我经常不能完成任务，这也就不奇怪了。这三个暴君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当我们认识到自我在努力同时满足它们——或同时服从它们时，我们就不会对这个自我人格化并看做分离的结构而感到任何遗憾。自我觉得自己三面被困，受到三种危险的威胁。假如它难以忍受其压力，就会产生焦虑。由于自我起源于知觉系统的经验，所以它担任着表达外部世界需要的职责，但它也努力争取成为本我的一个忠实奴仆，保持与伊底的良好关系，把自己作为对象推荐给本我，并把它的力比多吸引过来。在它企图调节本我和现实的过程中，它常常被迫用自己的前意识（Pcs）的文饰作用来遮掩本我的潜意识要求，掩饰本我与现实的冲突，并且即使在本我仍固执己见而不愿屈服时，它也会用外交的巧妙手段宣称自己正在关注现实。另一方面，自我所采取的每一步，都受到要求严格的超我的监视；超我丝毫不考虑自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方面所遇的困难，为自我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准则；而且自我一旦不服从这些准则，超我就用强烈的自卑感和罪疚感来惩罚它。这样，自我被本我所驱使，受超我所限制，为现实所排斥，为完成其经济的任务而奋斗，以便使它遭受到的种种力量和影响达到和谐；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常会忍不住叹息："生活不容易啊！"如果自我被迫承认自己弱小，它就会产生焦虑——有关外部世界的现实性焦虑、有关超我的道德性焦虑和有关伊底中激情力量的神经性焦虑。

我想根据上面描述，以一种简单的示意图，描绘心理人格的构成关系，呈述如下：





正如你们此处所见，超我融入到本我中；作为伊谛普斯的继承者，它的确与本我有着紧密的关系；它比自我距离知觉系统更远①。只有通过自我，本我才能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至少依此示意图看来是如此。当然，目前很难说清该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在某一方面它肯定是错误的，即作为潜意识的本我所占据的空间应该无可比拟地要大于自我或前意识所占据的空间。我必须提醒你们在思维中对此加以改正。

在总结这些听起来肯定令人兴奋的，但可能不很明确的论述时，我在这里向你们提出另外一些告诫。在考虑到将人格分为自我、超我和本我时，你们当然不会把它想象为具有明确的分界线，就像政治地理学中那些人工绘制图一样。我们无法像在图画或原始的绘画中那样，用直线的轮廓描绘出心理的种种特征，但我们可以像现代画家那样，用各种色彩区域相融的方法来描绘。在完成分离之后，我们应该使被分离的东西再次融合。对于采用图示表达像心理过程这样易变的东西的最初尝试，你们的评判不应过于苛刻。这种分化的产生极可能因人而异；在其实际活动中，它们也可能变化和经历短暂的停滞阶段。尤其对在分化发展过程中最后的且最微妙的分化——自我与超我的分化——这类情形来说，可能更是如此。无疑，心理疾病也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也很容易想象，某些神秘的方法可以成功地扰乱心理各个不同区域间的正常关系。例如，知觉或许能够把握本来难以接近的、在自我深层和本我中发生的事件。然而，这个方法能否引导我们达到期望中的终极真理，却大可怀疑。但是，精神分析的治疗选择了一种类似的方法，对于这一点是可以承认的；因为精神分析的治疗目的的确在于增强自我，使之更加独立于超我，拓宽它的知觉领域，扩大它的组织，以使它能够占有本我的新领域②。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这是一种矫正性工作——就像苏伊德海③的排水一样。

---

① 若该示意图与《自我与本我》（1923）中那个类似的示意图相比较，我们可看出在这件事上以前的那示意图与现在的这幅有根本差别，即前者没有指出超我。但该书中的后一节说明了这种缺乏的理由。在这些讲演的初版中，该示意图与《自我与本我》中的那幅一样，是竖着印的。而在两种全集版（G.S.和G.W.）中，为了某种原由（可能为节省空间），该图则横着印刷，而其他方面均未改变。

② 弗洛伊德在《自我与超我》的最后一章说过类似的话。

③ 苏伊德海（Zuider Zee）原为北海的海湾，位于荷兰西北。13世纪时海水冲击内地，同原有湖沼汇合而成。1932年，荷兰人建成长29公里，宽90米，高出海面7米的堤坝，把苏伊德海同北海分开，上有公路，下有水闸，可通小型渔船，内部相当一大部分的水已被排干，改造成了圩田。——中译者



第 32 讲 焦虑与本能生活

女士们，先生们：

关于焦虑和心理生活的诸种基本本能的假设（观点），我将向你们报告许多新东西，当听到这些内容时，你们不要感到奇怪；如果你们了解到这些东西中没有一个能为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最后的答案，你们也无须感到惊讶。这里我有特别的理由用“假设”一词。我们所面临的都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但其困难并不在于观察得不充分，因为伴随难题呈现我们眼前的，实际上是最普通、我们最熟悉的现象。困难也不在于这些现象所引起的种种思辨具有的晦涩性质；因为思辨性考察在该领域作用不大。真正的困难在于假设——即如何引入恰当的抽象观点，用以整理和说明观察所得到的原始材料。

在我以前的讲演集中，我曾以一讲（第 25 讲）专论焦虑；这里我必须简略重述那些内容。我们将焦虑描述为一种情感状态——即快乐-痛苦的情感系列中的某些情感的混合。这些情感均有着与其相对应的外导神经冲动以及对于这种神经冲动的知觉。但我们也曾主张，焦虑可能是通过遗传表现的、某种特别重要事件的积淀物（precipitate）——也可比作为一次个体的习惯性癔症的发作[①]。我们认为留下了焦虑性情感痕迹的事件即出生过程，因为在出生过程中对心脏的活动和呼吸变化所产生的具有焦虑特征的作用是有用的。因此，最初的那种焦虑一定是毒性的。随后，我们开始对现实性焦虑和神经性焦虑进行区分：前者是一种我们可以预见的对危险——即对来自外部的预料得到的伤害的反应；而后者则完全是神秘不测的，而且看上去全无意义。

在对现实性焦虑的分析中，我们将它一直还原到感觉注意和运动紧张增加的这种状态，并将其描述为“焦虑的准备”（preparedness for anxiety）。焦虑的反应

①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第 25 讲中的更详细论述。



正是由此产生。结果可能有两种：其一，焦虑的产生或曰早期创伤性经验的重演，只是一种信号，在这种情况下，焦虑反应的结果能调节自己以适应新的危险情境，并进而能够逃跑或抵御；其二，早期经验尽占上风，整个反应也仅止于焦虑的产生，在这种情形下，情感状态具有麻痹性，因而不利于当前的意图。

然后，我们又转向神经性焦虑，并指出我们观察到它有 3 种情况。首先，我们发现它是一种自由飘浮的、普遍的忧虑，它易于采取人所共知的“预期性焦虑”(expectant anxiety)，使自己临时依附于任何新近出现的可能性上，例如，像发生在典型的焦虑性神经症中的情况那样。其次，我们发现在所谓的恐怖症中这种焦虑稳固地依附于某些观念，在这种恐怖症中，仍有可能辨识出它与外部危险的关系；但我们必须公正地说这种担忧被极度夸大了。最后，我们在歇斯底里或其他严重的神经症中发现了这种焦虑；在此，这种焦虑或者伴随各种症状，或者作为一次发作独自出现，或以更持久的状态独自出现，但总是没有以外部危险来作为明显的根据。于是，我们问自己两个问题：“在神经性焦虑中人们害怕什么？”“我们怎样把它与面对外部危险所感受到的现实性焦虑联系起来？”

我们的研究并非全无收获，我们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关于焦虑的期望，临床经验表明，它与性生活中力比多经济原则（libidinal economics）有着稳固的联系。焦虑性神经症的最普通的起因，是那种发泄不了的兴奋。力比多兴奋被激起了，但没有得到满足和利用；于是忧虑出现替代力比多并在被利用的过程中被消磨。我甚至认为有理由说，这种未得到满足的力比多直接变成了焦虑。这种观点在幼儿常有的某些恐惧中得到证实。这些恐惧中许多是令我们迷惑不解的，但另一些，如对独处及对陌生人的恐惧，能够予以肯定的解释。孤独以及陌生的面孔，唤起了孩子对熟悉的母亲的渴求；他不能控制这种力比多兴奋，也不能使它中止，只能将其变成焦虑。因此，这种幼儿的焦虑不应该被看作是现实性焦虑，而应被看作是神经性的焦虑。幼儿的恐惧和焦虑性神经症中对焦虑的预期，是神经性焦虑产生的一种方式的两个实例，这个方式就是力比多的直接转化。我们马上还会知道，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种产生方式，但它与第一种产生方式并没有很大差别。

我们认为，导致癔症和其他神经症中焦虑产生的因素就是压抑的过程。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把与被压抑的观念有关的一切与依附它的那部分力比多区分开来的话，那就可以对这个问题做更全面的论述。这个观念很容易受到压抑，而且可能被歪曲到不可识别的地步；但它的情感部分通常转化为焦虑——无论这种情感可能具有何种性质，不论是攻击性还是爱，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力比多部分不能物尽其用或是由于幼儿自我的软弱（如幼儿的恐惧），或是由于性生活的各种躯体过程（如焦虑性神经症），或是由于压抑（如癔症）。然而，无论何种原因都没有根本的差异。因此，引起神经性焦虑的两种机制实际上是相吻合的。



在这项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焦虑的产生和症状的形成之间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即二者相互体现和互换。例如，一个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c）病人，很可能是由于在街上突然产生焦虑而开始得病。每次当他再走到这条街上，焦虑就会重复出现。于是他就会形成广场恐怖症的症状，这个症状也可以被说成是一种抑制，即对自我的功能的限制，凭借这种抑制，他可以避免焦虑的侵袭。假如我们能够干预症状的形成（就像我们能够干预强迫症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假如我们阻止一个病人进行洗礼，他就会陷入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虑状态中。显然，他是借助于这一症状而保护自己免受焦虑之苦的。好像的确是焦虑的产生在先，症状的形成在后，仿佛症状的产生就是为免除焦虑的突然发作似的。这一观点也被下述事实所证实：儿童期的最初神经症是广场恐怖症——在该状态中，我们如此清晰地看到，最初产生的焦虑是如何被后来形成的症状所替代的。我们得到一个印象，即最好是从这些相互关系中找到理解神经性焦虑的方法。同时，在回答一个人在神经性焦虑中害怕什么的问题时，我们也取得了成功；并且，还成功地证实了神经性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之间的关系。显然，他在神经性焦虑中害怕的是自己的力比多。这与现实性焦虑的区别表现为以下两种：危险是内部的，而非外部的；其危险是意识不到的。

在恐怖症（phobias）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这种内部危险转化为外部危险的方式——这就是说，神经性焦虑是怎样转化为明显的现实性焦虑的。为了简化通常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不妨假设广场恐怖症病人始终害怕的是由他在街上遇到他人时所产生的诱惑感，于是他在恐惧中产生一种移置作用；从此以后，他害怕的是外界情形。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他认为自己能够通过移置作用更好地保护自己。人们可以逃之夭夭，以摆脱外部危险，但躲避内部危险却是很难的事。

在我早期论焦虑的讲演的结论中，我自己曾表述了这样的观点：虽然我们的这些研究结果并不相互矛盾，但它们却也不怎么彼此吻合。就其作为一种情感状态而言，焦虑好像是曾带来危险性威胁的早期事件的重演；焦虑服务于自我保存的目的，并且是一种新危险的信号；它产生于力比多，而这部分力比多又因某种缘故未被利用，它还可以在压抑的过程中产生。它被症状的形成所替代，就好像在治理上受到了约束。因此，我们不免感到这里好像缺少了什么，否则这一切就可以被整合成为一个整体了。

女士们，先生们，在上次讲演中，我把心理人格（the mental personality）分为超我、自我和本我，这一划分也迫使我们在焦虑问题的研究中更新我们的支承。根据自我是焦虑的惟一支承的命题（即是说仅有自我能产生并感觉到焦虑），我们形成了一种新的、稳固的立场；从这个立场看，许多事物将都展示出一个新的侧



面。在谈及“本我的焦虑①”或认为超我具有产生忧虑的能力时，我们的确很难明白这些说法的含义。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一事实中与我们希望相一致的成分表示欢迎：焦虑的三种主要类型（即现实性的、神经性的和道德性的），很容易与自我的三种依赖关系（即与外部世界的、与本我的和与超我的）发生联系（第78页）。此外伴随着这个新观点，焦虑作为预告危险情况的信号的功能（这正好是一种我们不无熟悉的说法②）变得尤为突出了；而构成焦虑的材料是什么的问题则使我们失去了兴趣。而且现实性焦虑与神经性焦虑的关系出人意料地变得简单明了了。还需要指出的是，与从前被认为是简单的情况相比，我们现在对产生焦虑的各种明显复杂的情况有了更好的认识。

最近，我们一直在研究某些恐怖症（我们将之划归为焦虑性癔症）中焦虑的产生方式。我们选择了一些病案，在这些病案中，我们在研究那种对从伊谛普斯情结中产生的愿望性冲动所作的典型的压抑。本来，我们指望能发现，是男孩把母亲作为对象所给予的力比多精神贯注在压抑下转变成为焦虑，并表现为（从症状的角度而言）附着于父亲的替代物之上。我不可能向你们陈述这类研究的详细步骤；但是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与预料相反的惊人结论，这就够了。并非压抑产生焦虑：焦虑早就有了；产生压抑的恰恰是焦虑③。但到底是哪一种焦虑呢？这只能是那种面对具有威胁的外部危险时的焦虑——即现实性焦虑。诚然，在面对力比多的要求时，男孩的确感觉到了焦虑——在这种情况下，焦虑产生于对母亲的爱；在面对某种神经症焦虑时，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这种爱在他看来，似乎是一种内在的危险，对此他应放弃对象以回避这种爱，因为它惹来了某种外部的危险。在我们研究的所有个案中，我们都获得了相同的结果。应该承认，我们并未料到会发现，内部的本能危险会成为外部的、实在的危险状态的决定因素和准备因素。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男孩因爱恋其母而恐惧什么样的现实危险。这种危险是被阉割的惩罚，是失去其生殖器的惩罚，当然，你们将反对：毕竟那不是真实的危险。我们的男孩并不会因为在伊谛普斯情结阶段中恋爱其母而被阉割。但该问题并不能如此简单地被取消。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关于阉割是否真的被执行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是，危险是来自外部的恐吓，而男孩也信以为

---

① 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结尾处，弗洛伊德用几段相同的语言说明了这个观点。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中也有几处对此进行论述。关于焦虑这个主题的比较重要的见解，主要来自后期研究。

② 参阅《抑制、症状与焦虑》的编者导言中的一些早期论述。这个观点也见于《精神分析导论》第25讲（同上，第108～109页）。两个病案分别是“小汉斯”和“狼人”。

③ 参阅《抑制、症状与焦虑》第四章，那里研究的是“小汉斯”和“狼人”等案例。



真。男孩信以为真是有理由的，因为在阳具欲阶段（the phallic phase）[①]，在他的早期手淫（masturbation）阶段，人们常常吓唬他说要割掉他的阴茎，而且，这种惩罚的暗示一定会常在他心中得到强化。我们怀疑，在人类家庭的早期，妒忌而残酷的父亲实际上常对正在成长中的儿童施行阉割。而且在原始民族的成人礼经常举行的“割礼”（circumcision），是这种阉割的清晰可辨的遗风。我们意识到，在此我们与一般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我们必须牢牢地坚持这个观点，即对阉割的恐惧是压抑从而也是神经症形成的最普通、强劲的动机之一。而某些案例中，尽管确实不是阉割，而是割包皮作为对手淫的纠正和惩罚（这种现象在英美社会已不罕见），已经在男孩身上实施，因而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在此，尽管我有意更深入探讨“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但我却须扣紧我们的主题。

当然，对阉割的害怕并不是压抑的惟一动机。女人身上也的确不存在这种害怕，因为她们虽然也有阉割情结，但却不可能形成对遭阉割的恐惧。在女人性活动中，这种恐惧被失去爱的恐惧替代了[②]。对失去爱的恐惧，显然是幼儿发现母亲不在时所产生的焦虑的后期延续。你们会认识到，被这种焦虑所指示的危险状况是多么的真实。假如母亲不在了，或撤回了对孩子的爱，孩子就不再相信其需要会得到满足，从而可能陷人种种最悲痛的紧张情绪中。不可否认，这些决定焦虑的因素，实际上可能是出生时原始焦虑状态的重现，因为出生时的状态肯定也表现为与母亲的分离。的确，假如你们遵循费伦茨所提示的思想（费伦茨，1925），你们也可能将阉割的恐惧加进这些因素里，因为男性生殖器丧失的结果，就不能在性活动中再次与母亲（或其替代者）结合为一体，附带提一下，那种频繁产生的返回母体子宫的幻想，就是与母亲发生性交往的愿望的替代物。在这一点，这里有许多颇有趣味和令人吃惊的关系可以告诉你们：但我不能超越精神分析引论的框架。因此，我仅请你们注意这个事实：在这里，心理学的研究接近生物学的种种事实[③]。

兰克（O. Rank）对精神分析有着许多杰出的贡献，也明确强调了出生行为与母亲分离的严重性。不过，我们发现，不可能接受他从神经症理论甚至精神分析治疗这个有关因素中得出的极端推论。他已提出了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即出生时的焦虑经验是后来所有危险情境的原型[④]。假如我们花点时间详细论述这些

---

① 这些在该讲后面有论述。

② 参阅《抑制、症状与焦虑》。

③ 弗洛伊德在《释梦》第2版（1909）的注释中首次发表了这个评价。但有理由相信，他的理论在更早期就已被其维也纳的追随者所相当熟悉了。参阅《精神分析导论》第25讲的编者注。

④ 对兰克的出生理论的评价详见于《抑制、症状与焦虑》。



危险情形，我们就会说，事实上，焦虑的特殊决定因素——即危险情形——已被分派到了每个适应于它的发展阶段。心理无助的危险，适应于自我的早期不成熟阶段；丧失对象（或丧失爱）的危险，适应于儿童期最初几年的缺乏自信阶段；被阉割的危险，适应于阳具欲阶段；而最后，超我的恐惧——它立于一种特殊立场——则适应于潜伏期。既然由于自我的强大，适应于这些因素的危险情形已丧失了其重要性，故而，在发展过程中，旧的焦虑决定因素将被摒弃。但这种情形仅是不完全地发生。很多人都无法克服对丧失爱的恐惧，这在正常情况下从未消失过，因为这是社会关系所不能缺少的，其形式为道德性焦虑；仅有少数的人能向社会宣告独立。有一些旧有的危险情境，通过对焦虑的决定因素作时代的修改，在后来的生活中保存其势力。例如，阉割的危险继续存在于梅毒恐怖症的面具之下。的确，成年人都知道，阉割不再是对放纵性欲的习惯性惩罚，而另一方面，他又了解到，各种严重的疾病威胁到这类本能的自由。毫无疑问，那些被描述为神经症的人，在对待危险的态度上仍然孩子气十足，而且没有克服焦虑的早期决定因素。我们把如上这些内容看做是对神经症特征研究的一个实际贡献，但很难说清它为什么这样。

我希望你们没有丢失我讲演的主线，并记得，我们正在研究焦虑与压抑的关系。在此，我们了解到了两种新事实：第一，是焦虑产生了压抑，而不是像我们一贯认为的，是压抑造成了焦虑；第二，那可怕的本能情境最终可还原于外部的危险情境。下一个问题是：现在我们怎样描述焦虑影响下的压抑过程呢？我认为答案如下。自我注意到对乍起的本能要求的满足，可能会招致一种现在还记得的危险情境。因此，自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抑制、消除和减弱这种本能的精神贯注。我们知道，假如自我强大有力，能将上述本能冲动纳人自己的组织中，自我就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但在压抑的场合中，出现的情况是，该本能冲动仍属于伊底，而且自我觉得自己弱小。因此，自我通过某种本质上同于正常思维的方式帮助自己。这种思维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它只要少量的能量就能运作，采用的方式就像一位将军在行军时调动大批军队前，先在地图上移动士兵的小模型一样①。因

---

① 在上次《讲演》中，弗洛伊德已经提及这种延续的思维活动，把它当做自我主要功能之一。作为实践性的、小规模的活动的思维这一概念——“现实性实验”的根本成分——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最早和最根本的概念之一，与他关于原发性和继发性的精神过程的区别紧密相联。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895年《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16］［17］［18］中，并在同一著作的第三部分（1950a）第三节再次得到论述。在那里所阐述的显然是神经病学术语，但在《释梦》（1900a）第七章中，它又作为纯心理学的术语重现。此外，又见于《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心理功能的两个原则》，《论潜意识》（1915e）第五部分、《自我和本我》（1923b）第五章和《虚无》（1925h）中。它最后一次出现于《精神分析纲要》（1940［1938］）这部弗洛伊德最后的主要著作中。



此，自我预感到对这种可疑的本能冲动的满足，从而允许思维重演因从前所畏惧的危险情境而产生的种种痛苦情感。于是，快乐-痛苦原则的自动机制发生了作用，并对危险的本能冲动进行了压抑。

“稍等片刻，”也许你们会喊道，“我们不能跟着你跑得太远了。”你们是相当正确的，在你们能接受上述观点之前，我必须作一些补充。首先，我应该承认，我已试图把这样一个实际过程转译为我们正常的思维语言，该过程既非意识过程，亦非前意识过程，它发生于某个不可想象的最底层的种种能量状态之间。但这并非你们严重抗议的要点，因为我们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来研究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清楚地区分：当压抑发生时，在自我中发生了什么，在伊底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刚刚说过，自我所做的是：它利用实验性的精神贯注，通过焦虑的信号起动快乐-痛苦的自动机制。然后，就可能产生各种反应或这些反应在不同比例中的结合。或者，焦虑充分地产生，并且自我彻底摒弃令人不快的兴奋；或者用一种反精神贯注取代试验性的精神贯注，以对抗这种兴奋；这种反精神贯注与被压抑的冲动能量结合，从而形成症状；或者这种反精神贯注作为反作用一旦形成，就作为对某些自我意向的加强，和作为自我的持久性改变①，被吸入自我之中。焦虑的发展若越能以一种纯粹的信号为限，自我若越能利用各种防御活动，达成被压抑欲望的心理约束，那么这个过程也就越能接近于冲动的正常改造标准②。尽管它无疑未达到这一目的。

附带提一下，有一点我们在此应该花时间阐述一下。毫无疑问，你们自己已假设，那个难以定义的所谓“性格”，应完全归之于自我。我们对性格的构成成分已有了一些认识。首先，它包括受早期父母影响而形成的超我，无疑，超我是性格中最重要且具有决定性的部分；其次，性格还包括后期对双亲和其他对儿意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认同，以及作为被弃对象关系（参见英文版第64页）的积淀物所形成的种种类似的认同。另外，我们应该对性格的构成成分再补充一些内容，即还有自我起初用压抑，后来采用正常的方法处理不良冲动时所获得的反应结构；

---

① 关于因反精神贯注而产生自我改变的观点，很可能在弗洛伊德最早期著作中已形成了，如在《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一文中。后来出现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一书中，并在很晚期的一篇学术性文章《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中的第二、五部分进一步加以阐述。

② 作为一种处理不愉快的心理事件的正常方式，“重新唤起”这个概念是弗洛伊德使用的最早概念之一。例如，在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初步交往时期，弗氏曾在一次论癔症的讲演中说：“附带提一下，一个健康的心理机制有很多方法对付心理创伤的影响……即通过联想重新唤起它……”（1893h）

此反应结构是性格形成的补充成分①。

现在我们可再回过头来探讨本我。要猜测被反对的本能冲动在压抑时期发生了什么，这是较困难的。使我们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那种冲动的能量，即本能兴奋的力比多能量到底怎么样了，即它是怎样被使用的？你们还记得，对此我较早的假设是，被压抑转变为焦虑的，正是这种力比多能量②。现在我们不能再这样说了。最慎重的回答应是，本我发生的情况可能并不总是一致的。可能对被压抑的冲动而言，发生在自我中的情况和发生在本我中的情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因为我们已认为，通过焦虑信号而在行动中建立起的快乐——痛苦原则，在压抑中起作用，故而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预测。该原则完全不受限制地控制着本我内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我们可以认为，该原则使正在谈论的本能冲动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我们将会发现，压抑会产生相当不同的结果，其影响或大或小。在某些场合中，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可能保存着力比多的精神贯注，并继续存在于未改变的本我中，尽管它常受制于来自自我的持续压力。在另一些场合中，所发生的情况好像是，这种本能冲动被完全破坏了，而它的力比多永久性地转移到了其他路径上。我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正常处理伊谛普斯情结时，情况正是如此。因此在这种适宜的场合中，伊谛普斯情结在本我中不是被简单地压抑了，而是被毁灭了③。临床经验向我们进一步表明，在许多案例中，并未出现惯常的压抑，而是发生了力比多衰退，即力比多组织倒退到一个更早期阶段。当然，这种倒退可能只发生在本我中，而且，假使这种倒退发生了，它就会受到由焦虑的信号所导致的相同冲突的影响。强迫性神经症提供了这类性质的最显著的案例，在该症中，力比多倒退与压抑是同时产生作用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担心你们会发现这种解释难以把握，并猜想我并未穷尽其述。我很抱歉引起了你们的不快。但我惟一的目的就是让你们了解我们的发现所具有的性质，以及在取得这些发现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对心理过程的研究越深入，就越认识到它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许多简单的公式，一开始好像是符合我们需要的，但后来都被证明是有欠缺的。我们不厌其烦地变化并改进它们。在我释梦理论的讲演中，我曾向你们介绍了这样一个领域，15 年来，该领域鲜有新的发现。现在，在论及焦虑的地方，你们却看到每件事情都处于流动和变化状态之中。而且，新的发现没有得到彻底的探讨，这也可能增加了论证它们的难度。

---

① 本段的前部分起源于《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三章开始的论述。后部分则是以《压抑、症状与焦虑》的第十一章（A）为基础，在《性格与肛欲期》（1908b）的编者注释中有对关于性格的早期阐述的说明。

② 参阅弗洛伊德的一篇论《压抑》（1915d）的心理玄学论文和《精神分析导论》第 25 讲。

③ 参阅《伊谛普斯情结的消亡》（1924d）。



不过，要有耐心！我们将很快就结束焦虑这个主题了。我无法保证这个问题的解答会令人满意，但却有希望取得一点小进展。同时，我们获得了各种新发现。例如，对焦虑的研究使人们对自我的描述增添了一个新特点。我们已说过，与本我相比，自我是软弱的，它是本我忠实的仆人，渴望执行它的命令，满足它的要求。我们没有收回这个观点的意图。但另一方面，这个自我又是本我中组织较好的部分，它面向现实。我们不要过于夸大自我与伊底的区别，假如自我自身能对本我中的心理历程发生影响，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我相信自我是借助焦虑的信号，通过使几乎全能的快乐-痛苦原则运作起来的方式而施加其影响的。另一方面，随后自我又马上暴露出它的缺点，因为它因压抑的行为而放弃了其组织的一部分，而且不得不允许被压抑的冲动永远脱离它的影响。

现在，关于焦虑问题只有一点还需指出，尽管在我们手中，神经性焦虑已变成了现实性焦虑，变成了对特殊的外部危险情境的恐惧。但我们不能就此裹足不前。我们还应采取下一步骤，尽管它可能是后退的一步。我们问自己，在这类危险情境中，真正危险的和恐惧的是什么？显然，不像客观性判断的那样，是对病人的伤害，因为这种伤害没有心理学上的意义，而是伤害在病人心中带来的某种东西。比如，出生是我们焦虑状态的原型，但就其本身而言，它毕竟鲜能被认为是一种伤害，尽管它可能包含有各种伤害的危险。像上述每一种危险情境一样，有关出生的基本情况是，它在心理体验中唤起了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该状态令人不愉快，而且人们不能以发泄它的方式来控制它。这类状态我们称之为"创伤时刻"（traumatic moment）①。在其面前快乐原则毫无作用，然后，假如我们依次沿循从神经性焦虑、到现实性焦虑，再到危险情境来看，就能获得这样一个简单命题：所恐惧的和成为焦虑对象的东西，常常是创伤时刻的呈现，不能根据快乐原则的正常法则处理它。我们马上明白，尽管我们拥有快乐原则的天赋，也不能保证我们免遭客观性伤害，而只能保证我们免受心理节制所导致的特殊伤害。从快乐原则到自我保护本能是很大的一步；这两者的意向从一开始就相当不一致。但我们也看到了其他某种东西，也许这是正在寻找的解决途径，即它是一个相对量的问题。把一种印象变为一个创伤时刻，使快乐原则的功能瘫痪并赋予危险情境以其重要性，这都仅仅是由于兴奋量的增强而已。假如情况真是那样，假如这些谜如此容易解开，那为什么类似的创伤时刻不在心理的生活中唤起而不与假定的危险情境发生关系呢？——在这些创伤时刻中，焦虑不是作为一种信号产生，而是因为某种新的理由重现。临床经验明确地表明，上述情况确属事实。只是后来的压抑才显示出我们描述过的机制，在该机制中，焦虑作为较早期的危险情境

---

① 该术语是对沙可（Charcot）术语的重复，可追溯到弗洛伊德关于癔症的最早期论述，比如。参阅《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这篇论文。



的信号而被唤起。当自我遇到某种过分强烈的力比多需要时，最初的和最原始的压抑直接来自于创伤时刻；它们重新构造它们的焦虑，尽管所依据的事实上仍是出生原型。在因性功能的躯体组织受损而产生的焦虑性神经症中，焦虑的产生过程也和上面所讲的一样。我们不再坚持认为，在这种场合中，正是力比多自身被转变为焦虑了①。在这里，我认为焦虑存在着双重起源——一是创伤性因素的直接后果；一是预示创伤性因素即将重现的信号。关于这一点，是不会有反对意见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确信，你们正为不要再听到关于焦虑的论述而高兴。但你们不会高兴太久，因为即将讲述的东西也不易让人感到高兴。今天我正打算带你们进入力比多理论或本能理论的领域，这些领域也同样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在这里已获得了很大进步，以致值得你们不辞辛苦地去学习它们。这种想法我是没有的。这里要讲的是这样一个领域：我们正在其中艰苦地努力寻找我们的方向和各种发现；你们将仅是我们努力的见证者。在此，我也不得不追溯一些从前我已告诉你们的事情。

本能的理论可以说是我们的神话。本能是一些神秘的东西，不确定性是很显著的。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一刻也不能忽略它们，但我们从不敢肯定我们正在清楚地观察它们。你们知道流行的想法是怎样去处理本能的。人们假定本能就像它们当前碰巧需要的东西那样多种多样——有自我肯定（self-assertive）的本能、模仿（imitative）的本能，游戏（play）的本能、群居（gregarious）的本能和许多其他类似的本能。可以说，人们利用这些本能，让它们中的每一个完成其特殊工作，然后再抛掉它们。我们的行动一直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在所有这些较为特殊的本能背后，隐藏着某种重要而强大的东西，我们须予以慎重考察。我们所采取的第一步是非常审慎的。我们告诉自己，假如一开始我们就能根据两种重要的需要——饥饿与爱——分离出两种主要的本能，或对本能进行分类，我们就可能不会误入歧途了。无论我们通常怎样小心眼地保护着心理学相对于其他各种学科的独立性，这里我们却立足于不可动摇的生物学事实的支配之下。这个事实就是，有生命的个体有机物受两种意向即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和种族保存（preservation of species）的控制。这两种意向似乎是彼此独立的，就目前我们所知，它们没有共同的起源；并且在动物的生命中，它们的利益通常处于冲突之中。实际上，我们现在正讲的，就是生物心理学，我们正在研究生物过程的心理附属物。把“自我本能”与“性本能”的概念引入精神分析中，就表现了问题的

---

① 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弗洛伊德仍坚持至少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认为在焦虑性神经症中，“焦虑的产生过程中所释放的东西，正是未被利用的力比多的剩余物。”而在这里，旧理论的最后痕迹也被消除了。



这一方面。“自我本能”（ego-instincts）包括一切有关个体的保存、肯定和延续的东西；“性本能”（sexual instincts）包括对于幼儿的性生活和倒错的性生活所需的大量东西。在对神经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已知道自我是限制和压抑的力量，而性倾向则是被压抑和被限制的力量，故而我们相信，我们不仅掌握了这两种本能之间差别的明确证据，而且掌握了这二者间冲突的明确证据。我们研究的第一个对象仅是性本能，我们将它的能量命名为“力比多”。我们只有结合这些性本能，才能澄清有关什么是本能和什么应归于本能的种种观念。这里我们就来探讨探讨力比多理论。

本能不同于刺激，即本能起源于人体内的刺激，它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力量发生作用，并且主体不可能像对待外部刺激一样，通过逃避的方式来避开本能。我们能够区分本能的起源对象和目的。其起源是人体内的某种兴奋状态，其目的是去掉这些兴奋，在从起源到目的的道路上，本能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我们把它想象为某种向特殊方向前进的能量；本能依此而获得“Treib”的名称①。人们谈论“积极的”本能和“消极的”本能，但我们认为说具有主动目的和被动目的的本能将更为准确。因为要实现一个被动的目的也需要积极的活动。这种目的可以在主体自己身上得到实现；而通常产生的是外部对象，本能通过与它打交道而实现其外部目的；本能的内部目的则总是身体上发生的令人满意的变化。本能与其在躯体上的源泉间的关系是否带给了本能一种特殊性质？关于这一些，我们不太清楚。假如是这样，那是什么性质呢？精神分析经验的证据显示，以下内容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从一种源泉产生的本能冲动，与另一个源泉产生的本能冲动紧密相联，共同经历着变化，而且，一般而言，可以用他和本能的满足来替代某种本能的满足。但必须承认，我们对此并未能很好地了解。本能与其目的和对象的关系都很容易发生变化；虽然本能与其对象的关系更易于松散，但二者都可转化为其他关系。考虑到社会上的价值观，我们把对目标的某种修改和对象的变化称为“升华”。此外，我们还有理由识别出目标受约束的本能——这些本能冲动产生于我们熟悉的源泉，并具有明确的目的，但它们没有得到满足便被阻止了，以致产生了一个持久的对对象的精神贯注和一种永恒的（情感）倾向。例如，性爱关系就是这样，毫无疑问，它起源于性的需要，但又总是克制其满足②。

你们看到，对于这些本能的特性与变化，我们仍有许多是不能理解的。这里应提到表现于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之间的进一步区别，假如从总体上说，该区别也适用于群体，那么它将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性本能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

① 字面意义为“驱力”，这个德文词通常这样翻译，但“本能”一词已在标准版中普遍使用，其理由已在第1卷的总导言中作了解释。

② 本段的内容大体上是《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开始部分的重复。

为它具有可塑性，具有改变它们自己目的的能力，具有允许一种本能满足取代另一种本能满足的可替换性，并且能够被延续。在这些方面，我们上面所举的目标被阻的本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会很乐于否认这些特征是属于自我保存本能，因为自我保存本能是缺乏弹性的，对它们的满足不允许有丝毫延缓。在多种意义上，它们都是绝对必需的，并与压抑和焦虑具有非常不同的关系。但稍加考虑，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例外的观点是不适用于所有的自我本能的，而仅适用于食欲和渴欲，并且明显地是建立于这些本能源泉的特殊性质上。由此造成的混乱印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我们没有对有组织的自我的影响，在原本属于伊底的本能冲动中所造成的那些变化，予以单独的考虑。

当我们研究本能生活适应性功能的方式时，我们发现自己找到了更坚固的基础。在此，我们得到了十分肯定的知识，你们对这些知识也已是熟悉的。但我们也认识到，作为从一开始就是指向性功能目标——两个性细胞的结合——的工具的性本能，情况就不同了。我们所考察的是大量产生于人体的各个区域和部位的组元本能，它们彼此相当独立地寻求满足，在我们可能叫作“器官快乐”（organ-pleasure）的那种东西中找到满足[①]。生殖器是这些“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中的最新玩意儿，“性快乐”这个名称完全可能适用于生殖器所产生的器官快乐。这些寻求快乐的冲动并没有完全被纳入性功能的最后组织之内。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被作为无用的东西通过压抑或其他某些方式而搁置一旁；它们中的一小部分则通过我已提过的（英文版第97页）显著方式而离开了原有目的，并用以加强其他冲动；还有一部分以些微的作用继续存在，以利于做些前抚动作并产生事前快乐[②]。你们已听说过，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几个预备性组织的阶段是怎样被识别出来的；也已听说，性功能发展史是如何解释性功能的各种变型和退化的。我们认为，这些“前性器欲”（pregenital）阶段的第一个口欲期（the oral phase），因为与婴儿在母亲怀中吃奶的方式一致，嘴的性感区支配着这一生命时期的那些可以叫做性活动的东西，到了第二个时期，虐待的和肛的冲动欲（sadistic and anal impulses）占据了前台，毫无疑问，这个阶段与牙齿的出现、肌肉器官的增强和对括约肌功能的控制有联系。关于这个值得注意的发展阶段，我们已了解到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细节[③]，第三个阶段是阳具欲阶段（the phallic phase），在这个阶段中，两性中男性器官（和女孩身上相应于男性器官的东西）获得了不能再被

①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中曾详细论述了该术语，该讲包括了本段前部分的内容。

②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1905d）详尽论述了“前期快乐”（fore-pleasure）。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的专著（1905c）中对“前期快乐”又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且数次出现于该书中。

③ 这些在英文版第100～102页会有论述。



忽视的重要性[1]。我们已用性器欲阶段（the genital phase）这个名称来指定明确的性组织，该阶段建立于青春期之后，此时女性生殖器第一次得到识别，而男性生殖器在很早以前就被识别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讲述的全是老生常谈。但你们不要假定，我这次未讲到的许多事情是无效的。我这样重复是必需的，目的是将它作为起点，以报告我们知识中的进展。我们能够夸口说，我们已了解到了一些新东西，特别是关于力比多的早期组织，对旧东西的意义也获得了更清晰的理解，我将至少举几个例子以资证明。阿拉伯罕在 1924 年就说明施虐——肛欲期可分为两个小阶段，其中早期的一个阶段受毁坏和丢失诸破坏性倾向的控制，后期的阶段则受友善地指向对象的倾向——即保持和拥有的倾向——所控制。故而，在该阶段的中期，对对象的关心作为后期对性爱的精神贯注的先驱而首次出现。若我们对第一个即口欲期阶段进行类似的再划分，也是同样可行的。在第一个小阶段中，我们所讨论的仅仅是口唇的吞食，而与对象——母亲的乳房——的关系根本不存在矛盾心理。第二个小阶段则以咬的动作的出现为特征，它可以叫作“口欲施虐”阶段，第一次表现了矛盾心理现象，该现象在其后紧接而来的“施虐——肛欲”阶段中表现更为清晰。假如我们在诸如强迫性神经症或抑郁症（melancholia）等特殊神经症的案例中，去寻找力比多发展的各种倾向点，我们就尤其能够看到这些区分的价值[2]。在此，你们必须回想起我们对力比多固着、倾向和倒退三者间的关系的认识[3]。

从总体上看，我们对力比多组织的发展阶段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过去我们主要强调的是，这些阶段中的每一个都在下一阶段的到来前就消失了；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则转向这样一些事实：每一个前期阶段有多少成分与后期阶段并存，而且延续到它之后，并且在力比多的经济原则和主体的性格中得到永恒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各种病理条件下，频繁出现了向早期阶段的倒退；特定的倒退是疾病特定形式的特征[4]。但在此我们无法深入研究这些事实，它成为专门的神经症心理学研究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能够研究本能的诸种转化，尤其是就肛欲性欲（anal erotism）而言。肛欲的冲动产生于性感肛欲区。我们曾对将这些本能冲动多样化地使用的情况感到惊讶。某种特定性感区在其发展过程中要想摆脱被抛弃的命运，也许是较困难的。因此，让我们回想一下阿伯拉罕的观点吧，他主张，从胚胎学上讲，肛

① 参阅《婴儿的性器组织》（1923e）。

② 指力比多发展的这样一些阶段，在其阶段中，固着作用倾向于某些特殊的神经症。参阅《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1913i）一书。“倾向点”这一术语出现于施雷贝（Schreber）的分析（1911）中。

③ 见《精神分析导论》第 22 讲。

④ 这个观点也可能与阿伯拉罕 1924 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有关。



门相当于原始的嘴，这个嘴后来才移到肠子的末端[①]。然后我们了解到，当一个人的粪便（即其排泄物）对他失去了价值之后，则产生于肛门的这种本能的兴趣就转移到那些可以作为礼物赠送的对象。事实确实如此，因为粪便曾是婴儿能够赠送的第一件礼品，是某种他可能因对照顾他的人的爱恋而出让的东西。其后，准确地对应于在言语发展中所出现的类似变化，对粪便的原有兴趣不仅转变为对黄金和钞票的高度评价，而且也影响了对婴儿和阳具的充满感情的精神贯注。在那些长期保留厕所意识的儿童当中，普遍相信婴儿像一般粪便那样从肠子里生出来[②]。大便是出生行为的原型。但圆柱状的粪便也被看做是阳具的先驱，这种粪便塞满并刺激着肠粘膜。当一个儿童非常不情愿地认识到还有许多不拥有阳具的人时，在他看来，那个器官是作为某种与身体可相分离的东西而出现的，因而变得非常类似于粪便，后者是其身上不得不抛弃的第一件东西。结果，大部分肛欲性欲都转变成了对阳具的精神贯注。但对人体阳具的兴趣，除了肛欲性欲的根源外，还有口欲的根源；口欲的根源或许仍是更为有力的，因为吮吸终结时，阴茎也变成了母亲乳头的继承者。

假如一个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深刻的联系，就不可能在人类的种种幻想中、在人类受潜意识影响而产生的种种联想中和在人类的症状性语言中，发现一个理解这些问题的途径。在那里，粪便—金钱—礼品—婴儿—阳具，好像是意味着同一件事情，它们被同一些符号所代表。你们也不要忘记，我仅能够将很不完备的信息提供给你们。或许我可以匆匆加上一句，后来才被唤起的对阴道的兴趣基本上也是源于肛欲性欲。对此也不必奇怪，因为借助卢·阿德里安—萨洛梅（Lou Andreas-Salomé，1916）的一句适当的话说，阴道本身是从直肠“租借来”[③]的：在那些同性恋者即性功能发展不正常者的生活中，肛门一直被用来代替阴道。我们在梦中，常常出现这种场所：它起先是一间简单的房间，而随后则被一堵墙或其他方式分成了两间。这种梦境常意味着阴道与肠的关系[④]。也很容易理解下述情况：在女孩身上，那种期望得到阳具这一完全非女性的愿望，通常被转变成了想得到一个宝宝的愿望，然后又转化为想得到一个具有阴茎而又能给她宝宝的男人的愿望；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一部分起源于肛欲性欲兴趣的东西，是怎样获得进入后期的性器欲组织中的许可的[⑤]。

---

① 阿伯拉罕，1924年英译本，第500页。

② 参阅弗洛伊德关于《儿童性理论》的早期论文（1908c）。

③ 弗洛伊德在1920年为《性学三论》（1905d）第2版增写的一条注释中，概述了萨洛梅的文章。

④ 该例已于1919年补充到《释梦》（1900a）第六章中。

⑤ 后两段的大部分来自《本能及其变化》（1917c）。但这里有一些新增的观点。《精神分析导论》第20讲已间接谈到该问题。

在我们研究力比多的前性器欲阶段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关于性格形成的新观点。我们注意到某种三者合一的、通常被同时发现于一人身上的性格特征：整洁、吝啬和固执；根据对具有这些特征的人的分析，我们推测这些特征起源于肛欲性欲，该性欲以不同方式被吸收和利用。因此我们提出"肛欲性格"（anal character）。在此种性格中，我们发现了上述值得注意的结合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肛欲性格和未变化的肛欲期性欲做了比较①。我们也发现在抱负（ambition）与尿道欲期性欲（urethral erotism）间也存在一种类似的、甚或更牢固的联系。对这种联系的一个显著暗示可见于下面这个传说中：相传在亚历山大大帝诞生的那一夜，一个叫赫罗斯特拉斯（Herostratus）的人仅为了出名，而放火烧毁位于以弗所的著名的阿耳忒弥斯（Artemis）神庙。古人好像已意识到这个联系。当然，你们已经知道，排尿和火及灭火有密切联系②。我们自然期望也能证明：其他的性格特征也是同样起源于各种特殊的性器欲前的力比多结构，如有关的积淀物或反应结构。但目前我们还不能做到。

然而，现在我可要再注意较早的一个时期：并又一次提出本能生活的一些最普遍问题。起初，自我本能和性本能间的对立曾是力比多理论的基础。到后来，当我们开始更严密地研究自我本身并得到自恋概念时，这种区别本身就失去了基础。在稀有的场合中，一个人能够观察到，自我将自己当做对象，其所为就好像是自己爱自己。因此，术语"自恋"（narcissism）③ 是从希腊神话中借来的。但这仅是事物正常状态的一个极度夸大。我们逐渐明白，自我总是力比多的主要储藏库，对对象力比多精神贯注源出于斯又返回于斯；而这种力比多的主要部分则在自我中被永久保存④。因此，自我的力比多经常转化为对象力比多。但这种转变中，二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并且把一种力比多能量与另一种力比多能量区分开来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可以抛弃"力比多"这个术语，也可把它用做一般意义上的"心理能量"（psychical energy）的同义词。

这个观点我们没有坚持很久。关于两种力比多在本能生活中成为一种对比势力的看法，不久我们就找到了另一种更为精确的表达形式。但这里我不打算详述我得到这个新观点的经过；它基本上也是基于生物学的思考。我将把这种观点作为一个现成的结论告诉你们。我们假设有两类本质不同的本能：一类是在最广泛

① 实际上，弗洛伊德在很早的论文《性格与肛欲》（1908b）中就已指出了这些关系。

② 弗洛伊德在此不久前写了一篇专论此主题的短小论文（1932a），被引用到该讲后面第187页，并在编者语中可找到相当充分的另一些说明。

③ 纳西索斯是神话中爱恋自己的人。

④ 但请参阅本讲第77页的论述："对对象的精神贯注源于本我中的本能要求"。还请参阅英文版第105页上关于和破坏性本能有关的自我和本我的论述。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附录二中详细地论述了整个问题。



意义上所理解的性本能——假如你喜欢，也可叫做爱的本能（Eros）；另一类则是攻击性本能，其目的在于破坏。当用下述方式提出这种观点时，你们几乎不会视其为新观点。这种观点看起来是一种尝试：它将爱与恨之间的日常对立作了理论上的升华，这种对立可能与物理学所假设的在无机物世界中的吸引与排斥的对立相符合。但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即这种假设仍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新观点，并且是一种应尽快抛弃的、人们最不希望见到的新观点。我认为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因素正在对这种否定产生作用。我们自己为什么需要花这么长时间才决定接受攻击性本能呢？为了自己的理论而利用那些显而易见并且众所周知的事实时，我们为什么会显得优柔寡断呢？如果我们试图把带有攻击性目的的本能归之于动物，或许根本就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了。但如果认为人类气质中包含这种本能，则显得对人类是太不敬了；这种观点也违背了许多宗教假说和社会习俗。因为从本质上讲，人类应该是天生善良的；或至少是本性善良的。即使他偶尔表现出野蛮、粗暴和残忍，这也仅仅是其情感生活转瞬即逝的失调，因为它们大部分是被煽动起来的，或者可能只是他迄今强加于身的那种不明智的社会制度的产物。

可惜，历史的教诲和我们的亲身经历都没有证实这一点，反而证实了这样一种判断：对人性“善良”的信仰是那些有害的错误观念之一。凭借这些观念，人们期望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而安逸，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却只会造成灾难。这场争论无须继续下去，因为我们赞成人类具有特殊的攻击性的和破坏性的本能，这并不是根据历史教训或我们的生活经验，而是依据我们考察施虐狂和受虐狂现象而引起的种种普遍性思考。正像你们所知，我们把性的满足与性对象遭受痛苦、施虐和践踏的条件相联系的现象叫做施虐狂；反之，把性的满足以自己遭受此种待遇为条件的现象叫做受虐狂。又如你们所知，正常的性关系包含着这两种倾向的一种特定的混合体；当这两种性倾向将别的性目标放进背景之中，而用自己的目的来代替它们时，我们将它叫做性倒错行为①。你们也许根本没有注意到，施虐狂与男性气质有更密切的关系，而受虐狂则与女性气质有更密切的关系，仿佛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秘密的亲缘关系；尽管我必须补充说明，沿着这一途径研究，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施虐狂与受虐狂这两个现象对力比多理论而言，都是真正令人迷惑的问题，而受虐狂则尤为突出。这两种现象构成了力比多理论的障碍，而它们又恰恰能变成替代力比多理论的另一种理论基石。

然后，我们的观点是，在施虐狂和受虐狂中，我们得到了两个关于爱的本能和攻击性这两类本能的混合体的极好例子。我们再假定，这种关系是一种原型关系——我们能够考察的每一个本能冲动，都是由这两种本能的类似的融合或重合所组成。当然，这种融合的比例变化是很大的。结果，爱的本能将多种多样的性

① 关于性倒错行为参阅《精神分析导论》第20讲和21讲。



目的引进融合物中，而攻击性本能仅容许它们的单一倾向在融合物中趋于缓和或发生变化。这个假设为我们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前景，终有一天，它对我们理解病理学过程会有重大意义。由于融合物也可以分解，所以我们可以预料，这类分解作用会对融合功能产生最重大的影响。但这些概念仍太过新颖，也没有人力图将它们用于我们的工作中①。

让我们回到受虐狂呈现给我们的那个特殊问题吧。假如我们将其性爱成分暂时搁置不论，受虐狂就会向我们证明一种以自我毁灭为目的的倾向的存在。假如自我——不过在此我们心里所指的更是本我，即整体的人②——从起源上来讲包括所有的本能冲动，这对破坏性本能而言也是真的，那么我们就得出这样的观点：受虐狂比施虐狂产生更早，施虐狂是指向外部的破坏性本能，所以，获得了攻击性特征。一定数量的原始的破坏性本能仍可能存在于内部。好像我们仅能在下面两种条件下觉察到这种本能：当它与性爱本能结合面转化为受虐狂时；或者，当它拥有或多或少的性爱成分，作为攻击性本能指向外部世界时。现在下述可能性的重大意义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攻击性本能不能在外部世界中得到满足，因为它碰到了真实的障碍。假如这种情况发生了，它就可能退缩；而增加在内部占有稳定地位的自我破坏性。我们将会知道，这就是事实上所发生的情况，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受到阻碍的攻击性好像包含了一种严重的伤害。为了不毁灭自己，为了打消自我毁坏的冲动，而去破坏他物或他人，对我们而言似乎的确是必要的。这对道德家而言，确是一种可悲的披露。

但长期以来，道德家总以我们猜测的不可能性聊以自慰。事实上，一种古怪的本能甚至将破坏的目标指向自己栖身的躯体！诗人们的确提到了这样的事情；但诗人是可以不负责任的，他们享有诗歌式的豁免权。附带提一下，这样的看法甚至与生理学也有关联：例如，胃粘膜侵蚀它自身就是一例很好的说明。但我们得承认，自我破坏性本能需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寻找证据。毕竟人们不能仅仅因为少数可怜的傻子将其性满足与某种奇特条件相联系，就冒险做出这样一个范围巨大的假设。我相信，对本能的更深刻的研究将会带给我们所需的东西。这种本能不仅统治着心理活动，而且统治着植物性神经的活动，这些有机体的本能展现出一种值得我们深感兴趣的特征（将来，我们才能判断这种特征是否为本能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因为本能显示了一种恢复事物早期状态的努力。我们可以假定，在事物已获得的某种状态被搅乱时，一种本能就会产生出来重新制造那种状态，并产生一种我们可叫做“强制性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的现象。整个胚胎学就是这种强制性重复的一例。在整个动物王国中，都存在再生已丢失器官的能

---

① 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自我与本我》（1923b）第四章。

② 参阅英文版第103页第一个脚注。



力。除了治疗外，我们疾病的痊愈应归功于复原的本能，而这种复原的本能就是上述能力的遗迹，该能力在低等动物身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鱼类在排卵时的回游、鸟类的定期迁徙、甚至可能所有我们称为动物本能①的行为表现，都是在强制性重复的法则下产生的，这个法则表明了本能的保存性。在心理领域，我们也不难看到该法则的表现形式。我们已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在对梦和反应——尤其是那些发生于移情中的梦和反应——的精神分析中，儿童期的被遗忘和被压抑的经验会重现，尽管这种重视与快乐原则的利益是相抵触的；通过这一途径——即假设在这些情形中，强制性重复甚至正在征服快乐原则——我们就可以对上述事情进行解释。不通过精神分析，我们也可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有些人在其生活中，不断重复相同的不正确行为以伤害自己；而另一些人则似乎被厄运缠身。但更进一步的研究又告诉我们，恶运却是他们自己无意识地惹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强制性重复具有"恶魔"的特性。

但本能的这种保存性特性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自我破坏性呢？像这样的本能想要回复到什么样的早期状态呢？答案是容易发现的，并可开辟广阔视野。假如生命确实曾经产生于无机物——在某个无法推算的远古时期，以某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产生——那么，根据我们的假设，那时就应产生一种一再企图毁灭生命并重建无机物状态的本能。假如在这个本能中，我们能识别出我们假设的自我破坏性，我们就可以将这种自我破坏性看做是一种"死的本能"（death instinct）的表现，这种"死的本能"在每个关键过程中都必将表现出来。现在，我们相信，这种本能可分为两类——爱的本能，它企图将越来越多的有生命的物质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和死的本能，它与上述企图相反，而是想使有生命的一切退回到无机物状态。生命现象就是产生于这两类并存但又矛盾的行动中的，直到被死亡带回到终点。

你们可能不以为然地说："它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叔本华的哲学！"但是，女士们，先生们，一个大胆的思想家为什么不能猜测到某种后来才被严肃而艰苦的细致研究所证明的东西呢？而且，没有什么东西没有被说过。在叔本华之前，就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更何况，我们所说的又确非叔本华的哲学。我们没有肯定死亡是生命的惟一目的；也没有忽视有死亡也有生命这一事实。我们仅是承认这两种基本本能，并承认它们各有自己的目的。在生命历程中这两种本能是如何混合的，死亡本能如何被用来服务于爱的目的，特别是在它作为攻击性转向于外部时，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将来的研究。我们还没有走得太远，以致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前景。保存性特性是否毫无例外地可以不属于所有的本能？性爱本能在努力综合有生命物而形成更大整体时，是否可以不试图退回到事物的早期状态之中？对

① 原文为"Instinkt"，下两行的本能原文为"Triebe"。



这些问题我们暂时无法回答①。

我们已离题太远了。我再和你们回顾一下有关本能理论思考的出发点。它也是那个导致我们修改自我与潜意识关系的出发点——这种观点来自于精神分析工作中，即病人产生抵抗但经常意识不到他在抵抗。病人不仅意识不到他抵抗的事实，而且也意识不到抵抗的动机。我们被迫去寻找这些动机或这种动机。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该动机是对惩罚的强烈需要，我们只能把这种需要归类为受虐狂愿望。这个发现的实践意义与其理论意义一样重要，因为对惩罚的需要是我们治疗努力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它通过与神经症相联的痛苦得到满足，并因此而使病人坚持处于患病状态。这个因素即对惩罚的潜意识需要好像存在于每一种神经症疾病中。在某些病例中，神经症的痛苦可被别种痛苦所替代，这些病例是完全令人信服的，我将向你们汇报这类经验。

我曾经成功地使一个不再年轻的未婚妇女免除了症状情结，该情结使她遭受了大约 15 年的折磨，并使她完全不能参加生活中的任何活动。现在她感到病好了，并积极从事各种活动，以发展她那较好的才能，获得一些承认、享受和成功，尽管这一时刻来得晚了些。但是，只要有人让她知道或她自己感到，她太老了以致于无法完成这个领域的工作，她的每一个努力便终结了。本来每次这类结果显然会使其旧病复发，但她却再也不可能患那种病了。相反，每次她都会遇到意外事情，使她暂时终止活动并引起她的痛苦。在她正做某事时，她或者摔倒而扭伤脚踝，或碰伤膝盖，或碰伤手。若有人让她知道她自己应对这些明显的意外负责时，据说她就改变了方式，于是相同的烦恼不再导致意外事故，而是导致各种小毛病——如粘膜炎、咽喉炎和流行性感冒，或风湿性肿胀——直到最后，她下决心放弃所有尝试时，整个骚动才算结束。

我们认为，关于对惩罚的潜意识需要的起源，已是毫无疑问的了。这种需要看上去好像是良心的一部分，又像是我们的良心向潜意识的一种延伸；它必定和良心有共同的源泉，因此和一部分已被超越内化和接受的攻击性相符合。假如这些观点是对的，为了实践之目的，我们有理由将这种需要叫做“潜意识罪疚感”。在理论上，我们还怀疑，我们是否应假设所有已从外部世界退回的攻击性都受超我的约束，并因此反对自我呢？是否应假设这些攻击性的一部分作为一种自由的破坏性本能，继续在自我和本我中进行着沉默而怪秘的活动呢？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对于它，我们知之甚少。无疑，当超我最初形成时，超我这个机构所接受的是儿童指向其父母的攻击性，由于儿童性爱的固着作用和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他无法向外发泄这种攻击性，因此，超我的严厉性并不与养育的严格性简单地相

---

① 关于强迫性重复和死的本能的阐述，几乎全部来自于《超越快乐原则》(1920g)。而在后期的论文《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 中则对性受虐有更详细的阐述。



对应（见前面第 62 页）。很可能是当后来出现压制攻击性的场合时，这种本能就会采取每当在关键时刻就向它展开的那一途径。

潜意识罪疚感太强的人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是通过抗拒治疗的反应来表露自己的，从预测性观点看，这种反应是不协调的①。当人们向他们提供了症状的解释时（正常情况下，至少应在其暂时消失后才能做出），他们所产生的情况反而是症状与疾病的暂时加重。要想使他们的病情加重，只需对他们的治疗中的表现加以称赞或说一些精神分析有望取得进展之类的话，就足够了。非精神分析者将说病人全无“康复意愿”。假如遵照精神分析的思维模式，你会在这种行为中看到潜意识罪疚感的体现（正是为此而病的），以及由此而遭受的痛苦和挫折，这一切都是病人的意愿所在。潜意识罪疚感所面临的问题及它与道德、教育、犯罪和过失的关系，在当前都是精神分析家所偏爱的领域②。

在此，我们意想不到地从心理的地下世界步入了开阔的闹市。我不能再带你们向前去了。但今天在我离开你们之前，我要再耽搁你们一点时间，告诉你们我的另一个思考结果。我们已习惯于说，我们的文明是以性倾向为代价建立起来的。该倾向在社会抑制下，一部分的确被压抑了，另一部分则可以运用于其他目的。我们也承认，尽管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成就感到自豪，但是要实现文明所提出的要求或在此文明中感到舒服，实非易事。因为，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各种本能的限制，形成了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我们关于性本能的诸种观点，同样甚或更适用于攻击性本能。毕竟，正是它们产生了人们正常生活的困难，威胁着社会的继续存在。对个体攻击性的限制，是社会要求他首先做出的，也可能是最巨大的牺牲。我们已学会一种精巧方法用以完成对难以驾驭之事的驯服。承接危险的攻击性冲动的超越的建立就好像在那些有反抗倾向的地方派驻了一个卫兵。但另一方面，假如纯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就必须承认自我如此牺牲自己以服从社会需要，不得不臣服于攻击性的破坏倾向（对此它原本是乐意用来反对人的），对此它是不会感到快乐的。这种情况就像是那些支配有机动物世界的“吃或被吃”的困境在心理领域中的延续。幸运的是，攻击性本能从来就没有独自存在过，而总是与爱的本能并存，而后者在人类创造的文明条件下具有延缓与防止攻击性本能的作用③。

---

① 参阅《自我与本我》（1923b）第五章中长长的脚注。

② 关于罪疚感的主要阐述见于《自我与本我》（1923b）第五章、《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和《文明及其缺憾》第七、八章（1930a）。

③ 弗洛伊德在距此不久前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中详细阐述了攻击性和破坏性本能，特别是该书第五、六章中。而他关于此问题的看法的历史可追溯到那本书的编者导言中。



第33讲 女性气质[①]

女士们，先生们：

我一直准备告诉你们，我正与内心的困难做斗争。可以这样说，我感到把握不住讲演的合理范围。在过去15年的工作中，精神分析的确发生了变化并且变得更加丰富了。但是，尽管如此，《精神分析导论》大可不必有所改变或增补。我心中一直认为，这些讲演是没有存在理由的。对精神分析学家而言，我既言之无物，又无丝毫新意（说得太少了，而且根本没有什么新东西）；而对于你们来说，我又说得太多了，且都是你们没有准备理解的或超出你们能力之外的东西。我为演讲找了种种理由，并试图根据不同的理由证明各个相互独立的讲演。第1讲，关于梦的理论。可以设想，这一讲将一举把你们送回精神分析的氛围中，并向你们显示我们的观点是多么经得起考验。由于我有机会毫无约束地讲出我对这样一个研究领域的看法，即在该领域中，许多偏颇的期望正与强烈的抵抗进行斗争，从而我被引导到第2讲，追溯了从梦走向神秘主义的道路；我希望你们在做出判断时，学会容忍精神分析的实例，不要拒绝与我一起探索这个领域。第3讲，关于人格的剖析，因其是不为你们所熟悉的题材，肯定对你们提出了最难接受的要求。但是，我不可能向你们隐瞒自我心理学的最初起源。如果15年前我们就掌握了这种剖析，那时我就会向你们提及。我的最后一讲，你们可能只有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理解它，该讲提出了一些必要的更正——即对解决各种最重要的问题的新的尝试；如果我对这些修改保持缄默，那么我的介绍就会把你们引入歧途。你们知道，在人们开始寻求辩解的理由时，结果也同时显露了出来，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命中注定的。我服从命运，并请求你们也这样做。

---

① 该讲主要建立在早期的两篇论文《两性解剖学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学结论》（1925j）和《女性性欲》（1931b）的基础上，但本讲主要涉及成年妇女，包含着新的材料。在弗洛伊德死后出版的《精神分析纲要》（1940a [1938]）第七章中，再次返回这个主题。

显然今天的讲演在导论中也没有任何地位。但它能够向你们提供一个详细的精神分析工作中的实例，我可谈两点情况来介绍今天的讲演。首先，它所提供的仅是可观察的事实，几乎没有任何思辨性的附加成分；其次，它所论及的主题比其他任何主题更能引起你的兴趣。从整个历史看来，人们对女性气质的性质这个谜一筹莫展——

那些戴着象形文字的便帽的头，
那些裹着头巾的头和戴着黑色方帽的头，
那些戴着假发的头和其他无数
不幸的、流淌汗水的人们的头……①

你们无可避免地要为此问题而烦恼——这是指你们当中的男人；而对于你们当中的女人来说，却没有这种烦恼——你们自身就是这一问题。当你们遇到一个人时，你们所作的第一个区分是："男人抑或女人?"并且习惯于以毫不犹豫的确定性进行区分。在这点上，解剖学与你们有同样的确定性，而且并不比你们更深刻。男人的性产物，即精子及其载体是雄性的；卵巢和含有卵巢的有机体是雌性的。在两性中，绝对为性功能服务的器官形成了；它们可能起源于相同的（遗传的）性倾向，进而发展为两种不同的形式。此外，两性的其他器官、体形和组织，都显示了个体性别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稳定，而且它的程度也是可变的；这些就是所谓的第二特征。其次，科学会告诉你们某种与你们期望相背，并且可能扰乱了你们的情感的事情。它使你们的注意力转向下述事实：男人性器官的某些部分也会在女人身体上出现，尽管是以一种发育不全的状态出现，反之亦然。这种观点把上述情况视为双性特征（bisexuallty）的表现②，仿佛一个个体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又始终既是男人又是女人——仅仅是某一种性别比另一种性别更明显而已。然后，我们要求你们熟悉这样一种观点：个体身上男性成分与女性成分相混合的比例，具有相当大的波动性。然而，除非是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中，因为一个人身上所呈现的只能是一种性产物——或者是卵细胞，或者是精液，所以，你们一定会怀疑上述成分的决定性意义，并推断出构成男性气质（masculinity）或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东西是解剖学所无法控制的、不为人知的特征。

---

① Heads in hieroglyphic bonnets,
Heads in turbans and black birettas,
Heads in wigs and thousand other,
Wretched, sweating heads of humans... 海涅《北海》（第二部分第七篇，"问海"）。

② 弗洛伊德在其《性学三论》（1905d）初版中阐述了双性特征，该部分包括一个很长的注脚，该注脚被补充到了该书后来的各版中。



或许，心理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习惯于把“男性的”和“女性的”作为心理品质来使用，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把双性特征的概念引入心理生活之中。因此，我们谈到某个人时，无论是男是女，就说他在这个方面表现为男性的，而在另一个方面表现为女性的。但你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只是对解剖学或习俗的让步。你们不能给予“男性的”和“女性的”这两个概念以任何新的内涵。这种区别不是心理学上的区别，你们说到“男性的”时，通常意指，“主动的”；而说到“女性的”时，通常意指“被动的”。这种关系确实是存在的。男人的性细胞是积极活动的，它寻找女人的性细胞，而后者即卵子则是静止的，它被动地等待着。这种基本的性生物体的行为的确是性交中性个体行为的原型。男人为了性交目的而追求女人，占有她并穿人她体内。但就心理学而言，这种说法恰好把男性气质的特征变成为攻击性因素。但当你们想到，在某些动物中，例如蜘蛛，雌性更强壮而且更具有攻击性，而雄性仅在性交这一个行为中才具有主动性时，你们很可能会怀疑你们是否真正有权保持上述说法。甚至是那些抚育和照料幼儿的功能（我们认为这些功能是女性的优良美德），在动物中也并不总是与雌性相关。在相当高级的动物中，我们发现两性共同承担着照料幼仔的任务，或甚至由雄性单独承担。即使在人类性生活中，你们也很快会看到，把男性的行为与主动性等同，把女性的行为与被动性等同是多么不完善。母亲对孩子是主动的；哺乳这一行为可以等同地说是母亲给婴儿喂奶或被婴儿吮吸。你们越脱离狭隘的性交领域，这种“重叠性谬误”(error of superimposition)① 就暴露得越明显。女人可以在不同方面显示出重大的主动性，而男人只有养成大量的被动适应性，才能与其同类相伴生活。如果你们现在告诉我这些事实恰好证明了心理学意义所说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双性的，那么我将断定，你们心里已决定使“主动的”与“男性的”等同起来、“被动的”与“女性的”等同起来，但我劝你们不要这样认为。在我看来，这种见解对追求有益的目的毫无用处，也不能给我们的知识增加任何东西②。

人们可能会考虑从心理学上把女性气质描述为偏爱被动性目的。当然，偏爱被动性目的与被动性不是一回事：实现被动性目的可能需要大量的被动性。情况可能是这样：对于女人来说，基于她所承担的性功能，她对被动性行为和被动性目的的爱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扩大到相应有限的或广泛的生活领域之中，她的性生活可作为这些领域的模型。但是，我们应该警惕在这个方面低估了社会习俗的影响力。还是这些影响力迫使妇女陷入被动状态。所有这些情况仍远未被澄

---

① 即把两个相区别的事情混淆为一个，该术语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0讲中作了解释。

② 在《性学三论》1915年第3版增加的一个长注脚中，阐述了寻求“男性的”和“女性的”的心理之意义的困难，又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 第四章末的一个更长的注脚的开头中再次阐述了该困难。



清。在女性气质与本能生活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特别稳定的关系。妇女对攻击性的压抑是由其体格规定并由社会强加给她们的。这种压抑有助于强力的性受虐狂冲动的形成，正如我们所知，这种压抑成功地约束了已转向内部的性欲的破坏性倾向。因此，可以说受虐狂确实是为女性所独有的。但是，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你们在男人中遇到了性受虐狂，你们除了说这些男人显示了非常痛苦的女性特征外，还能说什么呢？

现在，你们听到了，心理学也不能解开女性气质之谜。无疑，这个解释要到别处去寻求，而只有在我们大致认识到活着的有机体是怎样演变成两种性别之后，才能找到解释。我们对这个演变一无所知，而两种性别的存在是有机生命中最显著的特征，该特征明显地把有机生命与非生物自然界区分开来。然而，对于研究那些拥有女性生殖器而具有显著的或占优势的女性特征的人类个体而言，我们已发现了很多东西。按照精神分析的特殊性质，它并不试图描写什么是女人——那将是一件它几乎无法胜任的任务——而是已着手研究女人是怎样形成的，即女人是怎样从具有双性别倾向的儿童成长起来的。幸亏我们有几个优秀的女精神分析家已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故而我们近来对这方面也掌握了不少知识。该问题的探讨已从两性差别中获得了特别的吸引力。对于女士们来说，只要某种比较的结果似乎被证明为不利于她们的性别，她们就可能提出怀疑，我们这些男性的精神分析家无法消除对女性气质所抱有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见，而且这种比较正在不公正的研究中受到损害。另一方面，立足于双性特征，我们毫不困难就避免了对女士们的失礼行为。我们只要说："这种比较不适用于你们，你们是例外；在这点上，你们所具有的男性成分多于女性成分。"

我们在研究妇女的性别发展中，提出了两个预测。第一，妇女只有经过反复的斗争，她的体格才能适应其功能。第二，性别发展中的关键性转折点在青春期以前就已做好准备或已经完成。这两个预测很快就会被证实。而且，与男孩的情况的比较告诉我们，小女孩向正常妇女的发展更加困难，也更加复杂，因为它包括两个额外的任务；而在男人的发展中并没有与之相当的任务。让我们从两种性别的起源谈起吧。男孩和女孩的生理物质无疑是各不相同的，关于这一点，无须精神分析来确定。生殖器结构的差异伴随着其他一些身体上的差异，对于后者，大家如此熟悉，在此无须再提。差异也出现于本能气质中，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后来所形成的妇女的性质。小女孩通常缺少攻击性、对抗性和自我满足感；她似乎更需要给予爱抚，因而显得更具依赖性和顺从性。这种顺从性的结果可能是这样：她更容易也更快学会控制排泄；尿和粪便是儿童送给其照料者的一批礼物（见英文版第 100 页），而且控制大小便是儿童的本能生活所能诱导取得的第一个让步。人们还有一个印象：小女孩比同龄男孩更聪明更活泼；她们更常走出户外接触外部世界，同时形成更强烈的对对象的精神贯注。我无法说清，女孩在发展中的这



种领先是否已被精确的观察所证明。但毋庸置疑，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能说女孩在智力上落后于男孩。然而，这些性别差异并不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以被个性变化所超越。就我们当前目的而言，它们可以忽略不计。

两种性别似乎都以同样的方式经历了力比多发展的早期阶段。我们原本期望女孩在肛欲攻击阶段已表现出在攻击方面的落后，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女精神分析家对儿童游戏的分析已表明，小女孩的攻击性冲动在丰富性与猛烈性方面都完整无缺。当她们进入阳具欲阶段时，两性的差别就完全被两性的一致所掩盖了。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小女孩即是一个小男孩。正如我们所知，对于男孩而言，这个阶段的标志即下述事实：他们已学会如何从他们的小阴茎那里获取快乐感，并把其兴奋状态与他们性交的念头联系起来。小女孩则通过其更小的阴蒂做同样的事。看起来她们的一切手淫活动都是在这种阴茎的等同物上进行的，真正的女性阴道（vagina）则仍未被两性发现。一些关于阴道感觉的报告也确实存在，但是要把这些感觉同肛门（anus）或（阴道）前庭（vestibulum）的感觉区别开来，却是不容易的；而且这些阴道感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起重要作用。我们有权坚信我们的观点：在女孩的阳具欲期，阴蒂是主要的性感区。当然，情况不会一直如此。随着女性气质的产生，阴蒂就全部或部分地把其敏感性连同其重要性移交给了阴道。这是妇女在其发展中不得不完成的两个任务之一，而相比之下要幸运些的男人只须在其性成熟时期，继续进行那个他早先在性欲早期旺盛阶段就从事过的活动。

我们以后再回到阴蒂作用的问题上来，现在让我们谈谈女孩在发展中肩负的第二个任务。男孩爱恋的第一个对象是他的母亲，在男孩伊谛普斯形成时期依然如此。而且从本质上说，终生如此。对女孩而言，她的第一个对象也应该是她的母亲（还有与母亲融为一体的奶妈或养母）。儿童最初对对象的贯注表现于对满足某些既主要又简单的基本需求的依恋中[①]，并且照料儿童的环境对两性而言也都是相同的。但在伊谛普斯状态中，女孩的父亲变成了她的爱恋对象（love-object），我们期望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她将找到从亲本对象（paternal object）通向最后选择的对象的道路。因此，在该时期，女孩不得不改变她的性欲区和爱恋对象——而男孩则保持二者不变。于是便产生了这个问题：这种转变是怎样发生的？特别是女孩是怎样从对母亲的依恋转到对父亲的依恋的？她是怎样从男性阶段转向生理上注定的女性阶段的？

如果我们假定，从某一特定年龄开始，异性相吸这一基本力量便被儿童感觉到了，并使女孩趋向男人，而同样的法则则允许男孩继续与母亲在一起，那么，这种假设将会是一个理想的简单解释。此外，我们还可以假设，在这一时期，儿

①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第21讲。

童遵循着父母性偏好所给予他们的暗示。但我们并不会这么容易地找到答案。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是否要确信这种吸引力，尽管诗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赞美这种力量，而在精神分析上却无法进一步对它做出分解。通过艰辛的研究，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至少很容易地获得了答案所需的材料。你们可能知道，长大后仍然温柔地依恋亲本对象（确切地说是父亲）的女人，为数甚多。我们对这些女人有惊人的发现，她们对父亲的依恋程度很强，持续时间也很长。当然，我们都知道，在这之前女孩还有一个恋母阶段；但我们不知道，这一阶段内容如此丰富，持续时间如此之久，而且留下了如此之多的、造成固着与偏向的机会。在这一个时期，女孩的父亲不过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竞争者；而且在某些实例中，对母亲的依恋持续到 14 岁以后。差不多我们后来在她与父亲关系中所发现的每一事件，都在早期的依恋中出现过，并被依次转移到父亲身上。简而言之，我们认为如果不懂这个依恋母亲的前伊谛普斯阶段，那么就不可能理解女人。

那么，我们将乐于知道女孩与母亲的力比多关系的性质。答案是，这些关系各不相同。由于它们贯穿于幼儿性欲的全部三个阶段，故也具有各个不同阶段的特征，并通过口唇的、肛门施虐的和阳具欲期的愿望表现自己。这些愿望体现了主动的和被动的冲动；如果我们把它们与后来呈现的两性差别联系起来——尽管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这样做——我们便可把它们叫做男性的和女性的。除此以外，它们是完全相矛盾的，既具有亲切的性质，又具有敌对的和攻击性的性质。后者通常仅在被转变为焦虑观念后才明朗化。要提出对这些早期的性愿望的明确阐述总是不容易的；女孩表达得最清晰的是让母亲怀上孩子和为她生个孩子的愿望——这两个愿望都属于阳具欲期，而相当令人吃惊的是，它们无疑都被精神分析的观察所证实了。这些研究给我们带来了令人吃惊而详细的发现，这是引人注目的。例如，我们发现，在这个前伊谛普斯时期，被杀或被毒害的恐怖，（它们后来可能构成偏执狂疾病的核心）就已出现在与母亲的关系中了。又如另一个例子：你们可能会回想起精神分析研究史中的一件曾引起我许多苦恼的趣事。在那个时期，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发现婴儿性欲创伤，我几乎所有的女病人都告诉我，她们曾被自己的父亲诱奸过。但最后我被迫承认，这些报告都是失真的，因而开始明白，癔症产生于幻想而不是真实事件。只是到了后来，我才能够从被父亲诱奸的幻想中，辨认出它是女人典型的伊谛普斯情结的表现。现在，我们在女孩的前伊谛普斯阶段中再次发现了关于被诱奸的幻想；但诱奸者通常是母亲。然而，这次的幻想涉及到了真实的领域，因为确实就是母亲，在给孩子做身体卫生保健的



活动中、无可避免地激起了，而且可能是第一次激起了女孩生殖器的快感①。

我相信你们将会怀疑到：对于小女孩与母亲的性关系的丰富性和强烈性的说明是言过其实了。毕竟人们有机会可以观察小女孩，但没有注意任何这类情形。但这种反对并未切中要害。如果人们知道怎样观察，那么他们在儿童身上就可看到很多东西。此外，你们应该考虑到，儿童能够带到前意识中并加以表述或传达的性愿望是何其少，甚至没有。因此，如果有人在这个情绪领域出现明显的或者过度的发展，我们就完全有权借助他们的回忆，研究这个情感世界的遗迹和影响后果。病理现象总是通过分离和夸大的办法，帮助我们弄清仍然隐含在正常状态中的条件。而且，由于我们的研究是在那些绝对严重变态的人中进行的，所以我认为研究的结果是值得信任的。

现在，我们将把兴趣转向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女孩对母亲的这种强烈依恋消亡的呢？我们知道，这种依恋的通常命运是：它注定要让位于女孩对父亲的依恋。这里，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引导我们进一步研究的事实。发展中的这一步骤并不仅仅包含对象的简单变化。对母亲的疏远是伴随着敌意的；对母亲的依恋以仇恨告终。这种仇恨可能变得非常显著而且终其一生；它可能在以后得到精心的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e）；通常它的一部分被克服，而另一部分则被保持。儿童后来发生的事件当然对这种结果影响很大。然而，我们将仅限于研究女孩在转向父亲时对母亲的仇恨；仅限于研究这种仇恨的动机。我们听到了一长串对母亲的谴责和抱怨，这些谴责和抱怨被认为证明了孩子的敌对情感，这些谴责和抱怨的有效性有很大差异，我们应该认真审查。其中一些显然是属于文饰作用（rationlizations）的，敌对的真正根源有待于发现。如果在此我让你们了解精神分析研究的一切细节，我希望你们会发生兴趣。

对母亲的责怪，追溯其最早的根源，是母亲给儿童太少的奶水——这被解释为儿童因丧失爱而反对母亲。在我们的家庭中，现在就存在着这种责怪。母亲经

---

① 在其关于癔症病因的早期论述中，弗洛伊德经常提及成人的诱奸，并视它为癔症的最普遍的原因之一［如可参阅关于《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一文（1896b）和《癔症的病因》（1896b）］。但在这些早期出版物中，他没有任何地方特别归罪于女孩的父亲。诚然，在1924年为《全集》中《癔症研究》的重印本所写的一些增补注脚中，他承认在两种场合中隐瞒了父亲的责任。然而，他在1897年9月21日给弗利斯（Fliess）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69），相当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事实。在该信中，他第一次表达了对病人述说的这些故事的怀疑。他们第一个公布的对该错误的承认是几年后在《性学三论》（1905d）中以暗示的方式提出的。但是，关于这种态度的更详细的说明，出现于收入洛温费尔德（Löwenfeld）编的（1914d）《论神经症病因》文集中的论文中。后来他两次说明发现这一错误对他自己思想的影响——见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和《自传研究》（1925d）。本文该段描述的进一步发现，则在《女性性欲》中就已有所预示。

常没有足够的营养提供给她们的孩子，且仅满足于给孩子喂几个月、半年或9个月的奶。而在原始的民族中，母亲哺乳孩子的时间长达两三年。通常是为孩子哺乳的奶妈的形象会与母亲相融合；在这种融合尚未出现时，对母亲的这种责怪就会转变为另一种责怪——责怪母亲把热心喂养她们的奶妈过早地辞退了。不过，无论这些事件的真实情况原本怎样，儿童对母亲的责怪都是不可能经常被证明为合理的。相反，儿童对最早期的营养的需求似乎是贪得无厌的，他似乎从未克服失去母乳的痛苦。如果对那个已能跑会说却还吮吸母乳的原始人的孩子进行精神分析，并且结果表明他们对母亲也有同样的责怪，对此我不会感到惊讶。被毒死的恐惧也可能与断乳有关。毒药是使人生病的营养品，或许儿童把他们早期疾病的病因也归结到这种挫折（frustration）上。相当程度的智力教育是相信偶然之事的先决条件；原始人和未受教育的人，无疑还有儿童，都能够给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以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可能是以泛灵论为基础的。甚至今天在人类的某个阶层中，人们还相信一个人的死亡必与被他人——最可能是医生——所杀害有关。一个神经病患者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的死亡的通常反应，是把引起死亡的责任归结到自己。

当婴儿室中出现了另一个婴儿，他就爆发了对母亲的另一种谴责。如有可能，这种谴责就与口欲挫折保持了某种关系：母亲不能或不会给这个孩子提供更多的奶水，因为她需要为新生儿准备营养。如果两个孩子年龄如此接近，以致于第一个孩子的奶水受到第二个孩子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对母亲的这种谴责就获得了一个真实的基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儿童并不会因为年幼而注意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他只比新生儿大11个月。但是，儿童对闯入者和竞争者所妒忌的不仅仅在哺乳方面，而且还在母爱的所有方面。他感到自己的权力被推翻了，被剥削了，被损害了；他把妒忌的仇恨投向新生儿，并怨恨不忠实的母亲，这种怨恨经常表现为他的行为变得令人讨厌，他可能变得“淘气”、易怒和不听话，并放弃了他在控制排泄中的进步。人们很早就已熟悉了这一切，并承认这一切都是不言自明的，但我们对于这些妒忌冲动的强度，他们所持续存在的顽固性以及对其日后发展的影响的重要性，很少形成一个正确的观念，尤其是当这种妒忌在儿童后期不断地受到新的刺激（因而每次有小弟弟或小妹妹出生时，都会全面发作）时，更是如此。即便这个儿童碰巧仍为母亲所偏爱，结果也差不多如此。儿童对爱的要求是没有止境的，他们需要的是专一的爱，而不容许他人与之分享。

儿童对母亲所怀敌意的根源，在于他的多样化的性愿望。这些愿望随着力比多的发展而变化，而且大部分不能得到满足。如果母亲禁止孩子与生殖器有关的快感活动——经常采用严厉的威胁方式和各种令人不快的动作——而这些活动归根到底又是她自己介绍给孩子的，那么最强烈的挫折就会在阳具欲期发生。人们会认为，这些理由足以说明女孩疏远母亲的原因。如果真是如此，人们就会推断，

这种对母亲的厌恶感必然起源于儿童性欲的特征、儿童对爱的要求的无节制性特征和他们性愿望的不可实现性。的确可以认为，儿童的第一个爱恋关系注定是要消亡的，其原因正是因为它是第一个关系，是因为这些早期的对对象的贯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矛盾的。强烈的攻击性倾向总是伴随着强烈的爱，儿童对其对象的爱越强烈，对在那个对象上所遭受的失望和挫折就越敏感；最后，这种爱就必定会屈从于积累起来的仇恨。关于在性爱贯注中存在着一种诸如上述的原始心理矛盾的观点，可能会遭到反对。人们可能指出，正是母亲与孩子关系中这种特殊性质，以同样的必然性导致了儿童的爱的毁灭；因为即便是最温柔的抚养，也无法避免运用强制手段和采用各种约束，而且任何这种对儿童自由的干预，作为一种反应，都必定会激起儿童的叛逆性和攻击性倾向。我认为，关于这些可能性的讨论大概是最有趣的；但忽然出现了另一种反对意见，这使我们的兴趣有所改变。所有这些因素——冷遇、对爱的失望、妒忌、因禁忌而产生的诱奸——毕竟也都在男孩与母亲的关系中起作用，但却仍不能使他疏远母本对象。除非我们能够找到某种东西，它为女孩所特有，而不存在或不以同样的方式存在于男孩身上，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女孩对母亲依恋的终止现象。

我相信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特殊因素，而且的确是在我们期望的地方发现的，尽管是以某种令人吃惊的方式发现的。这种特殊因素存在于“阉割情结”之中，正是我们所期望发现的地方。（两性间的）解剖学上的差别最终必将表现为心理学的结果。然而，精神分析表明，女孩坚持母亲要对她们丧失一个阴茎负责，而且为她们因此处于不利地位而不原谅母亲，这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你们知道，我们认为女人也具有阉割情结。尽管该情结的内容在女孩身上与在男孩身上不同，但仍有足够的理由说女孩有阉割情结。男孩从对女性生殖器的观察中认识到，他们如此宝贵的器官并非一定要与身体相伴随，在此之后他们才产生了阉割情结。在这种情结中，当他想起因玩弄那个器官而招致威胁时，便开始信以为真，并处于受阉割的恐惧的影响之下。这种恐惧成为他以后发展的最强烈的动力。女孩的阉割情结也是产生于对异性生殖器的观察。她们马上注意到两性器官的差别，而且必须承认这种区别的意义。她们感到非常委屈，经常表示她们也要“有像样的东西”，成为“阴茎嫉羡”的受害者，这种嫉羡将在其发展和性格的形成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即使是在儿童最受宠爱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消耗大量的心理能力，这种嫉羡也是不可克服的。女孩对她没有阴茎这一事实的承认，绝非意味着她很容易屈服于这个事实。相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会继续坚持希望自己获得像阴茎那样的东西，并且过了许多年后，她仍相信这种可能性；精神分析还表明，当儿童对现实的认识否定了这个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后，该愿望就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中，并保持着相当可观的贯注能量。这个获得阴茎的渴望，最终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形成某种动机，该动机促使一个成年妇女接受精神分

析；而且她们在精神分析中合乎情理地可能期望得到的东西　　如从事智力工作的能力　　可能常被认为是这种被压抑愿望的升华的变型。

人们无法怀疑这种对阴茎的嫉羡的重要性。如果我断言，羡慕（envy）和忌妒（jealousy）在女人心理生活中比在男人心理生活中作用更大，你们可能以此为对男性不公正的一个实例。我并不认为羡慕和妒忌这些特征不存在于男人身上，也不认为它们存在于女人身上的根源只在于对阴茎的羡慕；而是倾向于主张，它们在女人身上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阴茎嫉羡的影响。然而，有些精神分析家则表现出一种贬低女孩初期的阴茎嫉羡在阳具欲期的重要性的倾向。他们主张，我们从女人这种态度中发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个二次结构（secondary structure）。该结构是妇女在后期发生心理冲突并倒退到这种早期幼儿冲动的场合中产生的。不过，这是深蕴心理学的一般问题。在许多病理学的　—甚或异常的—　本能态度中（如在所有的性倒错行为中），产生下述问题：这些本能行为的强度有多少应归因于早期幼儿的固着作用，又有多少应归因于后期经验和发展的影响？在这一种情况下，该问题几乎一直是我们在关于神经症病因[①]的论述中提出的那种相互补充的问题。这两个因素以不同的重要性在病因中起作用；这方面的作用小些，另一方面的作用就会大些，以此达到平衡。幼儿期的因素在所有场合中都建立了模式，尽管通常是决定性的，但它并不总是决定着这个问题。正是在阴茎嫉羡这一场合中，我要坚决论证幼儿期因素的优势。

发现自己被阉割是女孩成长中的一个转折点。由此出发有三条可能的发展路线：第一条导致性约束（sexual inhibition）或神经症；第二条导致女性性格向“男性化情结”（masculinity complex）方向转变；第三条导致正常的女性气质。关于这三条路线，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尽管并没有全部认识。

第一条路线的基本内容如下：小女孩至此仍以男性方式生活，她能够通过使阴蒂兴奋获得快感，并把这种活动与她指向母亲的性愿望联系起来（这种愿望常是主动性的）；现在，由于受到阴茎嫉羡的影响，她失去了男性生殖器性欲意义上的快乐。因与男孩的那个远为优越的家仆相比，她的“自爱心”（self-love）受到了损伤，结果，她放弃了通过手淫从阴蒂中获得的满足感，否定了她对母亲的爱，与此同时，她还常常压抑大部分的一般性性倾向。无疑，她对母亲的疏远不是突然发生的，因为一开始她只是把阉割视为个人的不幸，后来才逐渐延伸到其他女人中，最后才延伸到她的母亲身上。她的爱是指向她的具有阳具欲望的母亲；由于发现母亲也被阉割了，她就不可能再把母亲作为对象，以致于她长时期积累起来的仇恨的动机占了上风。因此，这就意味着，对于女孩来说，就像对于男孩和后来可能对于男人来说一样，由于发现妇女缺少阴茎，她们的价值就降低了。

---

①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第22讲和第23讲。

你们都知道，我们的神经症患者把其患病的重要原因归之于手淫。他们要手淫为她们所有的烦恼负责，我们很难使他们认识到他们错了。然而，事实上，我们应该向他们承认，他们是对的，因为手淫是他们幼儿期性欲发泄的动力，而他们的确饱受这种性欲的不良发展之苦。不过，神经症患者大多谴责的是青春期的手淫；他们大多忘记了早期幼儿的手淫，而这种手淫才是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我希望日后有机会向你们详细阐明，早期手淫的所有真实细节对于个体后来形成的神经症或性格是多么重要。这种手淫是否被发现了？父母是怎样极力反对它或容忍它的？他自己是否成功地抑制了这种手淫？所有这一切都在儿童的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但总的来说，我很高兴我不必这样做。这是一件困难而沉闷的工作；而且，最后你们肯定会要求我向你们提供一些关于父（母）亲或教育者应该怎样帮助儿童戒除手淫的实践性建议，从而使我陷入尴尬境地[①]。我能够从本讲所涉及的女孩的发展中，向你们提供儿童本人努力摆脱手淫的例子，但她并不能总是成功地摆脱手淫。如果对阴茎嫉羡激起了反对阴茎手淫的强烈冲动，而阴蒂手淫仍拒绝让步，于是就发生了一场争夺自由的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女孩似乎自己接替了被其废黜的母亲的角色，并在反对从阴蒂获取满足的努力中，表现出自己对低劣的阴蒂的全部不满。许多年以后，她的手淫活动虽然很早就已被抑制了，但对手淫的兴趣仍然持续存在，我们应当把这种兴趣解释为一种抑制仍令人担心的引诱的防御。这种兴趣表现为对那些遇到类似困难的人的同情，它在缔结婚姻的行动中起动机的作用，而且的确可以决定对丈夫或爱人的选择。取缔早期幼儿手淫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或寻常的事。

随着阴蒂手淫的放弃，女孩也放弃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性。现在被动性占了优势，而且在被动的本能冲动的帮助下，女孩基本上完成了向父亲的转移。你们可以发现，上述发展的浪潮把女孩在阳具欲期的主动性涤扫殆尽，从而为形成女性气质清扫了基地。如果主动性在这一涤扫过程中没有因压抑而丧失太多，那么这种女性气质就可能是正常的。女孩转向父亲的愿望最初无疑就是对阴茎的愿望，这种愿望已遭到母亲的拒绝，现在她寄希望于父亲。然而，如果对阳具的愿望被对婴儿的愿望所取代，也就是说，按照古代的象征性的“等同式”，幼儿代替了阳具，那么一种女性情势也就随之建立起来了。我们也注意到，早在平静的阳具欲期，女孩就希望有个宝宝，这当然就是她玩弄布娃娃的意义。不过，这个游戏实际上并非女性气质的表现，它是对母亲的认同，企图用主动性代替被动性。她扮演母亲的角色而玩偶则成了她自己，现在她能为宝宝做一切她母亲曾为她做的事情。一直到对阳具的愿望产生了，玩偶宝宝才变成了来自女孩父亲的一个宝宝，

①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中提交的关于本专题的论文（1912f）中最全面地阐述了手淫，在那里还提供了一些别的说明。

此后又变为最强烈的女性愿望这一目的。如果后来这种有个宝宝的愿望在现实中实现了，女孩就会觉得非常快乐；如果这个宝宝是一个具有女孩所渴望的阳具的小男孩，她就会尤其地快乐①。在“来自父亲的宝宝”这一复合描述中，给予充分强调的是婴儿而不是父亲。那种对拥有阳具的古老的②男性愿望仍然以同样的方式依稀可见于业已形成的女性气质之中。但是，我们或许反而应当承认，这个对阳具的愿望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女性愿望。

随着对阳具-幼儿的愿望转移到她的父亲，女孩就已进入到伊谛普斯情结的状态。她对母亲的那种无须重新产生的仇恨，现在大大加强了，因为母亲变成了女孩的竞争者，她从女孩父亲那里得到了女孩所想得到的一切。按照我们的观点，女孩的伊谛普斯情结在她前伊谛普斯时期对母亲的依恋中已隐藏了很长时间，但是它仍然十分重要，并在其后留下了种种长久持续的固着作用。对女孩而言，伊谛普斯状态是她漫长而艰难发展的结果；它是一种初步的解决，一种不会马上放弃的宁静状态。特别是离潜伏期开端不远时更是如此。现在，我们注意到两性间的区别，对于伊谛普斯情结与阉割情结来说，这种区别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男孩而言，他的伊谛普斯情结是从阳具性欲阶段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情结中，男孩对其母亲产生欲望而且希望摆脱作为竞争者的父亲。然而，阉割情结的恐惧却迫使他放弃这种态度。在认识到失去阴茎的危险后，伊谛普斯情结遭到抛弃、压抑，在最正常的情况下，则遭到彻底的摧毁（见第 92 页），而且严厉的超我作为继承者建立起来了。在女孩身上发生的情况几乎是相反的。阉割情结是为伊谛普斯情结作准备而不是毁坏它；她因受阴茎羡慕的影响而放弃对母亲的依恋，并且进入伊谛普斯状态，就仿佛进入了避难所一样。由于不存在阉割情结的恐惧，女孩便缺少了一种引导男孩克服伊谛普斯情结的主要动机。她们在这一情结中停留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来才摧毁该情结，而且，即使如此，也摧毁得不彻底。在这些情况下，超我的形成必定受到妨碍；它无法得到使它具有文化意义的力量和独立性，而且，当我们向男女平等主义者指出这个因素对一般女性特征所具有的影响时，他们并不高兴。

我们再回头谈谈；我们曾提到（第 126 页）把女人的男性气质情结的发展当做发现女人阉割后的第二个可能的反应。在此我们的意思是，女孩似乎拒绝承认这个不受欢迎的事实，她甚至夸大以前的男性气质，坚持阴蒂活动，进行挑战性的反叛，她逃避到对具有阳具欲期的母亲或对父亲的认同中。支持这一结果的决定因素会是什么呢？我们只能假定它是某种气质上的因素，是较高程度的主动性，诸如男性普遍特征那样的东西。然而，不管它可能是什么，这个过程的本质在于：

---

① 参阅英文版第 133 页。

② 原文 uncient 疑为 ancient 之误。——中译者

在发展的这一阶段中，女孩避开了那股为转向女性气质开道的被动性浪潮。这样一种男性气质情结的极端发展，似乎会影响女孩对对象的选择，使之趋向于明显的同性恋。当然，精神分析经验告诉我们，女性同性恋很少是，或者绝不是对幼儿期男性气质的直接延续。即使对这种女孩而言，她似乎也必然在某个时期把父亲作为爱恋对象，并进入伊谛普斯状态。但是后来，由于对父亲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她被追退回到早期的男性气质情结中。这些失望情绪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命中注定要成为女性的女孩也会产生这些情绪，尽管这些情绪有不同的作用。气质因素的优势似乎无可争议；但女性同性恋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则充分反应在同性恋者的实践中，这些同性恋者经常而且明确地相互扮演母亲和幼儿，又扮演丈夫与妻子。

我在此跟你们所说的一切，可以描述为妇女的史前史。它是最近几年的产物，作为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详尽实例，它可能已经引起了你们的兴趣。因为这个例子的主体是妇女，所以，我们在此冒昧地提到几位妇女的名字，她们对这一研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布伦斯维克（R. M. Brunswick，1928）博士是第一个描述下述神经症案例的人，该疾病返回到前伊谛普斯阶段的一个固着点，而且根本没有到达过伊谛普斯状态。该例采取忌妒狂想症的形式，而且证明对其治疗是有效的。格鲁特（Jeanne Lampl-de Groot，1927）博士通过某些可信的观察，证实了女孩在阳具欲期中转向母亲的不可思议的活动。多伊奇（Helene Deutsch，1932）博士已证实同性恋妇女的性行为再现了母子关系。

追踪探讨女性气质从青春期到成熟期的进一步行为表现，这并不是我的意图。而且，对于这个目的而言，我们的知识还是不充分的。但我在下文将把一些特征综合起来。以妇女的史前史为出发点，我在此仅强调，女性气质的发展仍要受到早期男性化时期的残余现象的干扰；在一些妇女生活进程中，男性气质占优势的时期和女性气质占优势的时期反复交替存在着。我们男人称之为“妇女之谜”的某些部分，可能来自妇女生活中双性并存的表现。但是，在这引进研究的过程中，对另一个问题做出判断的时机成熟了。我们把性生活的动力称为“力比多”，性生活受男性—女性的对立倾向支配。因此，这种见解主张考察力比多与这组对立面的关系。如果能证明每一种性别都有适合于他自己的特殊力比多，因而一种力比多追求男性性生活目标，另一种力比多则追求女性性生活目标，那么这种观点也就不会令人吃惊了。但上述情况不是真的。实际上只有一种力比多，它同时服务于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功能。我们不能给力比多本身指定任何性别；如果按照主动性等同于男性的传统公式，我们倾向于把力比多描述为男性的，那么我们不应忘记，它也包含带有被动目标的倾向。然而，“女性力比多”这一词的对应出现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主张是，当力比多被迫用于女性功能时，它受到的压力就更大；而且，比较起男性气质的情况看——在目的论上讲——大自然较少关心它的（女

性功能的）要求。不关心的原因——再从目的论上讲——在于下述事实：生物学目的的实现已托付给男人的攻击性，而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女性的同意便已完成了。

女性的“性冷淡”（sexual frigidity）（其频繁性似乎证实了这种冷淡）是一种尚未完全认识的现象。有时它是心理冲突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容易受到影响；而在其他情况中，它则暗示了这种假设：它是由气质因素决定的，甚至还有解剖学上的因素促成。

我答应要再告诉你们一些精神分析观察中见到的、成熟女性气质的心理特质（psychical peculiarities）。我们并不要求这些断言具有高于一般的效度；且要辨别这些特质中哪些应归之于性功能的影响，哪些应归之于社会的熏陶，也并不总是容易的。例如，我们把大多数自恋现象归之于女性气质，这种现象也影响到女性选择对象，因而对她们而言，较之于爱人，被爱则是一种更强烈的需要。而且，阴茎嫉羡对女性心理上的虚荣也发生影响，因为她们一定会更高地估价自己的魅力，以作为对其早期性缺陷的晚期补偿”①。害羞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女性特征，但它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平常。我们相信，它有着自己的目的，即掩饰生殖器方面的缺陷。我们没有忘记，害羞在更晚的时期还负有其他功能。看起来妇女对文明史中的发现与发明没有做什么贡献；然而，她们可能已经发明了一种技术，即编织技术。果真如此，我们就应该有兴趣猜测这种成就的潜意识动机。大自然本身通过在人的成熟期生长阴毛以遮掩生殖器，似乎就已为这种成就提供了可资模仿的样式。在身体上，这些毛发长进皮肤里，而且彼此杂乱地交织在一起，这一步骤被保存下来，而成为使各线条相互交织的编织活动。如果你们把这个观点视为幻想而加以否认，并且认为我关于阴茎对女性气质的构成有影响的信念是一种偏见，我当然无力辩解。

女性选择对象的决定性因素，常常由社会条件造成而难以辨认。但只要她能进行自由选择，该选择就往往依照女孩希望成为的自恋性的男人形象做出。如果仍停留在对父亲的依恋中，即停留在伊谛普斯情结中，她的选择就依照类似父亲的模式做出。这是因为，当她从依恋母亲转向依恋父亲时，当她对母亲怀有充满矛盾心理的敌意时，这种选择就可保证一个幸福的婚姻。但是，这种选择的结果常常表现出对消除因矛盾心理而造成的冲突的一种普遍威胁。这种保留下来的敌视紧随于对父亲的无可置疑的依恋之后而来，并且蔓延到了新的对象上。女性的丈夫首先是父亲的继承者，过了一段时间后也成为母亲的继承者。因此很容易产生下述情况：在妇女的后半生中，可能充满了对丈夫的反抗，正如她的更短的前半生中充满了对母亲的反抗一样。一旦这种反抗经历完毕后，第二次婚姻就很可

① 参阅《论自恋》(1914 c) 第二节。

能变得十分令人满意了[①]。妇女性质中的另一个改变可能发生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的婚姻中，恋人对这种变化毫无准备。由于妇女自己成了母亲，她便可能恢复对自己的母亲的认同，而对这种认同她直到结婚后才停止反抗，并且这种认同可以把所有可获得的力比多吸引到自身中，以致这种强制性重复重演她父亲的不幸婚姻。母亲对子女的出生所产生的不同反应表明，即使到现在，"缺少阴茎"这个古老的因素仍没有丧失力量。母亲只有在与儿子的关系中才获得无限的满足；总而言之，这是最完美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摆脱了所有人类关系中的矛盾心理[②]。母亲可以把她自己被迫压抑的抱负寄托于儿子，期望从他那里实现她遗留在男性气质情结中的所有愿望。甚至只有等到妻子成功地把丈夫当成儿子，并以母亲的身份对待他时，她的婚姻才会牢靠。

我们可以把妇女对母亲的认同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前伊谛普斯阶段，它根植于对母亲的深情依恋，并以她为模型；后个阶段来自伊谛普斯情结，该阶段试图摆脱母亲，并以父亲取代她。无疑我们有理由这样说，这两个阶段的大部分内容都遗留到了妇女的未来发展中，而且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内容是被完全克服的。但深情的前伊谛普斯依恋对妇女的未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该阶段为获得某些特征做好了准备，这些特征使她后来实现了性功能方面的作用，并完成了她无可逃避的社会职责。也正是在这种认同中，她获得了对男人的吸引力，并使男人对母亲的伊谛普斯依恋爆发为狂热的激情。但是，常常发生的情况却是，只有男人的儿子才获得了男人自己渴望的一切，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心理学上，男人的爱和女人的爱有阶段上的不同。

妇女可能被认为缺少公正感，这种情况无疑与妒忌在其心理生活中的支配作用有关；因为对公正的要求就是对妒忌的修正，而且规定了使人能够摒弃妒忌的条件。我们还认为妇女的社会兴趣较男人的小，而且她们升华本能的能力也弱于男人。前种情况无疑来自于那种确属所有性关系特征的反社会性质。恋人彼此获得完全满足，而且家庭也反对包含于更复杂的组织中[③]。升华的能力造成了最大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我禁不住要提到一种在精神分析实践中不断获得的印象。一个 30 岁左右的男人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年轻的、有点不成熟的个体，我们希望他能充分利用精神分析为他揭示的发展可能性。然而，同龄妇女却常常因其心理上的僵化和不变性而使我们吃惊。她的力比多已固定在最后的位置，似乎难以为

---

① 这种观点早在《禁忌与童贞》(1918a) 中就讨论过。

② 弗洛伊德似乎是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 第六章的注脚中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的，他又在《精神分析导论》第 13 讲和《文明及其缺憾》(1930a) 第五章中重申该观点。上述第 66 页所举的实例表现了可能存在的例外。

③ 参阅《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 第十二章中的有关论述。

其他状态所更换。她没有别的道路通向进一步的发展，似乎整个过程都已完成了，此后再不易接受影响了——的确，在通往女性气质的艰难发展中，她似乎已耗尽了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可能性。作为治疗者，我们对这种事态感到遗憾，尽管我们通过解除患者的神经症冲突（neurotic conflict）而治愈了她的精神失调（ailment）。

以上就是关于女性气质我应当告诉你们的一切。它们当然是不完善、也不全面的，而且听起来有时很不顺耳。但不要忘记，我对妇女所作的描述，仅仅限于她们的性质是由其性功能决定的这一点上。这种影响的确是很深远的，但我们不要忽视，个体的妇女也可以作为人生活于其他领域。如果你们想对女性气质了解更多，你们就去研究你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或求助诗人，或等待科学为你们提供更深刻更连贯的信息。

第34讲 解释、应用和展望

女士们，先生们：

权当是为减轻这些讲演的枯燥，或许你们会允许我再次与你们谈论一些没有多少理论意义的事情，但是只要友好地对待精神分析，你们就会对此乐有所闻。例如，假定你们空闲时候拿起一本德国的、英国的或美国的小说，希望从中发现关于现代人和社会的描写。读了几页后，你们便遇到第一个关于精神分析的评论，不久之后还会遇到其他类似评论，尽管该书内容似乎并不需要这些评论。你们不必认为这是一个应用深度心理学以求更好地理解书中的角色及其行为的问题——附带提一下，尽管有其他更严肃的作品也做此类尝试。但事实上，这些评论大部分都是作者的滑稽议论，借以显示他博闻广识和智力超群。你们也并不总会认为他的确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另外，你们也可能在娱乐时加入一个社团——不一定在维也纳。谈话的主题不久就转向精神分析，你们会听到各种不同的人在对此做出评判，大都带着坚决的而肯定的口吻。他们的评判通常是傲慢的，或诽谤性的，至少也是玩笑性的。如果你们过于鲁莽，暴露了你们对该主题有所了解这一事实，他们就会蜂拥而至，要你们提供信息，做出解释，并很快使你们确信，所有这些严苛的评判都毫无知识依据。这些评论家们几乎无人翻阅过精神分析专著，即便读过，也未曾消除过初涉这新学科时所产生的反感。

你们也可能期望有关精神分析的介绍能为你们提供各种指导，能指导你们用什么样的论据去纠正这些关于精神分析的明显错误；能指导你们向人推荐什么样的书，以提供更明确的信息；甚至指导你们在讨论中应该从自己的知识或经验中引用什么样的例子来改变同行的态度。我请你们不要如此。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对你们而言，最好是完全隐藏你们的先进的知识。假使不能如此，你们应仅限于说明，就你们所知，精神分析是知识的一个特别分支，它难于理解，更难评判；它所研究的问题，非常严肃，是不能仅以几个玩笑去解释它的——因此，在社交娱乐中最好是选取其他题材为宜。并且即使不明智的人重述他们的梦，你们也不

要参加解释；更不可夸说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

但你们可能产生下述疑问：为什么这些舞文弄墨夸夸其谈的人行为如此恶劣？而且，你们可能不免有这样一种观点，即造成该局面的责任不仅在于这些人，而且还在于精神分析学本身。我也这样认为。你们所遇到的有如文学和社会中的偏见，是早期评判——即正统科学的代表者对年轻的精神分析学所做的评判——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我曾经在我写的一部史书①中对此抱怨过，但我不会再这样做了——也许一次就已经是多余的了——不过，事实是，那种做法没有违反逻辑，没有无视礼节和背离高雅情趣，尽管当时精神分析科学的敌手并没有承认它。这令人想起在中世纪常见的情景：一个犯罪者，甚至仅仅是政治上的反对者被套上枷锁，并受到粗暴的虐待。你们或许无法清楚地认识到，暴徒特色如何在我们社会中做上行蔓延，而且，当人们觉得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并感到不必承担个人责任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错误行为。在精神分析运动初期，我或多或少有些孤独。而不久就明白，反驳是没有前途的，但哀叹和乞求仁慈精神的帮助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那里没有受理我上诉的法庭。因此，我另辟蹊径。我对自己解释说，大众的这种行为正是我不得不与之抗争、出现在每个患者身上的那种相同抵抗的体现。这一自我解嘲成了精神分析的首次应用。我强制自己不去反驳，而且当我的继承者渐渐表露出反驳倾向时，我劝阻了他们。这步棋是正确的。那个年代对精神分析实行的封锁从此被化解了。但是，正如一个被弃的信仰作为迷信而残存着，或一个被科学摒弃的理论作为大众信仰而继续存在着一样，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早期拒绝，至今仍存在于那些舞文弄墨、高谈阔论的门外汉们的轻蔑讥讽之中。因此，他们的恶劣态度就不再会使你感到惊讶。

但你们也别指望会听到一些令人高兴的消息，说有关于精神分析的纷争已经结束，而且已被承认为一门科学并被大学采纳为一门教学课程。事实绝非如此。抗争仍然存在，不过是以一种更温和的形式存在而已。另一个新情况是，科学界中在精神分析和它的反对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层。它的组成者承认精神分析某些部分的合理性，并以种种最逗人的条件来苛待这些部分。但另一方面，这些人又排斥精神分析的其他部分，排斥一个他们怎么称赞也不过分的事实。要猜测使他们对此做出选择的决定因素是不容易的。这种选择似乎有赖于个人的同情心。一个人可能反对性欲，另一个可能反对潜意识；尤其不受欢迎的好像是象征主义这个事实。尽管精神分析的结构是不完善的，但它即使在今天就表现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元素不可能被任意地取舍拼凑：但这些折衷主义者似乎无视这一点。我从不认为，这些半吊子拥护者们，是把他们的反对建立在对事实的调查之上的。这类人中也有一些名士。诚然，由于把时间和兴趣都用于另一些他们非常精通的成

---

① 参见《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

就硕大的事业上面，这些人的反对还是情有可原的。但在那种情势下，他们不是最好应悬置他们的评判而不明确支持哪一方吗？我曾经成功地使其中的一位伟人的态度发生迅速的变化。他是闻名世界的批评家，具有仁慈的谅解之心和预言式的洞察力，他紧随着时代的精神潮流。我们认识时，他已是80高龄；但他的谈话仍具魅力。你们很容易就猜到我指的是谁①。并不是我首先谈起精神分析这个话题，而是他在以极谦虚的方式拿自己与我做比较时谈起的。“我不过是一个文人，”他说，“但你却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发明家。不过，有件事我必须对你说：我对我的母亲从未产生过性的情感。”“可是你完全没有必要意识到这些情感，”我回答道，“对于成人而言，那些情感是潜意识的情感。”“哦，这就是你所主张的呀！”他轻松地说，并握紧我的手。我们呆在一起继续谈了好几个小时，气氛友好和睦。后来，我听说他在有生之年常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谈到精神分析，并很高兴引用一个对他而言挺新鲜的词——“压抑”。

常言道，我们应该向自己的敌人学习。我承认我从未成功做到这一点。但同时，我认为，如果我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提出的一切责难和反对进行回顾，如果我继续指出其间非常容易被揭露的不公正和对逻辑的违背，这对你们可能会有所启发。不过，“考虑再三”，我告诉自己，那样做也许毫无意趣，只会变得无聊乏味和令人生厌，而这恰恰是我这些年来非常小心避免的结局。因此，如果我不再继续讲这一套，如果我向你们略去了这些所谓科学批评家的评判，你们应该原谅我。这毕竟是困扰某些人的问题，这些人的一大资格是通过与精神分析的经验保持距离而做到不偏不倚。但我知道，在其他场合中，你们不会如此轻易地放过我。“不过，”你们会告诉我，“还有这样一些人，你的最后说法对他们并不适用。他们并不回避精神分析经验，他们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也可能自己接受精神分析；在某个时期，他们甚至是你的合作者。然而他们形成了别的观点与理论，并基于该观点与理论，他们与你分道扬镳，并建立了独立的精神分析流派。你应该向我们阐明这些在精神分析史上如此频繁发生的分离运动所具有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我会尽力去做的；但仅能简略阐述，因为他们对理解精神分析的贡献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我相信你们首先会想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该书（例如在美国）被认为是与我们的精神分析学说并驾齐驱的一种思想，并且与之等价，它一

① 是指布兰戴斯（Georg Brandes，1842～1927），著名的丹麦学者。弗洛伊德一直对他很钦佩，弗洛伊德1900年3月在维也纳听过他的讲演。他按照妻子的建议，热情地把《释梦》送给下榻旅馆的布兰戴斯；但不知道是否有所反响。参阅弗利斯（Fliess）信131（弗洛伊德，1950）。琼斯（Ernest Jones）在其传记（1957）第3卷中提及他们的会晤（发生于1925年），弗洛伊德在1927年4月19日给他侄子的一封信中再次论述此事（弗洛伊德，1960a，信229）。

般与精神分析学说相提并论。实际上，个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相关甚少，但因为某种历史条件的缘故，个体心理学才得以寄生在精神分析之中。我们对这一群反对者的特征的论断，在有限的程度上适用于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个体心理学就其名称而言也是不恰当的，该名称是某种困惑的产物。该术语可做“群体心理学”的对应词，我们不能让这一合乎情理的用法受到妨碍；此外，我们自己的活动也主要且大部分都是与人类个体的心理学相关的。今天我并不想对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做一个客观的批评；在这些介绍性讲演计划中，也没有安排这种批评。此外，我曾经尝试过，而且没有感到对我当时所言有进行某些改变的需要①。不过，我将提及我在从事精神分析之前所遇到的一件小事，从而说明他的观点所给我的印象。

摩拉维亚的一个小镇是我的出生之地，在我3岁时我离开了这个小镇②，毗邻该镇处有一个其貌不扬的疗养地，坐落林间，煞是美丽。早在学生时代，我在假期里去过那里几次。大约20年后，因一个亲戚生病，我得以再次光顾那里，在与那个疗养地的医生（即接待我亲戚的那位医生）的谈话中，我尤其询问了他如何治疗那些冬季来的农民，即那些斯洛伐克人。我相信，这些人是他在冬季的全部病号了。他告诉我他的治疗方法是这样的：在他门诊时间里，病人走进房间排成一行，一个跟着一个出列诉说病苦，抑或背痛抑或胃疼抑或腿酸等等，等等。然后医生对这些人依次检查，在满意地发现问题症结之后，说出某种诊断，每个病例诊断都相同。他向我翻译了这个词，意思近乎于：“中魔了！”我惊讶地问，这些农民是否对他这种千篇一律的诊断表示反对。“哦，没有！”他回答道：“他们对此很满意：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归队时，都通过脸色和手势向别人示意，我是一个懂得各种事情的人。”当时我几乎没有想到，在什么条件下我会再次碰到这样的情形。

无论是同性恋者或恋尸癖者（necrophilic），无论是遭受焦虑之苦的癔症者，还是自绝于社会的强迫性神经症者，抑或狂言乱语者（raving lunatic），“个体心理学”中的阿德勒流派都宣称，患者的动机都在于希望表现自己，弥补自卑，保持“优越”，从女性特征转向男性特征。在我还是年轻学生的时代，当人们介绍一个癔症案例时，我们曾在门诊部听到非常相似的情况：我被告知，癔症病人形成

① 弗洛伊德对阿德勒观点的批判主要见于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中，在该书的编者导言中，为弗洛伊德作品的另外段落提供了一些说明，在那些文章中材料已经有所论述。可能令人吃惊的是，在当时讲演中，他并未提及荣格的背叛，除了在后面第143页上有小小的不明确的暗示，而且，弗洛伊德希望读者把阿德勒的观点放于首位。这与《精神分析运动史》中的某些评论相一致，在该书中，他说：“在这两种正在争论的运动中，阿德勒的观点无疑更为重要。”

② 该镇原名弗赖堡（Freiberg）后更名为普莱波（Pribor）。

其症状，从而使自己显得有趣，以把人们的注意吸引到其自身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老的聪明之举竟延续至今。然而即使在那时，心理学的这一细枝末节似乎也无奈于癔症之谜。它至今未得其解，例如，它未能说明病人为什么没有采取达到目的的其他方法。当然，“个体心理学”这个理论中肯定有某种东西堪称正确；所以管见被当做了整体理论。自我保存本能试图利用各种情境；自我甚至企图把疾病转变为有利条件。这在精神分析中被认为是“来自疾病的次要获益”[①]。然而，尽管性受虐狂、受罚的潜意识需要和神经性的自我伤害等事实，似乎证实了与自我保存背道而驰的本能冲动存在的假设，但当我们考虑到这些事实时，我们甚至对构成个体心理学基石的日常真理的普遍有效性发生了信仰动摇。不过，如果有一个理论否认了复杂性，对潜意识一无所知，没有引进难以掌握的新概念，一笔勾销了性欲这个常常无事生非的问题，而把自己局限于发现人们试图借以生活得更好的技能，像这样的理论理应受到许多人的大加赏识。因为大多数人都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们并不需要一个以上的关于原因的解释，并不感谢科学的深入研究，他们需要的是拥有简单的方法，以及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当我们考虑到个体心理学多么出色地满足了这些要求时，不禁想起了《华伦斯泰》(Wallenstein)[②] 中的一句话：

“若此观点过于聪明而令人智昏，我当断然称之实属愚蠢之举。”[③]

来自专家界的批评，尽管对精神分析是如此的粗暴，但对个体心理学一般而言，都是温和的。当然，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位精神病学家（psychiatrists）也发表了一篇名为《够了》（Enough）的反对阿德勒的文章，文中他强烈地表述了对个体心理学的“强制性重复”的厌恶。如果还有什么对个体心理学颇有好感的话，这无疑是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对抗有关。

我不必再叙述从我们的精神分析中分化出的其他学派。这种分化的事实，既无助于赞成也无助于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有效性。你们仅需考虑到种种强烈的情感因素，它们使很多人难以与别人相适应，或服从于别人；考虑到更大的困难正如格言所说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④]。当意见的分歧超越某一特定点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分手，随后沿着我们与众不同的道路前进——特别是当理论的

①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第 24 讲。

② 华伦斯泰（1583～1634），三十年战争期间德皇军队的统帅。——中译者。

③ “Were the idea not so confounded clever,
I'd be inclined to call it really stupid.”

④ 更通常的形式是［来自于特伦施（Terence)］“Quot homines tot sententiae (As many men, So many opinions).”

分歧包含实践过程中的变化时，更应如此。譬如，假设一个分析者[①]不重视病人过去经历的影响，而仅从现在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望中去寻找神经症的因果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必将忽略对儿童经历的分析；他必将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并且通过增强他的说教性影响和直接指出某些特定的生活目标，来弥补对来自童年期分析的事件的缺失。随后我们将对此指出："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学派；但它不再是精神分析。"或者，另一个人[②]可能形成这样的观点：出生时的焦虑经历播下了后来所有神经性障碍（neurotic disturbances）的种子。因此，在他看来，把精神分析局限于这种单一影响的结果，以及向病人保证三四个月的治疗可获得成功是合理的。你们将会发现，我所选择的两个例子产生于恰好相反的前提下。这些"分离主义运动"（secessionist movements）的共有特征是，它们每一个都孤立地抓住了精神分析学说中丰富课题中的一个，并以此为依据独立出来——例如，或者选择支配本能（instinct for mastery），或者选择道德冲突（ethical conflict）；或者选择母亲（的重要性），或者选择生殖问题，等等。如果就你们看来，这种分离现象今天在精神分析历史中已变得比在其他理论运动中更为严重，我想我是不会苟同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其责任应当归之于精神分析中理论观点与治疗方法之间的本质关系。纯粹的观点分歧是能够长期容忍的。人们喜欢指责我们精神分析者排斥异己。这种讨厌的特征的惟一表现形式，恰恰是我们从那些想法异于我们的人中分离出来的。这对他们毫无害处。相反，他们却很有运气，而且比从前过得更好。因为，由于与我们相分离，他们通常也就摆脱了压在我们身上的负担——它可能是幼儿性欲的臭名声，或者是象征主义的荒谬性——而且被周围人认为是值得尊敬的，而站在背后的我们则恰好相反。而且，除了一个显著的例外，正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的[③]。

你们以宽容的名义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是什么呢？或许当某些人说出了一种我们认为完全错误的观点时，我们应该对他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反驳。你们保证了我们能避开自满的危险，并给我们机会向美国人表示，我们的确是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宽宏大量'。当然，我们并不相信你们所讲的东西，但没有关系。也许你们恰好与我们一样正确。毕竟，谁能知道谁是正确的呢？尽管我们相互对立，但请允许我们在我们的杂志上阐述你们的观点。我们希望，作为交换，你们也能够发表你所否定的我们的那些观点。"将来，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完全被滥用后，上述

① 暗指荣格，瑞士著名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后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另创分析心理学。——中译者

② 此处指兰克，奥地利精神分析家，提出意志疗法，强调出生创伤的重要性。——中译者

③ 这可能指斯特克尔（Stekel）。

说法显然会成为科学活动中的惯常做法。但目前，我们确实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按照传统的方法，我们仅限于提出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甘于冒犯错误的危险，因为错误是防不胜防的，我们拒绝与我们相反的观点。如果我们认为发现了某种更好的东西，我们就会在精神分析中充分地运用它，从而改变我们的观点。

精神分析的最早运用，就是引导我们去理解因我们把精神分析用于实践，而由同时代人向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其他的运用，因其具有客观性，可能会产生更为普遍的影响。当然，我们的首要目的，是理解人类心理的各种紊乱现象，因为一个显著的经验表明，认识与治疗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存在着一条从认识通向治疗或从治疗通向认识的道路①。而且，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惟一目的。但我们后来发现，在病理学过程和人们认为是正常的过程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甚至存在着内部的同一性。精神分析成为一种深蕴心理学；因为没有心理学的帮助，人们所产生的东西或所做出的事情就令人无法理解；所以，人们自动地把精神分析应用于知识的无数领域中，尤其是应用于心理科学领域，并走向这些领域前沿，获得相互交流。不幸的是，我们所要完成的工作遇到了障碍，而这种障碍又是我们这种工作情境本质所应有，所以直至今日，这些障碍仍未被排除。这类应用是以专门化的知识为前提的，精神分析者没有掌握这些专门知识，而掌握这些专门知识的那些人即专家，又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也可能根本不想对此有所知。结果在做了不知是否适当的仓促准备后，精神分析者便以业余人士的身份开始涉足诸如神话、文明史、人类文化学和宗教学等知识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的常驻专家们对待精神分析者并不比对普通的外来者更加客气些，他们的方法与成果如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专家照例是不屑一顾。但是情况在不断改善，每个领域中都涌现出一批人，他们研究精神分析，以便在其特殊课题中运用它，并以殖民者的身份，取代拓荒者。在此，我们可以期望获得极为丰富的新发现，精神分析的运用也总是进一步巩固了自身。而且，在那些科学研究远离实践活动的地方，那些无可避免的观点的分歧形式，无疑会更为和缓。

我强烈地希望指导你们理解精神分析在心理科学中的一切应用。这些应用都是值得任何具有理智兴趣的人知晓的；而且在一段时间里让你们听不到有关变态和疾病的内容，将会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休息。但我必须放弃这个念头，因为它将再次使我们远离该讲的范围，我必须诚实地承认，我不能胜任这项任务。的确，在这些领域中的一些方面，我本人是最早采取行动的；但至今我已不再控制整个领域。为了掌握从我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已取得的成就，我将不得不做大量的研究。你们当中因我的这一拒绝而感到失望的人，可以从我们的期刊《意象》（Im-

① 布洛伊尔对他第一个病人的治疗。参阅《精神分析导论》第18讲。

age）中寻求弥补，该刊物专门介绍精神分析的非医学性的应用[①]。

但是，有一个主题我无法轻易略而不谈——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它特别了解，或对它做了很大贡献。恰好相反：我自己与它几乎毫无关系[②]。我必须提及它，这是因为它极端重要，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可能是精神分析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我所考虑的，就是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在抚育下一代中的应用。我很高兴，至少我能够说我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③] 已经把这种研究作为她的毕生事业，并以这种方式来弥补我的疏忽。

通向这种应用的道路不难找到。在对一位成年神经症患者的治疗中，当我们追踪其症状的决定因素时，常被引回到他的早期童年时期。我们对童年以后的致病因素的认识，既不足以了解该病症，也不足以形成治疗效果。因此我们被迫要熟悉病人童年时期的心理特质；我们认识了一定量的只有凭借精神分析才能了解到的事情，从而能够纠正许多通常是有关童年的观点。我们认识到童年期的最初几年——可能直到5岁——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其所依据的理由有好几个：第一，因为那几年是性欲的早期全盛时期，其后留下了各种对成人性欲生活有决定作用的诱使因素；第二，因为这一时期的各种影响冲击着幼稚的、微弱的自我，就像创伤对自我的冲击一样。他们除了以压抑的方式躲避内心激起的情感风暴别无他法；而正是依靠压抑的方法，他们获得了所有导致以后的疾病和功能性障碍的倾向。我们认识到，童年期的困难在于下述事实：儿童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发展的成果，包括对其本能的熟练控制和对社会的适应或至少是这两者的初步结果。他通过自身的发展只能完成这种变化的一部分；而更多的部分必须通过教育[④]强加给他。孩子们通常不能理想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在这些早期时期，他们大多数都经历了可以说是与神经症同步的阶段——而且在所有后来产生明显疾病的儿童案例中，情况尤其如此。在一些

---

①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第10讲。

② 尽管这可能是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与教育之间的种种关系的最长的阐述，但它实际上并不是惟一的一次。除了大量的附带说明外，他在《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b）中的第三章第三节较详细地考察了这个问题，还在普费斯特（Pfister）（1913b）和艾赫洪（Aichhorn）（1925f）所写的两本书的前言中论及该问题。这个与性教育有关的特殊问题，是他的一篇早期论文《关于儿童的性启蒙》（1907c）的主题，30年后在《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一文的第四节末再次论及。对它的最近一次阐述是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的第九、十章中，起因于谈论宗教教育问题。

③ 安娜·弗洛伊德（1895～1982）是精神分析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女儿，著名儿童精神分析学家，自我心理学的奠基者，首创儿童精神分析法。——中译者

④ 德文“Erziehung”，在此和别处的论述中均译为“education”（教育），德文本词的含义远比英文词汇更丰富，它含有一般意义上的“培养”。



孩子身上，神经症疾病并不是等到成年时才产生，而是在童年期就已发生了，他们给双亲和医生带来许多麻烦。

无论是把精神分析疗法应用于那些已显示出明确的神经症症状的孩子，还是应用于那些尚处于性格发展不顺利状态中的孩子，我们都不曾有所顾虑。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担心的是，儿童会受到精神分析疗法的伤害，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精神分析疗法表明，我们可以从这个活生生的主体身上证实我们在成人案例中（可说是从历史资料中）所推测的东西。而儿童也受益匪浅。实际上对于精神分析治疗而言，儿童是一个非常适宜的治疗对象，其疗效彻底而持久。当然，成人设计的治疗技术必须做大的改动，从而能适用于儿童。儿童在心理上迥异于成人。因为他尚未拥有超我，故而自由联想的方法还不能被他接受，移情作用也异于成人（因为生身父母仍然健在）。成人所反对的那种种内部抵抗，在儿童身上大部分都为外在的困难所取代。如果父母使自己成为这种抵抗的工具，那么精神分析的目的——甚或精神分析自身——经常会受到威胁。因此，通常有必要把对儿童的精神分析，与对其父母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响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儿童精神分析与成人精神分析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因下述情况而减小：我们的某些患者保持了许多婴儿的性格特征，以致于精神分析者（须重新使自己适应患者）必须对他们运用某种特定的儿童精神分析的技术。儿童精神分析自然成了精神分析者的领域，并且这种情况无疑将持续下去。

我们的大多数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神经症阶段。这一认识萌发了一个在卫生方面的挑战。可以设问：正如今天我们不能等到发现儿童已患上白喉病才给注射预防针那样，即使儿童尚未显示出失常的迹象，作为一种保证其健康的措施，对他进行精神分析是否有利？目前，对该问题的探讨仅具有学术意义，但我在此可以大胆地考虑它。然而，就这么一个建议，对我们大多数的同时代人来说，不啻受到残暴的奸淫，而且纵观大多数为人父母者对精神分析学的态度，我们眼下真是应该放弃任何将这种想法付之实践的愿望。这类针对神经症疾病的预防法可能是非常有效的，却也要以一个全然是另一种结构的社会为先决条件。把精神分析应用于教育这一口号现在只能在别的社会中找到。至于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什么，这要我们自己来弄清。儿童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本能，就不可能毫无限制地给他们实现所有冲动的自由。对儿童心理学家而言，上述给儿童自由的做法可能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实验，但对父母来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并且儿童自己也将深受其害，这种危害有的很快就显示出来，有的则在以后的岁月里显示出来。因此，教育必须对儿童的冲动实行抑制、禁止和压抑，而且这种情况在历史的所有时期都充分可见。然而，我们从精神分析中得知，正是这种对本能的压制隐含着神经症疾病的危险。你们会想起，我们已经详细地考察过这种情

况的产生[①]。因此，教育必须在不干涉的斯库拉和挫折的卡律布狄斯之间去寻找出路[②]。除非该难题完全不能被解决，否则我们就一定能寻找到适合途径，以使教育取得最大成效，产生最小伤害。因此，问题在于确定对儿童本能禁止多少，什么时候禁止，用什么方法禁止。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下述事实：我们教育影响的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天生的气质倾向，以致于同样的教育过程对所有的儿童不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某种及时的反省告诉我们，迄今为止，教育在完成其任务方面是十分糟糕的，而且对孩子伤害很大。如果教育找到了合适的途径，并理想地执行其任务，那么它就有希望消除某种致病因素——即童年期的意外创伤的影响。如果现在我们考虑到教育者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例如他应该怎样认识到儿童的个性，怎样从微小的迹象推测儿童未成熟的头脑中所进行的活动，怎样给予儿童适当的爱而又仍保持有效程度的权威——我们就会明白，惟一适合教育者工作的准备是彻底的精神分析训练。最好的方法是教育者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因为即使有关精神分析的一切都听说过或做过，但没有亲自体验过，也不可能掌握精神分析。对教师和教育者的精神分析与对儿童本身的精神分析比较而言，前者似乎更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而且更易于付诸实践。

尽管只是作为一种附带的考虑，我们仍应提及一种间接的方法，该法通过精神分析有益于培养儿童，而且将日益产生更大的影响。凡亲身体验过精神分析、从中受益匪浅的，并且洞悉自己的培养方式的缺陷的父母，都将会更好地懂得如何对待他们的孩子，并在许多他们自己不曾被宽容的方面更宽容孩子。

在精神分析者致力于对教育施加影响的同时；另一些研究正在讨论过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在此，我仅仅是再次向你们敞开精神分析的大门，并让你们看看大门后的那些房间，而没有引你们进入[③]。我肯定，如果你们不放弃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你们就能够学到许多关于上述主题的新颖而且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在尚未结束教育这个话题时，我必须谈谈它的另一个特殊方面。据说——这无疑是合法的——每种教育都有一个派别性的目标，它努力把儿童培养得适应已建立的社会秩序，而不考虑该秩序有多少价值和多少稳定性。如果（有人争辩说）人们承认我们目前的社会秩序中存在着缺陷，则教育与精神分析的结盟也就无法合理地为社会秩序服务：它必须赋予另一个更高目标，应当摆脱流行的社会要求的束缚。然而，以我看来，这种争论在此是不正确的。上述要求超出了精神分析的

---

①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尤其是第22讲和第23讲。在那里阐述了教育两难境地。

② 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是希腊神话中的两个怪物。他们隔海而住，航海者在两怪物之间通过是异常危险的。“处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比喻危机四伏。——中译者

③ 这里请参阅弗洛伊德为艾赫洪（Aichhorn）的《难以捉摸的青春》一书撰写的序言（弗洛伊德，1925f）。



有效功能。同样，一个医生被请去治疗肺炎，他不必考虑患者是否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自杀者亦或一个罪犯，也不必考虑他是否值得活下去或者是否有人希望他活下去，因为这并不是医生的职责。上述人们期望赋予教育的另一目标，也将是一个派别性的目标；而在两种派别间进行取舍不是精神分析者的事。我完全没有考虑情况的这个方面，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许与已存社会秩序相矛盾的目的，它对教育施加的任何影响就将被拒绝。但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打算把它的学生培养成叛逆者，它就将亲自承担一种多余的责任。如果它使它的学生尽可能健康而有才干地离开学校，它尽到了本分。这种教育包含了众多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证它所教育的任何人在今后的生活中都不会成为反动者和压迫者。我甚至以为，革命的儿童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不可取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打算与你们进一步谈谈作为治疗方式的精神分析。15 年前我就论述了这一问题的理论方面[①]，今天我还将以同样的方式阐述它；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这 15 年间我们所取得的经验。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面诞生的。尽管它现在的内涵已超过了该范围，但仍未脱离它的原始基础，而且，为增加自己的深度、促进自己的发展，它仍保持着与病人的接触。导致我们理论产生的种种积累起来的观念，是不可能以其他方法获得的。我们在治疗中所遇到的失败，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新任务；而现实生活的要求，则是一种防止过分推测——毕竟我们在工作中没有推测也不行——的有效保证。很早以前，当精神分析的确有助于患者，面且是作为一种方法有益于患者时，我就已经论述过它了[②]；今天，我则要考察一下精神分析方法取得了多大成就。

你们可能知道，我从来不是一个治疗狂；故而也不存在我因沉溺于对精神分析的赞颂而滥用此讲的危险。我宁愿说得过少面不愿说得过多。在我是惟一的精神分析者时，那些对我的观点显然持友好态度的人曾对我说："你的所有观念都是精密而且明智的，不过，让我看一看你用精神分析治愈的案例吧。"在人们排斥令人不舒服的新异观念时，有许多先后成功的手段，而上述说法就是其中之一。今天，它已像许多其他手段一样过时了，因为精神分析者也收集了大量来自被治愈的病人的感谢信。这种比较没有到此为止。精神分析法确实是像其他治疗方法，它有自己的优势和缺陷，自己的困难、局限和适应范围。曾经一度，有人对精神分析有所抱怨，认为由于精神分析不敢公布它的任何成功统计资料，因而不必认真地对待这种疗法。从那以后，艾丁根（Max Eitingon）博士创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院，发表了对精神分析最初 10 年的成就的评论[③]。这些治疗上的成功既没

---

① 在《精神分析导论》第 27～28 讲。

② 参阅《全集》标准版，第 12 卷的最后注脚和《关于治疗技术的论文》(1911～1915)。

③ 弗洛伊德为该评论作了一个前言（1930b)。



有提供精神分析自夸的资本，也未提供它自惭形秽的依据。不过，这类统计一般而言不具有启发性，有作用的材料如此不纯，以致于其中大量材料反而证明了别的方法。考察一个人的个人经验是更为明智的。而且我在此想补充说，我不认为我们的治疗能够与卢德（Lourdes）[①] 的治疗相媲美。相信圣母玛利亚的奇迹的人远比相信潜意识存在的人多得多。如果我们要求助于我们的竞争者，就必须对精神分析治疗与其他心理疗法（psychotherapy）进行比较。现在几乎不必提及治疗神经症的器质性躯体疗法。精神分析疗法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步骤，与医学中这一特殊分支所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对立，它既没有贬低它们的价值，也没有排斥它们。一个喜欢自称为心理治疗家的医生把精神分析疗法用于他的病人，同时又根据病例的特殊性和有利或不利的外部环境采用其他任何治疗方法，这并不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实际上，使医学实践必然趋于专门化的正是治疗技术。因此，外科术和矫形术不得不从同样的方式中分离开来。精神分析活动是艰苦而严格的；它不可能像一副眼镜那样好使：阅读时戴上它，而外出散步时取下它。因此，一个医生要么全盘照搬精神分析，要么丝毫不碰精神分析。就我所知，那些有时特别使用精神分析疗法的心理治疗家并不拥有坚实的分析基础，他们没有接受分析的整体，而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把分析的“毒牙”拔掉了；他们不能被认为是分析家。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但在医学实践中，一个分析家和一个仅限于采用其他技术的心理治疗家的合作，将会有利于益处甚大的目的。

与其他心理治疗步骤相比，精神分析疗法无疑是最有效的。这样说也是合理而公正的，因为该疗法大都费力最大，花时最多；它不用于轻度病症的案例中。在适宜的案例中，使用这种方法有可能消除障碍，并引起变化，这些变化是在前分析时期人们不敢抱有希望的。但该疗法也有其相当明显的局限性。我的一些继承者们有着治疗上的抱负，他们最大努力地消除障碍，从而使每种神经失常都可能被精神分析治愈。他们致力于把分析工作压缩到一个更短的疗程，加强移情作用，从而使移情作用有可能克服任何抵抗，并把移情作用与其他的影响方式联合起来，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疗。这些努力当然是值得称赞的，但就我看来，又是徒劳无功的。它们还带来了一种危险，即迫使自己脱离分析方法而陷入无穷尽的实验过程中[②]。这种期望每种神经症现象都能被治愈的愿望，我猜想是来自于门外汉的一种信仰，即神经症都是无权存在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东西。而事实上，它们是严重的、由素质（constitution）所构成的疾病，该病在个体身上不只是发

---

① 卢德是法国西南部一个小城镇，该城有一座供奉圣母玛利亚的神殿，为罗马天主教徒朝圣特别是去治病的重要场所。——中译者

② 在写这些话时，弗洛伊德很可能想到了他的朋友费伦茨（Ferenczi）；几个月后，在他为这个朋友所写的讣告中，他又重申了这些观点。参见后面第 229 页。



作几次，而通常是持续很长时间乃至终身。我们的分析性经验表明，这些疾病可能广泛地受到影响，如果说我们考虑到了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疾病诱因和偶发的次要因素，却在实践中忽略了素质上的因素，而且在任何案例中，我们对这一因素都无能为力；但在理论上，我们还是应该始终记住它的。根据精神病与神经病的紧密关系看，由于分析疗法很难从根本上接近精神病，这使我们局限于对神经症的治疗。精神分析的疗效仍受缚于很多重要的而又难以掌握的因素。对于儿童，可能阻碍治疗获得成功的困难，都是与其父母相关的外部因素，不过，这些困难归根到底还是儿童自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成人而言，困难则首先产生于两种因素：患者目前心理性僵直的程度和疾病的类型，而在类型中还含有更深刻的决定性因素。

人们常不公平地忽略上述第一种因素。无论心理生活的可塑性和恢复旧条件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重新回复生活中的。当一个过程自然结束时，有些变化似乎是明确的，而且相应于已形成的心理伤痕。在另一些场合，人们则认识到患者心理生活的普遍僵化；人们完全可以为其另谋途径的心理过程，似乎没有能力放弃原有的轨道。但这可能与我刚才所提的是同一回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它罢了。人们似乎一再发现，正是这种治疗缺乏必要的内在动力，因而阻碍了变化的发生。与我们所能动员起来的对抗力量相比，患者的特殊的依从关系，某种特别的本能成分，是过于强大了。就精神病而言，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对这些疾病真是太了解了，知道该在哪里运用这些杠杆，只是这杠杆尚无法撬起那堆重物。的确，未来的希望就在这儿：我们对激素①作用（你们知道它们都是些什么）的认识可能会向我们提供一定的取胜手段以便与这些疾病所具有的数量因素进行抗争；不过，现在我们距离那天还远着。我明白，所有这些问题中的不确定性，正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趋于完善的一种恒常激励。精神分析的初学者们面对失败时，尤其搞不清到底应该抱怨案例的奇特呢，还是抱怨自己在治疗过程中的笨拙。但是，如前所述，我认为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很大成果。

限制分析法取得疗效的第二因素即来自于疾病的类型。你们已经知道，分析疗法的应用领域是各种移情性神经症——如恐怖症、癔症、强迫神经症——此外，还有各种已经形成并取代这些疾病的性格异常。而与此有别的所有其他疾病（如自恋的和精神性的症状）都或多或少是不适宜分析的。小心翼翼地排除这些案例以预防治疗失败是完全合理的。这种谨慎在分析的统计方面将导致一个重要的进步。不过，这里有一个陷阱。我们的诊断常常是在治疗之后才做出的，它们与我

① 激素（hormones），音译"荷尔蒙"，亦称"内分泌"，由身体某一部位的器官所产生的信息化学物质，由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对维持身体健康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中译者



在雨果的作品中读到的苏格兰国王识别女巫的测验①相似。这个国王声称，他掌握了一种识别女巫的万无一失的方法。他把这个女巫放进沸水锅里煮，然后品尝肉汤。随后他便可以说："这就是女巫，"或"不，那人不是女巫。"我们的情形与此相同，只是除了我们是受害者外。只有当我们对前来求医的病人用分析法考察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或以同样的方式考察前来受训的考生），我们才能对其做出判断。我们实际上非常盲目。病人具有不明确的一般性不适，无法确诊。但经过这段预诊期之后，很可能明白该例不适宜于分析疗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此人是考生，我们把他送走；如果是病人，我们还要继续一段更长时间的诊断，以期能够对他的状况有更好的理解。病人已经通过增加我们的失败记录而报复了我们，而遭到拒绝的考生如果好猜疑的话，就可能通过亲自撰写关于精神分析的书来报复我们。恰如你们所见，我们的谨慎是徒劳的。

我担心这些详尽的阐述让你们感到兴趣索然了。但如果你们要认为我打算低估你们关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疗法的观点，我将更感遗憾。或许我的开头的确没讲好。因为我想要做的是相反的事：通过指出分析法的局限性的不可避免，来为这种局限性辩护。考虑到同样的目的，我转向了另一方面：即对精神分析费时过久的指责。就这方面，应该说，精神的变化实际上是缓慢发生的。如果变化太快、太突然，反而是一种不好的征兆。对极严重的神经症的治疗，可能极易延续数年；但治疗一旦成功，我们则应该考虑，这种疾病若未治好，还会延续多久？也许治疗一年就缩减了患病的10年时间；换言之（正如我们在未得到治疗的案例中通常所见），这种疾病是根本不会自愈的。在有些案例中，我们有理由在许多年之后恢复分析法治疗，因为那时生命已对新沉淀下来的诱因产生了新的病理反应；但在同一时期，我们的病人还自我感觉良好。第一次分析实际上并没有阐明病人所有的病理倾向；而当分析疗法取得成功时，分析者自然就会停止继续进行分析。还有一些有严重障碍的病人，其一生都受到分析的监护，并不时地重新接受分析。否则他们就完全不能自立，我们应该高兴，通过逐渐地反复地治疗，他们能够恢复健康了。对性格异常的分析也需要很长的治疗时间；但通常是能成功的。你们知道还有其他疗法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吗？当然，仅有这样的疗效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过我们已从肺结核和狼疮的例子中认识到，只有当某种疗法适合于疾病的种种特性时，该疗法才可能成功②。我已经告诉你们，精神分析最初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但我想使你们感兴趣的不是作为一种疗法的精神分析，而是精神分析所包括的真理，尤其是它向我们提供的有关人类的信息　　即人的自身本

① 这段轶事的出处无从可寻。弗洛伊德在其探讨手淫的文章（1912f）中已使用过它。

② 弗洛伊德后来的一篇文章《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就充分论述了精神分析法的各种有限性。



性　　以及它所揭示的人类各不相同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作为治疗方法，精神分析是许多方法中的一种，但它的确是最有效的。可以说，如果它没有治疗价值，不与病人相联系，它就不会被发现，不会持续发展达三十多年。



第35讲 宇宙观问题[1]

女士们，先生们：

在上次的讲演中，我们谈的都是些日常琐事——就好比是在整理我们简朴的房宅。我提议，现在我们应该大胆地迈出一步，回答一个别人常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精神分析会导致一个特殊的宇宙观吗？如果会，会是什么样的宇宙观呢？

我想，"Weltanschauung"（宇宙观）恐怕是德文所特有的一个概念，要把它译成外国文字恐怕有困难。假如我尝试着为你们给它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在你看来必定是笨拙的。我认为，宇宙观是种理智的结构，它基于某种凌驾一切的假设，统一地解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因此，它没有留下任何尚未做出解答的问题，而且，我们所关心的一切事情都可在其中找到固定的位置。不难理解，拥有这样一种宇宙观，是人类美好愿望之一。信奉它，人们就能在生活中拥有安全感，就能知道追求什么，怎样才能最恰当地对待自己的感情和兴趣。

如果这就是宇宙观的性质，那么就极易做出有关精神分析的回答。作为一门特殊的科学，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一种深度心理学或潜意识心理学——精神分析建构一种自己的宇宙观是不合宜的，它应该接受一般科学的宇宙观。但是，科学的宇宙观已经很显然地异于我们的定义。诚然，它也规定了对宇宙解释的统一性；但其解释仅仅是作为一个纲领，该纲领的实现有待于将来。除此之外，它具有各种消极的特征，局限于目前所知的一切，并且强烈反对某些特定的异己成分。它断言，除了对认真检查过的观察资料所进行的理智研究——换言之，即我们称为调查研究的东西——就不存在其他获得宇宙知识的源泉了，同时，没有任何知

[1] 这个词可译为 "A View of the Universe"（世界观），不过弗洛伊德自己在下面第二段解释了其含义。因在这个讲演中它出现了不少于30次，故最简单的办法似乎是保留其德文形式，而且我们的语言差不多在任何情况下都已采用了该词。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第二章结尾处有一段论述了该讲演主题。



识产生于天启（revelation）、直觉（intuition）或预卜（divination）。这个观点好像是在最近这几个世纪中才逐渐得到普遍的承认；而到我们这个世纪，却发现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反对意见，认为像这样的宇宙观同样毫无价值，不受人欢迎；它忽视了人类理智的要求和人类心理的需要。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再猛烈的抨击也不为过。它毫无根据，因为理智和心灵恰恰和任何非人类存在物一样，也同样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精神分析拥有一种特权，可在这一方面为科学的宇宙观辩护，因为人们无法指责它在宇宙图景中忽略了心灵事物。它对科学的贡献，恰恰在于把研究伸向了心灵领域。附带说一句，没有这样的心理学，科学就不会完整。然而，如果把对人类（和动物）的理智与情感功能的研究包含在科学中，那么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科学态度总体上没有改变，也尚未形成新的知识源泉或研究方法。即使存在直觉和预卜，它们也不会成为科学的源泉。但它们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幻想，是对愿望性冲动的满足。也不难看出，对某种宇宙观的这些要求仅仅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科学注意到下述事实：人类心理产生了这些要求，并准备考察它们的源泉；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要求是合理的。相反，科学把这种情况视为一种警告，从而小心翼翼地把每种幻想以及类似的情感要求的产物，与知识区分开来。

这决不意味着，这些愿望将会被轻蔑地抛弃或其对人类生活的价值将会被低估。我们将描绘出这些愿望得到满足的状况，这些满足是人们在艺术作品以及宗教和哲学体系中自己创造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下述事实：允许这些要求进入知识领域，将是不合理的，也将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就会打开通向各种精神病——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精神病——的道路，而且将会把人们大量的宝贵精力从直接指向现实的努力中抽取出来，以便尽可能地去满足其愿望与需要。

从科学的角度看，在此人们无可避免地要运用批判的能力，继续做出反对和驳斥。有人声称，科学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个领域，宗教和哲学是其他领域，它们至少与科学是等价的；因而，科学无权干涉其他两个领域：双方都有相等的权力成为真理，而且每个人都可自由地做出选择，并从选择中吸取信心，寄托信仰。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当然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极其优秀、宽容厚道，摆脱了狭隘的偏见。但不幸的是，它站不住脚，而且具有完全属于非科学的宇宙观一切有害特点，在实际上它也就等同于后者。事实很简单：真理不具有宽容性，它不容许妥协或限制。研究表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属于它，如果其他任何势力试图接管它的任何一部分，它必将对之进行无情的批判。

在三种可能对科学的基本立场质疑的势力中，惟有宗教才被真正当做敌人。艺术几乎总是无害而有益的；它追求的只不过是一种幻想。除了制造出一些被说成是被艺术“迷住了”的人外，艺术并不企图侵占现实王国。哲学与科学并不对立，它像科学一样行事，并局部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它又有别于科学，



坚持某种幻想，即人们有能力描绘出一幅天衣无缝的、连贯统一的宇宙图景，尽管随着我们知识的每一个新的进步，这种幻想一定会破灭。它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逻辑活动所具有的认识价值，承认了诸如直觉等别的知识源泉，结果在方法上误入歧途。当诗人谈到哲学家时，他所做的嘲弄性评论通常就显得不无道理：

"用睡帽和睡衣上的破布条，他在弥补着宇宙结构的罅隙。"①

但哲学对芸芸众生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在知识分子这一高层次中也只有极少数人对它有兴趣，而对其他人来说，哲学几乎是难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宗教则是一股巨大的势力，它支配着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众所周知，在较早的时期，它包括了在人类生活中起理智作用的一切，在几乎还没有像科学那样的东西存在时，它扮演着科学的角色；它构建了一种具有无可比拟的连贯性和自足性的宇宙观。虽然受到了深深的震撼，这一宇宙观仍延续至今。

如果我们要说明宗教的自负性质，我们必须记住它为人类所做的一切。它为人类提供了关于宇宙的起源及其形成的资料；它向人们保证，在人生沉浮中给予人们保护和最终的幸福，它运用其全部的权威所制定的戒律来指导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从而它实现了三种功能。用其第一种功能，宗教满足了人类对知识的渴求；它用自己的方法去做科学打算做的事，并在这点上与科学分庭抗礼。宗教的最大影响无疑应归功于它的第二种功能。当宗教消除了人们对生活的险恶和沧桑的恐惧时，当宗教保证人们将获得幸福的结局并在不幸之中给予安慰时，科学全然不可与之匹敌。诚然，科学能够教我们去避免某些危险，它也能够战胜某些困苦。否定科学是人类有力的帮助者，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科学不得不任由人们遭受苦难，而只能劝人们屈服苦难。第三种功能是，宗教发布戒律，制定禁忌和限制，在这种功能中，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最大差别。因为科学尽管也的确从其应用中，产生了指导人们生活的规则和告诫，但它热衷于调查研究和证实事实。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规则和告诫与宗教所提供的一样，但尽管如此，它们的理由却是各不相同的。

宗教这三个方面的联系并不很清晰。关于宇宙起源的解释与关于某些特殊的道德戒律（ethical precepts）的教诲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其中关于提供保护和幸福的保证与道德要求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道德要求是对满足这些需要的报答；只是那些遵守道德要求的人才可能指望得到好处，而惩罚则等待着遵守道德要求

① 海涅（Heine）（其文是："With his nightcaps and the tatters of his dressing-gown he patches up the gap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这几句话是弗洛伊德最喜爱的，他在《释梦》第六章第一节中阐述梦的润饰时提到了它们，在1908年2月25日给荣格的一封信（琼斯，1955，第488页）中再次提到。很多年以前，大约是1883年在给其未婚妻的信中就全文引用了该话。



的人。附带说一下，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科学中。因此科学告诉我们，凡轻视其教诲的人都会受到伤害。

宗教中教导、安慰和要求的奇特结合，只有在接受发生学（genetic）方面的分析之后，才能得到理解。我们可以从最显著的聚合点，从关于宇宙起源的教导开始研究。人们可能会问：宇宙起源论（cosmogony）为什么会成为宗教体系的一个固定成分？宗教教义说，宇宙是由一个类似于人的存在物创造的，但该存在物在各个方面，如在力量、智慧和情感力量上都被夸大了——相当于一个理想化的"超人"（super-man）。把动物作为宇宙的创造者（creator）表明了图腾崇拜（totemism）的影响，对此我们稍后至少会简略地说一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使有许多神灵（gods）受到崇拜，但宇宙的创造者总是单个的存在物。同样有趣的是，尽管并不缺乏女性神灵，但创造者通常都是男性；实际上在有些神话（mythology）中，宇宙的创造开始于男性神灵废除被认为是女妖的女性神灵①。这就展开了各种最有趣的细节问题；不过，我们无暇论及。我们所做的下一步易于识别，因为这个神性的创造者（god-creator）被直呼为"父亲"了。精神分析推断，他的确是父亲，曾披着所有的神奇出现于幼儿面前。宗教信仰者描绘宇宙的诞生，就像描绘出他自己的起源一样。

这样，我们就容易解释，安慰性的保证和严格的道德要求是如何与宇宙起源论结合起来的。儿童把自己的存在归之于与父亲具有相同特点的人，此人（或更确切地说，无疑是由父亲和母亲结合起来的父母亲机构）也在儿童弱小和无助的状态中向他们提供保护和监护。由于儿童面临着潜伏在外部世界的一切危险，故而他在父亲的保护下感到安全。当然，他知道，当一个人自己长大了，他就会拥有更大的力量。但他对生活中的危险的认识也变得更深了。他正确地断言，从根本上讲，他仍然像童年时一样无助和无法自我保护，面对世界，他还是一个孩子。因此，没有像在童年时代享受到的那种保护，他什么也干不成。不过他很早就认识到，父亲的能力极为有限，并不具备所有优秀特征。因此，他又返回到那个早在童年时就给予甚高评价的状态。记忆中的父亲形象，把这个形象抬高成一个神灵，并使之成为某种当代的和真实的东西。这种记忆中的父亲的强大力量和要求保护的执着性，一起支撑着他对神的信仰。

宗教纲领的第三个主要方面即道德要求，也很容易符合这种儿童状况。我可以提醒你们注意康德（Kant）的著名论断，他一直把星空与我们的道德规则相提

① 在《摩西与一神教》（1939a）第三篇第一部分［4］的文章中，弗洛伊德相当详细地论述了"女性神灵"（female deities）。



并论[①]（见前面第61页）。这种并列听起来是多么地奇怪啊！因为，天体与关于人类生灵间是彼此热爱还是彼此残杀的问题，有着什么关系呢？然而，它到底还是触及到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真理。给予儿童生命和保证儿童避开危险的父亲（或父母亲职能），也教导他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教导他必须习惯于限制自己的本能性欲望，并使他明白，如果他想成为家庭中和后来更大的社交圈中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成员，他就应该更加关心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通过爱的奖惩体系，儿童受到教育，并从而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他被告知，其生活中的安全感依赖于父母（后来是别的人）爱他以及他们相信他也爱他们。所有这些关系后来都被人原封不动地引入其宗教中。父母的告诫和要求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在他身上保留下来。借助于这种相同的奖惩体系，上帝统治着人的世界。分配给个人的保护及幸福的数量，取决于他满足道德需要的情形。他对上帝的爱和为上帝所爱的意识，是他的生活安全感的基石，他被这种爱及意识武装起来，得以抵御来自外部世界和人类环境的危险。最后，在祈祷中，他确信自己直接影响了神的意志，并在这种影响下，分享着神的全能。

我相信，你们在听我讲演的过程中，已被若干问题所困扰，而且你们乐于听取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此时此地我还无法着手去做，但我自信。这些详细的质疑中，没有一个能推翻我们的论点，即宗教的宇宙观取决于我们童年时的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点就更值得注意：尽管这个宇宙观仍具幼稚性，但它还是一个先驱。毫无疑问，有过一个没有宗教、没有神灵的时期，它被称为泛灵论（animism）阶段。那时世界充斥着类似于人的精神存在物——我们称之为“魔鬼”（demons）。外部世界的所有物体都是它们的栖息之地，或者也许可以说等同于它们的住所。但并不存在某种更卓越的势力，创造了所有的魔鬼，随后又统率着它们，并不存在这种人类能够向其请求保护和帮助的势力。尽管泛灵论中的魔鬼大多对人类持敌对态度，但人类那时似乎比后来更自信。他们肯定常常处于一种对这些邪恶精灵的极度恐惧之中，但他们却以种种行动（对之他们已赋予驱魔之力）来对付它们，保护自己。即便撇开这点不谈，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没有抵御能力。如果他们要向大自然企求某些东西——如企求降雨——他们并不直接向天气之神做祷告，而是做些法术动作，以期直接影响大自然：他们自己完成与降雨相似的事情。在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各种力量做斗争中，他们的第一个武器就是“法术”（magic）——现代技术的鼻祖。据我们猜测，我们对法术的仰赖来自于对自己的理智作用的高估，以及对“思想万能”（omnipotence of thoughts）的崇拜。附带

① 在初版中，该话是：“在哲学家康德的著名论断中，他指出了星空的存在和我们的法则道德的存在，是上帝的伟大的有力证明。”而在《弗洛伊德全集》（1934）中，该话就变为上述所译的形式——无疑，很早以前就遗漏了他对康德同一段话的较早引证。

说一下，这种信仰在我们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身上也可看到[①]。我们可以猜想，当时的人类特别对他们在语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这种成就中肯定伴随着思维的重大发展。他们认为法术的力量产生于词汇。这个特征后来被宗教所继承。“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他们的法术行动的事实表明，泛灵论时期的人并不仅仅相信他们的愿望的力量。他们更期望的是采取这一行动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促使大自然模仿该行动之力。如果他们企求降雨，他们就自己泼水；如果想让土地果实累累，他们就在田间对土地演示戏剧性的性交行为。

你们知道，任何事物一旦在精神上得到了体现，就不易消失了。所以，如果你们听说许多泛灵论的话语一直保留至今（其中大部分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迷信，与宗教并存或包含于宗教之中），你们也不会感到惊讶。更有甚者，你们几乎没法否认这样一种观点，即今天的哲学保留着泛灵时期的思维模式的一些本质特征——如过高地估价语词的神奇、相信世界上的真实事件都是按照我们的思维试图强加其上的方向前进的。因而，看起来的确存在着一个不具法术行动的泛灵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猜到，甚至在那时候就有了某种伦理，即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戒律；但我们没有发现它们与泛灵论时期的信仰有任何密切的关系。它们可能是人们相对力量以及实际需要的直接表现。

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从泛灵论到宗教的转变？但你们可以想象到，人类精神（spirit）演化的这些远始的时期，至今仍是模糊不清的。似乎是，宗教所表现的第一种形式就是图腾崇拜。即动物崇拜这个奇怪现象，而最初的伦理戒律即“禁忌”（taboos）都是这一现象的结果。在一本题为《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书中，我曾详细论述了一种观点，该观点把上述转变的原因一直追溯到人类氏族环境的一次变革上。与泛灵论相比，宗教的主要成就在于从精神上控制了人们对魔鬼的恐惧。不过，这个史前时期的残余即邪恶精灵，在宗教体系中仍占一席之地。

上述即宗教的宇宙观的史前史；现在我们转向研究那以后所发生的和仍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吧。凭借着对自然过程的考察而强大起来的科学精神，终于开始把宗教当做一件人类的事，并使之接受批判性的考察。宗教不能经受起这种考察。首先被怀疑的是宗教关于各种奇迹的传说，因为这些神话与严肃的观察所指出的一切相矛盾着，而且也清晰地表现出人类想象活动的影响。随后，那些解释宇宙起源的宗教教义遭到了否定，因为它们表现出一种具有古代特征的无知。而且，由于人们日益增加了对自然法则的了解，他们知道这些法则比教义更为优越。关于宇宙是通过类似于人类个体起源的交媾或发生行为而形成的看法，已不再是最显然，且为不证自明的假设了，因为具有心灵的生物与非生物自然界之间的区

① 这一问看阅《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第三篇文章，特别是其中第三部分。

别已经给人类思想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区别使人类不可能再保留原始泛灵论中的信仰。我们也不应忽视各种不同的宗教体系的比较研究的影响，以及它们彼此排斥和不相容的作用。

科学精神凭借这些初步的论战而强大起来，最终获得了足够的勇气，以致于敢对宗教宇宙观中最重要的、最具情感价值的成分进行考察。人们可能始终看到——尽管敢于公开讲出来是很久以后的事——宗教向人们承诺，只要他们能遵守某些道德要求，就向他们提供保护和幸福，但这种种表态也已表明其自身是不值得信赖的。宇宙中似乎并不存在那种力量，它以父母般的关怀照管着人们的安康，并给他们的所有活动带来团圆的结局。相反，人类的命运可能既不符合“宇宙行善”（Universal Benevolence）的假说，也不符合与此有些相冲突的“宇宙公正赏罚”（Universal Justice）的假说。地震、海啸、大火，根本不分是善良与邪恶，虔诚与不敬。更何况，我们谈论的不是非生物自然界，而是人，其命运依赖于他人的种种关系，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绝不是规律。凶暴、狡猾或残忍的人往往占有令人羡慕的世间财富，而善良的人却一贫如洗。各种黑暗的、无情的和没有爱心的力量在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宗教赋予宇宙统治的奖惩体系似乎并不存在。这再次说明，我们有理由抛弃宗教从泛灵论那里获得的一部分理论。

通过证明宗教是如何起源于儿童的无助，通过在成人的愿望和需要中的童年残迹去探求宗教的内容，精神分析学对宗教的宇宙观提出了最新的批评。

确切地说，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宗教；但它仍然是我们认识宗教的一种必要的完善，而且至少在这方面，它是对宗教的一种否定，因为宗教自身表明宇宙起源于神。当然，假如我们对神的解释，可以被宗教接受，那么它在这方面肯定就没有什么错了。

总之，这就是科学对宗教宇宙观的评价。种种不同派别的宗教在为谁占有真理而争论不休，而我们却认为关于宗教的真理性问题无法获得彻底的回答。宗教是一种控制感性世界的企图。由于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必然性，我们在内心中产生了一个渴望的王国。而借助于这一渴望的王国，我们置身于感性世界之中。但是，宗教并不能实现这一点，其教条留有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即人类童年的无知时代）的印迹。它的安慰不值得信任。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并非保育室。相反，宗教努力强调的那些道德要求应该给予另外的基础；因为它们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把对它们的服从与宗教信仰联合起来是危险的。如果我们试图确定宗教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那么，它看来并不是永恒的获取物，而是



与个体文明者从童年到成人的发展中所必须经历的神经症相似的东西①。

你们当然可以自由地批判我的这种观点；我甚至可能在来路上与你们相会于这点上。关于宗教宇宙观的逐渐衰弱，我所告诉你们的自然很简略，是不完善的。关于各种不同过程的秩序，我也说得很不清楚；我没有阐述各种力量在唤醒科学精神中的合作情况，也没有论述在宗教宇宙观实行绝对统治和后来受日益增强的批判的影响时它自身的变化。最后，严格地说，我的评论仅限于宗教的一种形式，即西方人的形式。可以说，为了便于说明，我构建了一个解剖学的模型，以期尽可能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我的知识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使事情做得好、更完善，这一问题我们现在不妨暂时搁置一旁。我明白，你们可以在别处听到比我谈得更好的论述。尽管在我的讲演中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我坚信，即使是关于宗教问题的资料的最细心的研究，也不会动摇我们的结论。

众所周知，科学精神反对宗教宇宙观的斗争尚未结束，至今，这种斗争仍在我们面前进行着。虽然精神分析一般很少拿起论战的武器，但我并不反对研究这场争论。这样，我就可能进一步阐述我们对宇宙观的态度。你们将看到，宗教支持者所提出的一些论据是多么容易答复，而也有一些的确难以驳倒。

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反对意见，认为科学把宗教作为它研究的一个课题是一种无礼行为，因为宗教是比人类理智的任何活动都崇高和优越的东西，是不可用琐碎的批判进行研究的。换言之，科学没有资格去评价宗教，因为它只要固守自己的领域，还是相当有用的，也是值得尊敬的。但宗教不在科学领域内，科学无权干涉。如果我们自己不被这种粗暴的排斥所吓倒，而是进一步质问：宗教提出的这种对在所有人类事物中的优越地位的要求依据是什么？那么，我们得到的答复（如果我们认为值得答复的话）就是，宗教不能用人类的量尺来衡量，因为它起源于神，是被圣灵作为启示赐予我们的，而人类精神是无法理解这个圣灵的。人们可能已经想到，没有什么比否定这个论据更容易：它显然是一个预期法则，即“用未经证实的假设来辩论”——我知道德文中没有一个好的相对应的表达方式。这里提出的实际问题是，是否存在神灵及它给予的启示？当然，不是下述说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们不能提这个问题，因为神性是不能被怀疑的。在分析工作中，我们也常遇到这种态度。如果一个平时很聪明的人竟用非常愚蠢的理由来反对某些特殊的建议，则这种逻辑的缺点就表明，在病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特别强烈的拒绝动机——这种动机只可能是情感性的，具有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

① 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和《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中提及社会遭受来自于个体神经症那样痛苦的可能性。在《摩西与一神教》第三篇第一部分（3）的文章中更加详细地阐述了这种可能性。而宗教活动及强迫性行为的类比在更早的时候就被指出过（弗洛伊德，1907b）。

我们也可能得到另一种回答，它公开承认这类动机：不可以对宗教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因为它是人类灵魂所产生的最高级、最珍贵和最崇高的事物；因为它表现了最深厚的情感。而且惟有它，才使世界对人们变得包容，生活对人们变得有价值。我们无须争论宗教的这种价值，而需关心另外的事。我们应该强调下述事实：问题的根本不是科学精神侵犯了宗教领域，而恰恰相反，是宗教侵犯了科学思想领域。无论宗教可能具有多少价值和重要性，无论如何，它都无权限制思想，——因而，无权拒绝对它进行思考。

科学思维本质上与一般的思维活动并无不同之处。而后者，则是我们大家，包括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用以照管日常事件的活动。科学思维形成了某些特点：它对那些缺少直接和实在效用的事情也感兴趣；它谨慎地避免个人因素和情感影响；它更严格地考察那些作为结论基石的感知觉的可行性；它用那些使用日常方法不可获得的新知觉来充实自己，并在有意识加以调整的实验中，把这些新知觉的决定因素分离出来。它努力达到与现实——也就是与存在于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的东西——一致。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这种努力决定着我们的愿望能否实现。我们把那种与外部真实世界的一致称为“真理”。即使我们不考虑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它仍然是科学研究的目标。因此，当宗教宣称它可能取代科学的地位；宣称因为它对人是有益的，并使人高尚，所以它必定也是真的时候；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侵犯，而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应驳斥它。人们已学会如何根据经验法则和现实来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现在若要求他们切身的利益完全托给自由行使职能而不受理性思维制约的一种权威，这未免有些太过分了。说到宗教向其信徒承诺的保护，我想，如果汽车司机宣称，他驾驶汽车绝不受交通规则的约束，而是根据他那异想天开的冲动，那么，我们当中甚至没有人会打算坐到他的车中。

宗教为保护自己而做出的限制人思想的禁律，不能不危及个人和人类社会。分析的经验已告诉我们：虽然像这样的禁律最初是局限于某个特殊领域，但它往往向外扩张，后来便成为患者日常行为中各种严厉抑制的起源。该结果也可在女性性生活中找到，这些女性甚至在思想上都不准涉及性[①]。传记可以表明，几乎所有的已故名人，在其生活经历中都受到因宗教对思想的限制而引起的伤害。另一方面，理智（或用大家熟悉的名称——理性来称之）是一种力量，在对人类施加一种统一的影响方面，我们可以对它抱有极大希望——人类是很难团结一致的，因此几乎难以实行统治。可以想象，只要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乘法表和度量单位，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不可能啊。我们对将来最好的希望是，理智——科学精神，理性——能够逐渐建立起在人类心理生活中的主宰地位，理性的本质是一种保证，

① 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第九章中已考察过。



保证它以后不会忘记给予人类情感冲动以及给予其所决定的东西以它们应有的地位。但是，这样一种理性统治所实行的普通制度，将被证明是团结人类的最有力的纽带，并将引向进一步的团结。无论是什么，只要它像制约思想的宗教戒律那样，反抗这样的进步，它对人类未来而言就是一种危险。

于是，人们会问，宗教为什么不以下述坦率的申明，来结束这场对它而言毫无希望的争论呢："事实是，我不能给予你们一般所谓的'真理'；如果你们需要那东西的话，你们就应坚守科学。但是，我要提供给你们的、相对你们能从科学中所获得的一切而言，是更美丽，更令人宽慰，也更使人高兴的东西。因此，我告诉你们，宗教是另一更高级含义上的真理。"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宗教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认，因为这将使它丧失所有对人类大众的影响。一般人只知道一种真理，即日常语言意义上的真理。他无法想象更高级的或最高级的真理会是什么样子。对他而言，真理似乎与死亡一样，是没有等级程度之分的；他无法从美飞跃到真。也许你们会像我一样，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因此，斗争尚未结束。宗教宇宙观的支持者信奉一句古老的格言：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们问道："这种科学是什么？它竟倨傲地诽谤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几千年来一直给无数的人带来帮助和安慰的宗教？它迄今为止实现了什么呢？今后我们能期望从中获得什么呢？它自己也承认，它无法带来安慰与兴奋。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它的理论又怎么样呢？它能告诉我们宇宙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宇宙产生之前是什么样的吗？它能向我们描绘一幅清晰的宇宙图景吗？或向我们表明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无法解释的生命现象或说明心灵力量怎么能作用于无生命物质吗？"如果它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它表示尊重。但至今它尚未解答任何一个问题。它向我们提供种种所谓的发现的碎片，而无法使之相互协调；它收集事件发展过程中一致性的观察材料，并把这种种一致性称为法则，提出其狂妄的解释。你们想想，科学赋予其发现的必然性是多么微小啊！它教导我们的一切都仅仅是暂时正确的：今天被称赞为最明智的东西，明天可能被否认，而代之以别的东西，尽管这东西将再次被证明仅仅是暂时的。于是，最新的错误被认为是真理。而且，为了这个真理，我们将牺牲我们的最高利益。

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只要你们自己是受上述言论冲击的科学宇宙观的支持者，这种批评就不会过于严重地动摇你们的信心。在此，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一段曾传遍奥匈帝国的话。有一次，那个"恶魔"[①] 对着他所厌恶的议会大声咆哮："这不是一般的反对意见！它是派别性的反对！"与此类似，正如你们所知，宗教以一种不公正的、邪恶的方式，夸大地指责科学尚未解决有关宇宙的问题。科学

① 人们通常这样称呼奥匈帝国的皇帝约瑟夫（Francis Joseph，1830～1916）。

的确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取得这些伟大的成就。因为科学非常年轻——是较晚形成的人类活动。仅选几个日期为例，我们应该记住，开普勒（Kepler）发现行星运动法则距今只有大约300年；把光分析为各种颜色的光谱，并建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逝于1727年——也就是说，距今不过200多年；拉瓦锡（Lavoisier）仅是在法国大革命前不久才发现氧的。相对于人类发展的历程，个体的生命是极其短暂的；现在我可能是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了[1]；然而达尔文（Darwin）出版其著作《物种起源》时，我却早已出生了。同年即1859年，镭的发现者居里（Pierre Curie）也诞生了。即使你们再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希腊时期精密科学的起源；追溯到阿基米德（Archimedes）；追溯到哥白尼（Copernicus）的先驱、萨姆斯岛的阿里斯塔恰斯（Aristarchus of Samos，大约公元前250年），甚至追溯到巴比伦时期天文学的最早开端，也只不过涵盖了人类学家所确定的人类从类人猿形态进化到人的、肯定有十几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而且，我们应该记住，上个世纪产生了如此丰富的新发现，带来了科学如此之迅猛的进步，以致于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科学的前景充满信心。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批评的正确性。科学的前进的确是缓慢的、摇摆不定的和艰辛的。这一事实无可否认或改变。难怪在另一个阵营中的先生们感到不满意。他们被宠坏了："天启"使得他们过得安逸自在。科学研究的进展——如精神分析的进展。我们把各种期望带入工作中，而这些期望又必须严格地加以控制。在观察中，我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会发现某种新东西；但一开始，它们只是一些不能粘合的碎片。我们提出推测，建立假设，倘若没有进一步证实，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些推测和假设。我们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准备，用以等待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放弃了早期的信仰，以免因它们而忽视那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最后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有了回报，那些支离破碎的发现自行组合起来了，我们因而洞察到精神事件的全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以从事进一步的工作了。但在分析中，我们不得不在没有实验所提供的帮助下进行研究。

而且，在对科学的批判中存在着大量的夸张。认为科学盲目地从一个实验摇摆到另一个实验，它用一个错误取代另一个错误，这都不是真的。科学通常像雕塑家摆弄自己的泥制模型，孜孜不倦地修改着这一样稿或者往上加点什么，或者拿掉一些什么，直到达到一种满意的程度，即他感到作品与他所看到或想象的物体相似了。此外，至少在那些更古老和更成熟的科学中，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一种坚实的基本原理，它只被修改过和改善过，却没有被推翻。在科学活动中，情况看起来并不像批判中的那么糟糕。

对科学的这些猛烈的污蔑最终又是为了什么？尽管科学目前还不完善，而且

---

① 弗洛伊德在写作本书时已76岁。



困难重重，但对我们而言，科学仍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它，它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进步。而宗教的宇宙观则不然，它的要点完美无缺，如果它曾经是谬误，那么它肯定永远都是谬误。对科学的贬低绝不可能改变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努力考虑到我们对外部真实世界的依赖性，而宗教却是一种幻想，它的势力来源于我们各种本能的欲望性冲动[①]。

我有责任接着考察与科学宇宙观相对立的别的宇宙观；但我极不情愿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严格地说，我没有能力评判它们。所以，在听以下论述时，你们必须记住这个限制条件；而且倘若你们对这种考察有兴趣的话，你们应当到别处寻找更好的指导。

在此，我必须首先提及哲学的各种不同体系，它们敢于根据那些多半是遁世的思想家的想法来描绘宇宙图景。我已经努力对哲学的特征作了普遍的考察（见英文版第160页），但我恐怕不具备少数人那样的资格，他们曾经建立了对哲学不同体系的评价。因此，我请你们一同考察另外两种现象，这两种现象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能被忽视的。

第一种宇宙观好似政治无政府主义的复本，而且可能就来源于它。当然，过去就已有这种理智的虚无主义者（intellectual nihilists），而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似乎冲昏了当今虚无主义者的头脑。他们的确是从科学出发的，但他们设法迫使科学自我取消，乃至自绝；他们派给科学一项任务，即通过否认自己的各种权利来消除自身。在这方面，人们通常认为，虚无主义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态度，上述任务一完成，它就不复存在了。一旦科学被消灭了，这个虚空出的空间就可能被某种神秘主义填满，甚或被陈旧的宗教的宇宙观所填满。按照无政府主义理论（anarchist theory）来讲，并不存在像真理那样的事物，即对外部世界的确定认识。我们所公布的像科学真理的一切都不过是我们自身需要的产物，因为这些需要一定会根据外部条件来获得满足；这再一次证明，它们是幻想。归根到底，我们只能发现我们需要的东西，只能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这是绝无例外的。因为真理的标准——与外部世界相一致——是不存在的，它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毫不相关。它们都同样正确或同样错误。任何一个都无权指责另一个是错的。

对认识论有兴趣的人可能发现，探索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借以成功地从科学中得出上述结论的途径——即诡辩论（sophistry）——是富有诱惑力的。无疑我们将会遇到类似于那些来自众所周知的科里特人（Cretan）的悖论（paradox）中的情况，科里特人说所有的科里特人都是撒谎者[②]。但我既不希望也没有能力对这

---

① 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中对宗教做了最详尽的评论。

② 这种悖论（被称为“Epimenides”）的最简单的形式是由那个说“我在撒谎”的人提供的。如果他正在撒谎，则他正在讲真话；而如果他讲的是真话，那么他正在撒谎。

个问题做深入的探讨。我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只要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涉及到关于抽象事物的看法，它听起来就具有神奇的优越性，但它向现实生活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不成功的。现在，人们的行动是由他们的观点和知识所支配的；正是这个同样的科学精神推测出原子的结构或人类的起源；设计了一座能够承受重物的桥梁结构。假如我们信仰的一切均无足轻重；假如根本不存在知识因与现实相符而相悖于我们的观念的情形，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硬纸片而不是用石头来造桥，就可以把催泪瓦斯而不是乙醚当做麻醉剂。但即使是这些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将强烈地否认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的这种应用。

另一个反对意见更要严肃对待；在此，我对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深感遗憾。我想，关于这件事，你们比我了解得更多，你们大概早就立场分明，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研究，关于经济体系对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的影响的研究，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权威性。我当然无法说清楚，他的观点具体有多少正确性或错误性。我明白，甚至是那些比我受到更好教育的人也不易说清。马克思的理论中包含着令我奇怪的主张，诸如，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阶层的变化按一种辩证的过程相继产生。我想我还远不能认为这些主张是正确的；对我而言，它们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相反，倒像是晦涩的黑格尔哲学的积淀物，毕竟马克思曾有一个时期受过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抛弃自己的外行看法，即社会的阶级结构起源于那些早在历史发端之际差异微小的部落①间所发生的斗争。我是这么想的，社会差别最初是氏族或种族间的差别。胜利不仅取决于体质上攻击性的程度等心理因素，同时也取决于部落内部组织的牢固性以及诸如拥有优越武器等物质因素。生活在同一领土上，胜利者就变成了主人，而被征服者就成了奴隶。在这种情况中，找不到任何自然法则或概念化的（辩证的）进化迹象。另外，由于对自然力量的日益控制，人们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影响也更有成效，因为人们总是让他们新近获得的有威力的工具，为其攻击行为效力，并且用以彼此斗争。金属——青铜和铁——的采用结束了那一整个年代的文化及其社会制度。我的确相信，正是火药和火器废除了武士制度和贵族统治；而且俄国的专制统治也早就注定要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不管欧洲的皇室如何盛行近亲繁殖，也生育不出在火器的爆炸威力前能够刀枪不入的沙皇来。

由于大战之后爆发的经济危机，我们的确可能正为此付出我们最近才获得的对大自然的胜利即对天空征服的代价。这说起来不太好懂，但至少是可清晰地辨认出这根链条的第一个环节。英国政治所据的安全，从海洋所冲刷出的海岸中获

---

① 弗洛伊德用“部落”（“horde”）术语是指相对较小的群体。参阅《图腾与禁忌》（1912～1913）。

得了保证。但是在布莱里奥（Blériot）乘坐自己的飞机飞越海峡的时候，这种保护性的隔离状态就被打破了；而在德国人齐柏林[①]（在和平时期的一次演习中）巡航于伦敦上空的那个夜晚，反德战争无疑已提前定局了[②]。在这方面还不应忘记德国潜水艇的威胁。

我用上述极少的不充分的言论向你们谈及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这使我一直感到惭愧。我也知道，我并没有涉及任何对你们而言是新的东西。不过，我只想使你们注意到下述事实：人类与其对大自然的控制——他们从这种控制获得了打自己同胞的武器——的关系，也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经济活动。我们似乎远离了宇宙观问题，但我们不久就会言归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显然不在于它的历史观或以历史观为基础的对未来所作的预言，而在于它英明地指出了人类经济条件对其理性的、道德的和艺术的看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样就揭示了许多从前几乎完全被忽视的因果关系及其内涵。但不能假定，经济动机是社会中惟一决定人类行为的动机。不同的个体、种族和民族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下表现各异，仅这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就足以证明，经济动机（economic motives）并不是惟一的决定性因素。当谈论到活着的人的种种反应时，实在难以理解人们怎么能够忽视心理因素；因为这些反应不仅与经济条件的建立有关，而且，只有处于这些条件的控制之下，人们才能利用他们最初的本能冲动——如自我生存本能、攻击性、对爱的欲求和趋乐避苦的倾向。在较早的研究中，我还指出了超我提出的重要要求——这个“超我”（super-ego）代表着传统和过去的理念，而且将在一段时间里抵抗新的经济状况的刺激[③]。最后，我们应该记住，大多数受到经济必然性制约的人也经历了这个文化发展——另一些人可能称为文明[④]——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无疑受到所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与有机物过程相比，它在起源上自然是独立于那些因素的，而且表现出完全有能力对其他因素施加影响[⑤]。它转移了本能的目标，并促使人们开始反抗他们从前加以忍受的一切。而且，科学精神的日益

① 我在战争的第一年从可靠人士那里得知的。

② 齐柏林（Ferdinand von Zeppelin，1938～1917）德国工程师，实用飞艇的首创者。1900年制成第一艘实用飞艇LZ-1号。——中译者

③ 参见英文版第67页。

④ 参见《为什么有战争?》（1933b）中的类似段落，而且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中对这个词汇的意义做了总的评价：“我完全不在乎对文化与文明的区分。”

⑤ 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频繁地想起“文明过程”这个观念。他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好几处论述了这个观念，并在《为什么有战争?》（1933b）中再次提到它。这个观念与另一个更有名的观念——即作为有机物过程的压抑的假说——密切相关。在《文明及其缺憾》第四章的开头和末尾处两个长长的脚注中，他对这个观念做了充分说明。这个假说可追溯到1897年，在最近命名的作品的编者导言中充分阐述了该假说的历史。

强大似乎构成了它的一个基本部分。如果有谁能够详细地阐明这些不同的因素——如人类一般的遗传素质，人类的种族变异和文化变迁——在社会等级、职业和谋生能力的条件下彼此抑制和促进的情况，谁就能补充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它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因为社会学所探讨的是人类的社会行为，故而它也只能是应用心理学。严格地讲，只有两种科学：一是心理学包括纯理论的和应用的；一是自然科学。

经济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一新近的发现使得人们跃跃欲试，要亲自运用革命的手段来引起经济关系的变革，而不是听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得到实现，便获得了一个宇宙观所具有的力量、自足性和排他性；但同时也获得了与其反对之物的不可思议的相似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最初是科学的一部分，也是建立在科学和技术之上的，但它却制造了一种对思想的限制，这种限制一如宗教昔日的冷酷。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考察都被禁止，对其正确性的质疑遭到了惩罚，其方式与天主教会对异端邪说的惩罚如出一辙。马克思的著作作为一种启示的源泉，取代了《圣经》和《古兰经》，尽管它们与那些古老的经书一样，不乏矛盾和晦涩之处。

虽然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情地抛弃了所有的唯心主义体系和幻想错觉(illusions)，但它自身又产生了种种幻想，而这些幻想与前者相比，并没有减少其可疑性和不可证实性。它希望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来改变人性（human nature)，从而使人们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几乎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而且将自觉地承担起劳动的责任。同时，它把种种社会必需的对本能的限制转移到别处去；把威胁所有人类组织的攻击性倾向移向外面；并从穷人对富人和如今的无权者对过去的当权者的仇视中寻找支持。但是，像这样的人性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新秩序尚不完善并遭受外部的威胁，布尔什维克党人目前所煽起的群众的这股热情使人们无法肯定，在将来这种秩序就能建立并不再处于危险之中。就像宗教一样，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得不弥补其信仰者现在所蒙受的痛苦和生活的穷困，于是，它向人们承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那时，一切需要都将得到满足。这样的天堂无论如何将在今生，在地球上建立起来，并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展示出来。但我们应该记得，犹太人——他们的宗教无视来生——也期望救世主降临人世；中世纪基督教徒曾很多次相信，上帝的王国近在眼前。

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主义必将对这些反对意见做出答复。它会说，只要人性尚未被改造，就有必要利用如今这些对他们有影响的方法。没有对教育的强制，没有对思想的限制，没有对武力的运用，直至流血，是不可能办得到的。如果我们不给人以你所称的“错觉”，便将无法使他们默认这种强制。有人会有礼貌地问我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一切呢？这就把我们问住了。我想不出有什么妙计。我应当承认，这种实验的种种情境足以吓倒我和像我一样的人，从而不敢

一试；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不是绝无仅有的人。有些活动家，一旦着手于他们的雄图大略时，就信仰坚定，绝无疑虑，更无凡人所具有的痛苦感。我们应该感谢这类人。因为他们，使创建一个新秩序的惊人实验目前正在俄国实际地进行着。当很多国家宣称他们只是在保持基督教的虔诚中期待被拯救时，发生在俄国的革命——尽管尚有许多令人不快的细节——却似乎不失为一种传递更美好的未来的信息。不幸的是，无论是我们的怀疑，还是另一方的狂热信仰，对如何揣测这个实验的结果，都未提供暗示。这个实验的未来会回答我们；它可能会表明：这个实验进行得太早了；要对社会秩序进行彻底改变，成功的希望渺小，除非新的发现增强了我们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从而使我们的需要更易得到满足。可能只有到了那时，新的社会秩序才可能既消除群众的卑俗需要，仅把注意力倾向于个体的文化需要。当然，即使到那时，我们仍然不得不与种种困难做斗争；人性的不驯服的特征，向所有的社会都会显示出这些困难。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在结尾处，就上述有关精神分析与宇宙观问题的关系，做一个总结。我认为，精神分析没有能力创建自己的宇宙观。它并不需要自己的宇宙观；它是科学的一部分，故而能够遵循科学的宇宙观。但是，论述这种关系几乎不值得用如此宏大的标题，因为科学宇宙观并非包罗万象，它极不完善，也不认为是自足的，能建构种种体系。人类的科学思想仍然很幼稚；还有太多的重要问题尚无法解决。建立于科学之上的宇宙观，除了对外部真实世界的强调之外，其性质主要是消极的（例如，服从真理，拒绝幻想）。我们的同胞中，若有人不满于现状，要求获得比现在更多的暂时安慰的地方，他们尽可以到他们所能得到这种安慰之处去寻找。对此，我们无可指责，也帮不上忙；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而改变我们的思考。



精神分析五讲

（*1910*）

贺 岭 峰 译
戴 淑 艳 校
郭 本 禹 修订

按语

本文又称《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是弗洛伊德1909年应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的邀请，为该校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1910年首次用英文刊出。该文是弗洛伊德最早论述精神分析的主题和发展的一篇著作。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第 1 讲

女士们，先生们：

当我来到这个新世界，面对着听众们真诚的求知期望来演讲，我心中既感到新奇又觉得有点儿勉为其难。无疑，我拥有如此殊荣仅仅是因为我的名字与精神分析有关；因此，我想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有关精神分析的问题。我将尽可能简要地介绍这种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历史概况和发展过程。

如果说使精神分析诞生于世是一大功劳的话，那么这功劳并不是我的①。我并没有参与精神分析的最初创建。当一位维也纳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尔医生②在一位患有癔症的姑娘身上最早（1880～1882）使用这种疗法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并且正在准备我的期末考试。现在让我们来直接看一下这个病例及其治疗情况，有关细节你们可以在后来布洛伊尔和我合著的《癔症研究》③（1895）一书中找到。

不过，我想先做一说明。我听说我的听众中大多数都不是医学专业人员，这并没令我感到不快。无须担心听懂我讲的内容需要什么特殊的医学知识。的确，在我们旅程的开始阶段将与医生们同路而行，但我们很快就会与他们分手，而与布洛伊尔医生一道去探索一条十分独特的道路。

布洛伊尔医生的病人是一个 21 岁才华出众的姑娘。她的病持续了两年多，这

---

① ［1923 年增注］参见我在《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中的有关论述，我曾在该文中表示对精神分析完全负责。

② 布洛伊尔医生（Dr. Josef Breuer），生于 1842 年，帝国科学院名誉院士，以研究呼吸和平衡感的生理而著称。

③ 该书中我所著的部分文章已由纽约的布里尔（A. A. Brill）博士译成英文，书名为《癔症论文选》（纽约，1909）。

期间出现了一系列显然不容忽视的身心障碍。她的身体右侧两肢患有僵直性麻痹，伴有感觉丧失；而且左侧也不时受到同样病症的影响。她的眼睛运动失调，视力受到多种阻碍。她的头摆动困难，还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咳嗽。她厌食，有一次尽管渴得难受，却一连几周无法喝水。她的语言能力下降，甚至到了无法听说自己母语的地步。最终，她陷入失神、错乱、谵妄，以及整个人格都发生改变的状态，这些症状是我们下面所要关注的。

当你们听了我所列举的这些症状时，即使你们不是医生，也可以满有把握地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很可能会波及大脑，这使得治愈的希望微乎其微，并且可能会导致病人的夭折。然而你可能会听到医生们说，在一些有着同样严重症状的病例中，有理由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加乐观的态度。如果一个年轻的女病人表现出这种情况：她的重要内部器官（心脏、肾脏等）经客观诊断均属正常，但她却经常表现出强烈的情绪波动——而且，如果她的各种症状在某些细节方面与人们通常所期望的有所不同——那么，医生们不会把这个病例看得很严重。他们认为他们所面对的不是一种大脑的器质性疾病，这种莫名其妙的症状被古希腊医学称之为“癔症”（hysteria），具有产生一系列严重疾病的幻觉症状的能力。他们认为这没有生命危险，而且恢复健康——甚至百分之百的恢复——也是可能的。要把这样一种癔症同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区分开来并不都是很容易的。然而，我们无须知道对它们如何做出区别性诊断，只要确信布洛伊尔的病人恰恰就是那种任何一位合格的医生都会诊断为癔症的病例就足矣。这里，我们还可以从这个病人的病历报告中引证这样一个深一层的事实：她的病是在她护理病入膏肓的父亲期间发作的。她全心地爱着她的父亲，但她却由于自己的病症而被迫放弃了对父亲的护理。

至此与医生同伴而行使我们受益匪浅，但是分手的时刻就在眼前。因为你们不要认为，通过把这种所谓的癔病转而诊断为大脑的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就能使病人接受医学援助的前景得到本质性的改善。在多数病例中，医疗技术对严重的大脑疾病无能为力，而医生对癔病性失调也无计可施。这样医生只有听凭仁慈的造物主来决定他的乐观的预后效果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得以实现①。

因此，把这种病看成是癔症对病人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对医生来说却恰恰相反。值得注意的是，医生对癔症患者的态度与患器质性疾病的病人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他对前者不像对后者那样怀有同情心，因为癔症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严重，但却似乎要求把它当成严重的病来看待。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因素在

① 我现在意识到并非如此，但是在我演讲时，我是把我自己和听众放回到了1880年以前的时期来考虑的。如果现在情况已经不同，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正在简述其历史的这些活动所造成的。

起作用。医生通过研究，掌握了许多门外汉一无所知的东西，他能够对某种疾病的起因及其所带来的变化——如中风或恶性肿瘤患者大脑中的变化——形成一定的看法。由于这些知识使他理解了疾病的许多具体症状，所以他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切中要害的。但是他所有的这些知识——他在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方面所受的训练——在他面对癔病现象的具体问题时却帮不上他什么忙了。他无法理解癔症，在癔症面前他自己成了门外汉。这对于任何一个通常重视自己知识的人来说，却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随之而来的就是癔病患者得不到医生的同情。医生把他们看成是侵犯他的科学规律的人——就像正教徒眼中的异教徒一样。他把所有劣迹都归于他们身上，指责他们夸大事实、故意欺骗、装病，于是他就通过不再理睬他们来施以惩罚。

但布洛伊尔医生对他病人的态度却不在此之列。即使在一开始他不知如何来帮助她时，也给予了她极大的同情和关注。正如他在她的病历记录中所说的，看起来好像是病人良好的智力和个性品质减轻了医生治疗中的难度。此外，他的热心而详尽的研究使他找到了帮助病人初期治疗的方法。

他观察到，当病人处于"失神"（absence，伴有精神错乱［mental confusion］交替人格）状态时，她会习惯地对自己嘟哝几句什么，这些话好像是产生于占据其头脑的某种思绪。医生在把这几个词记录下来以后，常常使她进入一种催眠（hypnosis）状态，再把那几句话重复给她听，以引导她以此作为开始。病人果然依计而行，并以这种方式在医生面前把那些在"失神"状态下占据其心灵的精神创造物再现出来，她讲出来的这些只言片语吐露出了这些创造物的存在。它们都是深沉而忧郁的幻想——我们可以称之为"白日梦"（daydreams）——时常有着诗一般的美丽，开头通常是一个姑娘坐在父亲病榻旁的身姿。当她涉及到几个这样的幻想，就好像获得了自由，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生活。这种状况的好转会持续几个小时，但到第二天又会陷入"失神"状态。这种病状照样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让她把新建构起来的幻想用语言表达出来——来消除。这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病人在"失神"状态下的心理状态是这些高度情绪化的幻想刺激的结果。说来奇怪，病人此时只能用英语理解和表述，并把这种新颖的治疗命名为"talking cure"[①]（谈疗法），且常常戏称为"chimney-sweeping"[①]（扫烟囱法）。

似乎是出于偶然，医生很快就发现这种把心灵打扫干净的过程所达到的成效远远超出了暂时缓解她反复出现的精神错乱。事实上，如果让她在催眠状态下，伴有情感的表达，回忆起某种症状最早出现的场合及相关的经历，就有可能消除这种痛苦的症状。"那是夏天最炎热的几天，病人受着干渴的折磨，因为不知道为

① 这两个词最初即为英文。



什么，她突然发现自己不能喝水了。她端起水杯，非常想喝水，但是杯子一碰到嘴唇，她就像患了‘恐水症’（hydrophobia）的病人一样把杯子拿开了。每当她这么做的时候，显然有两三秒钟是处于‘失神’状态。为了减轻那折磨人的干渴，她只能以西瓜等水果为生。这样大约持续了6周，直到有一天她在催眠状态下嘟哝着谈到了她的英国‘女佣人’，这个人她并不喜欢。接着带有厌恶的神情讲起，有一次她走进这位女佣人的房间，看到她那只小狗——可怕的畜牲！——怎样在一个玻璃杯子里喝水。出于礼貌，这位病人当时没有说什么。当她把当时压抑的愤怒一古脑儿地发泄出来后，她就想要点什么喝，并毫无困难地喝了大量的水。她从催眠状态下醒来时，杯子尚在嘴边上。从此，这种心理障碍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复发。"①

请各位允许我在这个问题上再多说几句。以前从未有人采用这种方法来消除过癔症的症状，也从未有人对病因有过如此深刻的洞察。如果能够证实病人的其他症状——也许是大多数的症状——是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和消除的，那么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布洛伊尔不遗余力地来证明这一点，他进而对病人其他的更为严重的病症的致病原因做了系统的考察。事实确实如此，几乎所有的病症都是这样形成的，即形成于情绪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s）的残留物或可称为"沉淀物"（precipitates）。据此，后来我们把这些体验称为"心理创伤"（psychical traumas），并利用病症与引发病症的创伤性情景的关系对病症的特性进行了解。用一个专业术语来说，这些病症是由那些记忆残留下来的创伤性情景所"决定的"，没有必要再把它们说成是神经症造成的变幻无常、神秘莫测的产物。但是有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值得重视。促使症状形成的往往并不只是一种体验；恰恰相反，这种结果通常是由几种创伤聚合所致，并常常是通过大量类似创伤的反复出现而导致的。因此，我们必须按照时间顺序，或者确切地说是相反的顺序，即从现在开始追溯过去来再现整个致病记忆的历程；要想跳过最后出现的创伤，以便更快地找出最早的、常常是最有说服力的创伤，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我已经给你们讲过的由于厌恶狗从玻璃杯里喝水而对水产生恐惧的例子，想必你们现在会要我多讲几个导致癔症发作的事例。不过如果我要按我的计划讲，就应该约束自己少举例子。例如，关于这位病人视功能障碍的问题，布洛伊尔描述了他和病人追溯到的这样一种情景："当她眼含泪水坐在父亲的床边，父亲忽然问她几点钟了。可她看不清楚，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把手表贴近她的眼睛。表盘现在看起来非常大，在她眼里，表盘大得不能再大了，她又一次强忍住泪水，以免病中的父亲看到。"② 而且，所有病症的表现都来自于她护理生病的父亲那段时

① 参见《癔症研究》，标准版，第2卷，第34页。

② 参见《癔症研究》，标准版，第2卷，第39～40页。



间。"一次她在半夜里醒来，心中非常焦急，因为病人正在发高烧。当时她正急切盼望着一位维也纳来的医生快来给她父亲做手术。她的母亲刚出门，安娜坐在床边，右手搭在椅子背上。她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恍惚看到一条黑色的蛇从墙角向病人爬去，要去咬他。（可能是房子后面的田地里确实有蛇，并且曾使这位姑娘受到过惊吓，因此这些都为她的幻觉提供了素材。）她试图把蛇赶跑，但是好像她的全身都麻木了。她搭在椅子背上的右手失去了知觉，像被麻醉了似的动弹不得。当她看自己的手时，发现手指都已变成了长着死人脑袋（指甲）的小蛇。（看来很可能是她想用麻痹的右手去赶走那条蛇，而它的麻痹就与关于蛇的幻觉联系起来了。）当蛇消失后，她在惊恐中想要祷告，却发现语言难住了她。她找不到自己能说的语言了，直到最后她想到了几句英语童谣，然后她发现自己只能用这门语言来思考和祷告了。"① 当病人在催眠状态下回忆起这一情境时，曾经在患病一开始就严重折磨她的右手臂麻痹一下子就消失了，治疗宣告结束。

当几年之后我开始在自己的病人身上运用布洛伊尔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时，我的经验与他的完全一致。一位四十多岁的小姐患有抽搐症，当她每次激动的时候，甚至有时并没有明显的原因，嘴里就会发出一种奇特的"喀喀咔咔"声。这种病症来源于她的两次经历，两次的共同之处都在于，每次当她决定不发出任何声音时，事实上都有一种反意志（counter-will）驱使她以同样的声音打破了沉默。这两次经历中的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她的一个孩子病了。当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最终哄她的孩子入睡后，她对自己说一定要保持安静，不要惊醒孩子。另一次，当她在一个雷雨天带着两个孩子驾车出门时，马惊了，她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害怕加重马的惊慌②。我这里所讲的只是《癔症研究》中记录的几个例子之一。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允许我简要概括一下的话——在如此简略的叙述中这是必不可少的——我想把我们迄今所学到的归纳为：我们的癔症患者受到来自记忆的折磨。他们的症状是特定的（创伤性的）体验的残留和记忆的象征。如果我们把这种象征同其它领域的一些象征做一下比较，那么我们就能获得一种对这类象征的深入理解。大城市中所装饰的那些纪念碑和纪念馆也是记忆的象征。如果你到伦敦的大街上散步，你会发现在一个大火车站前面矗立着一根雕刻精美的哥特式圆柱——查灵十字架（Charing Cross）。13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的一位国王命令将他心爱的埃莉诺王后的遗体运往威斯敏斯特，并在王后灵柩停留的每一站

① 参见《癔症研究》，标准版，第2卷，第38～39页。

② 参见《癔症研究》，标准版，第2卷，第54、58页。

都立起一个哥特式十字架。查灵十字架是这些纪念送葬仪式的纪念碑中最后的一座[①]。在伦敦的另一个地方，离伦敦桥不远，你会看到一根高耸入云的、更为现代的大圆柱，它只是被简单地称为“纪念碑”。它是为了纪念1666年在此燃起并烧毁了大半个伦敦的那场大火而设计的。因此，作为记忆的象征，这些纪念碑同癔症的症状是相似的，在这一点上，这种比较看起来是合理的。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位伦敦人会在埃莉诺王后的葬礼纪念碑前停下来深切哀悼，而不是按现代工作条件的要求忙于自己的事务，也不是因心中想象的那个年轻貌美的王后而感到愉悦，我们会作何感想呢？再者说，如果一位伦敦人站在为了纪念被大火化为灰烬的心爱的城市而建立的那座纪念碑前黯然泪下，全然不顾现在的都市远比当初绚丽辉煌，我们又会作何感想呢？可是，每个癔病或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就像这两个不现实的伦敦人一样。他们不但能回忆起久远的痛苦经历，而且在感情上对它们依依不舍。他们无法从往事中摆脱出来，但却由于这些往事而忽略了真实的目前的生活。这种精神生活中对于致病的创伤的“固恋”（fixaton）便是神经症最为重要、最有现实意义的特征之一。

我觉得此时基于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史，你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异议，这是合乎情理的，我随时准备洗耳恭听。确实，病人所有的创伤都来自于她护理生病的父亲这段时间，而且她的病症只能被看成是她父亲的疾病和死亡所引起的记忆符号。因而它们相似于哀悼的表现，在一个人死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对死者的固着性记忆当然不能算是病态的。相反，这是一种正常的情感过程。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从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历来看，她对于创伤的固恋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但是在其他病历中——正如我所治疗的抽搐症病例，其致病原因可以追溯到15年和10年以上——一种对过去经历的不正常的依恋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看起来如果布洛伊尔的病人在经历创伤和症状发作之后没有及时接受宣泄治疗的话，她也会出现类似的异常特征。

至此，我们只是讨论了癔症症状与病人生活事件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布洛伊尔的观察中，还有另外两个因素，能使我们就患病过程和治疗过程形成某种看法。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布洛伊尔的病人在几乎所有的病态场合，都不得不压制一种强烈的情感，而不是让这种情感以适当的情感表现形式——如语言或行动

释放出来。在关于她的女佣人的狗和那段情景中，考虑到女佣人的感情，她压制了内心非常厌恶的情感，而完全没有外露。当她守护在父亲的床前，她始终注意不让生病的父亲看出她的焦虑和痛苦的抑郁。后来当她在医生面前重复这些

① 或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那种纪念碑的现代复制品。据厄内斯特·琼斯博士告诉我，“Charing”一词源于法文“chère reine”（心爱的王后）。



情景的时候，当时被抑制的情感就像被贮存了好长时间似的，极其强烈地迸发出来。事实上，这些情景所遗留下来的症状，当接近其决定性病因的时候，就会达到最强烈的程度。只有当这一病因被充分地展示出来时，症状才会消失。另一方面，如果出于某种原因病人在回忆这些情景时没有触及到任何情感，那么这种在医生面前的回忆就不会产生效果。因此情感就是这样的，它可以被看做是可替代的能量，成为致病和治疗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不得不这样假设，疾病发作的原因是病态中所表现出的情感的正常出口被堵住了。疾病的本质就在于这些"被窒息的"情感继而发生了一种变态的作用。它们一部分保留下来成为病人心理生活的永久的负担和产生持续性兴奋的源泉；另一部分则经历了向非正常的体内的神经分布和神经压抑的转化，成为疾病的生理症状。为后一种过程，我们创造了一个术语"癔症性转换"（hysterical conversion）。与此相区别的是，我们心理兴奋中的某部分正常地沿着神经分布的道路前进，就会产生我们平时所说的"情绪表达"。癔症性转换夸大了充满感情的心理过程中的宣泄阶段，它们代表了一种更强烈的情绪表达方式，并进入了一种新的途径。当河床被分成两个水渠时，如果其中的一条渠的水流遇到了阻碍，另一条就会立即溢出水来。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把情感过程优先考虑，我们就获得了一套关于癔症的纯粹的心理学理论。

布洛伊尔的第二个观察，再次迫使我们在一系列致病事件的特征中，要高度重视各种意识状态。布洛伊尔的病人处在正常的意识状态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些心理异常：失神状态、精神错乱和性格改变。在正常意识状态下，她对那些致病情景及其与症状的联系一无所知。她忘掉了这些情景，或彻底切断了这些事件的致病环节。当病人处于催眠状态时，付出可观的努力，就有可能回忆起这些情景，通过这种回忆工作，症状就消除了。要不是在催眠状态的体验和实验中找到了这种方法，对这种事实进行解释将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对催眠现象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在同一个人身上可能有几种心理集合体，它们可能或多或少地彼此保持独立，也可能彼此"一无所知"，还可能在所控制的意识状态下相互转化。这些起初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现在已使我们感到司空见惯了。以上这一类现象有时会自发出现，便是被称为"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ence）的例子①。如果发生这样的人格分裂，意识有规律地依附于两种心理状态中的一种，我们称之为有意识的心理状态；而另一种脱离这种心理状态的意识称为潜意识的心理状态。在一种类似的"后催眠暗示"（post-hypnotic suggestion）情况下，一个在催眠状态下发出的指令会在后来正常状态中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个现象为了解潜意识状态对意识状态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例子，也为我们提供了阐释癔症现象的模式。布洛伊尔提出了一个假设：癔症症状产生于他称之为"类催眠"（hypnoid）的特定

① 法文为"dual consiousness"。

心理状态。根据这种观点，在类催眠状态下产生的兴奋很容易成为病因，因为这种状态不为兴奋过程的正常发泄提供机会。这种兴奋过程进而就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产物　　症状。症状像异质体一样进入了正常状态，转而就对类催眠的致病情境一无所知了。哪里有症状，哪里就有遗忘（amnesia）——一种记忆缺口，填补这一缺口就意味着消除了症状产生的那些条件。

恐怕我叙述的最后一部分使你们觉得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你们应该记住，我们讲的这些既新颖又有难度，把它们讲清楚也许是不可能的——这说明掌握有关这一课题的知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且，布洛伊尔的“类催眠状态”理论已经表现出没有必要，甚至成为一种障碍，它已被今天的精神分析所抛弃。以后，你们至少会对布洛伊尔竖起的这道类催眠状态的屏幕后面所发现的影响和过程有所了解。你们还会形成一种正确的看法，即认为布洛伊尔研究的成功之处只在于为他所观察到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很不完全的理论和一种并不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完整的理论不会是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有人在其观察一开始就给你们提供了一套无懈可击的完整的理论，你们可能就更有理由怀疑了。这样的理论只能是他推测的产物，而不可能是对事实进行无偏见考察的成果。



第 2 讲

女士们，先生们：

大约在布洛伊尔对其病人使用“谈疗法”的同时，巴黎的杰出人物沙可（J. M. Charcot）也在萨尔拜特利尔医院开始了对癔症患者的研究，他的研究导致了对这种疾病的新的理解。当时，他的发现在维也纳是不为人所知的。但是10年后，当布洛伊尔和我合作发表关于癔症现象心理机制的《绪言》（1893a）时，我们已经完全被沙可的研究迷住了。我们把病人的致病经历看做是心理创伤（psychical traumas），并把它与躯体创伤（somatic traumas）等量齐观，而躯体创伤对癔症性麻痹（hysterical paralyses）的影响是在沙可那里得到最早论证的。沙可在催眠状态下人为地再现了癔症性麻痹，布洛伊尔关于类催眠状态的假说只不过是这种事实的反映而已。

我在1885～1886年曾做过这位伟大的法国实验家的学生，他本人不倾向采用心理学的观点。是他的学生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首次尝试对癔症中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心理过程进行深人的研究。我们把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作为我们的立足点是学自让内。你们会发现在让内癔症理论中，当时在法国盛行的遗传（heredity）与退化（degeneracy）观点占有重要位置。据他所言，癔症是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形式，本身表现为心理综合能力的先天薄弱。他相信，癔症患者在把复杂的心理活动统合为一个统一体方面是先天无能的，因此才表现出精神分裂倾向。请允许我打一个平常而明了的比方，让内的病人使我们想到一位体虚的女子，她出门去逛商店，回来时大包小裹的；可是她的两只胳膊和十只手指却拿不了这么多东西。所以，一开始是一样东西从她的怀里滑落了，当她弯腰去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另一样东西又掉了，如此反复不已。这种分裂现象不能完全证实患者心理能力的削弱，因为当我们发现患者综合统一能力不足这一现象的同时，也观察到了其效能部分增加的例子，好像是一种补偿方式。当布洛伊尔的病人忘记了她的母语和其他语言，而只记得英语时，她对英语的掌握程度竟然如此之高，以致于



给她一本德语书，她就能正确而流利地直接读出它的英语译文。

当我后来以自己的力量继续开展布洛伊尔所开创的研究工作时，我很快就对癔症性分裂（意识分裂）的根源有了另外的想法。这种分歧对其后的一切研究都具有决定意义，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不像让内那样从实验室里的实验出发，而是从我心中的治疗目的出发的。

我首先是从实际需要中获取前进的动力的。布洛伊尔所采用的宣泄法（cathartic procedure），首先必须使患者进入深度的催眠状态，因为只有在催眠状态下，患者才能触及到他在正常状态下所遗忘的那些病因性关系。但是我很快就开始不喜欢催眠术了，因为它是一个变化无常、甚至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盟友。当我发现不论我怎么努力都只能使一小部分患者进入催眠状态时，我决定放弃催眠术，让宣泄法从它里面独立出来。既然我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改变我的多数患者的心理状态，我就开始研究正常状态患者。我必须承认，在最初，这看起来像一种既无意义又无希望的工作。我的任务是从患者那里了解对我来说连患者都一无所知的东西。一个人怎能期望了解到这些东西呢？这时对一项既出色又有指导意义的实验的回忆给了我很大启迪，那是当我和伯恩海姆（Bernheim）在南锡一起工作时（1889 年）亲眼目睹的。伯恩海姆告诉我们：那些被他带入催眠的梦游状态并在其间体验到了各种经历的人，只是看上去似乎对梦游状态下的经历丧失了记忆。但这些记忆却有可能在他们正常的状态下得到恢复。确实，当他问及患者那些梦游经验时，他们开始坚持说对此一无所知；但他拒绝让步，坚持追问，并使患者确信他们肯定知道，那些被遗忘的经历总能再现出来。

于是，我对我的病人也如法炮制。当我问到他们坚持说再也想不起更多的时候，我就明确指出他们对此肯定是知道的，只要说出来就行了。我甚至大胆宣称，只要我把手一放到他们的额头上，那些正确的回忆就会涌现出来。用这种方式，无须催眠，我就成功地从病人那里得到了我所需要的那些证据，以建立病人所遗忘的情景与这些情景所遗留的症状之间的联系。但这是一项费力的方法，时间长了会使人精疲力竭，不适合充当永久性的技术。

然而，在我用这种方法获得决定性的证据之前，我一直没有放弃它。我发现能证实如下事实：被遗忘的记忆并没有真正丧失，它们依然属于患者，并随时会在联想到那些还被记得的事情时再显露出来。但是，确实有一种力量在阻止它们进入意识，而迫使它们处于潜意识状态。这种力量的存在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当你试图把病人的潜意识记忆引入到他的意识中时，你会觉察到一种与此相关的力量在对抗它。这种保持致病条件的力量在病人方面是以抵抗（resistance）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正是基于抵抗的观念，我才建立了自己对癔症中心理事件的历程的看法。要取得治疗效果，事实证明消除抵抗是必要的。从治疗的机制出发，也就有可能对



疾病的起源形成相当明确的看法。现在以抵抗的形式出现，阻止被遗忘的材料进入意识的那些力量，想必当初就曾导致了遗忘并把那些致病的经验排除在意识之外。我把这个假设的过程称为“压抑”（repression），我认为抵抗的不可否认的存在证明了这一点。

下一步我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如这些力量是什么？在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癔症的致病机制中的压抑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在宣泄法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病因性情景，对此进行比较性研究就有可能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所有这些经验都与一种愿望冲动的出现有关，这种愿望冲动与患者的其他愿望形成鲜明的对照，并被证明与其人格中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格格不入。它们发生过短暂的冲突，这种内在冲突的结果是，把这种不可调和的愿望输入到意识中的念头成了压抑的牺牲品，并把与此相关的记忆一起排除在意识之外，且从此被遗忘了。因此，与患者的自我不相容的愿望是压抑的动机；患者的伦理标准和其他标准是压抑的力量。接受这种不相容的愿望冲动或者延长这种冲动都会产生严重的不快，这种不快可以通过压抑的方式加以避免。因此，可以把压抑看成是保护心理人格的手段之一。

我不想举出很多的例子，只引用一个我本人诊治的病例，从中可以充分地证明压抑的决定性因素及其长处。针对当前的情况，我还要缩简其病史并省略一些重要的背景材料。我的病人是一个女孩①，在她参与了护理之后，失去了敬爱的父亲——这与布洛伊尔的病人的情况很类似。在此后不久，她的姐姐结婚了，她的新姐夫唤起了她心中一种特殊的同情感，这种情感很容易在家庭亲情的幌子下被掩盖起来。又过了不久，她的姐姐生病去世了，当时病人和她的母亲都不在场。当她们被匆匆召来的时候，并不知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这位姑娘赶到她死去的姐姐床前，有一个念头在她脑海中瞬间闪过，大概可以用文字表达成：“现在他自由了，可以娶我了。”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念头把她自己不曾意识到的对其姐夫的深深的爱恋在其意识中暴露出来；但随后就被压抑了，这是因为出于感情上的反抗。这位姑娘出现了严重的癔症症状，当她接受我的治疗时，表现出完全忘记了在她姐姐床前的那一幕，以及曾在她脑海中出现的那种可憎的自私的冲动。在治疗过程中，她又都回忆起来了，并伴随着极其强烈的情感重现了那一致病的情景。治疗的结果是，她又恢复了健康。

也许我们可以从当前的实际情景中举一个粗略的比喻，来就压抑及其与抵抗的必然联系向你们提供一幅更加生动的图画。我们假设，在这个讲堂里，在这些听众中间，他们的安静和专心令我不胜感激；但是却有一个人在制造混乱，他的无礼笑声、吱吱喳喳的说话声、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的声音干扰了我对所讲问题

---

① 这是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病例，是《癔症研究》中详尽描述的第五个病例。

的注意，我不得不声明我无法继续讲演了。这时，你们当中有三四个身强力壮的人站起来，经过一场短暂的争斗，把这个扰乱者赶到了门外。于是他就被“压抑”了，我也能够继续自己的讲演了。为了防止干扰再次发生，为了防止被推出讲堂的人再次冲进来，那几位用行动实现我的意愿的先生用他们的椅子顶住了门，因而他们就在完成“压抑”之后又建立起了“抵抗”。现在如果你把门里和门外两个场所释译成精神分析术语“意识”和“潜意识”，在你的面前就呈现出一幅关于压抑过程的恰到好处的图景。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观点与让内的观点有何不同之处。我们并不认为精神分裂是由心理器官某一部分缺乏综合能力所造成的。我们从动力学角度来解释，即依据对立的心理力量的冲突来解决，把它看成是两个对抗的心理集合体积极斗争的结果，但是我们的观点又会引发大量的新问题。心理冲突的情境当然是相当普遍的；那种自我努力回避痛苦回忆而没有造成精神分裂结果的现象也是相当常见的。我们必定会认为，如果这种冲突最终导致了分裂，那么一定会有更深一层的决定因素存在。而且我也愿意向你们承认，压抑的假设并不是使我们面临着一种心理学理论的终结，而是面临着它的开端，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探索，要获得全面的知识还必须等待进一步、更深人的研究成果。

试图用压抑的观点来解释布洛伊尔病人的病例是不可取的。那一病史与这一目标是不适合的，因为它的发现都是靠催眠作用的帮助达到的。只有你排除了催眠的影响，你才能看到“抵抗”和“压抑”，才能对真正的致病事件的历程形成正确的看法。催眠掩盖了抵抗，并使得心灵的某一领域敞开，让人接近；但是，与此形成对立，催眠又在这一领域边界处，用抵抗筑起了一堵墙，使得墙后面的一切都变得难以接近。

我们从布洛伊尔的探索中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所证明的，在症状与病因性经验或心理创伤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但我们现在一定不要忘了用压抑理论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发现。一眼看上去，找到一条从压抑通向症状形成的道路确实好像是不可能的。我不想对此做复杂的理论阐述，倒愿意回到刚才用来解释压抑的那个比喻上去。你们不妨这样想，把捣乱者清除出去和在门口设置岗哨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也许那个被赶出去的人变得怒气冲天、不计后果，想给我们找更大的麻烦。确实，他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我们已经摆脱了他的存在，摆脱了他的无礼笑声和无聊评论。但是在某一方面来说，压抑并不成功。因为现在他在门外肆无忌惮起来，大喊大叫，用拳头砰砰地砸门，比刚才的无礼行为更严重地干扰了我的演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尊敬的校长斯坦利·霍尔博士愿意充当调解者与和事佬的话，我们一定会感到高兴。霍尔博士会去与门外那个不守规矩的人谈一谈，然后回来要我们无论如何还是应重新接纳那个人，他亲自担保那个人会表现好些。鉴于霍尔博士的威望，我们决定解除压抑，并再次获得了和



平安宁。对于描述心理医生在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神经症时所承担的任务来说，这个比喻提供了一幅不错的图景。

说得更直接些，对癔症患者和其他神经症的研究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未能成功地压抑那些不被容许的愿望所依附的观念。的确，他们已把它逐出了意识和记忆之外，并且明显地使自己免除了大量的痛苦。但是这种被压抑的愿望冲动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之中。它们正在窥视着被激活的机会，一有机会，那些被压抑的观念就会以一种经过伪装、难以辨认的替代形式成功地进入意识之中，而原来认为可以通过压抑免除的不愉快情绪现在又与这些替代物联系在一起。被压抑的观念的替代物——症状——能够防止来自于防御性自我的进一步攻击。取代过去的短暂冲突，现在出现了一种不随时间的流逝而自行消亡的病症。以症状中歪曲的临床表现为依据和线索，我们就能从中找到与最初被压抑的那些观念相类似的残迹。替代物发挥作用的途径可以从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寻到踪迹。为了达到治愈的效果，必须使症状沿着同样的途径回溯，使其重新变成那个被压抑的观念。如果被压抑的观念再次被带回到有意识的心理活动中——这一过程以克服大量的抵抗为前提——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病人竭力想避免的那种心理冲突会有一个较理想的结果，这会获得比压抑更好的结果。有很多这样适当的治疗方法，它们可以使心理冲突和神经症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病例中这些方法可以结合使用。我们使患者的人格相信拒绝接受致病的愿望是不对的，而且有可能引导他们全部或部分地接受这种愿望；或者也可能把这个愿望本身引向一个更高的、不会招致反对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升华”）；或者把对愿望的拒绝看做是正当的，但是那种自动的，因而也是无效的压抑机制，将在最高级心理功能的帮助下，被一种谴责判断所取代——这样就实现了对愿望的有意识的控制。

如果在现在被称之为“精神分析”治疗方法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我没能为你们做出清晰易懂的表述，请大家千万要原谅我。困难不只在于这一课题的新颖性。那些不可调和的愿望，尽管受到压抑，依然成功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它们有什么样性质？当压抑失败、替代或症状形成之前，必定会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那种主观的、构造上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将在以后做进一步的阐述。



第3讲

女士们，先生们：

不说错话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必须要说得简明扼要的时候。因此，今天我不得不纠正我在上一次演讲中说的一句错话。当时我说，在放弃了催眠术之后，我仍然坚持让我的病人把一切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的东西都告诉我，并且使他们相信，其实他们知道每一件表面上看起来被遗忘的事，在他们脑海中出现的观念[①]都确凿无疑地包含着我们正在寻找的内容。我接着告诉你们说，进入我病人头脑中的第一个观念确实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被证明是记忆中被遗忘部分的延续。但通常并非如此，我只是为了简捷起见才说得这么简单。实际上，只是在最初的几次，在我简单地坚持追问下，我想要的那些被遗忘的事得以揭示出来。当更深入应用这一方法时，不断涌现出来的观念不再是我想要的，因为它们不合适，连患者本人也觉得不对劲儿而摒弃了它们。在这一点上，坚持追问并不能给我更大的帮助，于是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后悔放弃催眠术了。

在不知所措之际，我固守着一个偏见。这种偏见的科学合理性几年后被我的朋友荣格及其在苏黎世的弟子们所证实了。我不得不说，有些时候抱有偏见是极其有用的。我很重视心理过程是被严格决定的这种观点，我觉得很难相信患者在注意力高度紧张时产生的观念具有随意性，而且与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观念毫无关系。两个观念并不同一的事实从事件的假定心理状态中可以得到满意的解释。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身上，总有两种力量在相互对抗：一方面，他的有意识努力把遗忘在潜意识中的观念带入意识中；另一方面，我们已知的那种“抵抗”正在竭力地阻止被压抑的观念或其衍生物进入意识。如果这种抵抗的力量很小或干脆就

---

① 此处的原德文词“Einfall”，经常被翻译成“联想”（association），但后者是个易引起争议的词，所以这里尽可能回避这个词，甚至不惜做出这么长的解释。当我们碰到“freier Einfall”，则无可避免地要译成“自由联想”（虽然仍会引起非议）。



没有，被遗忘的观念就可以不受歪曲地进入意识。因此，如果抵抗这种观念进入意识的阻力越大，其歪曲程度就越大，这种假设是有说服力的。因此这种观念就像一种症状一样在患者脑海中出现了，它替代了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种观念，它是被压抑的观念的替代物：新鲜，造作，稍纵即逝，并且在由于抵抗的影响所造成的歪曲程度上也是与被压抑的观念极不相似的。但是，由于它的性质就像一个症状，所以必然与我们所寻找的那个观念很相似。而且，如果抵抗不是太强大的话，我们应该能够从前者中猜到后者。在患者头脑中出现的观念必定具有成为被压抑因素的某种隐喻（allusion）的性质，就像用间接的语言对其做出表述一样。

在正常的心理生活领域，我们知道好多这样的例子，其中那些与我们假设相类似的情形都产生了相似的效果。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诙谐。精神分析的技术问题迫使我去研究开玩笑的技巧。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巧得很，这是一个英语的笑话。

这是一段轶闻[1]。有两位不很检点的商人在一连做了几笔风险很大的生意之后，成功地发了大财，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挤入上流社会。有一个办法令他们非常动心，使他们觉得有了成功的希望，那就是请城里最有名望、收费最高的画家为他们绘制头像，而这位画家的画是非常出名的。两幅昂贵的油画在一个大型晚会上首次露面了。两位主人亲自把本城最有影响的鉴赏家、艺术评论家领到并排挂着两幅画像的墙前。这位鉴赏家兼评论家对这两幅画仔细地研究了好长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好像漏看了什么东西似的，用手指着两幅画之间的空档轻声问道："可是耶稣基督在哪儿呢？"我看得出你们都觉得这个笑话很有趣。现在让我们接着分析一下。很明显，鉴赏家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一对无赖，就像耶稣基督受刑时，在他一左一右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两个盗贼一样。"但是他没有那么说。相反，他却说了一句乍听起来很奇怪不合时宜而又毫不相干的话。但是，我们稍后一想，就意识到这是他心中鄙视的一种隐喻，而且是一种绝妙的替代。我们不能指望从诙谐中找到患者头脑中出现的观念所具有的全部特征。但是我们必须重视诙谐的动机与这种观念中动机的一致性。为什么这位批评家没有对这两个无赖直截了当地说出心中的想法呢？因为他的心中还有一种"反动机"（counter-motives）在抑制着他想把这些话当面说出来的欲望。耻笑招待你的主人，而且他们随时都可以召来一批挥舞拳头的打手，这自然是很冒险的事。很容易就会遇到和我上次讲演中用来解释压抑的那个捣乱者一样的下场。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批评家没有直接表达他心中的想法，而是以"伴以省略的隐喻"的方式来表达的原因。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的患者创造出一个或多或少被歪曲的替代物，来取代我们

[1] 见《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二章第二节，那里对这段趣闻有更详尽的论述，而且恰好这是一个美国式的诙谐。



正在寻找的那个被遗忘的观念。

女士们，先生们，像苏黎世学派（布洛伊勒、荣格等）那样，把充满情感的一组相互依赖的观念性因素描述成“情结”，的确很方便。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如果我们从患者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后一件事入手，来寻找那个被压抑的情结，只要患者能为我们提供足够多的自由联想的材料，我们就完全有希望发现那个情结。相应地，我们允许患者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并坚信我们的假设，即只有那些与我们寻找的情结有着间接依存关系的观念才有可能进入患者的头脑。如果这种发现被压抑观念的方法并不令你们信服，我至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惟一可实践的方法。

当我们把这个方法付诸实践的时候，又受到了另一种干扰。因为患者时断时续，甚至会停下来，声称自己想不起来什么可说的了，而且脑海中也不再有什么念头出现了。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患者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们的方法将再次被证明是无效的。但是进一步的观察表明，这种意识流的中断事实上永远不会发生。这种似乎发生的思维停顿只是因为患者受伪装的抵抗（即抵抗伪装成患者头脑中观念价值的各种批判性评断）影响而阻止或摆脱那些已经意识到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事先提醒患者或要求患者不去注意这种批评来防止这种情况在患者身上发生。我们告诉他，他必须完全抛弃这种批评性的选择行为，把进入大脑的念头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即使他认为不正确、没关系和无意义的观念也要如此，特别是他发现进入头脑中的念头使他自己觉得难以接受也要说出来。如果这条要求得以贯彻实行，我们就能获得想要的材料，那就能指引我们找到被压抑的情结。

如果患者不听医生的话而是受到抵抗的影响，这种联想的材料就会被患者轻蔑地抛弃。而对于精神分析医生来说，它们就像是矿石，只须借助简单的解释，就有可能从这些内容中提炼出贵重的金属。如果你急于想对患者被压抑的情结有一个迅速而暂时的了解，而不想探索其前后的序列和相互联系，那么你可以采用“联想实验”（association experiment）的测验方法，这种方法是由荣格（1906）及其弟子发明的。这种方法提供给精神分析医生的就是定性分析提供给化学家的那种东西。在对神经症患者进行治疗时，也可以不用这种方法。但是在对情结的客观显示和心理变态的测验中，这种方法则是必不可少的。苏黎世学派在这一方面成就非凡。

研究那些遵从精神分析的主要规则而出现在患者头脑中的观念并不是我们发现潜意识的惟一技术方法，同样的目标也可以通过另外两种方法达到，那就是：对患者梦的解释和对失误和偶然行为的探究。

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承认，我曾犹豫了很长时间，与其就整个精神分析领域的概观泛泛而谈，倒不如详细地给你们讲一讲梦的解释。但我被一个纯粹主观上的、看起来次要的动机所阻止了。在我看来，在一个致力于追求实际目标的



国度里，以“释梦者”的身份出现会很丢面子，尤其在你们还没有了解到这种古老而又倍受讥讽的艺术的重要性之前更是如此。事实上，对梦的解释是了解潜意识的康庄大道①。这也是精神分析学的最坚实的基础，这一领域中的每个人都应有此信仰并受训练。如果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精神分析学家，我就会回答：“去研究自己的梦。”每个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不是对《释梦》置之不理，就是以一种肤浅的拒绝态度来避开其内容，这就是他所谓良好的鉴别力。相反地，如果你能接受解决梦的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方法，那么，精神分析学在你面临新奇的问题时就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困难。

你们必须牢记，我们夜间所做的梦，一方面，与精神错乱时的创造有着外在相似性和内在亲缘性；另一方面，又与我们清醒状态下完全健康的情景相一致。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那些以惊讶而不是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正常的”幻觉、妄想和性格改变的人并不比外行强多少，他们在理解病态心理状态的异常结构方面所知甚少。你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几乎所有的精神科医生都看成是外行。

现在我请你们随我到梦的王国中做一次短暂的旅行。当我们清醒时，我们总是习惯于轻视自己的梦，正如患者轻视精神分析医生要求他们所做的联想一样。我们照例迅速而彻底地忘掉了我们的梦，因而也就错过了它们。我们对梦的轻视，是基于那些梦即使不是混乱迷惑或毫无意义，它们的特性也是稀奇古怪，而另一些梦则显然荒谬绝伦、不合情理。我们对梦的摒弃与某些梦中公开展示无所顾忌的羞耻场面及不道德场面的倾向有关。众所周知，古人并不是这么轻视梦的。我们当今社会中较低阶层的人也不怀疑梦的价值，像古人一样，他们期望梦能预示未来。我承认，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填补我们今天知识上的空白而去做一些神秘假设；相应地，我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梦的预测性质。关于梦，还有许多同样引人入胜的其他问题值得讨论。

首先，并非所有的梦都与做梦的人无关、不可理解而且荒谬不堪。如果你考察一下从 18 个月开始的幼儿的梦，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梦极其简单而且容易理解。小孩子总是梦见前一天在心中激起的、但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在梦中得到了实现。要发现这一简单的结论无须任何解释技术，你需要做的只是调查孩子在做梦前一天［梦日（dream-day）］的经历。当然，对梦之谜的最令人满意的解答不外乎发现成人的梦与孩子的一样，都是在梦想日激起的愿望冲动的实现。事实上确实如此，只要对梦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寻找这个谜底的道路上的困难就会逐步得到解决。

最早也是最严厉的批评认为，成人的梦的内容通常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能

① 这句话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被引入《释梦》第 2 版（1909）中。标准版，第 5 卷，第 608 页。



被看做是愿望的实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梦已经受到了歪曲，梦背后的心理过程用语言表达出来时已经和原来大为不同了。你必须区分开梦的外显内容——即你在早晨模模糊糊地回忆出来并费力地（而且似乎是臆断地）用语言装扮起来的那些内容——和隐梦的思想——即我们必须假设存在于潜意识中的内容。梦的歪曲过程与我们探索癔症症状构成时所知的过程是一样的。它也表明，在梦的形成和症状形成的运作中有着同样的心理力量的相互作用。梦的外显内容是潜意识中梦念歪曲了的替代物，这种歪曲是自我防御力量的作用，即抵抗力量的作用。在清醒的状态下，这些抵抗一起阻止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愿望进入意识中；在轻度睡眠状态抵抗虽有所减弱，但至少还有足够的力量迫使这些愿望戴上伪装的面具。于是，做梦的人就无法理解梦的意义，正如癔症患者不能理解其症状的联系及意义一样。

如果你采用与精神分析技术同样的方法来对梦做一番分析的话，你就会相信，确如我所说的那样，存在着隐梦思想这种东西，而且它与梦的外显内容之间确实存在着关系。你完全可以不考虑显梦中诸因素之间的表面联系，只要根据精神分析的原则进行自由联想，并把进入你头脑中的每一个独立的观念联结起来。从这些材料中，你就可以获得隐梦思想，正如你可以从患者对症状和过去经历的联想中找到其隐藏的情结一样。这样以这种方式获得的隐梦思想很快就会让你看到，我们把成人的梦回溯到儿童的梦是完全合理的。梦的真实含义已经代替了它的外显内容，而且清晰可辨。它的出发点是前一天的经历，并被证实是未被满足的愿望的实现。当你醒来时，根据记忆所了解到的是显梦，它只能被看做是被压抑的愿望的伪装的满足。

你们还可以通过一种综合工作来了解潜意识中梦的思想被歪曲成梦的外显内容的过程。我们称这个过程为“梦的工作”。它值得我们在理论上给予最密切的关注，因为我们能够从中探究在潜意识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像意识和潜意识这样两个彼此分离的心理系统之间，发生了什么无法预料的心理活动，而这在其他过程中是无法探究的。在这些新发现的心理活动中，凝缩和移置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梦的工作是两个不同的心理集合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情况——也就是精神分裂所造成的后果；它看起来在本质上与歪曲过程是相一致的，这种歪曲过程把被压抑的情结转变为症状，症状是压抑失败的表现。

在对梦的分析中（尤其是对自己的梦的分析），你们还会惊奇地发现，早期的童年印象和经历在人的发展中起着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在成人身上可以追溯到童年梦中经历的存在，而且它们还保持着原有的特性和愿望冲动，尽管这些特性和冲动在后来的生活中已失去了作用。许多发展、压抑、升华和反向形成会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降临到你的身上，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有着不同天赋的儿童就长成了我们所说的正常人，成为历尽苦难才获得的文明的承担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成为文明的牺牲者。

我还想请你们注意，梦的分析向我们表明，潜意识利用一种特殊的象征，尤其用来代表与性有关的情结。这种象征一方面因人而异，另一方面却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出现，这种典型象征与我们所假设的，作为神话与童话基础的那种象征是相一致的。看起来在梦的帮助下，对这种民间流传的心灵的创造做出解释也并非不可能的。

最后，我必须提醒你们，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焦虑梦的出现与梦是愿望满足的观点相矛盾。你们不要为这种观点所吓退。事实上，这些焦虑梦和其他梦一样，在我们对其做出评价之前，首先要解释它们。除此之外值得强调的是，焦虑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无须对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有更多的了解，就认定它们简单地依赖于梦的内容。焦虑是自我在否认强大的被压抑愿望时的一种反应；如果梦的形成是因为过于关注被压抑愿望的满足，那么焦虑梦的发生就很容易解释了。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对梦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多方面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通过其他途径难以获得的。这一点证明了梦的研究对其本身颇有价值。而我们是想把梦的研究与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治疗联系起来。从我所讲过的内容中，你们可能不难理解，如果病人的抵抗不给释梦带来很大的困难的话，释梦将怎样地使我们得以了解患者被隐藏、被压抑的愿望和由这些愿望培育出的情结。现在我可以讲第三组心理现象了，对它们的研究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技术手段之一。

我们要讨论的现象就是无论在正常人还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都会出现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过失。例如忘掉一些他可能知道或事实上确实知道的事（如偶尔想不起熟人的名字），谈话中出现口误，这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屡见不鲜的，类似的还有笔误和误读，做事笨手笨脚，丢失或打破东西等。所有这些行为都被看成是很平常的事，人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决定因素在里面，只是不加挑剔地将其看成是由分心或一时疏忽或其它类似原因所造成的结果。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人们根本不加注意就做出的行为和动作，更不用说从心理角度去重视它们了。这些行为包括：摆弄东西，哼小调，触摸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或衣服，等等①。这些区区小事，像失误行为和症状行为或偶然活动一样，并不像人们通常所默认的那样无足轻重。它们总是有某种意义的，通常可以从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中得到轻易和明确的解释。这再一次向我们揭示出，这些小事儿也同样表达了那些被赶回或藏匿于潜意识中的冲动和意向；或者说，这些小事儿事实上来源于同样的被压抑的愿望冲动和情结，我们已经知道它们是症状的创造者和梦的建构者。因此可以把这些小事儿与症状等量齐观，如果认真地考察一下，这些小事儿就能像梦一样揭示心灵中隐秘的部分。一个人的最秘密的隐私往往借助于它们表露出来。如果它们

① 参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



在压抑其潜意识冲动很成功的健康人身上也特别容易、而且经常地出现，那主要是因为它们显得微不足道且毫不引人注意。但是，因为它们证明了即使在健康人身上压抑和替代的形成也会发生，所以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精神分析者的显著标志在于他们严格相信心理生活的决定性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无足轻重的、随意的和偶然的。他们期望在每一件通常看来毫无动机的事件中找到充足的动机。确实，他们准备从一个心理活动中找出几个动机，而当同一个心理活动发生时，我们对因果关系的内在渴求仅仅满足于找到单一的心理起因。

现在，如果你们把我们已有的用来揭示心灵中被隐藏、被遗忘、被压抑部分的各种手段。(对患者在自由联想中所想到的观念的研究，对患者的梦的研究，和对他们的过失行为和症状行为的研究）都结合到一起；如果再加上精神分析治疗中对其他现象的探索（就这一方面我将在以后论述“移情”(transference) 时有所涉及)；如果你们把所有这些都铭记心中，你就会和我一样得出以下结论：我们的治疗技术很有效，足以完成任务，即把致病的心理材料带人意识中，进而消除由替代症状的形成所带来的烦恼。如果在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加深和扩展了我们对人类健康和病态心理的了解，那当然只能被看做是我们工作中一件特殊的且令人可喜的“副产品”。

你们可能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要掌握我所介绍的这门技术特别困难。而我认为，这门技术的难易完全取决于它所要处理的材料。但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这门技术不是无师自通的，必须要像学习人体组织学或外科学专业技术知识那样来学习它。听到下面的情况你们可能会感到很惊讶，在欧洲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对精神分析大加评论，而这些人对这门技术一无所知，也不会应用。他们还带着讥笑的表情来追问我们如何向他们证明我们发现的正确性。在这些反对者当中，有些人无疑是相信科学思维模式的。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得到肉眼观察的证实就轻易否定对解剖标本的显微镜观察，但他们要借助显微镜对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然而，提到精神分析，要想得到这种确认的希望其实很渺茫。精神分析寻求使心理生活中被压抑的东西能在意识中获得确认，而每一个对此做出判断的人本身也是人类中的一员，也有类似的压抑，而且或许正在竭力地维持着这些压抑。因此他们会像我们的病人一样产生同样的抵抗，这种抵抗很容易把自己伪装成理智的拒绝，并提出辩驳，而这种辩驳在患者身上可以利用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加以避免。正如在我们的患者身上所发现的一样，我们在反对者身上也认识到，他们的判断力会明显受到一种被削弱的感觉的影响。意识的高傲（例如以这种蔑视来抛弃梦境）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用它我们大家都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潜意识中情结的侵袭。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难以相信潜意识这一现实，难以使他们学会认识那些与他们的意识相抵触的新东西的原因所在。

第4讲

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借助于我所介绍的这些技术方法，在神经症的致病情结和压抑的愿望冲动中我们都发现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发现了，精神分析的研究在回溯患者的症状时，总是遵循令人吃惊的规律，在病人的性生活印象中找到病因。它告诉我们这些致病的愿望冲动在本质上都是性本能的成分。它还迫使我们设想，在致病的诸因素之中，性障碍（erotic disturbances）是起着主导的作用，而且在男女两性中都是如此。

我意识到人们不愿意相信我的这种观点。甚至那些乐于追随我的进行心理学研究工作的人，也倾向于认为我过分强调了性因素所起的作用。他们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别的心理兴奋不会导致我所说的那种压抑和替代形成呢？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不会，我也不应该反对它们的这种行为。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它们不会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其量只是性因素运作中的辅助因素，而不能代替性因素。我绝不是一开始就在理论上形成了这一观点，在1895年我和布洛伊尔医生合作出版《癔症研究》时，我尚未采用这种观点。只有后来当我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我才转而相信这种观点。现在在座的听众中有几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弟子，他们和我一起来到沃斯特。问一问他们，你们就会知道他们在一开始也完全不相信我把性病因学（sexual aetiology）看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张，直到最后他们自己的分析经验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一观点。

患者的行为并不容易使我们相信这种观点的正确性。患者并不愿意向我们提供他们性生活的有关信息，他们总是尽可能地隐瞒这些情况。在性问题上，人们普遍是不坦率的。他们不会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性欲，而是为了掩饰它而披上一件用谎言编织成的厚厚的大衣，好像在性的世界里天气永远是那么寒冷。也不能说他们是错的。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里，阳光和微风对性行为来说是不合时



宜的。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向他人暴露自己的色情欲望。但是，当你的病人发现，在接受治疗中他们能对性问题坦然处之时，他们就会抛掉谎言的面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资格对这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做出判断。不幸的是，甚至医生在涉及到他们个人的性生活时，也并不比其他人表现得更出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无法摆脱统治着多数“文明人”的对性问题的一贯态度：既想好色，又装得正经。

下面让我接着讲我们的发现。在另一类病例中，用精神分析调查去回溯其症状起源时，确实只追溯到一般性的创伤经验，而不是性经验。但是另外一种条件使这种区别失去了意义。因为分析工作要想获得对病例的透彻理解和完全治愈的效果，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患者发病时所发生的事件上，而是必然要追溯到患者的青春期和幼儿期。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决定后来发病的印象和事件。只有童年期的经验才能解释其对后来的创伤的敏感性，也只有通过揭示这些几乎总是被遗忘的记忆踪迹并使它们成为有意识的，我们才能获得消除这些症状的力量。这里，我们得出与梦的研究中同样的结论：童年期的长存不灭的、被压抑的愿望冲动为症状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没有它们，对于后来的创伤的反应就会采取一种正常的方式。但是这些强有力的童年期愿望冲动都可以无一例外地被视为具有性的意味。

说到这里，我想我终于可以确信你们会为此感到惊讶：“那么，真有像幼儿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这样的东西吗?”你们会问：“难道童年期不是恰恰相反，是一个以缺乏性本能为标志的人生阶段吗?”不，先生们，性本能肯定不像《福音书》中魔鬼进入猪的躯体那样，在儿童发展到青春期才进入他们体内的。一个儿童在一出生时就有了性本能和性活动，他是和这些东西一起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它们是在经过许多阶段的重要发展历程后，才形成我们所谓的成人的正常性欲。在儿童身上观察到这些性活动的表现毫不困难，相反，要想观察它们并想解释得通，就需要有一定的技巧。

幸运的是，我现在有机会可以从你们中间找出一个证人来证实我的观点。我手头有一篇论文，是由桑福德·贝尔（Sanford Bell）医生所写的，发表于1902年的《美国心理学杂志》上。作者是克拉克大学的一名研究员，而我们此刻恰好聚集在这所大学的讲演厅里。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两性爱情初探》。它比我的《性学三论》（1905年）早三年问世，作者所说的恰好与我刚才跟你们讲的相吻合：“性爱情感（emotion of sex-love）……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在青春期首次出现的。”他这篇文章的写法在我们欧洲被称为“美国格调”，他收集了15年间的不少于2500个肯定性的观察实例，其中有800个是他自己的观察。这些恋爱的事例都是通过种种迹象表现出来的，就此他写道：“观察到上百名儿童情侣的表现，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把它们同性的根源联系起来。如果在这些观察上再加上人们的自述，这些人在童年期都经历过强烈的爱恋情感，而他们对童年期



的记忆又较为清晰，那么，即使最苛求的人也会满意的。”不过，最令你们当中不愿相信“幼儿性欲”的那些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些早早就产生恋情的儿童中有不少竟是3岁、4岁和5岁的幼儿。

如果你们对这位最亲密的邻居的观察比对我的观察更加信任的话，我并不会感到惊讶。我自己最近也相当幸运，根据对一位患有焦虑症的5岁男孩的分析，我比较完整地了解到了儿童性生活早期的躯体本能表现和精神产品——这项分析是由孩子自己的父亲采用正确的技术进行的[①]。而且我可以提醒你们，就在几小时前，就在这个大厅里，我的朋友卡尔·荣格博士向你们报告了一个对更小的女孩的观察，这个女孩有着与我的病人类似的沉积性病因（家中一个小弟弟的出生），这使我们可以确凿地推断这个病例中存在着几乎同样的肉欲冲动、愿望和情结。因此，我觉得有希望使你们相信乍看起来颇为奇怪的关于幼儿性欲的观点。而且我很愿意向你们介绍值得一提的苏黎世精神病专家尤·布洛伊勒医生的例子，他在几年前曾公开宣称他无法理解我的性欲理论，但后来他完全根据自己的观察证实了幼儿性欲的存在。

要解释为什么多数人（无论是医学研究者还是其他人）宁愿对儿童的性生活置若罔闻是很容易的。在为文明生活所受的教育压力下，他们忘记了自己幼年的性活动，而且也不愿意再回想那些被压抑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开始对自己童年的记忆进行自我分析、修正和解释，他们就会形成另一种信念。

那么，请抛开你的种种疑虑，和我一起从人生的最早阶段来思考一下幼儿性欲[②]。儿童的性本能是由一系列因素组成的，因此，也就可以将其分成来源各不相同的许多部分。最重要的是，它仍然独立于生殖功能，直到后来才开始承担这一职责。它这时的职责是获得各种不同的快感，因为这些快感相类似或有联系，所以把这些情感统归于性快感。儿童性快感的主要来源是对刺激特别敏感的身体某些部位所产生的适当兴奋。这些部位除了生殖器以外，还有口腔、肛门、尿道、皮肤和其他感官表层。既然幼儿性生活最初阶段是从自己的身体上获得满足的，不关注外部对象，因此我们称这一阶段为“自体性欲”（auto-erotism）阶段（这个词是从哈弗洛克·霭理士那里借用来的）。我们又把获得性快感的重要的身体部位称为“性感带”。幼儿吸吮拇指（或肉欲吸吮）就是从性感带获得自体性欲满足的良好的实例。第一个科学地观察到这一现象的人是布达佩斯的一位儿科专家林德纳（Lindner），他已经把这种现象正确地解释为性满足，并且透彻地描述了它向其更高级的性活动形式过渡的过程（1879年）。生命中这一阶段的另一种性满足是对性器官的手淫兴奋，它对一个人今后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许多

① 参见弗洛伊德的《对一个5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

② 参见《性学三论》（1905d）。



人无法彻底地克服它。除了这些及其他的自体性活动以外，我们还在非常小的孩子身上发现了把某个外人当成对象而产生性快感的那些本能性成分（或如我们所说的力比多）。这些本能是以主动和被动相对立的形式成对出现的。可以一提的，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造成痛苦的欲望（施虐狂）及其被动的对立面（受虐狂），还有主动的和被动的寻求欲；前者后来派生出好奇心，后者演化成艺术和戏剧表现的冲动。一个儿童的性活动的其他方面意味着做出了“对象选择”，即把某个外人当成这种活动的主要特征，这个人在第一次出现时的重要性来自于自我保存本能的考虑。但是在儿童的这个早期阶段，性别差异还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果你认为每一个儿童都有不同的同性恋现象，那并非是不公正的。在儿童的这种广泛、丰富而又分离的性生活中，每一种单独的本能都各自独立地获取自己的快感满足，而后来则会逐渐集中起来，形成两个主要发展方向，因此到青春期结束时，个人的最终的性特征通常就完全成型了。一方面，这些单独的本能从属于生殖器区的支配，因此整个的性生活开始服务于生殖，单独的本能满足的重要性只在于辅助和促进正当的性行为。另一方面，对象选择使自体性欲退居其后，因此在一个人的性生活中，性本能的所有成分都要寻求从其所爱的人身上获得满足。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原始的性成分都被允许参与性欲的最终确立。即使在青春期之前，一些本能的极有力的压抑就已经在教育的影响下发挥了作用，像羞耻、厌恶和道德这样的精神力量已经形成，它们像哨兵一样压抑着愿望。因此，当青春期的性要求达到高潮时，就会遇到水坝一样的反抗性和抵抗性的心理结构，它们使这股潮水流入所谓的正常渠道，令其无法再次唤醒那些被压抑的本能。特别是童年期的排泄冲动（coprophilic impulses）——也就是对排泄物的依恋欲望——总是受到最严格的压抑，对于儿童最初的对象选择所涉及的人物的固恋也同样是如此。

先生们，在普通病理学中有一定则，那就是每一个发展过程中都隐含有病态的倾向，因为这一过程有可能被抑制、被延迟、甚至可能半途而废。在性功能的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如此。它在每个人身上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使不陷入退化（involution）（如退行）的历程中，也会遗留下种种异常现象或导致以后发病的隐患。还可能会发生并非所有的本能成分都听凭生殖器官区支配的情况。以此种形式保持独立的本能会导致我们所说的性变态（perversion），而且它会用自己的性目标代替正常性目标。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自体性欲不能被完全克服的现象便屡屡发生，大量随之而来的紊乱现象证明了这一点。初始阶段把男女两性作为性对象具有同等价值，这种初始现象持续下去并将导致成年生活中的同性恋倾向，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就会深陷于单一的同性恋欲望中。这类紊乱现象代表了性功能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直接压抑，它们构成了性变态和那些并不罕见的在性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幼稚行为。



神经症的引发倾向可以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追溯到受到损害的性发展。神经症对于性变态就像被动对于主动的关系。出现在性变态中的本能成分可以在神经症中作为情结的载体和症状的建构者而被发现，只是在神经症中它们是在潜意识中运作的。因此，它们受到压抑作用，但在与压抑的抗争中，它们能坚持存留在潜意识之中。精神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些本能在很小的年龄阶段的过度强烈的表现会导致一种局部的固恋。这种固恋继而在性功能的结构中造成了一个薄弱点，如果在成熟以后，正常性功能的发展受到阻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压抑就会恰好在幼年固恋发生的地方被冲破。

但是你们可能会争辩说，所有这些都不是性欲。我所用的这个词的含义要比你们惯常理解的含义宽泛得多。如果在你们的定义内，我也乐于赞同你们的看法。但是问题是当你们把这个词的含义仅仅局限于生殖的范围内，它的含义是否太狭窄了呢？这意味着你们没有理解性变态，以及性变态、神经症与正常的性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且使自己无法在其真正意义上认识到儿童肉体和精神方面的性生活这些容易观察到的萌芽。但是，不论你们如何选择确定这个词的用法，你们必须牢记，精神分析是从完整的意义上，即出于对幼儿性欲的考虑而来理解性欲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儿童“性发展”的问题上来。因为我们一直给予性生活的肉体方面比精神方面更多的关注，所以就这个问题需要做一些补充说明。儿童最初的对象选择是源于对援助的需求，这种对象选择行为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研究。他最初的选择是直接指向照顾他的那些人，但很快就集中指向他的父母。正如我们对儿童的直接观察和后来对成人的分析考察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儿童与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并非丝毫不伴有性兴奋因素的。儿童把父母双方，尤其是其中一方，当成是自己性爱欲望（erotic wishes）的对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通常遵从来自父母的暗示，而父母的柔情常常带有明显的性活动特征，尽管这种性活动的目标受到了禁制。通常是父亲偏爱女儿，母亲偏爱儿子；而孩子对此做出的反映是：如果他是个儿子，就希望能取代父亲；如果她是个女儿，就希望能取代母亲。在这种亲子关系中，以及由此引发的兄妹关系中所激起的情感不仅是积极的和充满爱慕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和充满敌意的。由此而形成的情结注定在很早就受到了压抑，但它仍会在潜意识中继续产生很大而持久的影响。由此可以推断，这一情结及其衍生物构成了每一种神经症的“核心情结”（nuclear complex），估计它在心理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也是相当活跃的。关于杀父娶母的伊谛普斯王的神话几乎完完全全地表达了幼儿的愿望，这种愿望后来遭到“乱伦阻障”（barrier against incest）的反抗和排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同样植根于乱伦情结的土壤，只是披上了更巧妙的伪装而已。

当儿童仍然受到未被压抑的核心情结支配时，他的那种大有性意味的精神活动便开始了。他询问婴儿来自何处，根据他所看到的迹象，猜测到比成人想象的



真实情况还要多。他的这种探究的兴趣通常是由一个新生儿的降临给他带来的真正威胁而引发的，这个新生儿被他看成一个竞争对手。在受到其自身起作用的那部分本能的影响，他得出了一系列幼稚的性理论——如认为两性都有男性生殖器，或者认为婴儿是母亲吃饭时怀到腹中，在排便时生出来的；或者把性交看成是敌对的行为，看成一种暴力的征服。但是，由于他的性器官构造的不完善，以及他对女性性通道的隐秘性特征的知识匮乏，这位幼小的探索者一定会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幼稚的探究本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幼稚性理论，在决定儿童性格的形成和其后的任何神经症的内容方面都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儿童把他的父母当做自己第一个爱的对象，这是不可避免的和完全正常的。但是，他的力比多不会始终固着在这最初的对象上；以后，他只是把父母作为一个原型，并且当他们最后选择对象时机到来时，他会逐渐从父母身上转向旁人。因而，如果一个儿童的社会适应不会面临危险，那么儿童与其父母的这种分离就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事。当压抑在各种本能成分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或者后来当父母的影响有所松懈时——这些影响是压抑中能量消耗的根本原因——教育的任务就会遇到极大的难题，而在当前，这种难题总是不能以一种理解和不会引起反对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不要认为，这些关于儿童性生活和性心理发展的讨论使我们偏离了精神分析和治疗神经性疾病的主题。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把精神分析治疗看成是旨在消除这些童年残迹的教育工作的序幕。

第 5 讲



女士们，先生们：

随着对幼儿性欲的发现以及把神经症症状追溯到性本能的成分，我们就神经症的性质和目的方面得出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结论。我们发现，由于外部的障碍和内部的不适应，人们的性需要的满足在现实中受挫，因此就患病了。我们还发现人们继而遁入疾病，以便在疾病的帮助下得到一种满足，以取代那种受挫的满足。我们认识到，病理症状构成了患者性活动甚至整个性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发现从现实中退缩（withdrawal）回来既是患病的主要目的，也是疾病所造成的主要危害。我们推测患者对康复的抵抗绝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而是包含着好几种动机。不但患者的自我反对放弃压抑，因为自我是利用压抑才从其最初的心理倾向中提升出来，而且性本能也不愿放弃这种替代性的满足，因为不知道现实能否为它们提供更好的满足方式。

从不满意的现实逃向伴有生物性损伤的、我们所说的疾病状态（虽然疾病从来不会给患者带来即时的快感），这种逃遁发生于退化、退缩和返回性满足不受阻碍的初始阶段这一条道路。这种退缩表现出一种双重性：一是时序性退缩，即力比多或性需要返回到时间上更早的发展阶段；另一是形式性退缩，即在表现这些需要时运用原始的、最初的心理表达方式。但这两类退缩都是指向竞争的，而且在带来性生活的幼稚状态方面是统一的。

你对神经性疾患的病因挖掘得越深，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揭示了神经症与人类心灵中的其他产物，包括与那些最有价值的产物之间的关系。你可能会领悟到，我们人类有着高标准的文明，却又承担着内心压抑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我们普遍地发现现实并不令人满意，出于这个原因便热衷于一种幻想的生活，从中我们编织出种种愿望满足的情景来弥补现实中的缺憾。这些幻想中包含大量的构成一个人人格的真正要素和那些涉及现实而被压抑的冲动。有能力和有成就的人是那些能够凭自己的努力把愿望的幻想转变成现实的人。如果由于外部世界的



抵抗和个人自身的弱点而使这种努力遭到失败，他就开始逃离现实而退缩到那个更令其满意的幻想世界中，而幻想世界中的内容就会转化成其患病时的症状。如果在有利的条件下，他仍然可以找到一条从幻想返回现实的道路，而不是以倒退回幼儿期来永远与现实隔绝。假如一个与现实冲突的人拥有艺术天赋（对我们来说，这仍是个心理学的难解之谜）他就可以把他的幻想转化为艺术创造，而不是转化成症状。以这种方式，他就能逃脱神经症的厄运，而且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重新获得了与现实的联系（见兰克，1907）。如果对现实世界的抗争不断而又在可贵的艺术天赋方面匮乏或有缺陷，那么不可避免地，作为幻想源泉的力比多就会走上倒退的道路，重演幼儿时的愿望，并以神经症告终。寺院曾经是那些对生活感到失望、或觉得无力面对生活的人的避难所，而如今神经症已取代了寺院的位置。

现在让我讲一讲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探索所获得的主要发现。神经症患者并没什么与健康人不同的、独特的心理内容。或者，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导致神经症的那些情结也就是我们健康人与之斗争的那些情结。至于这场斗争是以健康告终，或以或神经症告终，还是以一种补偿性的成就优势告终，那就取决于定量(quantitative）的考虑，取决于相互冲突的力量的对比。

女士们，先生们，我还未来得及告诉你们证实我们关于神经症中性本能力量运作这一假说的最重要的观察。在对神经症患者的每一次精神分析治疗中，都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们称之为移情。也就是说，患者会直接对医生产生一定程度的柔情（不时混杂着敌意），这种情感并非建立在他们真实关系的基础上，正如它出现时的每个细节所表明的那样，它只能追溯到已成为潜意识的病人的那些过去幻想中的愿望。患者所无法回忆的一部分情感生活又在他与医生的关系中重新体验到了，而且也只有在移情中的这种重新体验才能使他相信潜意识性冲动的存在及其力量。借用化学上的比喻来说，他的症状就是在爱（用这个词的最广义的含义）的领域中早期经验的沉淀物，只有在移情体验的加温过程中，这种沉淀才会溶解并产生出其它的精神产品。在这类反应中，我可以从费伦茨（Ferenzci，1909）那里借用一个恰当的词，那就是医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他把这一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情感暂时吸引到自己身上。对移情的研究也能为你提供理解催眠暗示的钥匙，我们最初曾把催眠暗示（hypnotic suggestion）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来考察患者的潜意识。那时我们发现催眠术有辅助治疗的作用，但却妨碍科学地理解这些事实；因为它清除了某些领域的心理抵抗，并在这一领域的边缘上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另外，你们不要认为移情现象（遗憾的是，关于这一现象，我今天能告诉你们的实在太少了）是在精神分析的影响下才制造出来的。如同患者和医生的关系一样，移情是在人际关系中自发产生的。无论在哪里，移情都是传递治疗影响的真正媒介；而且你对它的存在了解得越少，它的作用就越大。因此，

精神分析并没有创造移情，而只是使它呈现于意识之中，并获得对它的控制，以引导心理过程达到理想的目标。然而，在结束移情这一主题之前，我必须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移情现象在不仅为患者而且为医生提出一种信念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我知道，我的所有追随者的确是根据他们在移情方面的经验才相信我关于神经症病因的主张的。而且我很容易理解，在一个人实施精神分析并亲自观察到移情的作用之前，谁也不会做出如此肯定性的判断。

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从理智上讲我们必须考虑到有两个特殊的障碍，使人们不易承认精神分析观点的价值。首先，人们不习惯把决定论严格而普遍地应用到心理生活中。其次，他们对区分潜意识心理过程和我们所熟悉的意识过程的特殊性一无所知。对精神分析工作最普遍的抵抗之一都能追溯到第二种因素（即潜意识），这对病人和健康人都是一样的。人们害怕受精神分析的伤害，害怕把被压抑的性本能召回到患者的意识中，好像含有一种危险，会压服其高尚的道德倾向和剥夺其彬彬有礼的习尚。人们注意到患者的心灵中有一些痛疤，但是不敢触及它们，怕加剧他的痛苦。我们可以接受这种比喻。如果这样做只能引起疼痛，那么无疑不去触碰这些伤疤更为仁慈。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如果一个外科医生想要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他认为这样做会产生永久的疗效，那么他肯定会检查和对付疾病的病灶。只要达到了最终的疗效，只要患者暂时的痛苦会换来长久的康复，那么没人会因为检查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或手术所造成的各种反应而责怪医生。精神分析的情况与此相似。如同外科一样，它也可以做出声明：患者在治疗中痛苦加剧的情况要比外科医生所造成的痛苦轻得多，而且相对于隐藏的疾病的严重程度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另一方面，人们如此害怕的最终后果——从压抑中释放出来的本能会导致患者文化性格的崩溃——是完全不会发生的。因为这种惊恐与我们从经验中所获得的确凿无疑的知识完全不符——即愿望冲动的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一旦对它们的压抑失败，那么它们在潜意识中要比它们在意识中强大得多。所以使这些力量进入意识只能削弱它们，潜意识的愿望不受任何影响，也不受任何相反倾向的奋力驱使，而有意识的愿望则受一切意识到的愿望和反对它的愿望的掣制。因此，精神分析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些最高尚、最有价值的文化倾向，本身就能更好地替代不成功的压抑。

那么，由精神分析所释放的潜意识愿望又会成为什么呢？通过什么途径我们才能成功地使它们不对患者的生活造成伤害呢？这样的途径有几条。最常见的结果是，当精神分析工作正在进行时，这些愿望被反对它们那些更好的倾向的理性心理活动所驱逐。可用这些最佳的方法以谴责判断（condemning judgement）来取代压抑。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必须放弃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起源于自我发展早期阶段的那些影响。因为个体在那时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还十分软弱。因此他过去只能成功地压抑那些无用的冲动。现在他已成熟和强壮，他

可能会完全成功，他征服那些敌对的冲动而无伤于自己了。

精神分析工作的第二个结果是，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潜意识本能有可能被用于更有用的目的。如果发展不被阻断的话，这种目的很早就能被发现。因为消除竞争的愿望冲动决不是发展的理想目标。由于压抑，神经症患者已牺牲了许多心理能量的资源，而这些能量的贡献本来对他们性格的形成和生活行为具有重大价值。我们还了解到一个目的更加明确的发展过程，叫做“升华”。在升华过程中，幼儿愿望冲动的能量不会消退而会得到应用——各种冲动的无用目的被一种更高尚的、也许不再是性欲的冲动所替代。碰巧的是，性本能的这些成分才特别显著地能进行这种升华，可以把它们的性目标转化成一个更远大的更具有社会价值的目标。也许我们把最高的文化成就归功于以这种升华作用的方式释放的能量。早期未成熟的压抑使被压抑的本能不可能升华；祛除了这种压抑，通往升华之路才重新畅通。

我们一定不要忽视精神分析工作的第三个可能的结果。被压抑的力比多冲动的某一部分要求获得直接的满足，而且也应该在生活中找到这种满足。我们文明的标准使生活对于人类的多数群体都显得过于艰难。这些标准随后会加剧脱离现实并导致神经症。过分的性压抑，不会使人类获得太多的文化成果。我们不应把自己抬得太高，以致完全无视我们身上原始的动物性。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个人幸福的满足也是我们文明所必须具有的目标之一。性成分的可塑性通过它们的升华能力表现出来，这可能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诱惑，即通过更彻底的升华而寻求获得更高的文化成就。但是，正如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机器把全部热量都转化成有用的机械能一样，我们也只能利用性本能的一部分能量以达到较高的目的。如过多的利用，其实是不可能成功的。对性欲施加过多的限制，非但无益，反而会带来各种祸端。

在结束讲演的时候，我要向大家提出一个警告，在你们看来（这恐怕是有些夸张。我只是想通过讲给你们一个古老的故事，来间接地描述一下我的信念，我就不管你们怎样来看待它了。德语文学中经常提到一个叫做希尔达的小镇，镇上的居民会施展各种聪明巧计。据说，希尔达的居民拥有一匹骏马，它的健壮令居民们引以为自豪，只有一个美中不足的缺点——它每天要吃掉大量贵重的燕麦。居民们决定每天减少一点它的食量，直到使它习惯于完全节食为止，这样就可以慢慢地改掉它的坏毛病。有一段时间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马最后的食量达到了每天只吃一根燕麦，甚至接下来就可以什么也不吃了。第二天早晨，希尔达的居民发现这可恨的畜牲死掉了，但人们不知道它是为什么死的。

我们可以认定这匹马是饿死的，而且不可能期望一匹一点燕麦不吃的马去干什么活。

我应该感激你们的邀请，感谢你们专心致志地听我讲话！

精神分析运动史

（在巴黎城的盾形徽章上*）

（*1914*）

杨　韶　刚　译
高　中　春　校
杨　韶　刚　修订

---

*“盾形徽章”(the coat of arms)代表一条船，这条船可能表示，“它在风浪中颠簸，但并没有沉没。”弗洛伊德在与弗利斯的通信中两次提到这个格言，这和他自己的心态有关(弗洛伊德，1950a，信119和信143)。

按 语

本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主要包括三部分:(1)阐述了大约1902年前精神分析发展史,包括同布洛伊尔的合作与分离,独自提出迁移宣泄法,形成压抑和抵抗理论、幼儿性欲假说,以及作为潜意识来源的梦的解释和开拓。(2)阐述了大约1910年前精神分析的观点第一次开始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包括以维也纳与苏黎世学派联盟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形成、主要贡献,以及精神分析运动在欧洲和美国的兴起。(3)阐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组织建设、学术活动和分裂,包括地方组织的建立、前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代表大会的活动、同阿德勒和荣格的根本分歧以及弗洛伊德对他们的严厉批评。



英文版编者导言

本译文是1924年版本的一个修改版。

在1924年之前的德文版本中，本书的末尾出现了“1924年2月”这一日期。事实上这本书似乎是在那一年的1月和2月写成的。在1924年的版本中做了少量字词修改，并且在第33～34页上增加了一个很长的脚注。到目前为止，这还没有在英文版中出现过。

在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编撰的《弗洛伊德传记》（1955年，第142页以下）第2卷的第五章中，对导致撰写本著作的情况做了全面的说明。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非常简短地总结一下这种情况。阿德勒（Alfred Adler）对弗洛伊德观点的不赞同在1910年达到了顶峰，而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反对意见则是在大约三年以后。尽管存在着把他们和弗洛伊德分开的一些歧异，但是，他们却都坚持把他们的理论描述为“精神分析”。本书的目的是想清楚地说明精神分析的基本假定和设想，指出阿德勒与荣格的理论和它们是完全不相容的，并且想做出推论，如果这些相矛盾的观点都被赋予同样的名称，那么，这样做除了造成普遍的混乱之外，将一无所获。而且，尽管多年来舆论继续坚持认为有“三个精神分析学派”，但弗洛伊德的论点最终取得了胜利。阿德勒已经为他的理论选择了“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这个名称，而此后不久，荣格也为他的理论取名为“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

为了完全清楚地说明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弗洛伊德追溯了这些原理从他们目前精神分析开始的发展历史。在本书第一章所包含的时期中他自己是惟一与此有关的人——就是说，一直到大约1902年。第二章将历史讲述到大约1910年

在这一段时间里，精神分析的观点第一次开始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只是在第三章中，弗洛伊德才开始讨论那些持有异议的观点，首先是阿德勒的，然后是荣格的观点，并且指出了他们同精神分析的研究发现相分歧的那些基本方面。在这最后一章中，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本书的其他章节，我们发现弗洛伊德采纳了一种比他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更好战的语调。鉴于他在前三四年的个人经历，这种不同寻常的心境不能被认为是令人惊奇的。

关于阿德勒和荣格观点的讨论将在弗洛伊德另外两本与本书同时代的著作中找到。在《论自恋》（1914c）一文中，该文和《精神分析运动史》几乎是在完全相同的时间里撰写成的，在第一章末尾（英文版第79页以下）出现了与荣格发生争论的一些段落，而在第三章开始则出现了一段与阿德勒争论的类似的段落。关于“狼人”（1918b）的案例史主要是在1914年底写成的，尽管只是在1918年才出版（又增加了两段），这个案例史的构思主要是对阿德勒和荣格进行实证的驳



斥，还包含着许多对他们理论的抨击。在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中，有许多关于这些争论的散在的参考资料（主要是在说明性的或半自传式的作品中），但是这些材料总是较枯燥乏味，而且范围并不太广泛。但必须提到，在弗洛伊德关于“鞭挞幻觉”(beating-phantasies)《“孩子挨打”：写给性倒错起源的研究》(1919e，标准版，第17卷，第201页以下）一文的最后一节，对阿德勒关于导致压抑的动机力量的观点做了严密推理的讨论。

关于本书的纯历史的和自传的部分，我们必须说明，弗洛伊德重述了他在《自传研究》(1925d）中所持的多少有些相同的立场，但在某些方面对本书做了补充。当然，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全面的探讨，读者必须参考厄内斯特·琼斯的3卷本的《弗洛伊德传记》。我们并不想在本译文的脚注中重述那本著作中已经包含的同样观点。



第一章

对于我打算在这里对精神分析运动史所做的这种阐述的主观性，谁都无需惊奇，同样，对于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无需任何人感到惊奇。因为精神分析乃是我的创造；十年来我是惟一独自关心它的人。我的同时代人对于这种新现象所提出的一切不满，统统以批评的形式倾注到我的头上。尽管长期以来我是惟一的精神分析学家，我却以为即使在今天，还没有人能比我再清楚地知道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它如何不同于研究心灵生活的其他方法，被称作精神分析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用什么其他名称才能更好地描述它。在这样驳斥了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冷漠无情的侵权行为之后，我打算把引起这本《精神分析年鉴》的编辑和版式发生改变的那些事件间接地告诉它的读者们①。

1909 年，我有机会第一次在一所美国大学的讲坛上公开发表关于精神分析的演讲②这对我的研究是一次重要的机会，而且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我当时宣称，使精神分析得以存在的人并不是我：这个荣誉还应归于其他人，应归于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当我还是一个正忙于通过考试的学生时（1880～1882年），布洛伊尔就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但是，由于我做了那些演讲，一些好心的朋友便向我提出了一个疑问，是否我的感激在那种情况下没有表示得太过分？在他们看来，我应当像我以前习惯于做的那样进行下去：即把布洛伊尔的“宣泄法”作为精神分析的一个准备阶段，把我放弃催眠术和引进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作为精神分析本身的开始。无论精神分析的历史是否把宣泄法或我对它的变更作为开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很重要的；我提到这些毫无趣味的事情，只是

① ［迄今为止，《年鉴》一直在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的指导下，并由荣格编辑。现在，弗洛伊德本人成了惟一的指导者，而编辑职务则由阿伯拉罕和黑奇曼（Hitschmann）接替。也请参见英文版第 46 页以下。］

② 见我的发表于克拉克大学的《精神分析五讲》（1910a）（见英文版第 30～31 页）。



由于精神分析的某些反对者们有一种习惯，他们时常认为，精神分析技术毕竟不是由我，而是由布洛伊尔发明的。当然，如果他们的观点允许他们发现其中某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如果他们没有对精神分析的否认加以这样的限制，那么，毫无疑问，精神分析始终是我独自的研究。我从未听说，由于布洛伊尔在精神分析中分担了大量工作，使他蒙受相当程度的批评和凌辱。正像我长期以来所认识到的，引起矛盾和产生痛苦是精神分析不可避免的命运。我已经得出结论，我必定是精神分析最具有独到特点的真正创立者。我很高兴能够补充说，企图最大限度地贬低我在创立这个备受凌辱的精神分析中所起作用的任何努力，都不是来自布洛伊尔本人，或者都没能得到他的支持。

布洛伊尔的发现如此经常地得到叙述，以致于我可以无须在此对它们进行详加讨论。这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就是说，癔症患者的症状是建立在他们过去的生活背景上的。过去的生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却被遗忘了（创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治疗，就在于引起对它们的记忆，并在催眠状态下再现这些体验（宣泄）；而且理论框架也是由它推演而来的，这就是说，这些症状代表着对尚未得到安置的大量兴奋的一种变态的使用（转换）。每当布洛伊尔在他对《癔症研究》（1895 年）的理论贡献中提到这种转换过程时，他总是把我的名字放在后面的括弧内①，好像在理论评价上这个第一次尝试的优先权属于我。我认为实际上这只是有关名义的区分，我还认为这个概念是我们同时一起发现的。

布洛伊尔第一次发现宣泄法之后，他在若干年里一直未使用这种方法，只是当我从沙可（Charcot）那里学习归来时②，他才在我的鼓励下重新使用它，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沙可在对他具有很高要求的医学上进行了大量的咨询实践；我自己只是不愿从事医学这个专业，但在那时我却有一种强烈的动机，要帮助那些在神经过敏情感方面遭受痛苦的人们，或者至少希望了解他们的状况中的某些事情。我曾从事过生理治疗，并在对我做的埃伯的电疗（Erb's Elektrotherapie）（1882 年）的研究结果失望之后，曾感到绝对束手无策，这项研究竟提出了如此多的提示和建议。如果当时我没有独自获得这个后来由莫比亚斯（Möbius）得出的结论，即对神经症患者电疗的成功全是暗示（suggestion）的作用，那么，毫无

① [这里似乎有个错误。在布洛伊尔的贡献之中，他使用“转换”（或它的衍生物）这个术语至少有 15 次。但却只有一次（在他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时，标准版，第 2 卷，第 206 页），他在括弧内加上了弗洛伊德的名字。似乎很可能弗洛伊德看了布洛伊尔的某些最初的手稿，并且劝说布洛伊尔在印出的书里不要更多地加上他的名字，只写一次即可。第一次出版时使用这个术语是在《癔症研究》之前，在弗洛伊德的第一篇论文《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之中。]

② [弗洛伊德在 1885～1886 年冬天曾在巴黎的萨伯居里工作过。参见其《我的研究报告》（1956a [1886 年]）。]



疑问，只要完全放弃这些有希望获得的成功，就会受到责难。在深度催眠时用暗示进行治疗，这是我从李厄保（A. A. Liébeault）和伯恩海姆（Bernheim）的那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演示[1]中学会的，这样，对于电疗的失败似乎提供了一种满意的替代。但是，布洛伊尔使我熟悉的这种研究催眠状态中的病人的实践（即把一种自动操作方式和满足科学好奇心相结合的实践），确实要比暗示治疗中使用的那些单调、强迫性的抑制具有更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这些抑制阻碍了所有研究。

新近我们接收到一个忠告，它声称代表精神分析的最新发展，大意是说，现时冲突和引起疾病的原因应该在分析中处于最显著的位置[2]。这正是布洛伊尔和我在开始研究宣泄法时所经常做的。我们把病人的注意直接引向产生症状的创伤情景，我们力图发现创伤情景下的心理冲突，释放其中被压制的情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后来我称之为“退行”（regression）的心理过程，它具有神经症的特征。病人的联想从我们试图阐述的这个情景退回到早期的经历，并且被迫进行分析，而这种分析是想纠正现状，并专注于过去。这种退行经常引起进一步退化；开始时似乎有规则地把我们带回到青春期；后来，那些仍然躲避解释的失败和要点，便把分析的工作更进一步带回到迄今仍然无法做任何探究的童年期。这种退行的方向成为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看起来，如果精神分析不涉及过去，就无法说明属于现在的任何东西；确实，任何致病的经历都包含有先前的经验，这种经验尽管不是病因本身，但已赋予后来的经验以病因的性质。但是，把人的注意力限制到现在已知的那种令人激动的原因的意图是如此强烈，甚至使我在以后的分析中也要给它让路。在1899年对那个我称之为“杜拉”的病人进行的分析中[3]，我已知道引起这种病情爆发的情景。我曾尝试过无数次，想使这种经验服从于分析，但是，甚至直接提出这种要求，也总是使她对疾病做出同样贫乏和不完全的描述。直到经过长期的曲折，回到她最早期的儿童时期，一个梦在分析中使她想起了迄今已被遗忘的这个情景的细节时，才有可能理解和解决当前的这种冲突。

这一实例表明上面提到的这个忠告是何等的错误，表明在此推荐给我们的分析技术中，这种对退行的无视代表了多大程度的科学倒退。

布洛伊尔和我自己之间的第一个差异，表现在关于癔症的更精细的心理机制问题上。正如人们可能会说的那样，他更喜欢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生理学的理论；他试图用各种心理状态（当时我们称之为“意识状态”）之间缺乏交流来解释癔症病人的心理分裂，他因此而建构了“类催眠状态”（hypnoid states）的理论，据说

---

① [1889年，弗洛伊德在南锡（Nancy）度过了几个星期。]

② 参见英文版第63页。

③ [这是一个错失，应该是1900年。见标准版，第7卷，第5页。]



这个理论的产物会像未同化的异体一样渗透到觉醒的意识中。我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更不科学；我似乎是要处处区分和日常生活的那些动机和倾向相类似的动机与倾向。而且，我把精神分裂本身看作是一种抵制过程的作用，当时我称之为“防御”（defence），后来叫“压抑”（repression）①。我做了一个短暂的尝试，允许这两种机制并列地分别存在，但是，正如观察向我表明的那样，它们常常只不过是一件事，这是在我的“防御”理论采纳与他的类催眠理论相反的立场之前不久。

然而，我非常清楚，在我们的观点之间的这种对立和此后不久随之发生的我们的关系破裂无关。这里有更深刻的原因，但是，这种分裂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的，以致于刚一开始我还对此不理解；只是后来，从许多明显的迹象中我才知道了应如何解释这件事。应当记住，布洛伊尔在谈到他的著名的第一个病人（即安娜·O——中译者）时说，性欲成分在这个病人身上令人吃惊地未发育成熟②，而且这对该病例非常丰富的临床描述毫无帮助。我常常感到惊奇，为什么批评者往往并不更多地引证布洛伊尔的这种主张，以作为反对我关于神经症中性病因学这个论点的一个证据，而且甚至在今天我也并不知道，我是应当把这种疏漏视为他们机敏的证据，还是视为他们粗心大意的证据。任何一个人，若依照过去二十多年来获得的知识来阅读布洛伊尔的病例史，将会立刻觉察到其中的象征作用——蛇、坚硬的、臂膀瘫痪——以及在考虑到那位年轻女士在患病的父亲床边所发生的情境时，将很容易猜测到对她的症状所做的真正解释；因此，布洛伊尔关于性欲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见，将由此而和她的医生的意见大相径庭。在治疗她的症状过程中，布洛伊尔能够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关系（rapport）的非常强烈的暗示，这种良好关系可以看作是今天我们所谓“移情”（transference）的一个完满的原型。现在我有强烈的理由怀疑，在她的一切症状得到解脱之后，布洛伊尔一定从进一步的迹象中发现了这种移情的性动机。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出乎意料的现象的普遍性，结果，就好像他遇到了一件“麻烦事”③似的，他放弃了所有进一步的研究。他可从未就此事对我说过如此多的话，但在不同的时候他却充分地告诉过我，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这种重建是有道理的。当我后来开始越来越坚决地提出性欲在神经症病因学中的意义时，他却第一个表现出厌恶和否定的反应，后来我对此已变得非常熟悉了。但在当时，我还没有学会把这种现

① ［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一书中，弗洛伊德复活了“防御”这个术语，用它来表示一种一般的概念，而“压抑”则表示这个一般概念的分支。］

② ［见布洛伊尔所写的关于安娜·O的病例史的第二自然段，在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癔症研究》（1985年）中，标准版，第2卷，第21页。］

③ ［在英文原版中，更全面的评述将在《厄内斯特·琼斯的传记》第1卷（1953年，第246页以下）中发现。］



象视为我不可避免的命运①。

不管是温情的还是敌意的，在每次神经症的治疗中都会以粗略的性的形式出现移情，尽管这既非医生或病人所渴望的，亦非他们所诱发的，但在我看来，这个事实往往是最不可或缺的证据，即神经症的驱动力量的根源就在于性生活。这个论点从未受到过任何应有的注意，因为假如它受到了人们注意的话，那么，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就不会留下任何其他公开的结论。就我而言，这个论点一直是一个决定性的论点，而且是精神分析研究的更具有特殊意义的发现。

对于我关于神经症性病源学的论点，甚至我的较亲密的朋友们也不欢迎，这样一来倒有些安慰作用——因为在我这个人的周围迅速地形成了一个真空——人们都认为我正在为一个新的和原创的观点而进行战斗。但是，有一天，某些记忆涌上了我的心头，这些记忆扰乱了这种令人高兴的念头。但是，作为一种交换，这种记忆却使我真正领悟到人类创造活动的过程和人类知识的本性。过去一直由我来承担责任的这个观点决不是起源于我的。那是由三个人传授给我的，他们的意见受到我最深切的尊重——他们是布洛伊尔本人、沙可和克罗巴科（Chrobak）。后者是大学的妇科医学家，也许是我们所有的维也纳医生中最优秀的②。这三个人都传授给我一些知识，严格地说，他们自己并不具备这些知识。当我后来向他们提起这个事实时，其中两人否认这样做过；而第三位（伟大的沙可），如果我能再见到他的话，或许同样会予以否认。但是，这三种相同的意见我虽然听到了，却没有弄明白，多年来在我心中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有一天，这三种意见才以一种明显的原创发现的形式苏醒过来。

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家庭医生时，有一天，我和布洛伊尔一起在城镇里走着。这时，有一个人突然走上前来，他显然有急事要和布洛伊尔说话，我落在后面。那人一离开，布洛伊尔就以他那友好的、讲授的方式告诉我，这人是他的一位病人的丈夫，向布洛伊尔提供了关于她的某些消息。布洛伊尔补充说，这位妻子在社会上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行动，以致她被送到布洛伊尔这里作为一种神经症病例来治疗。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事情往往是幽会的秘密（secrets d'alcôve）！"我惊奇地问他是什么意思，而他则通过向我解释幽会场所（alcôve，即婚床）这个词作为回答，因为他并没有认识到，他所陈述的这件事对我来说有多么不同寻常。

几年之后，在沙可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我碰巧在这位伟大的老师身边站了一

① ［关于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关系的讨论可在标准版第2卷的编者导言中找到。］

② ［鲁道夫·克罗巴科（kudoff chrobak，1843～1910）从1880～1908年在维也纳大学任妇科教授。］

会儿，当时他好像正向布罗阿代尔（Brouardel）[1] 讲述一件非常有趣的在他白天工作时发生的事。我没有听到故事的开始，但是我的注意力逐渐被他所谈的吸引住了：一对来自东方远土的年轻夫妇——女的患有严重的疾病，而男人则在性方面要么无能，要么极端笨拙。我听到沙可反复地说："继续努力，我相信你，你会成功的。"说话声音较低的布罗阿代尔一定是表示了他的惊异，像这位妻子这样的症状居然可能是由这样的情境引起的。因为沙可突然很激动地喊叫起来："但是，在这种病例中往往总是生殖器的问题——总是，总是，总是。"当时他两臂交叉在胸前，用他自己特有的生动方式，踮起脚尖上下跳跃了好几次。我感到在那片刻我被惊异得几乎麻痹了，我自言自语地说："噢，但是如果他知道了这种事，他为什么从未这样说过呢？"不过这种印象不久便被遗忘了；对癔症瘫痪的脑解剖和实验归纳吸引了我的全部兴趣。

一年以后，我作为神经性疾病的讲师在维也纳大学开始了我的医学生涯，并且在所有和神经症的病因学有关的事情上，我仍然像人们所预料的一个受过大学训练的有前途的大学生那样无知无识和天真无邪。一天，我从克罗巴克那里获得一条友好的消息，要我为他接待一位女病人，因为他新任一所大学的教师，不能抽出足够的时间。我在他之前到达病人家中，发现她遭受着无可名状的焦虑困扰，只有当她每日每时最精确地得知她的医生的消息时，才能使她减轻痛苦。当克罗巴克到达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这位病人的焦虑是由于这个事实，虽然她已结婚18年了，她却仍旧是个完全的处女（virgo intacta），丈夫是绝对的性无能。他说，在这类病例中，医生是无能为力的，除非用他自己的声誉保护住这个家庭的灾难，并且忍耐下去，如果人们耸耸肩对他说："要是这么多年后他仍然治不好她，那是他的不中用。"他补充说，对于这样的疾病的惟一处方我们都很熟悉，但却无法开出来。上面写着：

R Penis normalis（使阴茎障碍恢复正常）
dosim（的药剂）
repetatur!（反复练习）

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处方，而且总想对我这位善良的朋友的讥诮而摇头。

当然，我没有泄漏这种可耻的观念来自名门显贵以使其他人为此负责。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仅用匆匆一瞥就表达出一种观念是一回事，而认真看待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从字面上看待它，在面临每一矛盾的细节时探究这种

---

[1] 布罗阿代尔（P. C. H. Brouardel），（1837～1906）于1879年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法医学教授。弗洛伊德在他的《我在巴黎和柏林学习情况的报告》[1956a（1886年）]，以及在给波克（Bourke）写的《世界各地有关粪便的习俗》序（弗洛伊德，1913k）中，曾很赏识地提到他。

观念，并且使它在被人们接受的真理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偶然调戏和负有其全部责任和困难的合法婚姻之间的不同之处。“和一个观念结婚”（Epouser les idées de…），不管怎么说，在法语中都是并非不同寻常的修辞手法。

在由于我的研究而添加到宣泄法当中去，并且把它迁移到精神分析中去的其它新因素中，我可以特别提到压抑和抵抗（resistance）的理论，对幼儿期性欲的承认、以及作为潜意识知识的一个来源的梦的解释和开拓。

压抑理论当然是我不依赖于任何其它来源而得出的。我并不知道任何可能会向我提到这个理论的外部印象，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这一理论完全是首创性的，直到奥托·兰克（Otto Rank，1911a）给我们看了在叔本华（Schopenhauer）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的一段话，在这本书中，这位哲学家寻求对精神错乱做出解释。他在书中所说的关于反对接受一种痛苦现实所做的斗争，竟然和我的压抑概念如此完全一致，以致于我把这次做出发现的机会归于我的知识不渊博。但是，其他人读过了这篇文章就过去了，并没有做出这种发现，要是我在年轻时更喜欢阅读哲学著作的话，或许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便放弃了阅读尼采著作的嗜好，存心想在精神分析中获得的印象方面不受任何预期观念的妨碍。因此，我曾做好准备——并且对这样做感到很高兴——要放弃在许多情况下对一切优先权的要求，在这些情况下，艰苦的精神分析研究只能确证这位哲学家通过直觉所认识到的那些真理①。

压抑理论是精神分析的整个结构建立其上的基石，它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一部分；不过，压抑理论不是别的，而是对一种现象的理论阐述，如果我们没有诉诸催眠就对一个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经常观察到这种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发现对分析工作的一种抵抗，并且为了阻挠分析工作而求助于一种记忆的丧失。若使用催眠就一定会把这种抵抗隐藏起来；因此，精神分析本身的历史只是从不使用催眠这项新技术才开始的。这种抵抗与某种健忘症相一致，对于这个事实进行理论上的考虑，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我们得出潜意识心理活动的观点，这是精神分析所特有的，也使它和关于潜意识的哲学思辨十分明显地区别开来。因此可以认为，精神分析的理论是试图说明两个惊人而又出人意料的观察事实，只要试图把一个神经症患者的症状追溯到他的过

---

① [预期弗洛伊德这些观点的其他事例在他的《关于分析技术的史前史的说明》（1920b）中得到了讨论。也请参见后面对波普尔—林克乌斯（Popper-Lynkeus）的评论（第20页）——厄内斯特·琼斯对弗洛伊德从19世纪早期哲学家赫尔巴特（Herbart）那里间接地获得“压抑”一词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1953年，第407页以下）。参见编者对论压抑这篇论文的注释（英文版第143页）。]



去生活中的起源，那么，两个事实就会出现：这就是移情和抵抗这两个事实。承认这两个事实和把它们当作研究的出发点的任何研究路线都有权自称是精神分析，即使它所得到的结果和我自己的并不一样。但是，任何一个人如果坚持自称是精神分析学家，却对这个问题采纳其他观点，而躲开这两种假设，那么，他也难以逃避通过尝试性的表现而滥用所有权的谴责。

如果任何人想把压抑和抵抗理论放在这些前提中，而不是放在精神分析的发现中，那么，我就会最强烈地反对他。这样一些具有心理学和生物学普遍性质的前提确实存在，而且在某个其他场合考虑到这些前提将会是有用的；但是，压抑理论却是精神分析研究的产物，是从无数的观察中合理地抽象出来的理论推断。

这种理论的另一产物是关于幼儿性欲的假说。然而，这是较晚时期才提出来的。精神分析在尝试性研究的早期并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情。最初观察到的仅仅是，当前经验的作用必须追溯到过去的某件事。但研究者们却往往发现一些他们所预料不到的东西。人们愈来愈被拖回到过去；最终人们希望能在青春期停止，人们通常认为性冲动在这个时期才会唤醒。然而，这全都是徒劳；这些痕迹一直追溯到童年，乃至它的更早期。在这条道路上必须克服对这门年轻的科学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种错误思想。由于受沙可关于癔症的创伤起源观点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倾向于把病人的陈述作为真实的和在病因学上有意义的来接受。在病人的陈述中，他们把症状归之于童年的最初几年中那些消极的性经验——直截了当地说，归之于“诱奸”（seduction）。当这种病因学在确实可以肯定的情况中受其自身的不可能性和矛盾性之压而破灭时，最初的结果便是无能为力的迷惑不解。精神分析通过正确的通路追溯到这些幼儿的性创伤，但这些创伤却是不真实的。现实的坚实基础已经消逝了。到那时我会乐于放弃全部的研究。正像我所尊敬的前辈，布洛伊尔，在做出他那个不受欢迎的发现时已经做过的那样。或许我之所以坚持，只是因为我不再有任何选择，因此也不能重新开始任何其他事情。最后得出的想法是，一个人毕竟没有权力绝望，因为他已经在自己的期待中受过骗；他必须修正那些期待。如果癔症患者把他们的症状追溯到虚构的创伤，那么，出现的这个新的事实简直可以说，他们是在幻想（phantasy）中创造出这些情景的，而且这种心理现实需要连同实际现实一起加以考虑。在这种想法产生之后不久我们便发现，这些幻想打算隐匿儿童期头几年的自体性欲活动（autoerotic activity），对这种活动加以修饰并把它提到一种较高的水平。现在，儿童的全部性生活[1]才开始

---

① ［弗洛伊德对他的理论做这种修正的现代说明，可以在1897年9月21日他写给弗利斯的信中找到（1950a，信69）。他几乎是在十年以后才在一篇发表的论神经症中的性欲的论文中第一次明确承认这件事（1906a，标准版，第7卷，第275页），也请参见编者对《性学三论》（1905d，同上，第127页以下）所做的注释。］



从这些幻想的背后出现。

伴随着儿童期初年的这种性活动，个体的遗传结构也开始它自身的活动。在这里，素质和经验是以一种不可分解的病因学统一体而连结起来的。因为素质对印象起夸张作用，要不然这些印象就会完全是司空见惯的，而且丝毫不起作用，由于这种夸张，这些印象便成为引起刺激和固着的创伤；而经验则唤醒了素质中的诸因素，要是没有这些因素，素质就可能会长期潜伏着，或许永远也不会发展起来。对创伤的病因学这一主题的最后说明，是后来由阿伯拉罕（1907 年）做出的，当时他指出，儿童所特有的性结构，确实被认为是会引起一种特殊的性的经验——这就是"创伤"。

开始时，我对幼儿性欲的陈述，几乎完全是以对追溯到过去的成人的分析发现为基础的。我没有直接观察儿童的机会。因此，几年以后，当我通过对非常幼小的儿童进行直接观察和分析，几乎能够证实我的全部推论时，这可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胜利——当一个人逐渐认识到，这种发现的实质竟然是，他确实应该为他已经做出的这个发现而羞愧时，这个胜利才失去了它的一定量值。一个人越是对儿童进行这些观察，事实就越会不证自明；但是，对于人们费了这么大劲竟没有看出这些事实，人们也会感到愈加惊异。

然而，对于幼儿性欲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的如此确信，只能通过分析的方法，通过把神经症患者的症状和特殊性追溯到它们的最终来源才能获得，因此，对它们的发现会解释其中能够解释的一切，并且使可以改变的一切都得到改变。我能够理解，就像荣格最近所做的那样，如果首先形成关于性本能实质的一个理论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解释儿童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种概念一定会任意地或者根据一些不相关的考虑而被选择出来，并且对于人们寻求加以应用的这个领域，会冒着证明它是不恰当的危险。确实，分析的方法也往往会引起关于性欲及其与个体全部生活的关系的某些极端困难和晦涩难解之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通过思辨而得到解决；而必须等待通过其它观察，或者通过在其他领域的观察来解决。

我需要对梦的解释做一点说明。释梦是作为我所采用的技术革新的一些最初成果而出现的。当时，我追随着一种模糊的预感，我决心用自由联想代替催眠术。我对知识的渴望在开始时并没有指向理解梦。对于把我的兴趣吸引过去，或者用任何有帮助作用的期待鼓舞我的任何外界影响，我一无所知。在布洛伊尔和我中断会面之前，我刚好有时间告诉他一句话，我现在懂得如何解释梦了。既然这就是该发现产生的原因，那么，随后在梦的语言中的象征主义（symbolism）就几乎成为我所获得的最后一项成果，因为梦者的联想对于理解象征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在从书中寻找关于这些象征的信息之前，我已经养成了总是研究事物本身的习惯，因此，在我受施尔纳（Scherner）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影响之前（1861 年），我已

能够自己确定梦的象征作用。只是后来，我才开始对梦的这种表现方式大加赞赏。这部分地是通过斯特克尔（Stekel）的著作的影响，他最初做了这样一些令人赞誉的工作，但以后则完全走向迷途①。在精神分析的释梦和在古代就实践过和受到过如此高度尊敬的释梦的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后来，我发现了我的梦理论的主要特征和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种内部冲突，一种内在不真实的梦的歪曲的衍生物——说真的，这是在一个对医学一无所知，虽然不是对哲学一无所知的作者中发现的，他就是著名的大师波普尔（J. Popper），他曾以林克乌斯（Lynkeus）的名字发表了《一个实在论者的幻想》（1899 年）②。

在精神分析的那些艰难的最初岁月里，我必须掌握这种技术，同时注意临床现象和进行神经症的治疗，那时，释梦便成为我的安慰剂和支柱。在那个时期，我是完全孤立的，而且问题成堆、困难重重，我时常害怕丧失我的耐性和自信。常常有病人，在我的假设被证明是真实的之前，使我把不可胜数的漫长时间消磨在他们身上我的假设是，神经症一定会通过分析而得到理解；但是，可以看作与病人的症状相类似的这些病人的梦，几乎总是证实这个假设。

这只是在使我能够坚持下去这一方面所获得的成功。结果是，我形成了通过心理学家对释梦的态度来测量其理解力的习惯；而且，我满意地观察到，精神分析的大多数反对者们都完全回避这个领域，或者，只要他们试图处理这类问题，便表现出明显的笨手笨脚。此外，我很快就发现了进行自我分析的必要性。我借助于我自己的一系列梦做到了这一点，这些梦把我带回到我的童年的一切事件中；今天，我仍然持这种意见，对每一个好的梦者而又不是太不正常的人来说，这种分析可能是足够的③。

我认为，通过这样展开精神分析的发展史，我已说明了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这比通过系统地描述它更好。最初，我并没有觉察到我的发现的特殊性质。通过系统地探究我的神经症患者的患病原因中所包含的性因素，我便毫不犹豫地牺牲

---

① [关于斯特克尔的影响的更长的讨论，包含在弗洛伊德 1925 年为《释梦》（1900a）第 6 章（五）（标准版，第 5 卷，第 350～351 页）中论象征主义那一节所增补的一段话里。]

② [见弗洛伊德论述这个问题的两篇论文，1923f 和 1932c——在本句中“著名的”一词是 1924 年加上的。]

③ [弗洛伊德对他的自我分析的重要方面的现代说明，可在他与弗利斯的通信中找到（1950a），特别是在 1897 年 10 月写的第 70 封和 71 封信中。——他并非总是像上文中那样采取一种合适的自我分析的观点，例如在 1897 年 11 月 14 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1950a，信 75），他写道：“我的自我分析仍然被打断了，我已经认识到了原因。我只能借助于客观地（像一个局外人那样）获得的知识来分析我自己。真正的自我分析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不会有（神经症）这种疾病了。由于我还在我的病人中发现了某些难题，因此这些难题一定耽搁了我的自我分析。”同样，在他生命的晚期，在对论失误动作（parapraxis）一文的一个短注中（转下页）



了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日益增长的声誉，以及在我看病期间人数的增加；这使我获得了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终于使我对性因素的实际重要性坚定了信心。我曾天真地向以克拉夫特—艾宾（Krafft-Ebing）①任主席的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症学协会的会议致词（参见弗洛伊德，1896c），期望我自愿遭受的那些物质损失能通过我的同行们的兴趣和承认而有所补偿。我把我的发现作为对科学的普遍贡献来看待，并且希望这些发现会以同样的精神得到承认。但是，我的交流活动使我遭到的冷遇，我所形成的空虚感，人们传达给我的提示，都逐渐使我认识到，在神经症病因学上性欲所起作用的主张，不可能指望受到像其他交流活动一样的待遇。我明白了，从现在起，正如赫伯尔（Hebbel）所说②，我是“扰乱了世界的沉睡”的那些人之一，我不能对人们的反对和宽容抱有任何指望。但是，我对自己的观察和结论的普遍精确性的坚信越加强烈，因为我对自己的判断的自信和我的道德勇气确实不小，所以，这种情况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我下定决心，坚信发现某些特别重要的事实和联系是我的运气，我准备接受有时伴随这些发现而来的命运。

我对未来做如下描述：——借助于用新方法取得的治疗成功，我完全可以成功地保持住自己，但科学却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完全置我于不顾；几十年后，别人也一定会碰到类似的事情——解决这些事情的时间现在还不成熟——也会获得对这些事情的承认，而且会把我作为一个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先驱，而对我表示尊重。同时，像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那样，我尽可能舒适地在我的荒岛上定居下来。当我摆脱了今天的压力和混乱，回首这些凄凉的岁月时，仿佛这是一个光荣的英雄时代。我的“壮丽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③并不是没有其优越性和魅力。我不必阅读任何出版物，也不必倾听任何反对者的坏消息；我并不容易受到任何方面的影响；什么也不能把我排挤掉。我学会了限制思辨倾向，并遵循着我那令人难忘的导师沙可的忠告：一遍又一遍地看待那些同样的事

* （接上页）（1935b），他匆匆地说道：“在自我分析中不完善的危险性特别大。人们很容易满足于部分的解释，在其后抵抗会很容易地阻挡住一些或许更重要的东西。”他在给E·匹克沃斯·法罗（E. Pickworth Farrow）的一篇提出自我分析发现的论文（弗洛伊德，1926年）作序时所用的小心翼翼地赏识的词语，可能会与这些观点相反。不管怎么说，在训练分析的情况下，他以强烈的话语支持用某个其他人来进行分析的必要性——例如，在本文之前不久写的一篇论技术的论文中（1912e）和在很久以后的一篇论文《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性的分析》（1937c）中。]

① [克拉夫特—艾宾（R. von Krafft-Ebing，1840～1903）是斯特拉斯堡（1872～1873）、格拉斯（1873～1889，他还在此指导过一个省立心理医院）和维也纳（1889～1902）的精神病学教授，他也因对犯罪学、神经病学和性精神病学的研究而驰名。]

② [参见在赫伯尔的《吉杰斯和他的戒指》，第五幕第一场中提到的康德里斯（Kandaules）对吉杰斯（Gyges）说的话。]

③ [原文是用英文写的。]



情，直到它们自己开始说话①，虽然有麻烦但还有一席之地的我的出版物，总是远远地落后于我的认识，只要我愿意就会被延误出版，因为无法保证那种不确定的“优先权”。例如《释梦》是1896年初完成所有主要部分的②，但直到1899年夏才写完。对“杜拉”的分析是1899（1900）年年底写完的③；又过了两个星期才写完了案例史，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同时，我的著作也没有在医学杂志上得到评论，或者即使作为一种例外进行了评论，它们也是用表示嘲笑或怜悯的优越性草草了结。偶而会有一位同行在他的出版物中对我做一些文献参考；那也是很简短的，而且决无奉承之意——倒会使用像“偏执的”、“极端的”或“非常特殊的”这样的词语。有一次，碰巧在我讲授大学课程的维也纳诊所的一位助理医师，要求我允许他听这门课。他很注意地听着，而且一言不发；在最后一节课结束后，他提出要在外面和我谈谈。当我们在外面走着离开时，他告诉我，他运用其长官的知识写成了一本反对我的观点的书。然而，他非常后悔没有先从我的讲课中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因为那样，他就会写出与这本书大不相同的东西。他确实曾在诊疗所里问过是否最好先读一下《释梦》这本书，但是他被忠告不要这样做——不值得如此麻烦。因此，他便自己把我的理论结构，根据他现在的理解，和天主教会的理论结构在其内部稳固性方面做了比较。按照他那拯救灵魂的观点，我将假设，这种陈述包含了一定的赏识。但是他最后却说，要改变这本书中的任何东西已经太晚了，因为这本书已经在排印了。我的同事们也认为，以后没有必要公开声明他改变了对精神分析问题的观点；但是，以他作为一个医学杂志的正式评论员的能力，他却愿意用轻率无礼的评论来追随精神分析的发展④。

在那些年里，无论我所具备的对我的利益的个人敏感性有多么迟钝，但是，我却被一种环境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这种环境并非总能表现出来，以帮助那些孤立无援的发现者们。一般地说，这样的人由于需要了解他们为什么缺乏同情，或者对他们的同时代人的嫌恶而感到苦恼，并且把这种态度作为担保自己的确信感的一种令人苦恼的矛盾。对我来说没有必要产生这样的感觉。因为精神分析理论使我能够理解我的同时代人的这种态度，并把它看作是基本分析前提的一个必然结果。如果这是真的，即我发现的这些事实会被一种带有感情的内部抵抗所阻止，而无法了解病人本身，那么，这些抵抗也一定会在健康人身上出现，只要某种外部根源使他们面对着受到压抑的东西。毫不奇怪，他们应该能够证明，在理智的基础上对我的观点进行这样的反对是有道理的，虽然最初它实际上是带有感情色

① ［这句话在弗洛伊德对沙可的讣告（1893f）中是以略有不同的词语出现的。］

② ［但是，请参见编者对《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4页以下）所做的导言。］

③ 参见英文原版第10页的脚注②。

④ ［这件轶事的续集将在弗洛伊德的《自传研究》（1925d）的第五节的开头找到。］



彩的。同样的事情往往同样经常地发生在病人身上：他们提出的论据同样毫不令人赞赏。用福斯塔夫（Falstaff）的话说，理由简直“俯拾皆是”[①]。惟一的差别就是对病人必须施加压力，以便诱使他们洞察到自己的抵抗和克服这些抵抗。而在对付外表上健康的人们时，我们就没有这种便利了。如何强迫这些健康的人以冷静和科学的客观精神考察这个问题，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最好留待时间来解决。在科学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在起先除了产生矛盾之外，什么也没有实现的命题，在后来却都得到了承认，尽管并没有提出支持它的新证据。

但是，很难期望，在我孤立地代表精神分析的那些岁月里，我会对世界舆论特别地尊重，或者对理智的满足产生任何偏见。

① ［见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第二幕第四场。］



第二章

从1902年起，许多年轻医生聚集在我周围，明确表示他们打算学习、实施和传播精神分析的知识。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一位亲身体验过精神分析治疗的有益效果的同行①。有几个晚上在我家举行定期集会，按照某些规则进行讨论，参加者们努力要在这个新奇的研究领域内发现他们的位置和使其他人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一天，一位技术培训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拿着一本表现出非凡理解力的手稿做了自我介绍。我们劝他上体育馆（中等学校）和上大学，并专心从事非医学方面的精神分析。这个小社团得到了他这样一位热忱可靠的秘书，我得到了奥托·兰克（Otto Rank）这样一位最忠诚的助手和合作者②。

这个小社团迅速扩大，在以后的几年中它的成员也经常变动。总的说来，我自己认为，在人才的数量和种类方面精神分析并不比人们所能想到的任何临床教学的教员们低下。包括从一开始的那些人，他们到后来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即使这种作用并非总是受欢迎的。然而当时人们还无法猜测这些运动的发展。我有种种理由对此感到满意，我认为我尽了一切可能把我的知识和经验告知其他人。只有两次不幸的情况，最后使他们从团体内部离开了我。我既无法成功地在精神分析的成员中建立友谊关系，这种关系在所有从事同样困难工作的人中是应该获得的；我也不能阻止关于优先权的争论，在这些共同工作情况下有如此多的获得优先权的机会。在传授精神分析实践方法上的困难特别大，这些困难对于目前出现的许多争吵是有责任的，而且这些困难显然已经存在于这个私立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之中了。我自己绝不敢提出一个尚未完成的技术和正在制订中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和一个能使其他人避免某些错误方向和最终灾难

① ［这里指的是威廉·斯特克尔（Wilhelm Stekel）。］

② ［1924年增注］现在是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的社长（见标准版，第17卷，第267～268页），并且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杂志》和《意象》杂志的编辑（见原版第47页）。



的权威一起制订的。知识分子的自恃和他们作为教师的早期独立性，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常常是令人喜悦的；但是如果这些人获得了某些不同凡响的个人地位，那只会对科学有益。尤其是对精神分析来说，需要有一个长期、严格的纪律和自我约束的训练。鉴于他们对一个如此声名狼藉而又前景暗淡的课题的忠心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使我较倾向于对我否定的话应该表示反对的那些成员持容忍态度。除医生外，成员中还包括其他人——承认精神分析中某些重要方面的受过教育的人：作家、画家等等。我的《释梦》和那本论诙谐的书等，从一开始就说明精神分析理论不仅限于医学界，而且能应用到其他各种心理科学。

1907 年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竟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好像精神分析客客气气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且得到了知遇，甚至有些科学工作者也准备承认它。在此之前，布洛伊勒①写了一封信告诉我，我的著作已在伯格尔斯立（Burghölzli）得到研究和使用。1907 年 1 月苏黎世诊疗所的第一个成员艾丁根（Eitingon）医生来到维也纳②。接踵而至的其他访问导致了生气勃勃的思想交流。最后由于荣格（当时他还是伯格尔斯立的助理医生）的邀请，于 1908 年春在萨尔茨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使维也纳、苏黎世和其他地方的精神分析友人们聚集在一起。第一次精神分析大会的成果之一是创办了一种名为《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的定期刊物（见原版第 46 页），这个刊物在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指导下，并由荣格编辑，于 1909 年创刊问世。这个刊物表现了维也纳和苏黎世之间的密切合作。

我已再三感谢过在传播精神分析中苏黎世精神病学派，尤其是布洛伊勒和荣格给予的巨大帮助，我毫不犹豫地再次表示感谢，即使在当前大大改变了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确实，并不是苏黎世学派的支持，才使当时科学界第一次对精神分析表示关注。情况是这样的，当时精神分析的潜伏期已经完成，精神分析处处都成为人们日益增长的兴趣的对象。但在所有其他地方，这种兴趣的增加最初导致的不是别的，而是非常强烈的拒绝接受；几乎是非常愤怒的拒绝接受；相反，在苏黎世占支配地位的特征是基本路线上的赞同，而在任何其他地方，这样密切的小团体门徒并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任何公共的诊疗所能为精神分析研究服务，也没有任何一位临床教师把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他的精神病学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苏黎世这个群体成了为承认精神分析而战斗的那些小团体的核心。学习这门新的技术和从事实践的惟一机会实际上是在那里奠定基础的。目前我的大多数

---

① ［尤金·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1857～1939），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当时是苏黎世公立精神病医院的伯格尔斯立地区的领导人。］

② ［1924 年增注］“精神分析门诊部”在柏林的最后创建者［见 1923g 和 1930b 弗洛伊德对此做的两个短注］。



追随者和合作者都是借道苏黎世才来到我这里的，甚至那些在地理上到维也纳比到瑞士更近的人也是如此。在和西欧的关系中（其中也包括我们文化的伟大中心），维也纳的地位处于边陲；许多年来它的声誉受那些强烈偏见的影响。一切最重要国家的代表都在瑞士聚集，这里的学术活动如此活跃，在这里一个起传播作用的中心必定会对传播像弗莱堡的霍奇（Hoche of Freiburg）所称的这种“精神流行病”（psychical epidemic）有巨大的重要性①。

根据一位同事的证据（他曾目睹了在伯格尔斯立的发展情况），好像在那里精神分析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1902年荣格发表的论神秘现象的著作中已经提到过我的《释梦》一书。从1903或1904年起向我提供消息的人说，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名列前茅。在维也纳和苏黎世之间建立起个人关系之后，还出现了一个非正式的学会，1907年在伯格尔斯立，人们定期举行会议讨论精神分析的问题。在维也纳和苏黎世学派之间的联盟中，这些瑞士人绝不仅仅是接受者。他们已经写出了非常值得称赞的科学著作，其成果就是对精神分析的贡献。由冯特学派开始的联想实验（the association experiments），被他们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做了解释，并且证明可以通过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加以应用。借助于这种手段，人们已有可能达到对精神分析观察材料做出迅速的实验证实，并且能直接向学生们证实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才能告诉他们的某些联系。联结实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第一座桥梁已经建立。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联想实验使我们能对病例进行暂时的定性分析，但它们对技术并未做出基本的贡献，在实施精神分析时可以不用联想实验。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另一项成就，这是由苏黎世学派，或者它的领导者布洛伊勒和荣格做出的。布洛伊勒表示，借助于引用那些在梦和神经症（弗洛伊德的机制）中得到的、通过精神分析认识到的同一过程，就可以把许多纯粹的精神病弄清楚了；荣格（1907年）成功地把精神分析的解释方法应用于性质最不相同和最含糊不清的早发性痴呆现象（精神分裂症），这样，这些病例，在病人生活史和兴趣中的来源便得到了清楚的了解。此后精神病学家再也不可能轻视精神分析了。布洛伊勒关于精神分裂症的伟大著作（1911年）完成了这项成就，在这本著作中他把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临床的系统观点置于相同的立足点之上了。

我将不会忘记指出，当时在这两个学派的研究方向上已经引起人们注意的一

---

① [阿尔弗里德·霍奇（Alfred Hoche，生于1865年），弗莱堡的精神病学教授，他曾特别强烈和辱骂性地攻击精神分析。他在巴登的一次医学大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医生中的一种精神流行病》的论文（霍奇，1910年）。]



种分歧。早在1897年①，我发表了对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例的分析；但这则病症具有偏执狂的特性，因此它的治疗方法无法摆脱荣格的分析所造成的印象。但是，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像解释这种疾病的神经机制那样来解释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而是首先使这种机制和已经发现的癔症的机制一致起来。那时我们还没有把这两种机制之间的差异弄清楚，因为我那时正致力于神经症的力比多理论（libido theory），该理论打算把所有的神经症和精神病现象都解释为从力比多的失常变化所发生的，也就是，解释为从力比多的正常使用中发生转移。这种观点都被这些瑞士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了。就我所知，甚至在今天，布洛伊勒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各种形式的早发性痴呆都有器质性的原因；在1908年萨尔茨堡会议上，荣格支持这种疾病的原因是一种毒素理论，而没有考虑到力比多理论，虽然它确实并没有把力比多理论排除在外。他曾于1907年发表专论这种疾病的著作。后来（1912年），由于使用了他以前曾拒绝使用的过多的素材，因而在同一种观点上陷入悲境。

瑞士学派做出的第三项贡献可能完全归功于荣格，对此我的评价并不像其他那些对这些问题更不关心的人那样高。我指的是从《诊断的联想研究》发展起来的"情结"理论。它自身既没有产生一种心理学理论，也没能证明可把它轻而易举地结合到精神分析理论的复杂关系中。另一方面，"情结"这个词可以说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语言中很自然的东西了；对于描述性地概括某种心理状态来说，它是一个方便的、往往不可缺少的术语②。精神分析为了本身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其他术语没有一个得到这样广泛的流行，或者受如此滥用而使较明白的概念结构受到损害。分析学家开始在他们中间谈论一种"情结回归"(return of a complex)，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被压抑的观念回归到意识域"(return of the repressed)，或者习惯上说："我有一种反对他的情结。"在这里惟一正确的表达将是"一种针对他的抵抗"。

1907年以后，当维也纳和苏黎世学派联合起来时，精神分析形成了特别汹涌的浪潮，这种势头就是在今天也还能感觉到。这可以由精神分析文献的传播和那些实践与研究精神分析的医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以及在会议上和在学术界对精神分析的频繁攻击中表现出来。精神分析已渗透到最遥远的大陆，不仅处处使精神病学家们感到吃惊，而且还博得其他领域有教养的公众和科学工作者们的注意。

---

① [这个错误的日期出现在所有的德文版本中。该病例发表于1896年5月。它位于弗洛伊德的第二篇论文《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 的第三节中。]

② 弗洛伊德似乎是在一篇论法律诉讼证据的论文中（1906c），首先从荣格那里借用这个术语的。但是，他本人似乎很久以前曾在《癔症研究》（1895d）中为艾米·冯·N小姐（Frau Emmy von N.）的病例所做的脚注中，在非常类似的意义上使用过这个词（标准版，第2卷，第69页脚注）。



霭理士（Havelock Ellis）虽然从未自称精神分析的信徒，但却一直同情地追随精神分析的发展，1911 年他在为大洋洲医学会议做的报告中写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目前不仅在奥地利和瑞士，而且在美国、英国、印度、加拿大，我毫不怀疑还在澳大利亚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和实施。"① 一位智利的医生（很可能是个德国人）在 1910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支持幼儿性欲的存在，并高度称赞精神分析治疗对强迫性症状的效用②。在印度中部（伯克利山）③ 的一位英国神经学家通过一位访问欧洲的著名同事告诉我，他对穆斯林印度实施的分析表明，他们的神经症病因和我们在欧洲病人中发现的并无二致。

精神分析引入北美，受到非常特殊标记的尊敬。1909 年秋，麻萨诸塞州沃西斯特的克拉克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邀请荣格和我参加庆祝建校 20 周年纪念日，在大会上我用德语做了多次演讲。使我们大为惊奇的是，我们发现，在这所小而精并受人敬重的大学里，研究教育和哲学的师生们竟然如此毫无偏见，他们对精神分析的所有文献都很熟悉，并且在他们给学生的讲课中也赋予精神分析以一席地位。自由和科学地讨论日常生活中每一件可能被认为是令人讨厌的事，在一本正经的美国人，至少在学院范围内是可能的。我在沃西斯特的五次即席演讲，用英语在《美国心理学杂志》（1910a）上发表，以后不久用德文以题为《论精神分析》发表。荣格宣读了一篇关于诊断学的联想实验论文和另一篇论儿童心理冲突的文章④。我们得到了法学名誉博士学位的奖励。在沃西斯特纪念周期间，代表精神分析的五个人中除我和荣格外，还有和我一同旅游的费伦茨、厄尼斯特·琼斯（当时他在多伦多大学［加拿大］，而现在在伦敦）和已经在纽约实行精神分析的 A·A·布里尔（A. A. Brill）。

从沃西斯特大会建立的最重要的个人关系是和普特纳姆（James J. Putnam）的关系，他是哈佛大学神经病理学教授。几年前他曾表示了对精神分析不利的意见，而现在他却很快和精神分析一致起来，并且用一系列形式华美、内容丰富的演讲把精神分析介绍给他的同胞和同事。由于他的崇高道德品质和对真理毫不退缩的爱，使他享有全美国的尊敬，这构成了对精神分析的巨大支持，并且保护了精神分析，使之免遭由于各种反对意见而可能导致的灭顶之灾。后来，通过提出太多具有普特纳姆特点的强烈的道德和哲学倾向，普特纳姆提出了一项据我看来似乎不可能的要求——他期望精神分析能服务于一个特殊的关于宇宙的道德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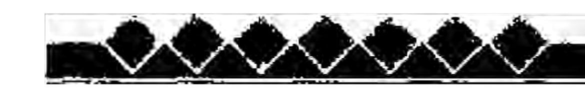
---

① 霭理士，1911 年［弗洛伊德本人向在悉尼召开的同一个大会提交了一篇论文（1913m（1911 年））］。

② 格里弗（G. Greve），1910 年。［弗洛伊德为此写了一个摘要（1911g）］

③ ［这个名字是 1924 年增补上的。］

④ 荣格 1910a 和 1910b。



概念——但是，他把精神分析运动的主要柱石保留在他的国土上了①。

对于这个运动的进一步传播，布里尔和琼斯应该享有最大的荣誉：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孜孜不倦地引导自己的同胞注意那些在日常生活、梦和神经症中容易观察到的基本事实。布里尔还通过他的医学实践和翻译我的著作而对传播精神分析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而琼斯则通过他的授课和在美国的各种会议上辩论的技巧做出了他的贡献②。在美国，由于缺乏任何深厚的科学传统和官方权威的很不严格的规定，这对于斯坦利·霍尔促进精神分析的传播是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那个国家的特点是，教授们和精神病医院的主管们，从一开始就对精神分析表现出像独立开业的医生们那么大的兴趣。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表现出最大抵抗的古代文化中心才一定是对精神分析进行决定性斗争的地方。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至今表现出最不欢迎精神分析，尽管苏黎世的米德（A. Maeder）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入门在法国做了有益的工作。最初的同情表现在以下几处：墨里乔·布尚（Morichau-Beauchant）是公开依附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法国人。莱吉（Régis）③和海斯纳（Hesnad）最近（1914年）曾力图通过竭力展示，来排遣他们的同胞对这些新思想的偏见，但这种展示并非总能得到理解，而且特别反对象征作用④。在巴黎城有一种信念似乎仍然占优势，[让内（Janet）本人曾在1913年伦敦会议⑤上雄辩地表达了这种坚信，]认为在精神分析中一切好的东西都是对让内的观点加以细微改变的重复，但精神分析中其他的一切却是不好的。确实，在这次会议上，让内一定接受了厄尼斯特·琼斯所做的一些更正，琼斯能够向他指出他对这个问题的不充分认识⑥。但是，即使我们拒绝让内的若干主张，我们也不能忘记他的研究对神经症心理学的价值。

在意大利，经过几次有希望的开端之后，并没有出现对精神分析真正的兴趣。精神分析通过个人的联系发现了通往荷兰的早期途径：凡·艾姆登（Van Emden）、凡·奥佛逊（Van Ophuijsen）、凡·伦特吉姆（Van Renterghem）和两个

---

① [1924年增注] 见普特纳姆的《精神分析演讲》（1921年）[弗洛伊德曾为此书作序，(1921a)。普特纳姆死于1918年。（见弗洛伊德为他写的讣告）(1919b)]。

② 这两位作者的出版作品都在全集当中。布里尔（1912年），琼斯（1913年）。

③ [E·莱吉（1855～1918）从1905年起任波尔东的精神病学教授。]

④ [1924年以前，这句话读作“一种只对象征作用表示反对的殚精竭虑的富有理解力的描述”。]

⑤ 指国际医学大会。

⑥ [参见让内（1913年）和琼斯（1915年），也请参见《癔症研究》的编者脚注（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年），标准版，第2卷，第12～13页。]



斯塔克（Starke）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积极地从事精神分析[①]。英国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发展得很慢，但有理由期望，英国对正义的那种实际而又诚挚的热爱感，将会保证精神分析在英国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在瑞典，成功地进行了海水浴治疗实践的皮埃尔（P. Bjerre），为了支持分析治疗而放弃了催眠暗示，至少在当时是放弃了。沃特（R. Vogt）（基督教徒）在1907年出版的《基础精神病学》中表示欣赏精神分析；这样，提到精神分析的第一本精神病学教科书就是用挪威语写的。在俄国，精神分析已家喻户晓，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几乎我的所有著作和精神分析的其他拥护者的著作都译成了俄文。但在俄国真正透彻地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论还不明显；所以俄国医生的贡献在目前还不太值得注意。在那里惟一受过训练的分析学家是在敖得萨开业的沃尔夫（M. Wulff）。主要是由于捷凯尔斯（L. Jekels）才把精神分析介绍到波兰的科学和文化界的。在地理上如此接近奥地利，但在科学上却相距甚远的匈牙利，只出现了一位合作者费伦茨，但他确实是一个足以胜过一个完整的团体的合作者[②]。

关于精神分析在德国的地位，只能说精神分析形成了科学讨论的焦点，并且在医生和外行人中都引起了最强烈的争执。这些争执不仅还没有终止，反而经常爆发争吵，有时还很激烈。直到现在，官方的教育团体还没有一个承认精神分析的。应用精神分析而获得成功的执业医生是少数；只有少数机构，像在克鲁斯灵根（在瑞士国土上）的宾斯万格（Binswanger）和在霍尔斯坦的马西诺夫斯基（Marcinowski）都为精神分析打开了大门。精神分析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一度曾是布洛伊尔助手的卡尔·阿伯拉罕（Karl Abraham）一直坚持在柏林的那种批评

---

① 在欧洲对梦的解释和对精神分析的第一次官方承认是由黎登大学校长，精神病学家杰尔杰斯玛（Jelgersma）在1914年2月9日他的校长演说中传播给他们的。

② ［1923年增注］当然把1914年写的这个说明说成是“最新式的”（最初用英文出现），并不是我的意图。我将只补充几句话来说明，这描述在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内的间隔期间是如何改变的。在德国精神分析理论逐渐渗透到临床精神病学中，虽然这并非总能得到允许。在过去几年中出版我的著作的法文译本也终于引起了法国人对精神分析的强烈兴趣，虽然当时在文学界比在科学界更活跃。在意大利出现了（上若切拉的）莱维·边齐尼（M. Levi Bianchini）和（的里雅斯特的）艾德都·魏斯（Edoardo Weiss）作为精神分析的翻译者和拥护者。在马德里出版的［由洛佩斯·鲍里斯特洛斯（Lopez Ballesteros）翻译的］我的著作的全集版就是在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中对精神分析产生极大兴趣的证明（利马的H·戴尔加多教授）。在英格兰，我的上述预言似乎正在稳固实现的过程中；精神分析研究的一个特别中心已在英属印度的凯尔库达形成。在北美更真实的情况是，对精神分析的透彻理解尚未跟上它的声望。在俄国由于这场革命，精神分析研究又在几个中心地区重新开始。在波兰“Polska Bibljoteka Psychoanalityczna”现正在出版中，在匈牙利一个卓越的分析学派正在费伦茨领导下蓬勃发展［（参见，为纪念他50岁生日而发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弗洛伊德（1923i）的一个评价）］。目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仍然是最不肯接受精神分析的。



气氛中。我们可能惊奇，这种情况竟连续几年不变，假如一个人并不知道我的说明只是代表外部现象，那么，这种情况就应该连续几年保持不变。不应认为官方科学的代表、某些机构的领袖以及依赖于他们的那些追随者们的拒绝对此有多么重大的影响。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大声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而它那些受到威胁的拥护者们则保持沉默，这是很自然的。最初对精神分析做出贡献而引起人们满意期待的几位拥护者，后来却在这些环境的强迫下从这项运动中撤退下来。这项运动本身的进步虽然是静悄悄的，但又是肯定的；它经常在精神病学家和外行者中找到新的拥护者，它为精神分析文献带来了日益增多的新的读者，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它的反对者们竟做出更凶猛的防卫。近几年来，我曾多次在某些会议和科学团体做的报告中或在某些出版物的评论中读到：精神分析现在已经死了，被彻底打败了。对这种说法的最好回答是马克·吐温对误发他的死讯的报纸拍去的电文："对我死亡的报导大大地夸大了。"在每次发出这些讣告之后，精神分析会按期得到新的拥护者和合作者，或者开拓新的宣传途径。因此，宣告死亡和被静悄悄地埋葬相比毕竟是一个进步。

在精神分析向空间扩展的同时发生了内容上的扩展；从神经症和精神病学领域扩展到其他知识领域。我不想详细讨论我们这种学科在这方面的发展情况，因为兰克和萨克斯（Sachs，1913 年）已经在洛温费尔德（Löwenfeld）的《界限研究》这本书中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本书详尽论述的恰恰就是精神分析研究的这一方面。另外，这种发展还处在它的幼儿期：它才刚刚获得一点成功，大部分是尝试性的开端，而部分地则只是一些计划而已。只要是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在这里找到任何责骂的根据。少数的研究者面对着大量的工作，其中大多数人都有自己主要的职业，只能以业余的资格来研究这些不熟悉的科学领域的技术问题。这些从精神分析中派生出来的研究者们不会对他们的业余性保密。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专家们充当路标和临时替补，等到该轮到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时，他们就争分夺秒地随意使用分析的技术和原理。然而所取得的结果却不小，其原因部分地归功于分析方法的丰富，部分地则归功于这种环境，即有少数研究者，他们虽然不是医生，却已经把精神分析应用到心理科学中去，作为他们的终生职业。

对精神分析的这些应用，大多数当然都能追溯到我最早期有关分析的著作中的某种暗示。对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的神经症症状的分析考察，使关于心理状况的这个假设成为必要，我们不可能把这些状况限制在它们被得到发现的那个领域内。分析由此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对病理现象的说明，而且揭示了它和正常心理生活的联系，揭示了在精神病学和探讨心理活动的大多数其它各种科学之间不容置疑的联系。例如有些类型的梦能够解释某些神话和童话。黎克林（Riklin，1908 年）和阿伯拉罕（1909 年）就遵照这种暗示，开始对那些已有定论的神话进行研究，在兰克关于神话学的著作中甚至同意用专家标准进行研究（例如，1909 年，

1911b)。进一步研究梦的象征作用则导致神话学、民间传说问题（琼斯［例如，1910年和1912年］和斯托弗［1914年］）和宗教的抽象观念。在一次精神分析会议上，当荣格的一个追随者证实了早发性痴呆症幻想和原始时代与原始种族的宇宙创始论之间相符合时，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①。神话学材料后来在荣格试图使神经症和宗教与神话幻想发生相互联系的著作中得到了更详细的阐述（尽管公开地受到了批评，但仍然非常有趣）。

由梦的研究导致的另一条道路是对想象作品的分析，并最终导致对其创作者——作家和艺术家——本身的分析。在早期阶段我们发现，作家们创造出来的梦常常会像真正的梦那样以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参见"Gradiva"［1907a］）。潜意识心理活动的概念能够形成一种想象的创造性作品的预兆性思想；在对神经症和对本能冲动所起作用的研究中获得的认识，使我们能够感受到艺术作品的来源，也使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艺术家怎样对这种冲动做出反应，以及他用什么手段来伪装他的反应行为②。具有广泛兴趣的大多数分析家曾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贡献在精神分析的应用中是最迷人的。当然，在那些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的人里面也不是没有反对意见的，反对的形式和在精神分析研究的最初领域中采用的形式是同样的——同样的误解和激烈的否认。从一开始我们就只好期望，无论精神分析可能渗透到的同样的什么样的领域，它将不可避免地体验到和已经占有该领域的那些人进行斗争。但这些入侵的企图还没有引起在未来等待这些入侵的某些方面的注意。在精神分析对文献的严格的科学应用中，兰克关于乱伦问题的详尽研究（1912年）堪称首屈一指。这个主题必定会极不受欢迎。直到现在，在语言学和历史科学中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研究几乎没有。我自己冒险用在宗教仪式和神经症仪式之间划一道平行线的方法第一次研究了宗教心理学问题（1907b)③。苏黎世的牧师普费斯特（Pfister）医生在他关于孔德·冯·齐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1910年］）的书和其他作品中，曾把宗教狂热的起源追溯到性欲倒错。但是，在苏黎世学派最近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充满宗教观念的分析，而不是已经发现的那些相反的结果。

在书名为《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四篇短文中，我曾尝试根据分析来探讨社会人类学问题；这条研究路线直接导向我们的文明、国家结构、道德和宗教以及禁止乱伦和良心等最重要风俗的起源问题。毫无疑问，确定如此达到的这

---

① ［简·奈尔金（Jan Nelken）在1911年魏玛大会上。对这篇论文的进一步说明可在奈尔金（1912年）的著作中找到。］

② 参见兰克《艺术家》（1907年），萨杰（Sadger，1909年）、赖克（Reik，1912年等）和其他作家的分析，我自己的著作《达·芬奇童年的回忆》（1910c）和阿伯拉罕对塞甘提尼的分析（1911年）。

③ ［所有的德文版本都把这个日期误写为1910年。］



些结论能够经得住批评的程度还为时尚早。

思维的分析模式应用到美学问题的第一个事例包含在我的论诙谐的书中[1905c]。除此之外的一切仍有待于其他研究者开发，他们可望在这个领域获得特别的丰收。在所有这些分支知识领域中，我们完全没有专家的合作。为了吸引专家，1912 年汉斯·萨克斯（Hanns Sachs）创办了定期刊物《意象》，由他和兰克任编辑。黑奇曼（Hitschmann）和冯·温特斯坦（von Winterstein）已开始阐明哲学体系和人格的精神分析观点，在这个领域中非常需要进行广度和深度上的研究。

精神分析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革命性发现——即性冲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在生殖机能中已成为无益的那些性成分的命运——一定在很早就把注意力指向了教育，并试图把分析的观点引入到这个研究领域的突出地位中。这种认识应归功于普费斯特医生，他满腔热情地开始把精神分析应用到这个领域，并且使精神分析受到宗教牧师们和那些关心教育的人们的注意（参见《精神分析方法》1913年）①，他在这方面成功地得到许多瑞士教师的同情和参与。他的其他同行据说和他持同样的观点，但却宁愿小心翼翼地呆在幕后。当他们从精神分析中退却时，一部分维也纳的分析家似乎已经把医学和教育结合起来了②。

我已经尝试用这种不完全的概述提出了某些有无数联系的观念，这些联系已在医学精神分析和其他科学领域显露出来。在这里有一些可供一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材料，而且我并不怀疑，只要对精神分析的抵抗在它的起源地得到克服，这项研究将得以进行下去③。

我认为要在现时写下这些抵抗过程的历史是无益的，也是不合时宜的。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值得称誉的。但我必须立刻补充一句，对我而言，绝不会仅仅因为他们是精神分析的反对者而轻视他们——除了少数不值得注意的个别人，和在论战时双方都会发现的那些冒险家和暴发户之外。我很熟悉如何说明这些反对者的行为，而且我也知道精神分析给这些人留下了最坏的印象。但我决心对我的对手们不予回答，只要我的影响还存在，我就不限制其他人成为我的论战者。在对精神分析进行论战的这些特殊情况下，我很怀疑，是否公开论战或书面论战会有什么益处；当然，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大多数人要走哪条路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我对那些反对我的先生们的理由和良好行为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很信任的。经验表明，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在一场科学论战中保持文雅而不表示任何反对意见，但学术上的争吵给我留下的印象总是讨厌的。或许我的这

① [弗洛伊德曾为此书作序（1913b）。]

② 阿德勒和富特缪勒（Furtmüller），《治愈和教育》，1914 年。

③ 参见我为《科学》杂志写的两篇文章（1913j）。

种态度被误解了；或许人们认为我的脾气这么好，这么容易受恫吓，因此无须对我多加注意。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也能像别人一样会骂人，会发怒；只是我没有那种使我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这种潜在情绪的艺术，因而我宁愿完全闭口不言。

如果我纵容自己以及我周围那些人的激情，也许在某些方面情况会好一些。我们都曾听说过这个有趣的意图，有人企图把精神分析解释为一种维也纳社会环境的产物。就在最近的1913年，让内曾不知羞耻地利用了这种论点，尽管他本人无疑会对作为一个巴黎人而自豪，但巴黎却几乎不能称为比维也纳有更严格道德规范的城市①。意思是说，精神分析，尤其是它关于神经症可以追溯到性生活失调的主张，只能起源于像维也纳这样的城市——在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荒淫和不道德的环境下——可以说这只不过是对维也纳的这些特殊状况的一种反思，是一种理论推测。现在，我当然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者；但关于精神分析的这种理论对我来说总是显得特别没有意义——事实上竟使我有时这样设想，对于一个维也纳市民的谴责，只不过是谁也不愿公开提出的另一种谴责的委婉的替代说法②。假如这个论点所依赖的前提就是其反面，那么，就值得让它做个申诉。如果有个城市，它的居民对自己性欲满足严加限制，而且，如果他们同时又表现出一种严重神经症紊乱的明显倾向，那么，这个城市当然会使一个观察者的心中产生一种想法，即这两种情况有相互联系，而且会认为，一种情况要视另一种情况而定。但这两种假设都不符合维也纳的情况。维也纳人比起任何其他首都的居民来，既不禁欲，也没有更多的神经症患者。在两性关系方面他们比为其贞操而自豪的西部和北部的城市更随便更不拘谨。维也纳的这些别具一格的特点与其说使观察者对神经症的原因有所启示，倒不如说是误导观察者。

但是，维也纳竭尽全力地否认它与精神分析的起源有关。对分析家而言，在其他任何城市，其居民中的有学问和受过教育的人对精神分析的敌意性冷漠，都不会像维也纳这么显而易见。

可能我的避免过于公开论战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为此负责。如果我鼓励或允许维也纳医学学会和精神分析进行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会把一切愤怒都发泄出来，把它的对手们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所有谴责和谩骂都公开出来——那么，到现在或许就会消除对精神分析的禁令，而精神分析也不再是其本土上的一位陌生人了。其实有位诗人在他的一首诗中写的诗句倒可能是对的：

　　但维也纳人所不能饶恕我的

---

① ［本句的最后那个从句是1924年补上的。］

② ［这可能是指弗洛伊德的犹太人血统。］



是我欺骗他们莫要吵闹[①]。

我所不能胜任的这项任务——向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态度温柔地论证他们的不公正和专横——却由布洛伊勒在1910年写的论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种防卫和几点批评意见》中最完满地完成了。我竟如此自然地赞誉这篇论文（它在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批评），致使我要赶快谈到其中我所表示反对的东西。在我看来，它仍然表现出了偏心，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的错误太宽容，而对精神分析的信徒们的缺点则太严厉。这篇论文的这个特点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位如此深孚重望、有着如此不容置疑的能力和独立的精神病医生，其意见却不能承担他的同事们更多的重任。假如一本著作的影响不是由它的论证力量，而是由它的情调决定的话，那么《感情论》（1906年）的作者就不会感到惊异了。这篇论著影响的另一方面——它对精神分析追随者们的影响——后来则被布洛伊勒自己破坏了。1913年他在《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批评》一文中表明了他对精神分析的相反态度。在该论文中，他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结构竟然如此断章取义，致使我们的反对者们将非常高兴地得到精神分析的这位斗士所给予的帮助。但是，布洛伊勒的这些相反的判断却不是以新的论点或者更好的观察为基础的。这些判断只依赖于他自己的知识状况，也就是他自己不再容许的那种不适当性，就像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做的那样。由此看来，一个几乎无法弥补的损失曾在这里威胁精神分析。但是，在他最后的一本书《对我的论早发性痴呆的批评》（1914年）中，布洛伊勒集中全力对付向他发起的攻击，这些攻击说他把精神分析引进他的论早发性痴呆的书中，他还提出了他自己所谓的一种“放肆的主张”。“但是现在我将提出一个放肆的主张：我认为直到现在，心理学的各个学派对于解释心因性症状和疾病的性质几乎毫无贡献，但深蕴心理学却有助于这样一种心理学的创立，医生需要这种心理学以理解并合理地治疗他们的患者；我甚至相信，在我的《论早发性痴呆》一书中，我只是向着那种理解迈出了一小步。前两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最后那种说法则可能是错误的。”

既然他指的所谓“深蕴心理学”不是别的，而正是精神分析，我们现在就可以对这种认识表示满意了。

---

① ［席勒《小学徒》，Ⅱ，7。］



第三章

长话短说

*所谓世界的末日无异于放屁!*①

——歌德

在精神分析第一次私立的代表大会两年之后，1910年3月在纽伦堡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之间，部分地是由于受到在美国时令人高兴的接待的影响，受到讲德语国家中日益增长的敌意的影响，以及得到苏黎世方面意外支持的影响，我构想出一个计划，在我的朋友费伦茨的帮助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付诸实施。我意欲组织好精神分析运动，把运动的中心转移到苏黎世，并为它物色一名能领导精神分析未来事业的领袖。当这项计划遭到精神分析拥护者们的竭力反对时，我将为此详述我的理由。我希望这些理由将证明我是正确的，虽然结果表明，我这样做实际上并不很明智。

我断定这个新运动和维也纳的联系毫无可取之处，相反倒是精神分析运动的障碍。像苏黎世这样位于欧洲中心的地方（在这里一位大学教师曾在他的研究机构中为精神分析打开了大门），对我来说似乎更有希望。我还认为第二个障碍在我自己。关于这个看法已被各个不同方面的赞同或反对意见搞得一塌糊涂了：人们

---

① ［这两行诗是歌德晚年以讽刺诗体写的，其中魔鬼撒旦代表对拿破仑的强烈谴责，弗洛伊德引用的这两行诗是上帝父亲的回答。早在许多年以前（1896年12月4日），弗洛伊德在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引用了同一诗句作为论“抵抗”一章的启示警句。（弗洛伊德1950a，信51）关于弗洛伊德引用的语录目前在这方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并非互不相容）。他可能把这些诗句用于针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提出的那些批评，或者也可能讽刺地指向自己竟在这些琐碎小事上浪费时间。——大家也可能会注意到，为方便不懂德语的读者，“Jüngsten Tag（末日）”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写成大写字母“J”的。］



要么把我比做哥伦布[①]、达尔文和开普勒，要么辱骂我是个思想完全瘫痪的病人。因此，我倒希望把我自己和这座使精神分析第一次见到光明的城市退缩到幕后去。况且，我不再是个年轻人了；我发现前面还有很长的路，我为这种想法而苦恼，作为一个领袖的责任对我的一生来说为时太晚了[②]。但我觉得必须有人做领袖。我非常清楚这种隐藏着的危险，它等待着任何一位从事精神分析的人。我希望，假如推选出一个准备发布命令和进行忠告的权威人士，就会使许多这种危险得以避免。这个地位最初只有我自己才能担任，这是因为我有任何人都无法抗衡的15年的经验这一有利条件。我感到需要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年轻人，在我死后他将理所当然地取代我的地位。这个人只能是荣格，因为就年龄而论，布洛伊勒是我的同龄人；荣格的有利条件是他非凡的才智，他已经为精神分析做出的贡献，他的独立地位和他的人格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放心的能力印象。除此之外，他似乎愿意和我建立友好联系，甚至为了我而放弃了他以前所容许的某些种族偏见。在当时我还根本没有认识到，除了这些有利条件之外，这个选择竟是最不幸的选择。我所选中的这个人竟然不能忍让另一个人的权威，但他还是一个不会行使权力的人，他把他的能力坚持不懈地致力于研究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官方的学会，因为我担心精神分析一旦流行起来，就会受到人们的滥用。应该有一些指挥机关，它们的任务就是宣称："所有这一派胡言都和精神分析无关，这些都不是精神分析。"各地方组织的学会（这些地方组织合在一起将组成国际学会）应该对如何进行精神分析以及如何训练医生给予指导，地方组织的活动将因此而受到某种保护。另外，使我感到称心如意的似乎是，既然官方科学对精神分析宣布了严肃的禁令，并宣布对从事精神分析的医生和公共机构进行联合抵制，那么，精神分析的拥护者们就应该联合起来，进行友好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支持。

我曾经希望建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正在于此而别无他图。所能获得的东西可能还不止这些。正如我的反对者们所发现的那样，想要逆这场新运动的潮流而行是办不到的，因而我曾想发现，精神分析不会沿着我曾希望为它指定的方向前进。费伦茨在纽伦堡提出的建议确实被采纳了；荣格当选为主席，黎克林（Riklin）担任他的秘书；决定出版一种能把中央执委会和各地方组织联系起来的简报。学会的目的据称是"促进和推动弗洛伊德所建立的既是纯心理学（pure psychology）、又适用于医学和心理科学的精神分析科学；促进其成员间的相互支持，竭尽全力地获得和传播精神分析的知识。"这个方案只受到维也纳小组的强烈反对。阿德勒非常激动地表示了他的担心，他指的是"对学术自由的

---

① 这个人名是1924年增补的。

② [1910年弗洛伊德已54岁。]

检查和限制"。最后，在得到保证说学会的地址不会是苏黎世，而是任职主席的居住国时（任职主席每两年改选一次），维也纳小组才让步了。

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三个地方组织：一个在柏林，主席是阿伯拉罕；一个在苏黎世，该组织的首脑已成为整个学会的主席；一个在维也纳，我把指挥权授予阿德勒。后来在布达佩斯又成立了第四个组织。布洛伊勒因病未出席这次大会，他对于加入这个总会犹豫不决；确实，他是在和我做了一次私人谈话之后才被说服而加入了这个学会，但不久又由于在苏黎世一次不同的意见争论而退出学会。这就割断了苏黎世和伯格尔斯立机构之间的联系。

纽伦堡大会的成果之一是创办《精神分析中心杂志》，为了这份刊物阿德勒和斯特克尔联合起来了。最初显然是想代表反对意见的：这就意味着想为维也纳争回由于荣格当选主席而受到威胁的盟主权。但是，当这个刊物的两位创办者在难以找到一个出版商的困难情况下，使我确信了他们的和平意图，并且把允许我行使否决权作为其忠诚的一项保证时，我便接受了对这个刊物的指导工作，并且为这个新的刊物而精力充沛地工作；第一期于 1910 年 9 月出版。

现在我将继续讲述精神分析代表大会的历史，第三次代表大会是 1911 年 9 月在魏玛召开的，在总的气氛和科学兴趣方面比前两次大会更加成功。曾出席了这次大会的普特南后来在美国声称，这次大会使他非常愉快，他对与会者的"心理态度"（the mental attitude）表示了他的敬意，他还引用了我曾用过的与此有关的一段话："他们学会了忍受真理。"（普特南，1912 年）这是事实、凡是参加科学大会的人都会留下对精神分析学会的良好印象。我亲自主持了前两次大会，我允许每一个发言者有充分的时间宣读他的论文，把讨论留到以后在参加大会的成员之间私下进行。作为主席的荣格，接管了在魏玛大会的指导工作，并重新引入了在每次宣读论文之后进行正式讨论的做法，但是，这在当时还没有引起任何困难。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是两年以后（1913 年 9 月）在慕尼黑召开的。所有与会者对此仍然记忆犹新。这次大会是荣格以一种不适当的错误方式主持召开的；发言者有时间限制，而且讨论以绝对优势压倒了论文的宣读。由于一次预谋的机会，碰巧那个恶魔霍奇（Hoche）[①] 进入召开大会的那座大楼。霍奇本来应该毫无困难地承认他是胡说八道，分析学家说他的胡说把精神分析描述为盲目追随其领袖的一个狂热的派别。使人疲倦、令人厌恶的议程在重新选举荣格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之后结束了，他接受了这一职务，虽然有五分之二的与会者不愿意让荣格作为他们的支柱。我们四散而去，没有任何再次相会的愿望。

大约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力量是这样的：维也纳、柏林和苏黎世的地方组织早在 1910 年纽伦堡大会时就已成立了。在 1911 年 5 月增

① 参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加了慕尼黑的一个组织，主席是塞福（L. Seif）博士。同年第一个美国地方组织在布里尔的领导下成立，名称为“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在魏玛大会期间批准成立美国的第二个精神分析组织；该组织是第二年成立的，命名为“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包括来自加拿大和全美国的会员；普特南（J. J. Putnam）当选为主席，琼斯为秘书。在1913年慕尼黑大会之前不久，布达佩斯成立了地方组织，主席是费伦茨。此后不久已经回到英国去的琼斯成立了第一个英国的组织。这些地方组织（现在共有8个）的成员状况，当然，我们未能提供任何手段来估计未组织起来的精神分析的学生和拥护者的人数。

精神分析杂志的发展情况也值得简述一下。其中第一种是一系列专题文章，题目是《应用心理科学论文集》①，自1907年以来不定期出版，现已发行15期（出版者最初是维也纳的海勒，后来是F·德提克）。这些专题文章包括弗洛伊德的论文（第1和第7期）、里克林、荣格、阿伯拉罕的论文（第4和第11期）、兰克的论文（第5和第13期）、萨杰、普费斯特、格拉夫、琼斯的论文（第10和第14期）、斯托福和凡·哈格海尔缪斯的论文②。当《意象》杂志创办时（过一会儿将要提到［第47页］，这种出版形式不再具有同样的价值。在1908年萨尔茨堡会议之后，创办了《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在荣格的编辑下出版了五年，现在又重新再版，有两个新的编辑③，并且名称也有少许变动，称为《精神分析年鉴》。它的意图不再像近年来那样，仅仅是一个出版自用著作的仓库，而是通过编辑们的活动，使《年鉴》致力于完成在精神分析领域内所做的一切工作和所取得的一切进展这个目的④。我已经提到的那个《精神分析中心杂志》（这是在1910年纽伦堡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之后由阿德勒和斯特克尔创办的），在短暂的发行期间经历了剧烈动荡的发展过程。早在第1卷的第10期上（1911年7月），有一条通知出现在头版上，内容是，由于和刊物指导者学术观点上的分歧，阿德勒医生决定自愿退出编辑工作。此后斯特克尔医生留任为惟一的编辑（从1911年夏天开始）。魏玛大会（1911年9月）把这份中心杂志的地位提高为国际学会的官方刊物，并且适用于全体会员，这样又反过来增加了每年的订购量。从第2卷⑤的第3期开始（1912年冬，12月），斯特克尔成为惟一对其内容负责的人。他的行为（要对此发表一篇报导并非易事）迫使我放弃了对该刊物的指导，并且急忙为

---

① 见弗洛伊德为该系列论文所做的内容简介（1907e）。

② ［1924年增注］此后又出版了更多的著作，包括萨杰的著作（第16和第18期），基尔霍茨的著作（第17期）。

③ 见英文版第7页注。

④ ［1924年增注］战争一开始这份杂志［只发行了一卷（1914年）之后］就停止出版了。

⑤ ［第2卷是以前编辑出来的，事实上应该是“第3卷”。这儿卷的日期是从10月到次年9月。］

精神分析创办了一个新的刊物《国际医学精神分析杂志》。经过几乎所有工作人员和那个新出版商雨果·海勒（Hugo Heller）的齐心协力，第1期在1913年1月出版了；因此这份杂志就取代了《中心杂志》而成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官方刊物。

同时，早在1912年，一个完全是为了把精神分析应用于心理科学的新刊物《意象》杂志（海勒负责出版），由汉恩斯·萨克斯医生和奥托·兰克医生创办出版。《意象》杂志现正发行第3卷；读来妙趣横生，订户日益增多，有些订户几乎和医学分析毫无关系①。

除了这四种期刊出版之外（即《应用心理学论文集》、《年鉴》、《国际医学精神分析杂志》和《意象》），德国国内外的其它杂志也发表了一些可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文章。莫尔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指导的《变态心理学杂志》对精神分析做出了如此卓越的贡献，因而我们必须把这份杂志看作是美国精神分析文献的主要代表。1913年冬，怀特（White）和杰里佛（Jelliffe）在纽约创办了一个完全致力于精神分析的新刊物《精神分析文摘》。毫无疑问，应该记住这个事实，就是说，在美国大多数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医务人员都感到德语是个难关②。

我现在必须提及在精神分析的信徒中发生的两次退出事件；第一次发生在1910年学会的建立和1911年魏玛大会期间；第二次发生在此后，并且在1913年慕尼黑大会上变得明显起来。假如我在分析治疗中更多地注意病人的这些反应，那么，他们使我感到的失望就可能会避免。我当然非常清楚地懂得，任何人在初次探讨精神分析这个不受欢迎的真理时都会逃跑的；我始终认为，每个人对精神分析的理解是受他自己的压抑（或者宁可说，受支持这些压抑的抵抗）制约的，这样，在他同精神分析的关系中就不能超越某一特定的界限。但是，我却未曾想到，一个已经在精神分析的理解上达到了一定深度的人竟然置这种理解于不顾，并把它丢弃了。不过，治疗病人的日常经验已经表明，每当在心灵的任何深度产生特别强烈的抵抗时，都会引起病人对分析知识的完全抵抗；一个人在费力地使病人掌握一部分分析知识，并使他像支配自己那样在支配这些知识方面，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但是，还可以看到，在他控制了下一步的抵抗之后，就会把他学会的一切都抛弃不顾，而且还进行防御，就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初学者所做的那样。

---

① ［1924年增注］这两种刊物的出版于1919年迁至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目前（1923年），这两种刊物都出版到第9卷（实际上《国际杂志》出版了11年，《意象》杂志出版了12年。但是，由于战争的爆发，《国际杂志》第4卷停刊不止一年，即1916～1918年；《意象》杂志的第五卷停刊于1917～1918年）。当第6卷开始发行的时候，《国际杂志》的标题上去掉了"医学"一词。

② ［1924年增注］1920年厄内斯特·琼斯着手为英美国家的读者创办《国际精神分析杂志》。



这使我不得不认识到，在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身上所能发生的事和在分析中病人的行为如出一辙。

要写出这两次退出事件绝非易事，也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部分的原因是，我没有如此强烈的这样做的个人动机——我既不奢望得到感谢，也不想在任何有效程度上施加报复——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我知道，假如这样做，我将会使自己受到人们的抨击，说我是一个不太严肃认真的对手，而且这样做会给精神分析的敌人提供这种他们非常渴望看到的情况——“精神分析学家们互相攻击，四分五裂”。在为了不致于受到精神分析之外的对手们的攻击而进行了极大的自我克制之后，我现在被迫奋起反击这些以前的精神分析追随者们，或者说是这些仍然愿意自称为精神分析追随者的人们。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别无选择；只有懒惰或懦弱才会使一个人保持沉默，而沉默所造成的危害比已经存在的、公开表现出来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任何一个追随其他科学运动发展的人都会知道，同样的动乱和意见分歧也会在这些运动中出现。也可能是这些动乱和意见分歧在什么地方更小心翼翼地隐蔽着；但是，拒绝接受这么多传统理想的精神分析，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得也更加真实。

另一个非常严重的倒退是，我不能完全避免使这两个反对运动在分析之下原形毕露。但是，把分析用于辩论是不合适的；因为分析往往是以被分析者的赞同和有主有从的情境为先决条件的。因此，任何一个出于辩论目的而从事分析的人，一定期望那个被分析的人反过来用分析来反对他，这样，这个讨论将会达到一种不可能使任何不偏不倚的第三者确信的状态。因此，我将最大限度地克制轻率地使用对我的敌人才使用的那种分析的知识和攻击；我还要指出，我并没有把任何科学的批评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我对可能包含在我所反对的这些理论中的真理并不关心，我也不想驳斥这些理论。我想把这项任务留给精神分析领域的其他有资格的工作者去完成，事实上，这项任务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我只想表明，这些理论是反驳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并且说明是在哪些观点上反驳的），为此这些理论是不应该称之为精神分析的。因此，我利用分析只是为了解释精神分析的这些分歧是怎样在分析学家中产生的。当我涉及到产生分歧的要点时，我将不得不用某些纯批判性的言词来保卫精神分析的正当权益。

精神分析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解释神经症；它把抵抗和移情这两个事实作为出发点，还探讨了第三个事实（遗忘症），用神经症中的压抑理论、性动机理论和潜意识理论对这些病况进行解释。精神分析从未要求全面提供关于人类心理的一般状况的全部理论，而只期望它所提供的理论应该用来补充和纠正用其它方法所获得的那种知识。但是，阿德勒的理论完全超出了这一点；他的理论寻求一举解释人类的行为和特点，以及人类的神经症和精神病。这个理论与其说适合于神经症领域，倒不如说更适合于任何其他领域，虽然有理由说，这个理论和它仍然

十分重视的它的理论发展史是有联系的。多年来我有机会研究阿德勒医生，也从未拒绝承认他的不同寻常的能力，并且为他做了特别深思熟虑的安排。作为他声称受到我的“迫害”一事，我可以指出这个事实，在学会成立之后，我让他做维也纳小组的领导者。直到学会的全体成员提出迫切要求，我才被说服重新主持精神分析的学术大会。当我发现阿德勒恰恰是在判断潜意识材料上多么缺乏才能时，我就改变了想法，而期望他能成功地发现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联系以及精神分析和本能过程的生物学基础的联系——根据他所做的“器官自卑”（organ inferiority）[①]。这一有价值的研究来看，这个期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合理的。他确实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卓有成效；但他的工作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用他自己的“难懂的话”来说[②]——是想证明精神分析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错误的，由于精神分析轻率地听信了神经症患者的话，而把这么多重要的东西都归因于性动机的力量。我甚至可以公开指出他的研究的个人动机，因为他曾当着维也纳小组的一小部分人的面宣布：——“你以为使我的一生处在你的保护之下会给我带来那么多快乐吗?”当然，一个年纪轻轻的人自由地承认他的勃勃雄心，我看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猜测，他的工作是应该受到鼓励的。但是，即使一个人受这种动机支配，他也应该知道如何用他的良好的社会机智来避免英语所谓的“不公平”（unfair）——这在德语中只能用一个更粗鲁的词来表达。阿德勒在这一方面几乎没有获得成功，这一点可以通过大量出现的有损于他的著作的微小恶意表现出来，并通过他的作品所包含的那种无法控制的渴望获得优先权的迹象表现出来。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中，我们确实曾经听到他要求获得提出“神经症统一”（unity of the neuroses）和神经症的“动力观”（dynamic view）概念的优先权。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始终认为这两个原则是我在认识阿德勒之前提出来的。

不过，和阿德勒进行的这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已经产生了一种必定会有益于精神分析的好处。在不可调和的学术上的意见分歧公开化之后，当我被迫让阿德勒辞去《中心杂志》的编辑职务时，他同时也脱离了维也纳学会，并创建了一个新的组织，最初采用了一个雅致的名称“自由精神分析学会”。但是，和精神分析毫无联系的局外人，在识别这两种精神分析观点之间的差异方面的不熟练，就像我们欧洲人在发现两个中国人的脸之间的那些差异一样。“自由”精神分析是受“官方的”、“正统的”精神分析保护的，并且只作为后者的一个附属组织来对待的。然后，阿德勒采取了一个使我们非常感激的措施：他断绝了同精神分析的一切联系，把他的理论命名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在上帝创造

① 阿德勒，1907年。

② [“好像”和“难懂的话”这两个词都曾经在阿德勒的著作中显要地出现过。]



的这个地球上有足够的空间，任何人都完全有权在地球上毫无阻拦地到处闲逛；但是，要使已经不再相互理解并且互不相容的人住在同一个家庭里，却不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现在是许多和精神分析相对立的心理学派别之一，它的进一步发展与我们的精神分析无关。

阿德勒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体系”　这曾经是精神分析小心翼翼地想要避免的。他的理论也是“润饰作用”（secondary revision）的一个极好的实例。例如，就像在梦的材料接受清醒的思维活动支配的那个过程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就阿德勒的情况而言，梦的材料的地位被通过精神分析研究所获得的新材料所取代；其后，这些材料又纯粹是从自我的立场来看待的，被缩减到自我所熟悉的范围里而发生变化并被歪曲了——正如在梦的形成中所发生的那样——被误解了[①]。另外，阿德勒的理论与其说具有它所主张的那种特点，倒不如说更具有它所否认的那种特点，这样，他的理论就是由三种完全不同价值的成分组成的：（1）对自我心理学有用的贡献；（2）虽然毫无必要但还可以接受的那种把分析事实转变成新的“难懂的话”；（3）当这些事实不符合自我的要求时，就歪曲和篡改这些事实。

精神分析从来没有忽视第一种成分，虽然这些成分不值得受到特别注意；精神分析更关心的是想表明，每一种自我倾向都包含着力比多成分。而阿德勒的理论所强调的却与此相反，是在力比多的本能冲动中自我的组成成分。如果阿德勒不是为了支持其自我中心的本能成分而否认力比多冲动，从而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使用这种观察的话，那么，这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他的理论所做的就是每一个病人所做的，也是我们的意识思维大体上所做的——就是说，正如琼斯（1908年）所称的那样，为了隐藏潜意识动机而利用了一种“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阿德勒如此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个观点，他自信地认为，在性活动中最强烈的动机力量是，男人想表明自己对女人的控制　男人是“高高在上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他的论著中表述了这些荒谬的观点。

精神分析早就认识到，神经症的每一个症状都产生于可能存在的某种妥协。因此，每一种症状一定以某种方式遵循着进行压抑的自我的要求；它一定会提供某种好处，它一定承认具有某种用途，或者说，它一定会遭到像原始的本能冲动自身所已经避开的那种同样的命运。“从疾病中获益”这个术语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症状想要继续存在，那么，人们把自我的“原发性获益”（这一定是在产生症状时获得的）和“继发性获益”（这是在依恋于自我的其他目的时意外发生

---

① 「见《释梦》第六章，第一节，标准版，第5卷，第490页。]

的）区分开来，也是有道理的①。我们也早就知道，把这种获益从疾病中撤离出来，或者由于真实的外界环境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使这种获益消失，实为治疗这种症状的机制之一。在阿德勒的学说中，主要强调的是那些容易证实的和明白易懂的方面，而完全置如下事实于不顾，即在无数情况下，自我由于其用途而在屈从于强加给它的非常讨厌的症状时（例如，把焦虑作为一种安全的手段），只是把非做不可的事装成出于好心才做的。自我在这里扮演的是马戏团里的小丑那个滑稽可笑的角色，这个丑角试图用他的手势使观众信服，在马戏团表演中的每一种变化都是在他的命令下进行的。但是，只有最年幼无知的观众才会受他的欺骗。

精神分析不得不对阿德勒理论的第二个构成成分加以支持，正如这个理论将会给它自己的某些东西提供支持那样。事实上，这个理论不过是精神分析的知识而已，这是那位作者在十年共的同研究期间从众所周知的根源中推断出来的，现在，他只是改换了一个术语就称之为他自己的了。例如，我自己认为"防卫"（safeguarding）是一个比"保护措施"（protective measure）更好的术语，这是我使用的一个术语；但是，我绝没有发现这两个术语在意义上有何差别。再者，当一个人用早期"幻想出来的"和"幻想"这样的术语来代替"虚构出来的"、"存在于想象中的"和"虚构"（fiction）时，在阿德勒的命题中又会发现许多熟悉的特征。精神分析是坚决主张这些术语的同一性的，即使这些术语的作者多年未参加我们的共同研究工作。

阿德勒理论的第三部分，对不合意的分析事实进行曲解和篡改，实际上就是把"个体心理学"，正如他现在所称的那样，和精神分析明确区分开来的东西。正如我们所知，阿德勒体系的原则是，个体的自我主张（self-assertion）的目标，或他的"权力意志"，是以"男性抗议"（masculine protest）② 的形式，在生命活动中，在性格形成和在神经症中起主要作用的东西。但是，这个"男性抗议"，即阿德勒的动机力量，不是别的，而是从他的心理学机制中分离出来的压抑，除此之外，它还是性欲化的——这和他自夸的把性欲从心理生活中排除出去完全不一致③。"男性抗议"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心理生活的（惟一的）动

---

① ［从疾病中原发性获益（primary gain）和继发性获益（secondary gain）的全面讨论，将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4讲中找到。］

② ［"男性抗议"一词是阿德勒在1910年纽伦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的一篇论文《生活与神经症中的心理雌雄同体》中提出来的。论文摘要发表在《精神分析学与精神病理学年鉴》（1910年）第2期，第738页，论文的全文发表在《医学进展》杂志上，（1910年）第28期，第186页。］

③ ［弗洛伊德在他的论文《孩子挨打：写给性倒错起源的研究》（1919e），标准版，第17卷，第200页的结尾部分，以更长的篇幅论述了阿德勒对压抑的解释——关于对自恋的"男性抗议"的讨论将在英文版发现（第92页）。］



机力量，那么，被观察到的事实就会作为一个用来起跳之后而留下来的跳板。让我们考虑一个基本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感受到一种婴幼儿时期的愿望，即儿童观察成人之间性活动的愿望。分析表明，在医生后来将要对其生活史予以关注的那些人的病例中，未成年观察者在这时有两种冲动，在男孩中一个冲动是使自己处在主动的男人地位，而另一个冲动则与此相反，是想使自己和被动的女人一致的冲动[1]。这两种冲动往往会在其中耗尽可能发生的快乐情境。第一个冲动可以在“男性抗议”的标题下出现，如果这个概念想完全保持任何意义的话。但是，第二种阿德勒所不予重视的和他一无所知的那个进一步的过程，却是在以后的神经症中变得更加重要的一个过程。阿德勒竟然陷入到自我那个妒忌的狭窄气量中，以致于他只考虑那些适合于自我，并受到自我鼓励的本能冲动；在神经症的情况下，冲动是和自我相反的，这正是超出他的见识的那种情境。

精神分析已使一项努力成为必要，即将其理论的基本原则与儿童的心理生活相联系。就此而言，阿德勒却表现出，他最严重地脱离了实际的观察，显示出他在概念上最基本的混乱。在这里他把“男性的”和“女性的”的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意义毫无希望地混杂起来[2]。让一个儿童（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一出生就在蔑视女性的基础上制定他的生活计划，并把希望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作为他的“指导路线”（guiding line）[3]，这是不可能的，也为观察证明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儿童没有区分性别意义的观念；相反，他们最初是这样假设的，认为两性都有同样的生殖器官（指男性生殖器）；他们并不是以区分性别这个问题开始其探索的[4]，社会对女人的轻蔑对儿童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对某些女人而言，在她们的神经症中，想成为一个男人的愿望并不起作用。无论在男性抗议中可能表明存在着什么东西，都很容易追溯到由于害怕阉割或与性活动发生最早期冲突而产生的最初自恋的障碍。关于神经症的心理发生学（psychogenesis）的一切争论，最终必须在儿童神经症领域确定下来。对一个早期儿童神经症的认真分析，将会结束对神经症病因学（aetiology）的一切误解，结束关于对性本能在神经症中所起作用的一切疑问[5]。这就是为什么在对荣格的论文《儿童心灵中的冲突》（1910c）进行批评时，阿德勒（1911a）被迫转嫁罪责，认为该病例的这些事实无

---

① ［参见《自我和本我》（1923b）第三章。］

② ［参见弗洛伊德在1915年给《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三篇论文第四节补加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7卷，第219页以下。］

③ ［“leotlinie”（指导路线）是阿德勒常用的一个术语。］

④ ［这个说明（在1915年弗洛伊德给《性学三论》的第二篇第五节补加的一段话里重复过，标准版，第7卷，第195页。在他后来的关于区分两性的（1925j）论文中做了更正。］

⑤ ［对这个事实的说明是弗洛伊德对“狼人”分析（1918b）的主要论点，在本文写出后几个月弗洛伊德就开始起草“狼人”。］

疑是（这个儿童的）父亲片面安排的。

我将不再详述阿德勒理论的生物学方面，也不再讨论究竟是实际的"器官自卑"（英文版第51页注①），还是对它的主观感受——人们并不知道是哪一个——真能作为阿德勒体系的基础。我只是附带地说明一下，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神经症似乎就是一切身体衰老的副产品，而观察却表明，大多数使人印象深刻的、丑陋的、畸形的、残暴的和可怜的人并不能用神经症来影响他们的缺陷。我将不再讨论这个有趣的主张，根据这个主张，自卑感可以追溯到作为一个儿童的情感。这表明在"个体心理学"中又出现了这种伪装，精神分析如此坚决强调的那种幼稚病（infantilism）的因素就是以此做伪装的。另一方面，我必须指出，精神分析所获得的一切心理学知识是如何被阿德勒抛到九霄云外的。但是，在他的《神经症的构成》（1912年）一书中，潜意识仍然被作为一种与他的体系毫无关系的心理学所特有的东西提出来。后来他一直坚持声称，一个观念究竟是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这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阿德勒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他并没有理解压抑。他在维也纳学会（1911年2月）宣读的一篇论文摘要中写着，必须指出，在一个特殊的病例中有证据表明，这个病人从未压抑过他的力比多，而且一直在不断地保护自己免受压抑①。此后不久，在维也纳学会的一次讨论中他说道："如果你想问压抑来自何处，那么回答就是'来自文明'；但是，如果你继续询问文明来自何处，则回答就是'来自压抑'。所以请看，这完全是在玩弄文字游戏。"阿德勒据以揭露"神经症特点"的防御机制的那一点点敏锐和机智，将足以指明他的这种诡计多端的论点的出路。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文明是建立在前几代人产生的压抑基础上的，而要求每一代新人通过产生同样的压抑来保持这种文明。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事儿，一个小孩认为人们在嘲笑他而哭起来，因为当他问鸡蛋来自何处时，人们告诉他"来自母鸡"，而当他继续问母鸡来自何处的时候，人们则告诉他"来自鸡蛋"。但是，人们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相反，人们是在向他讲述真理。

阿德勒不得不说的关于梦（这是精神分析的术语）的一切都同样是空洞的和毫无意义的。起初，他把梦看做是女子气转向男子气的一个转折点——无非是把梦的愿望满足理论转变成"男性抗议"的语言。后来他发现，梦的实质在于使人潜意识地完成他们有意识否认的东西。阿德勒（1911b，第215页注）在把梦和潜伏的梦念（dream-thoughts）混为一谈方面，也一定具有优先权的——这是一种建立在发现他的"预期倾向"（prospective tendency）基础上的混淆。米德（Maeder，1912年）后来在这方面效法了他②。这里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对在表现形式上不可理解的每一种梦的解释，都是以这种梦的解析的根本方法为基础

---

① 这个摘要将在《精神分析中心杂志》第1期第371页找到。

② [参见1914年给《释梦》增补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5卷，第579～580页）。]



的，这种方法的前提和结论尚在争论之中。关于抵抗，阿德勒告诉我们，抵抗服务于把病人对医生的反抗付诸实施这个目的。这当然是真的；简直就等于说，抵抗服务于抵抗的目的。但是，关于抵抗来自何处，或者受病人支配的抵抗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就不再深究了，因为这对自我是毫无助益的。关于疾病的这些症状和表现的详细机制，对那些各种各样疾病及其表现形式的解释也都完全不予理睬；因为一切类似的东西都被迫服务于这种“男性抗议”、自我主张和人格扩张。这个体系是完整的；要重新解释它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虽然这个体系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观察。我认为我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个体系是和精神分析无关的。

在阿德勒的体系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生观，是完全建立在攻击本能基础上的；这个体系中并没有爱的立足之地。我们可能会感到奇怪，这样一种惨淡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竟会受到人们极大的注意；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人类由于受到性需要这个重担的压力，因此，只要把“克服性欲”作为一个诱饵提供给人类，人类就乐于接受一切。

阿德勒的退出发生在 1911 年魏玛大会之前；此后那些瑞士人也开始退出。非常可笑的是，这种退出的最初的标志是黎克林在瑞士的一些出版物上发表的一些流行的文章中的几句话，因而普通大众反而比最密切关注这个问题的人知道得还早。他们认为，精神分析已经克服了一些早先使它丢人现眼、令人遗憾的错误。1912 年，荣格在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中夸口说，他对精神分析的改革已经克服了许多人的抵抗，这些人曾经拒绝承认和精神分析有任何联系。我回信说，这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他对辛辛苦苦获得的精神分析的真理牺牲得越多，就会越多地发现抵抗消失。那些瑞士人如此自豪地加以介绍的这种改变不是别的，也无非是使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性因素不再具有重要地位而已。我承认，从一开始我就把这种“进步”看做是对现实要求的一次过于深远的调整。

这两种和精神分析倒行逆施的运动（我现在必须对它们进行相互比较）表现出另一个共同点；因为它们都通过提出一些玄虚的观念而企求获得某种赞同的意见。可以说，这些玄虚的观念把一切事物都看做是旁门左道。在阿德勒看来，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和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对知识资料进行人为建构的人格权力就起这个作用；在荣格看来，这是向年轻人呼吁摆脱桎梏的历史权力，在这种桎梏下暴政时代曾用它们墨守成规的观点寻求把它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必须说几句话来揭露这些观点的谬误。

我们知识的相对性是出于这种考虑，它的提出就像人们用以反对精神分析那样，可用来反对每一种其他科学。它是从当前对科学充满敌意的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反动潮流中派生出来的，并要求得到一种谁也没有资格获得的优越感。我们谁也无法猜测，人类对我们的理论努力将会做出什么样的终极判断。在有些例子中，被前三代人所反对的东西却被下一代人加以改正并重新得到认识。在一个人仔细

听取了对他本身的批评意见，并且稍微注意他的对手们的意见之后，他除了全力维护他自己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信念之外，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一个人应该为诚实地从事他的事业感到满足，而不应该奢望法官的判决，这是留待遥远的将来的事。在科学问题上强调武断的个人观点是不好的；这显然是企图剥夺精神分析要求作为一门科学来得到评价的权力——顺便提一句，这是在这种评价已经被前面所提到的东西（一切知识的相对性）贬低之后。任何一位对科学思想评价很高的人，都会尽一切可能在这门科学能起很大作用的地方，寻求每一种可能的手段和方法，来约束怪诞的个人爱好这个因素。此外，正好可以说明，在保护自己时的任何热情都是不合适的。阿德勒的这些辩解在本意上并不是严肃的——这些辩解只是用来反对他的对手的，而不涉及他自己的理论。这些辩解也没能阻止他的追随者把他拥立为救世主，因为许多前驱者已经为他的出现做好了预期的人性方面的准备。救世主当然不是相对的现象。

荣格的论点“为了获得良好意志这个目的”，是建立在一个过于乐观的假说基础上的，即人类及其文明和知识的进步总是沿着一条连续的路线发展；就好像没有衰败的时期，在每一次革命之后都没有反动和复辟，每一代人都没有后退和放弃他们前辈所获得的东西。荣格对群众观点的探讨，他对证明为不受欢迎的那种改革的放弃，都已先验地表明下述观点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荣格对精神分析的修正不可以公正地称为一次朝气蓬勃的解放行动。对此起决定作用的，毕竟不是行动者的年龄，而是其行动的特点。

在我们正讨论的这两种运动中，阿德勒的理论无疑更为重要；虽然犯有激进的错误，却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此外，姑且不论其他的一切，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一种本能理论上的。另一方面，荣格对精神分析的革新却松弛了这种现象和本能生活的联系。而且，正如该理论的批评者（如阿伯拉罕、费伦茨和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理论太晦涩难懂，致使人们难以采纳它的任何观点。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人掌握了荣格理论的一点东西，他就必须做好准备，听到别人说他误解了荣格的理论，从而使人看不出怎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它。这个理论是以一种特别踌躇不决的方式提出来的，一会儿作为“一种相当轻微的偏差，这种偏差并不能证明对该理论提出的强烈反对是正确的”（荣格）；一会儿又作为将要为精神分析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灵魂救助的新预言，而且确实，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当一个人在思索荣格这场运动所做的各种公开和私人说明中表现出来的那些不一致时，就一定会自问，这个运动有多少应归咎于缺乏清晰感，有多少应归咎于缺乏诚意。但是，必须承认，这个新理论的阐述者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困难的境地。他们现在所反对的东西正是他们以前所赞成的东西，另外，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以能教他们更多东西的新观察为基础的，而是由于这些新的解释使他们发现



的那些东西，现在看上去和他们以前所看到的不同了。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愿意放弃和精神分析的联系，他们作为精神分析的代表已为世人所知，因而宁愿这样说，精神分析发生了变化。在慕尼黑大会上，我发现有必要澄清这种混乱。我是这样做的，我宣布不承认那个瑞士人的革新是由我发起的精神分析的合法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外界的批评家（像佛特缪勒，[Furtmüller]）已经发现究竟是怎么回事了，阿伯拉罕正确地指出，荣格已经完全放弃了精神分析。我当然完全愿意让每一个人都有权力随心所欲地去思考和写作；但他没有权力把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东西提出来。

正如阿德勒的研究给精神分析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对自我心理学的贡献——并因而希望我们为这份礼物付出太高的代价，即放弃精神分析的一切基本理论；与此相似，荣格及其追随者也以同样的方式，通过给精神分析提供一个新的东西，从而为他们反对精神分析的斗争铺平了道路。他们详细追溯了（就像普费斯特以前所做的那样）属于家庭情节和乱伦的对象选择的性观念材料，如何被用来代表人类的最高道德和宗教利益的方式——就是说，他们阐明了升华作用的一个重要实例。这种升华作用是指爱欲的力量及其转变为不再被称为爱欲的倾向。这和精神分析的一切期望完全一致，并且也和如下观点相吻合，即在梦和神经症中这种升华作用的退行分裂，就像所有其他分裂一样，变得清晰可见了。但是，全世界则会愤起抗议，道德和宗教被性欲化了。现在，我忍不住不止一次地从目的论上设想，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创新者会敌不住这场愤怒的风暴。或许愤怒是从他们自己的心里发出的。这么多瑞士人的神话论的史前期并不能说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态度，正如阿德勒的社会主义史前期不能说明他的心理学的发展一样。这使人想起马克·吐温关于他的手表及其结论的著名故事："而他常常感到奇怪，不知道所有那些不成功的补锅匠、枪炮修理工、鞋匠和铁匠们怎么样了；但却没有人告诉他。"

假设——让我们做一个明喻——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中有一个暴发户（parvenu），他夸口说他是住在另一个地方的贵族家庭的后裔。但是，有人向他指出，他的父母就住在邻近的某个地方，是很微贱的人。对他来说只有一种摆脱窘境的方法，他会利用这种方法的。他可能不再否认他的父母，而是声称他们自己具有贵族血统，只是败落了而已；他从好心的官方那里得到了他的家谱。在我看来这些瑞士人似乎是被迫以非常相同的方式做事情的。假如道德和宗教不容许被性欲化，而必须从一开始就是某种"更高级"的东西，假如其中包含的观念虽然不可否认地来自伊谛普斯情结和家庭情结，但却只能有一条出路：最初这些情结本身一定不会有它们似乎正在表达的那种意思，而是具有更高级的"神秘的"意义（就像西尔伯勒所称的那样），这就使他们能够把这种意义用在一系列抽象的道德和宗教神秘主义的思想之中。



我完全准备再次听到，我误解了这个新苏黎世理论的实质和目的；但我必须预先声明，我不服任何对我的观点的反驳，我可以提出我对这个理论的看法，但不能由该学派的出版物说三道四然后强加于我。我找不到任何别的方式来使我对荣格所改革的全部内容明白易懂，并掌握其全部含义。荣格对精神分析提出的一切改革都出于以下意图，即消除在家庭情结中应该反对的东西，便以使之不在宗教和道德中重新出现。一个抽象的概念已经提出，用来代替性欲力比多。关于它，人们这样说准没错，它的神秘和晦涩对于智者和蠢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伊谛普斯情结只有一种“象征的（symbolic）”意义：母亲在这种意义上就意味着难以达到，这一点是为了文明的利益而必须反对的；在伊谛普斯神话中被杀害了的父亲是“内部的”父亲，一个人为了使自己独立就必须摆脱父亲的限制。关于性观念材料的其他部分无疑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得到同样的重新解释。在自我毁灭的性倾向和自我保存的性倾向之间发生冲突的地方，出现了“生活任务”（life-task）和“心理惰性”（psychical inertia）（第272页）之间的冲突；神经症患者的罪疚感是和他的自我谴责一致的，这种自我谴责说他没有恰当地完成他的“生活任务”。以这种方式创造出一种新的宗教—道德体系，就像阿德勒的体系那样，这个新体系一定会重新解释、歪曲和抛弃那些事实上是精神分析所发现的东西。而真实的情况是，这些人从生活的谐音中挑选出几个文化的陪音，而且仍然没能听到本能的强大而原始的乐曲。

为了维持这个体系的原样，我们有必要完全不用观察、不用精神分析的技术。有时候对这个问题的热情甚至会使人不顾科学的逻辑——正如当荣格发现，伊谛普斯情结对神经症的病因学来说还不够独特，并且开始把这种独特性归因于惰性时那样，这种惰性是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物质的最普遍特性。顺便说一句，人们还要注意到，伊谛普斯情结只代表个体的心理力量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它本身并不是像“心理惰性”那样的一种力量。对个别人的研究已经表明（并将永远表明），性欲情结就其原始意义来说在这些人身上是很活跃的。因此对个体的研究（在这些新理论中）就被推到了后面，并且被从人类学研究中获得的证据基础上的结论所取代。冒着最大的危险起而反对这些得到重新解释的情结的原始而又不掺假的意义，是在每一个体的童年早期发现的；因此在治疗中提出的禁令是，应该尽可能少地细述这一过去的历史，并把强调的重点回复到当前的冲突上来。另外，在这个冲突中基本的问题绝不是偶然的和个人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事实上，是没有完成生活任务。但是，如我们所知，只有当我们把一个神经症患者当前的冲突追溯到他的个案史，只有当一个人沿着他的力比多在生病时所走过的道路返回时，才能理解这个神经症患者当前的冲突并使之得到解决。

在这些影响之下，这个新苏黎世派的治疗所采取的形式，可以用一个亲自体验到这种治疗的病人的话来表示：“这一次丝毫也没有注意过去或者注意移情。凡



是我认为我已经认识到后者的地方都被宣布是一种纯力比多符号。这种道德教育是相当不错的，我切实遵从过这种教育，但我却没有向前迈进一步。使我感到的烦恼比使他感到的烦恼更甚，但是我怎么办呢？……不是通过分析来解脱我，而是每天向我提出大量的新要求，要治好神经症就必须满足这些要求——例如，借助于内倾的内向反省、宗教沉思、和我的妻子重新开始爱情生活等。这几乎是一个人力所不能及的；其目的在于使一个人全部的内在性质发生根本的转变。我觉得这种分析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悔悟情感和最好的解决方法，但同时又是最令人沮丧的可怜的罪人。任何一位牧师都会提出他的忠告，但是，我上哪儿去找这种力量呢？"这位病人确实报告说他已经听说过，必须先对他进行过去的和移情的分析；但是他却被告知这种分析已经足够了。既然这第一种分析对他没有更大的帮助，那么，对病人的这种分析就是不够的，这个结论在我看来似乎是有道理的。当然，再也无权称为精神分析的随后进行的治疗并未使问题得到改善。显而易见，苏黎世学派的成员为了在附近的伯尔尼城振奋起来（杜布瓦[①]就在这个城市里用一种考虑更周全的方式通过道德鼓励来治疗神经症），就必须取道维也纳做一次长途旅行[②]。

当然，与精神分析完全不一致的这个新运动，也表现在荣格对压抑的态度（现在在他的论著中很少提到）上，表现在他对梦的误解（这一点和阿德勒一样，参见第 57 页）上，表现在他完全无视梦的心理学，把梦和潜隐的梦念混为一谈，表现在他完全丧失了对潜意识的理解——简言之，表现在我认为是精神分析实质的一切方面。当荣格告诉我们，乱伦情结只是"象征性的"，并非"真的"存在，一个野人毕竟不会对一个老丑婆产生欲望，而会对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产生欲望的时候，我们很想下个结论，"象征性的"和"并非真的存在"只不过表示这样的意思，即由于它的表现形式和致病的作用，而被精神分析描述为"潜意识存在的"——这是对解决这种明显矛盾的一种描述。

假如一个人牢牢记住，梦和它们所加工的潜隐梦念是不同的，那么，对病人梦到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在治疗期间，病人的心灵中一直充满了这些事情，不论这是"生活任务"还是"高高在上"，抑或"地位卑下"。被分析者的梦无疑可以得到指导，就像为实验目的而施加的刺激所支配的方式一样。人们能够确定在梦中出现的一部分材料；这些材料并没有改变梦的实质和机制中的任

① ［保罗·杜布瓦（Paul Dubois，1848～1918）］是伯尔尼市的神经病理学教授，20 世纪初由于他用"劝导法"（persuasion）治疗神经症而有些名气。

② 我知道有些反对意见是利用病人的叙述，因此我将特地说明，向我提供情况的这个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完全能形成判断。他是完全自愿向我提供这个情况的，我未经他的同意就利用了他转达的信息，因为我不能容许精神分析的技术有任何权力要求得到医学判断的保护。



何东西。我也不相信他们所谓“传记的”梦会出现在分析之外①。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对治疗之前出现的梦进行分析，或者，如果人们考虑一下做梦者自己添加上的东西，这是做梦者添加到在治疗期间向他提示的东西上去的，或者，如果人们避免向病人布置任何这种任务，那么，人们就会探究梦究竟离它试图完成生活任务的目的有多远。梦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人们绝不可能通过提到这些思想内容就能达到对这种形式的理解；只有通过对梦的工作的评估才将导致这种理解②。

人们不难发现对荣格娱解和偏离精神分析所进行的实际反驳。每一种以适当形式进行的分析，特别是对儿童的每一次分析，都会加强精神分析据以建立的这些信念，都会驳斥荣格和阿德勒体系所做的重新解释。在荣格大彻大悟（启蒙）之前的那些日子里，他亲自进行（1910b，英文版前面第 31 页）并且发表了他对一个儿童的这种分析；至于他是否将借助于一种不同的“对事实的片面安排”（这是阿德勒在这方面所用的表达方式，英文版前面第 56 页）而对其结果做新的解释，人们正拭目以待。

关于“高级的”思想在梦和神经症中的性表达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古代的表达方式，这个观点当然和下述事实不相容。即在神经症中，这些性欲情结证明是从运用于现实生活中撤离出来的大量力比多的承担者。假如这只是一个关于性的“行活（jargon）”问题，那么，力比多的结构 就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被它所改变了。荣格本人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阐述》（1913 年）一书中承认这一点，并且把治疗的任务详细阐述为把力比多贯注从这些情结中分离开来。但是，通过把病人从精力贯注中引开并促使他升华，是绝不可能达到这一点的，而只有通过对这些贯注的详尽考察并使之完全成为意识的，才有可能达到。病人必须解决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是他的疾病。病人为完成这项任务所花费的努力表明，医生在帮助病人克服抵抗方面，没能提供多少帮助，或者表明医生害怕这项工作的后果。

最后，或许可以说，荣格通过对精神分析的“革新”，给了我们一个著名的黎克顿堡刀（Lichtenberg knife）③ 复制品。他把刀把换了，安上一个新刀片；但是由于刀上刻着同样的名字，他就希望我们把这把刀当做原来的那把。

我认为我已经说清楚了，相反，这个旨在取代精神分析的新学说意味着对精神分析的放弃和脱离。有些人可能担心，由于精神分析是那些在这个运动中起了如此巨大作用的人和对精神分析做了这么多工作的人们发动的，因此，这种脱离

---

① 见《释梦》，标准版，第 5 卷，第 348 页。

② ［弗洛伊德曾在《论释梦的理论和实践》（1923c）中的第七节对这一段的这个主题以更长的篇幅进行了讨论。也请参见 1925 年他给《释梦》第六章（一）加上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 5 卷，第 506～507 页。］

③ ［这个格言在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的一个脚注中被引用过。］



对精神分析的影响一定会比放弃更重大，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

只要人们代表一种强大的思想，他们就是强大的；当人们反对这种思想时，他们就会变得软弱无力。精神分析将经受住这种损失，并将获得新的追随者以取而代之。最后的结论是，我只能表示一种愿望，愿运气允许所有那些发现让他们呆在精神分析的地狱中太不合口味的人们做一次愉快的向上旅行。我希望让我们剩下的人能够畅行无阻地把我们在深渊中的劳动进行到底。

1914 年 2 月



精神分析纲要

(1940)

葛 鲁 嘉 译
宋 广 文 校
葛 鲁 嘉 修订

按　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最后一部极为重要的代表著作。他写于1938年(82岁)，并以德英两种文字发表于1940年。虽书未写完他已去世，但全书的内容基本上是完整的。全书共分三部分：(1) 心灵及其活动(五章)，阐明了本我、自我和超我相继发展而形成的精神结构，具有根本性作用的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性功能从幼年到成年的发展过程，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对梦的解析。(2)实践任务(两章)，阐述了精神疾病的早期根源及其精神分析治疗技术。(3)理论成就(两章)，揭示了精神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总之，本书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他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因此，《精神分析纲要》在弗洛伊德全部著作中具有独特的价值。



英文版编者说明

目前的译本是根据标准版译本校正重印的，并有一些编辑的增补。

当这本著作首次出版的时候，德文本和英文本中均附有两段很长的摘录，摘自弗洛伊德同时期未完成的《精神分析若干基础讲稿》(1940 [1938])。这些摘录在德文本中是作为第四章的脚注，在英文本中是作为附录。摘录源出的未完成稿不久之后便全文发表了，因而这本著作后来的重印便删去了该脚注和附录。

由于一个不幸的疏忽，作者的《序言》从《弗洛伊德全集》的重印本中被删去了，因此只有在《时代文献》的德文本中才能找到。应该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全集》第17卷作为遗作，也以不同的扉页和装订同时发行了，这在所出版的(1941年)各卷中尚属首次。

这部完整的著作的手稿是以异乎寻常的简略形式写成的。特别是第三章(《性功能的发展》)，绝大部分都是缩略的。例如，略去了定冠词、不定冠词以及许多主要的动词，这可以说是一种电报文体。正像德文版编辑告诉我们的，他们扩展了那些缩略的部分。总的意思是准确无疑的，尽管编辑在某些方面有点任意，但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接受它，并翻译《弗洛伊德全集》所提供的这个版本。

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的标题并不是作者给出的。德文本编辑采用的是《精神的性质》，理由在于这是上面提到的同期未完成稿《精神分析若干基础讲稿》中的小标题。目前的版本设计了一个要更为普通的标题。

对弗洛伊德开始写作《精神分析纲要》的时间，存在着一些争议。根据欧内斯特·琼斯的说法，“他是在维也纳等待期间开始写作的”——这应该是指1938年的4月或5月。可是，手稿首页上的日期却是7月22日，这证实了德文本编辑的说法，即这部著作开始写于1938年的7月——也就是说，是在弗洛伊德6月初到达伦敦之后不久。到9月初，他已写了63页纸的《精神分析纲要》，当时，他的写作工作被他不得不承受的一次大手术所中断了，他再也没有回头续写。尽管他不久又开始写另一部讲解性的著作(《精神分析若干基础讲稿》)，但很快就再次中断了。

因此，《精神分析纲要》必须被看做是未完成的，但却很难认为它是不完整的。的确，最后一章比其他章要短，并且还可以继续讨论像罪疚感等，而这在第六章中已触及到了。不过，总的来看，弗洛伊德在这本书里会走出多远和走到什么方向，这还是一个吊人胃口的问题。从作者在《序言》中所制定的步骤来看，他似乎已经很好地完成了。

在弗洛伊德的一系列讲解性著作中，《精神分析纲要》展示了独具的特点。其



他著作无一例外，目的都在于向外界公众解释精神分析，公众通常接触弗洛伊德论题的程度和类型各异，但相对总是无知的。《精神分析纲要》就不能说是这样的。应该得到明确了解的是，这并不是针对初学者的书，它更像是针对高层次学生的“复习课程”。它处处期望读者不仅熟悉弗洛伊德对心理学的总的探索，而且熟悉他有关一些细节的发现和理论。例如，有两处很简短的提到语感印象的记忆痕迹所起的作用（第 19 页和第 56 页），对于不熟悉最后一章和论“潜意识”的心理玄学论文的结尾部分的一些艰深论点的人来说，就将不知所云。再者，有两三处论及自居（或译认同）及其与所放弃的对象之爱的关系的寥寥数语，就隐含着至少是《自我与本我》第三章的知识。但是，那些已经熟知弗洛伊德著述的人，会发现这本书是最为迷人的尾声。他重新审视了他所涉猎的内容——最基本的理论或者最详细的临床观察——每个方面都以最终的术语得到了讨论。甚至偶尔还有对全新发展的提示，特别是在第八章的后一部分，以恋物癖为例，更进一步地考虑了自我的分裂及其否认外部世界的某些部分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弗洛伊德在 82 岁的高龄仍然拥有惊人的才华，能对那些似乎是老生常谈的题目做出新的探讨。他的文笔也许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简明和透彻的更高水平。整部著作的阐述均给人以流畅自如的感觉，在一位大师对他所缔造的思想进行的最后说明中，这也许是不难意料的。

编者所做的增补，无论是正文还是注脚，都以方括号印出。

由诺顿出版公司出版的弗洛伊德著作的版本，下列书籍的页码与标准版相同：《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图腾与禁忌》（1912～1913），《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自我与本我》（1923），《精神分析新论》的单行本（1933）。



英文版再版说明

自从弗洛伊德著作的英译本初次出版以来，已经有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标准版》这一新的权威性版本。这是由詹姆士·斯特雷奇与安娜·弗洛伊德担任总主编，由艾莉克斯·斯特雷奇、艾伦·泰森和安吉拉·理查兹协助，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因此，精神分析学会认为，当库存不足的时候重印国际精神分析文库，使用这个新的版本是合适的。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版权有限公司的恩斯特·弗洛伊德先生、艾莉克斯·斯特雷奇女士以及霍格思出版社的热心合作下，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而且，目前很有必要在国际精神分析文库中以《标准版》的版本重印任一新版的弗洛伊德著作。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的现在这个版本，就采纳了全面修订和全面注释的《标准版》版本。由安吉拉·理查兹提供了文献目录和索引，并从事了本卷书出版的准备工作。

出版委员会希望，这些带有注释的修订版会有益于不断增加的精神分析的学生和读者。

国际精神分析文库

编辑

M·麦萨德　R·科汉



英文版封底说明

《精神分析纲要》是弗洛伊德逝世前写作的最后一部著作。作为一部透彻和简明的杰作，它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既是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一般读者的指南，也是毕生科学研究和实验所得出的理论原则的总结。

弗洛伊德在《序言》中写到，本书的目的是“汇总精神分析的原则，并像教义那样以最简洁的形式和最明确的术语加以陈述”。该目的出色地达到了。本书的三个部分——心灵及其活动、实践任务、理论成就——共同构成了一个基本的文本，适合于所有那些想要了解弗洛伊德的毕生工作及其精神分析的基本原理的人。



序　　言

这部要论性著作的目的在于汇总精神分析的原则，并像教义那样以最简洁的形式和最明确的术语加以陈述。它很自然地不打算迫使信仰或强求信服。

精神分析的教学是基于大量的观察和经验之上的，只有那些在自己和他人身上重复了此类观察的人，才会对精神分析做出自己的评断。



第一部分
心灵及其活动

一、精神结构

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设想，对该设想的讨论虽然可以留给哲学的思考，但对它的证明却取决于其结果。

对我们所称的精神（或心理生活），我们知道两类事情：第一是精神的躯体器官和活动场所——脑（或神经系统）；第二是我们的意识活动，意识活动是直接的事实，任何描述都无法对其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我们对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还一无所知，事实材料也没有反映出我们的知识的这两个终结点之间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如果直接联系是存在的，那它至多会提供意识过程的精确定位，而不会有助于我们对意识过程的理解。

从我们的知识的这两个终点或者起点出发，我们有两个假设。第一是关于定位①。我们假定心理生活是某个结构的功能，我们认为，这个结构的特点是占有空间并由几个部分所构成——也即我们将其想像为类似于一架望远镜或显微镜等等。尽管在相同的方向上早有某些尝试，但一而贯之地运用这样的概念是科学的创新。

我们通过研究人类个体的发展，得出了关于这个精神结构的知识。我们把其中最古老的部分称之为本我（id）。本我是遗传的，是生来就有的，而首要的是，本我是由本能构成的。本能源出于肉体组织，并以我们未知的形式在这里［在本

① 第二个假设见第四章。——中译者



我中］得到了最初的精神表现①。

在我们周围的外部现实世界的影响下，本我的一部分经历了特别的发展。从而产生了一个专门的组织，它源于本我的表层，配备了接受刺激的器官，并配备了免受刺激损害的活动程序。这一特殊组织从此便成为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中介。我们把心灵的这一区域称之为自我（ego）。

自我的基本特征有如下述。由于在感知觉和肌肉活动之间预先建立了联结，自我具有自己控制的随意运动。它的任务是自我保存。就外部的事件而言，自我履行自我保存的任务，是通过意识到刺激，通过贮存有关刺激的经验（在记忆中），通过避免过度强烈的刺激（经由逃避），通过接触适宜刺激（经由适应），和最后通过学会有效的改造外部世界，使之利于自己（经由活动）。就内部的事件而言，与本我相关联，自我履行自我保存的任务，是通过取得对本能愿望的控制，通过决定是否允许本能愿望得到满足，通过延缓那种满足，直到外部世界中具备了有利时机实现，否则干脆压抑本能欲望的兴奋。自我的活动是由对刺激产生的紧张的考虑引发的，不管这些紧张是自发的，还是带进来的。这些紧张的出现一般被感觉为不快乐，而它们的减弱则被感觉为快乐。可是，很可能被感觉为快乐或不快乐的，不是这个紧张的绝对强度，而是其某种变化节奏。自我力求快乐，并设法避免不快乐。预期或预见到不快乐的增长，会伴有焦虑的出现。无论是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不快乐增长的时刻都会被当做危险。自我常常放弃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结，退缩到睡眠状态，在此状态中，自我对它的组织做出广泛的改变。从睡眠状态可推断出，这一组织就在于精神能量的特殊分布。

在漫长的童年期，成长着的人依赖他的父母而生活，使父母的影响得到延伸的特殊作用在自我中形成，并作为沉淀物留存下来，这被称之为超我（super-ego）。就此而言，超我是由自我分化而出，或者与自我相对立，构成了自我必须关注的第三种力量。

自我的活动在于同时满足本我、超我和现实的要求——也就是说，在于能够相互协调它们的要求。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具体联系，当其被追溯到儿童对父母的态度时，就十分易于理解。自然，继续发挥其作用的父母的影响，不仅包含着父母实际的人格，而且也包含着通过这些人格而世代相传的家庭、种族和国家的传统，和这些人格所体现的直接的社会环境的要求。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像教师和公众生活中被视为社会理想的典范等，会作为他的父母的后来继任者和替代者，以同样的方式塑造超我。人们会了解到，虽然本我和超我有着基本的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点：二者都体现着过去的影响——本我体现着遗传的影响，超我

① 该精神结构的最古老的部分在整个一生中都是最为重要的，进而精神分析的考察就开始于此。

基本上体现着所承继的前人的影响——而自我则主要受个体自己的经验，即受偶然的和当下的事件的支配。

对该精神结构的这一概要的描绘，可以假定也同样适用于心理上与人相类同的高等动物。与人一样，超我的出现必须假定为存在着童年期的长期依赖。自我和本我的区分是个不可避免的设定。动物心理学还没有涉及此处提到的有趣问题。

二、本能的理论

本我的动力表达了个体有机体生命的真实目的，那就是满足它的先天需要。而依赖焦虑来维持生存或防止危险并不是本我的目的，那是自我的任务。自我的职能在于去寻求最有利和最少危险的方法，从而既能获得满足、又考虑到外部世界的要求。超我可以带来新的需要，并使之处于优先的地位，但它的主要作用一直是限制满足。

我们假定，在本我的需要所引起的紧张背后存在着的力就是本能。本能体现着作用于心灵的肉体欲求。本能虽是所有活动的终极原因，但其本质具有守恒性，有机体不论达到什么状态，均产生一种趋向，即那种状态一经消除，就会重新建立起来。从而，有可能识别出一群数目未定的本能，事实上在平常的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可是，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从所有这些大量的本能追溯到几个基本的本能是否是可行的。我们发现，本能能够改变其目标（通过移置作用）；我们同时也发现，本能能够相互取代——一个本能的能量会传递给另一个。这后一过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决之后，我们才毅然假定，只存在有两种基本的本能：爱欲本能和破坏本能（自我保存本能和种族保存本能相对，自我爱和对象爱相对，它们都属于爱欲本能）。爱欲本能的目标在于不断地建立更大的统一体，并极力地维护它们——简而言之，是亲合。相反，破坏本能的目标是取消联结，故而带来毁灭。就破坏本能来说，我们可以设想它的最终目标是使勃勃生机变成无机状态。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死的本能。如果我们假定，生物的出现晚于并且产生于无生物，那死的本能就适合于我们据此提出的准则，即本能趋向于重返更早时的状态，就爱欲（或爱的本能）来说，我们便不能应用这个准则。要效仿的话，则应该先假定，生物体曾经是统一体，后来被分离了，而现在力求重新联合①。

在生物性功能方面，这两种基本的本能或者相互排斥，或者彼此结合。这样，

① 富有创见的作家已经想象出了此类的东西。但是，像这样的东西，我们不是从生命体的实际历史得到了解的。



吃的活动就是对对象的一种破坏，而破坏的最终目的是吸收对象；性活动是一种攻击活动，而攻击是为了最亲密的结合。两种基本本能共存和相互对抗的活动，造成了全部丰富多彩的生命现象。与我们这两种本能相类似的是超出了生物界的一对相对抗的力量——吸引和排斥——它们统辖着无机界①。

本能之间融合比例的变更有着最为确实的效果。性侵犯的过剩会使一个情人成为一个性谋杀者，而侵犯因素的锐减则会使他害羞或软弱。

毫无疑问，能够把基本本能的任何一个限定于心灵的某一范围。但它们必定可见于它处。我们可以把初始的状态描绘为：爱欲全部有效的能量存在于仍没有分化的自我——本我之中，并用以抵消同时存在的破坏倾向。我们以后将把爱欲能量称之为"力比多"（我们还没有一个类似于"力比多"的术语来描述破坏本能的能量）。在后来的阶段，我们追踪力比多的变迁就要相对容易些，而追踪这些破坏本能就要困难得多。

作为死的本能，当其内在地活动时，便保持着沉静，只有它转向外部成为破坏本能，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能发生这个转变，对保存个体似乎是必要的，肌肉器官即是用于这一目的。当超我形成的时候，大量的攻击本能就被固着在自我的内部，起着自我破坏的作用。这是人类的健康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所面临的危害之一。压制攻击性，一般来说是对健康有害的，会引起疾病。常有这样的事，一个勃然大怒的人，当其攻击受阻时便转向攻击自身，进行自我破坏。他撕扯自己的头发或挥拳捶打自己的脸，尽管他显然更愿以此来对付别人。无论处于什么情况，总留有某些自我破坏，直到最后扼杀个体，除非个体的力比多被耗尽了，或者被固着于不利的方面。因此，一般可以猜想到，个体是死于其内部冲突，而种族如果获得了适应无法应付外部世界的变化，则会亡于它与外部世界的失败的抗争。

我们对力比多在本我和超我中的表现很难说出什么来。我们知道的关于力比多的一切都与自我相联系。起初，力比多的整个适用部分都蕴藏在自我中，我们称这种状态是纯粹的、原始的自恋（narcissism）。这种纯粹的、原始的自恋结束于自我开始将力比多贯注于对象观念，开始把自恋的力比多转变成对象的力比多。在整个一生中，自我都是个大贮存库，力比多的贯注由此遣出、达于对象，而又一再地退回于此。这正像一个变形虫在用它的伪足活动。只是当一个人处在热恋当中的时候，力比多的主要部分才转移到对象上，对象才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自我。力比多在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的流动性，这使它易于从一个对象转向另一个对象。必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力比多固着于特殊的对象，并常常持

① 有关基本的力量或本能的这一图景，尽管一直引起分析家的许多反对，但早已为亚克拉格斯（Acragas）的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所熟知。

续一生。

力比多无疑有肉体的源泉，它从身体的各个器官和部分流向自我。这从力比多的一部分看得最清楚。根据其本能的目标，可把这部分力比多形容为性兴奋。身体产生性兴奋的最突出部分，以“性感区”的称谓而为人所知，不过事实上，整个身体都是这种性感区。我们对性爱——也就是说对它的体现者力比多——的更多的了解，得自于对性功能的研究。当然，即使不是根据我们的理论，而是按照通行的观点，性功能也与性爱是一致的。我们已能够形成对此的了解，即注定会对我们的生活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性驱力，是从组成它的一些本能的相继作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本能分别体现着特定的性感带。

三、性功能的发展

根据通行的观点，人类的性生活基本上就在于一个人设法使自己的生殖器与某一异性的生殖器相接触。与此相联系，作为附带现象和先导活动的是亲吻其外部躯体，寻视它和触摸它。这种努力被认为出现在青春期——并且服从于生育的目的。然而，已了解到的确凿事实总是与上述观点的狭隘不相吻合。（1）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只被同性的个体以及自己的生殖器所吸引。（2）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他们的情欲行为极像是性行为，但他们同时又完全漠视性器官或它们的正常功用。这样的人被看做是“性变态者”（perverts）。（3）最后，引人注目的是，某些儿童很早就对他们的生殖器感兴趣，并显示出性兴奋（为此，他们被看做是性倒退者［degenerate］）。

可以使人相信，部分地依据于上述三个受到忽视的事实，精神分析对性欲的看法与所有流行的观念相矛盾，因而引起了惊异和否定。精神分析的主要发现在于：

（1）性生活并不仅仅开始于青春期，而是在出生后不久就有了明显的表现。

（2）在“性”的概念和“生殖器”的概念之间，必须做出明确的区分。前者是更为广泛的概念，它包括许多不涉及生殖器的活动。

（3）性活动包括从身体的某些区域获得快感的功能——这一功能后来才成为生育的辅佐。这两种功能经常是根本不一致的。

主要的兴趣自然集中在上述的第一个主张，这是最为出人意料的。现已经发现，在童年早期就有性活动的身体标志，只有古老的偏见才能对此矢口否认。这些标志与我们后来在成人的性爱生活中遇到的精神现象相联系——像执迷于特殊的对象、嫉妒等等。可是，进一步会发现，这些出现在童年早期的现象，构成了有序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它们历经有规律的增长变化，至5岁末达到高峰，其



后紧接着的是间歇。在间歇期间，进展停顿下来，许多都被忘却了，并有很大的倒退。在这个潜伏期结束之后，人们所谓的性生活便随着青春发育东山再起，可以说这是二度开花。在此，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事实，即性生活的发动是二相的(diphasic)，它涌现出两个浪潮——除了人以外，有些内容还不为人知，并且它显然对人化（hominization）过程有很重要的影响①。要紧的是，早期阶段的那些事件除了某些残余，都成了幼年记忆缺失的牺牲品。我们关于神经症病因的观点，以及我们的分析治疗技术都源于这些概念，我们对这个早期阶段的发展过程的追溯，也为其他的结论提供了事实根据。

从出生之日起，作为性感区出现的，并向心灵提出力比多需求的第一个器官是口腔。起初，所有的精神活动都集中为口腔性感带的需要提供满足。当然，这一满足主要服从于得到营养、自我保存的目的，但是生理学不应被混同于心理学。婴儿固执的坚持吮吸，证实了早期阶段追求满足的需要 。这种满足尽管源于摄取营养并由摄取营养所引起，然而却是努力去获得超出营养的快感。为此，可以而且应该把它叫做性的。

在此口欲期，施虐的冲动已偶尔随着牙齿的出现而发生，其程度在第二个阶段会大大增长。我们把它描述为肛欲 施虐冲动。因为，那时会在攻击和排泄功能中寻求到满足。我们为包括力比多引导下的攻击驱力所作的辩护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施虐狂是纯粹的力比多驱力和纯粹的破坏驱力的本能融合，这一融合从此以后就不断地持续着②。

第三个阶段就是人所共知的阳具欲期。其实，这是性生活所采取的最终形式的前兆，并且已非常类似于最终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起作用的不是两性的生殖器，而仅仅是男性的生殖器。女性生殖器长时间一直默默无闻：儿童试图理解性的变化过程时，他们崇信古老的肛娩幻想（cloacal） -这一论说的合理性有着发生学的证明③。

随着阳具欲望的到来及其发展，童年早期的性欲达到顶点并临近终结。从此，男孩和女孩有了不同的历史。两性都同时开始把他们的智能活动用于性探索，都

---

① 参见这样的提法，人是来自一种哺乳动物，该哺乳动物在5岁时就达到了性成熟。但是，某些主要的外部影响施加到了物种的身上，结果打断了性发展的直接进程。与动物相比，人的性生活的其他变化都可与此相联系——像废除力比多的周期性、在两性关系中利用月经期的作用。

② 出现的问题在于，是否满足纯粹的破坏性的本能冲动可以被感受到快乐，是否纯粹的破坏没有任何力比多的混合就会发生。保存在自我之中的死本能的满足似乎并不会产生快感，尽管受虐狂表现出了一种完全与施虐狂相类似的融合。

③ 早期阴道兴奋的出现常常得到了肯定。但是，问题最有可能出在阴蒂的兴奋——也即与阴茎相似的器官。这并没有妨碍我们把这个阶段描述为阳具欲期。



同样从阳具普遍存在的前提出发。但现在，两性分道扬镳了。男孩进入了伊谛普斯阶段，他开始摆弄自己的阴茎，同时幻想以阴茎来实现某种与自己母亲有关的活动。直到由于阉割的威胁和看到女性缺少阴茎的双重影响，他经历到他生活中的最大创伤．其全部后果会进一步左右着潜伏期。女孩在徒劳地试图做与男孩同样的事之后，逐渐认识到她没有阴茎，或者更确切地说，认识到她的阴蒂是劣等的。这对她性格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竞争中第一次失意的结果，她开始经常全然回避性生活。

要是设想这三个阶段是以明确的方式彼此相继，那就错了。一个阶段可以接续另一个而出现，它们还可以相互重叠，可以比肩并存。在早期阶段，不同的、作为组成部分的本能彼此独立地开始它们对快感的追求。到了阳具欲期，则出现了组织，使其他的驱力从属于居首位的生殖器，这标志着追寻快乐的全部冲动开始彼此协调地转入性的功能。完满的组织是在青春期，即第四阶段性器欲期才达到的。那时所形成的状况是：（1）某些早期的力比多贯注得到了保留；（2）其他的活动则作为预先的、附属的活动被纳入性功能；它们产生的满足就是所谓的前期快乐；（3）还有一些驱力被排斥在组织之外，它们或者完全被抑制了（受到压抑），或者以其他方式为自我所运用，不是形成着性格特质，就是随其目标的转移而经历升华。

这个过程并不总是进行得完美无缺，其发展中的抑制作用本身就表现为性生活的多种失调。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会发现，力比多固着于早期的情境，它的驱力不受正常的性目标支配，这被形容为性行为异常（perversion）。例如，这种发展阻碍的表现就是同性恋（homo-sexuality）。分析表明，在每个案例中都存在着同性恋的对象关系，而在大部分案例中则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下面的事实使情况变得复杂化了。一般来说，达到正常结果所必要的那些过程并不是全有或全无，而是部分有之，以致于最终的结果总要依赖这些量的关系。在此情况下，生殖器的组织确实被完成了，但是它缺少部分力比多，这部分力比多没有随其余部分一道发展，而是仍然固着于前生殖器的对象和目标。如果没有得到生殖器的满足，或者在外部现实世界中遇到了困难，这个弱点就会表现为一种倾向，使力比多重回到早期前生殖器的贯注（倒退作用）。

在研究性功能期间，我们对两个发现已能够初步地加以确定，或者倒不如说是怀疑。其后将会看到，这两个发现在我们的整个研究领域中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所观察到的常态和变态的表现（即主体的现象学）需要根据有关它们的动力学和经济学的观点来描述（就我们来说，是根据有关力比多量的分布的观点）；其次，我们所研究的失常的病因要到个体的发展历史中去寻找——也就是说，要到个体的早期生活中去寻找。



四、精神的品质

我已经描述了精神结构的构造和其内部活动着的能量或力量，并以突出的实例探索了这些能量（主要是力比多）以某种方式把自己组织成其目的在于保存种族的生理功能。然而，这一结构和这些能量只是被描述为我们精神生活的那些功能的基础，除了这一经验事实之外，还根本没有论证过精神所具有的相当独特的特性。现在，我将转向的内容就是精神独具的特性，并且根据广泛持有的观点，这的确仅是精神所具有的，而无关其他。

这一研究的起点源自惟一不需任何描述和解释的意识事实。如果某人谈到意识，我们就会以个体的经验立即知道这指的是什么①。无论是在心理科学之内还是之外，许多人都满足于这样的假定，即仅有意识才是精神。真若如此的话，那心理学的任务就不过是在精神现象当中区分出知觉、情感、思维过程和意志决断。不过，通常认为，这些意识过程并没有形成完全属于自身的完整序列。从而，就只能假定存在着生理的或肉体的过程，它们伴随着精神过程。我们必定会把它们看做比精神序列更为完全，因为它们其中有一些有意识过程与之相对应，其他的则没有意识过程相对应。如果是这样，那就有可能在心理学中强调这些肉体过程，把它们视为精神的真正实质，并寻求对意识过程的某些不同的评估。可是，大多数哲学家和其他许多人对此看法不一，他们宣称，把某种精神的东西看做是无意识的，是自相矛盾的想法。

但是，这恰恰是精神分析无可推卸的主张，并且是精神分析的第二个基本假设②。它把猜想到的肉体伴随现象解释为真正精神的东西，因此，它一开始并不考虑意识的品质。无独有偶，某些思想家（例如李普斯）有着众口一词的主张。对什么是精神的常见观点的普遍不满，导致了一种不断增长的迫切需要，即把无意识的概念纳人心理学思想。当然，这一需要采取的是不确切的和模糊的形式，以致于它未能对科学产生影响。

此时，看起来好像精神分析和哲学之间的争论涉及的仅是并不重要的定义问题——即“精神的”这一名称是应当被运用于这一现象序列，还是应当被运用于那一现象序列的问题。然而，事实上这一步是最为重要的。意识心理学从未超出显然依赖于其他某种东西的不完整序列，而另一认为精神本身是无意识的观点，

① 一个极端的思想路线认为，有可能建立一种忽略这一基本事实的心理学，美国的行为主义学说是其典型的代表。

② 第一个基本假设见第一章。——中译者



则使心理学能够取得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的地位。它所关注的过程本身就像其他科学，例如化学和物理学所涉及的过程一样是不可知的，但却有可能建立支配这些过程的规律，并有可能去追寻这些过程的长期持续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性

总之，有可能像所描绘的那样，获得对正谈及的自然现象领域的“理解”。不提出新的假设，不创造新的概念，上述就无法实现。不应小看这些假设和概念，认为它们标志着我们陷入了困境，而正相反，完全可以把它们看做是对科学的充实。它们能够具有与其他自然科学近乎相同的价值，即都有理智的基础。当有了对经验的进一步积累和筛选之后，我们期望这些假设和概念能够得到修改、矫正和更准确的限定。我们料定，新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原则（本能、神经能量等）能像古典科学的那些概念和原则（力、质量、引力等）一样明确地得到长期运用。

任何科学都是建立在观察和经验的基础上，这些观察和经验是通过我们的精神结构的中介得出的。可是，我们的学科就是以精神结构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所以，不同就出现于此。我们通过同一知觉结构做出的观察，正是借助于“精神”事件序列的中断。我们通过做出尽可能的推论并把它表现为意识材料，来填补漏掉的部分。以这种方式，我们就好像是在构造意识事件的序列，来补充无意识的精神过程。我们的精神科学的相对确定性就是基于这些推论的粘合力。任何一个深入到我们的工作之中的人都会发现，我们的技术立足的根基可以抵御任何批评。

在这一工作中，我们描绘为精神品质的那些区别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我们所称的“意识”，无需去表明它的特性，它与哲学家谈论的以及通常认为的意识一样。意识之外的精神过程就是我们提出的“无意识”。我们立即就会对这种无意识做出重要的区分。某些无意识过程很容易转变为意识，然后它们又可以退出意识，但能够再度顺利地转变为意识，正如常人所说，它们能够得到再现或者回忆。这向我们提示了，意识总的来说是非常变动不居的状态。成为意识的仅仅是暂时的。如果我们的知觉没有证实这一点，那矛盾也是表面上的，这可由下述事实得到解释，即引起知觉的刺激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期，以至于在此期间，对刺激的知觉可以得到重复。所造成的整个情形都很明显地与我们思想过程的意识觉知相联系，这些意识觉知也可以持续一段时间，而且同样可以转瞬即逝。所以，任何以这种方式活动，从而能很容易地从无意识状态转换成意识状态的无意识，都最好叫做“可以成为意识的”，或叫做前意识（preconscious）。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前意识通常将像我们说的那样开通自己进入意识的道路，那也几乎没有哪一种精神过程不能伺机成为前意识，无论它多么复杂。其他还没有那么容易的机会成为意识的精神过程和精神材料，但它们必须得到推论、认识，并以上述的方式转变为意识形式。我们把这样的材料命名为严格意义上的潜意识（unconscions）。

至此，我们已赋予精神过程三种品质：它们或者是意识，或者是前意识，或者是潜意识。在具有这些品质的三种材料之间做出的区分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



不变的。正如我们所知，前意识的东西转化为意识，可以没有我们的任何参与，而潜意识的东西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才能变成为意识。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即我们常常要克服特别强烈的抵抗。当我们打算以此施于他人时，我们不应当忘记，对他的知觉裂隙的填充——我们提供给他以构造——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使他的潜意识材料进入了意识。到现在为止，完全可以确定的是，他所具有的材料有两种记录：一为我们给予它的有意识的重新构造，再一为它的原始的潜意识状态。我们的持续努力，最终会成功地把这种潜意识材料转变成为他自身的意识，其结果会导致两种记录的合一。我们必须做出多大努力因人而异，据此，我们会估量出对潜意识材料变成意识的抵抗。例如，在分析治疗中，由于我们的努力而达到的也能自发地出现：即平时为潜意识的材料会使自身转化为前意识的材料，然后又变成意识——这种事很大程度上出现于精神病状态当中。由此我们推知，保持某些内部抵抗是正常状态所绝对必须的条件。随着潜意识材料的推进，这种抵抗的放松有规律地发生于睡眠状态中，从而造成了建构梦的必要前提。相反，由于抵抗，前意识的材料能够暂时变得不可接近，并受到阻隔，此时发生的是某些事情被暂时遗忘了或者没有记住。要么，前意识的思想甚至能够暂时被遣回潜意识中，这似乎是诙谐的前提。我们将会看到，前意识的材料或过程转回到潜意识的状态是神经错乱的重要诱因。

以这种由繁而简的方式，对精神所具有的三种品质做出描述，很可能会引起极大的混乱，而不会有助于澄清问题。但是不应忘记，实际上它根本不是理论，而是对我们观察到的事实的初步盘点，它尽量与那些事实相符，并且不打算加以解释。它揭示出的复杂性会使我们的研究必须克服的特殊困难更为突出。不过可以设想，如果我们描述出精神品质与所假设的精神结构的区域或组成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些关系也远不是简单的——那我们将会更接近于理解这一理论本身。

某种东西变为意识的过程，首先与我们的感觉器官从外部世界得到的知觉相联系。因此，从地形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发生于自我最外层的现象。实际上，我们也从身体内部接受意识信息——体内感觉比外部知觉会对我们的精神生活施加更为决定性的影响。此外，在一定条件下，感觉器官除了传达专门的知觉外，也传达自身的感觉，像痛觉。然而，由于这些感觉（对它们的称谓是与意识知觉相对照的）也源于末端器官，并且由于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感觉都看做是自我外层的延伸部分或者支流部分，我们仍旧能够坚持上面提出的主张（在本段的开头）。惟一的区别就是，就感觉和知觉的末端器官而言，身体本身就可以取代外部世界。

意识过程处于自我的边缘，自我中其余的是潜意识——这大概是我们可以描绘的最简单的事态。而且事实上，这可以是动物普遍具有的状态，但在人类则增添了复杂性。从而，自我的内部也可以获得意识的品质。这就是言语功能的活动，它使自我中的材料与视知觉，尤其是与听知觉的记忆痕迹牢固联结起来。此后，

自我表层的知觉边缘更可能由内部得到同样的激发，像观念和思想过程的变迁这样的内部事件可以成为有意识的。为了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区分，便要求一种特殊的手段——它就是通称的现实检验。知觉＝现实（外部世界）的等式不再适用。于是那些现在能够很容易就出现的并有规律地出现在梦中的错误，便被叫做幻觉。

在主要由思想过程构成的自我的内部，具有的是前意识的品质。这是自我的特性，并且为自我所独有。然而，不应该认为，与言语记忆痕迹的联结是前意识状态的必要先决条件。正相反，前意识状态不依赖于这一联结，尽管由这个联结的存在会可靠地推论出那一过程的前意识性质。前意识状态一方面具有接近意识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与言语痕迹相联结的特征。不过它还有独特之处，其性质不能由这两种特性包罗无遗。其根据在于如下的事实，即自我的大部分，特别是超我的大部分无可否认地具有前意识的特性，但它们从潜意识的现象含义上来看，又基本上是潜意识的。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必然如此。我们目前只打算解决前意识的真实性质的问题。

本我独有的主要品质是潜意识性。本我与潜意识就像自我与前意识那样紧密相联，实际上，本我与潜意识的联系甚至要更为密切。如果我们回顾个体和他的精神结构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本我的重要特点。最初，当然一切皆属本我，由于外部世界的不断影响，自我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在这个缓慢的发展进程中，本我的某些内容转化为前意识状态，因面被带到了自我当中。本我的其他内容则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本我中，成了本我的几乎无法接近的核心。可是，在此发展期间，幼稚和脆弱的自我会把它已经得到的某些材料遗回到潜意识状态，排斥这些材料，并以此来对待本可以吸收的某些新印象，以至于这些受到抑制的材料反而能在本我中留下痕迹。鉴于它的由来，我们把本我后来的部分称做被压抑的。我们并不总能够在本我的这两类内容之间做出截然的划分，但这一点无关紧要。二者的大致区别在于，一个在起源上是生来具有的，一个是在自我的发展过程中获得的。

此刻，当我们决定对精神结构进行地形学剖析，把它分解为自我和本我之后，与此相平行的是前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不同品质的区分。并且当我们同意了这种品质仅会被看做是区别的标志，而不会被看作是其本质之后，我们又面临着进一步的问题。譬如，在本我中由属于潜意识的品质所揭示的状态的真实性质是什么呢？在自我中由属于前意识的品质所揭示的状态的真实性质是什么呢？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何处呢？

可惜，我们对此一无所知。面且，几点卓识的闪光几乎还没有照亮我们极为昏暗的无知背景。在此，我们接近了一直掩盖着的精神本性的奥秘。像其他自然科学使我们想到的一样，我们设想在精神生活中有某种能量在活动，但我们却没



有其他形式的能量可作为依据，使我们能通过类推来加深对这一能量的了解。我们自认为神经的或者精神的能量存在于两种形式当中：一种是自由活动的，与此相比较，另一种是受约束的。我们谈到了精神材料的贯注和过度的贯注，我们甚至大胆假定过度的贯注会导致不同过程的一种综合——在综合过程中，自由的能量被转变成受约束的能量。我们知道的不比这更多。总而言之，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潜意识状态和前意识状态的区别就在于这种动力关系，它可以说明一种状态如何能够自发地或在我们的帮助下转变成另一种状态。

然而，在所有这些不确定性背后，存在着一个新的事实，它的发现应归功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我们了解到，潜意识当中或本我当中的过程服从与前意识自我不同的法则。我们在整体上把这些法则称为原发过程。与此相区别的是继发过程，它制约着自我当中或前意识当中的事件进程。因此，对精神品质的研究最终表明是很有成效的。

五、作为佐证的释梦

在正常、稳定的状态下，自我的疆界通过抵抗（反贯注）防备着本我，简直固若金汤；同时，在这种状态下，超我也不会从自我分化出来，因为它们的活动和谐一致——因此，对正常、稳定的状态的研究使我们收效甚微。能够有助于我们的，只有冲突和扰动的状态。此时，潜意识本我的内容有可能强行闯入自我和意识，自我一再奋起反抗这一入侵。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进行观察，从而证实或改正我们有关这两个对手的陈述。我们夜里的睡眠就正好是这种状态，因此，睡眠期间我们觉知为梦的精神活动是最佳的研究对象。在此，我们也避免了一般的指责，即认为我们是基于病理学的发现来建造正常精神生活的。对梦来说，不论它们的特点有多少会不同于我们醒时生活的产物，它们也是正常人生活中有规则的事件。如同每个人所知的那样，梦可以是混乱的、难以理解的、或十分荒谬的。梦所告之的会与所有我们对现实的了解相矛盾，我们在梦中的举止就像个疯子。因此，只要我们在做梦，我们就会把梦到的东西看做是客观现实。

我们醒来之后回忆的梦，并非是真正的梦的过程，而不过是个表面，梦的过程就隐藏在这一表面的背后。根据这样的设想，我们发现了理解（“解释”）梦的途径。在此，我们对梦的显意和梦的隐意做出了区分。从梦的隐意制造出梦的显意的过程叫做梦的工作。对梦的工作的研究使我们得知，这是个绝好的例证，正是通过梦的工作，来自本我的潜意识材料（原始的潜意识和相似的被压抑的潜意识）闯入自我，成为前意识，并且作为自我反对的结果，经历着改变。我们把这些改变视为梦的伪装。所有梦的特征都能以此得到解释。



最好一开始就指出，梦的形成可由两种不同方式引起。一方面，或者是通常受压抑的本能冲动（潜意识的欲望）在睡眠中达到了足以被自我感受到的强度；另一方面，或者是醒时遗留的驱力——附有全部冲突着的冲动的前意识思想链条——在睡眠中得到了来自潜意识因素的强化。总而言之，梦或许由本我引起，或许由自我引起。无论以何种方式，梦的形成机制是相同的，这也是必要的动力前提。自我有时会丧失自己的功能，并任由自己退回到早期的状态，这表明它自己最初是源于本我。在逻辑上，这是由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中断和从感觉器官撤出它的精力贯注而造成的。下述可证实我们是正确的，即人一出生时，便出现一种返回已离弃的胎内生活的本能——睡眠的本能。睡眠就是试图重返子宫。醒时的自我发挥着能动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会在睡眠中失去，因此，施加于潜意识本我的大部分抑制就变成多余的了。从而，这些“反贯注”的撤除或减弱，允许此刻的本我具有某些无害的自由。

证明梦的形成有潜意识本我的参与的证据是大量的和确凿的。（1）梦中的回忆比醒时的回忆要有多得多的内涵，梦所恢复的记忆是梦者已遗忘的，也是他醒时难以重现的。（2）梦无限制地运用语言符号，其意义绝大部分不为梦者所知，精神分析的经验使我们能够确定这些语言符号的意义，它们很可能源于言语发展的早期阶段。（3）梦中的回忆常常重现梦者幼年的印象，我们可以明确地肯定，这些印象不仅被遗忘了，而且也由于压抑变成了潜意识。这表明，梦给予了我们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帮助，使我们在对神经症的分析治疗期间，可以尝试去重新建构梦者的早期生活。（4）此外，梦还显露了这样的材料，它既不会是源于梦者的成年生活，又不会是源于他遗忘了的童年。我们只好把它看做是原始的遗产，它与生俱来，先于任何个人的经验，而受祖先经验的影响。在最早的人类神话和残存的习俗中，我们会发现这一种系发生的材料的原型。因此，梦成了不容忽视的人类史前的原始资料。

梦对于增长我们的见识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在于，当潜意识材料进入自我时，它也一道带来了活动方式。这意味着潜意识材料从中得到表达的前意识思想，就好像是本我的潜意识成分一样会在梦的工作过程中得到操纵。就形成梦的另一方式来说，从潜意识本能冲动获得加强的前意识思想会被降成潜意识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了解制约着潜意识中事件变迁的规律，才会知晓与我们醒时的思想中所熟知的规则不同的方面。因此，梦的工作实质上是潜意识的活动假身于前意识思想过程的实例。打一个历史的比方，入侵的征服者统治着被征服的国家，他们实施的裁决并非遵循被征服国家的司法制度，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司法制度。但明白无误的事实是，梦的工作的结果是一种妥协。自我的组织还未瘫痪，它的影响体现在对潜意识材料加以伪装，并体现在下述常常根本不起作用的尝试中，即试图赋予全部结果以一种勉强可为自我所接受的形式（文饰作用）。这就好



比是战败的人表示要继续抵抗。

制约着潜意识中事件变迁的法则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足可以解释大部分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梦。首先，存在着明显的凝缩作用的倾向。这一倾向使我们醒时的思想中肯定会保持着分离的要素构成：新的统一体。其结果是，梦的显意中的单一要素常常代表着梦的全部隐意，仿佛它是全部隐意的综合性的隐喻。一般说来，与其来源的丰富内容相比，显梦的范围相当狭小。梦的工作的另一特性并非完全与前一特性无关，那就是精神强度①（精力贯注）会很便利地从一个要素被移置到另一个要素。因此，在梦念中无关紧要的成分，常常会表现为显梦中最为明显并相应地最为重要的特性。反过来也是如此，梦念中的那些本质要素，在显梦中仅被轻描淡写的隐喻表现出来。此外，一般情况下，两方面的要素都存在着没什么意义的特点，在进一步活动中完全可由梦的工作使一个替代另一个。不难想象，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的这些机制，大大增加了我们解释梦和揭示梦的显意和梦的隐意之间的联系的困难。根据存在着凝缩和移置这两种倾向，精神分析的理论推测：在潜意识本我中，能量处于自由活动的状态，与其他考虑相比，本我更重视释放大量兴奋的可能性②。我们的理论就是运用这两个特点来确定我们赋予本我的原始过程的特性。

研究梦的工作，还使我们了解了潜意识过程的其他许多值得注意的重要特征。但在此我们只能提及几个。支配性的逻辑规则在潜意识中不起作用，潜意识可称为无逻辑的王国。具有相反目标的驱力同时存在于潜意识当中，没有任何必要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节。要么，它们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影响；要么，如果有影响，那也不是决定性的，而产生的妥协也没有意义，因为妥协容纳的只是一些互不相容的细节。与此有关的事实是，对立面并不会被分离，它们被看做好像是同一的，因此，在梦的显意中，任何元素都可以具有它的对立面的含义。某些语言学家发现，在大部分古代语言中，便具有很多与上述相同的地方，像“强—弱”、“明—暗”、“高—低”等对立面，最初都由相同的词根所表达 。直到对原始词有了不同的修饰，区分了两种对立的意义为止。这种原始的双重意义似乎仍残存于甚至是高度发达的语言中，像拉丁语所运用的词汇“altus”（“高”和“低”）、“sacer”（“秘密”和“公开”）。

由于梦的显意与其背后的隐意之间的联系十分复杂和模糊，提出下述疑问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即由一面推演出另一面是完全可能的吗？依靠出现在显梦中的符号的转译，我们必须进行的一切是否都不过是一种侥幸的猜测呢？可以回答说，

① ［弗洛伊德最早常用来等同于心理能量的一个术语。］

② 可以从一个尚未受委任的官员的行为看到相似的东西。他平静地接受来自上级的惩罚，但却把他的愤怒发泄到他碰到的第一个无辜者身上。



在绝大多数情形中，问题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但必须借助于梦者本人对显意的元素提供的联想。任何其他的程序都是随意的，并且不可能得到确定的结果。而梦者的联想却会显示出中介的环节，我们能够用它们来填补显意和隐意之间的空隙，并且我们可以借助它们复述梦的隐意并加以“解释”。如果这种解释工作（正与梦的工作相反的活动）有时不能达到完全的确定性，也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余下的任务，就是对睡眠时的自我为什么承担梦的工作的任务做出动力学的解释。幸运的是，这样的解释很容易做到。借助于潜意识，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每一个梦都对自我提出要求——如果梦源于本我，那就是为了满足本能；如果梦源于醒时的前意识活动的残余，那就是为了解决冲突、消除怀疑或形成意向。不过，睡眠时的自我集中于保持睡眠的愿望，它感到梦的要求是一种干扰，并寻求解除这一干扰。自我通过看起来像是顺从的活动，可以成功地做到：在无害于愿望的满足的情况下，满足梦的要求，从而也就解除了这个要求。以满足一个愿望来替换梦的要求，这一直是梦的工作的基本功能。也许有必要以三个简单的实例来证实这一点——一个是饥饿的梦，一个是寻方便的梦，一个是由性欲引起的梦。在睡眠时，做梦者对食物的需要会使自己感受到：他梦到一顿美餐，并继续睡觉。当然，他可以做出选择，或者是醒来吃点东西，或者继续他的睡眠。他选择了后者，并通过梦实现了饥饿需要的满足——无论怎样，这是暂时的，因为要是他的饥饿持续下去，他还是会醒来。再就是第二个例子。一位睡眠者必须按时醒来到医院上班，但他却一直睡了下去，并做了一个梦，梦到他已经在医院里了——但却是作为一个无需起床的人。再有，夜梦中，一个欲望会变成与受禁止的性对象的享乐活动，如与睡眠者朋友的妻子。他做了一个性交的梦——的确，不是与这个人，而是与他实际上不感兴趣的同名的某个人。或者，他对该欲望的抵抗，也可以表现为他的女主人公完全是匿名的。

很自然，每个案例都不是这么简单。特别是这样的梦，即梦的来源与前日的遗留物无关，以及只是在睡眠状态中才得到了无意识的强化。

要揭示出潜意识动机力量及其愿望的满足，常常是很艰难的任务。但我们可以假定，它始终是存在的。且不说大量的梦并没有任何确定的情调，就是当回想起许多梦实际上都有令人苦恼的内容，乃至梦者会在焦虑中醒来，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命题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怀疑。焦虑的梦并不能用来支持反对精神分析的异议。不要忘记，梦永远是冲突的产物，是一种调和的结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满足潜意识本我的东西可以引起自我的焦虑。

当梦的工作在进行时，有时潜意识会成功地向前推进，有时自我会以更大的能量来保护自己。焦虑的梦大都是那些内容伪装得最少的梦。如果潜意识对睡眠时的自我提出的要求太强烈，使自我无法自如地躲避它，那自我就会放弃睡眠的愿望而醒过来。如果我们说梦永远是一种依靠欲望的满足来解除睡眠干扰的企图，



以至于梦成了睡眠的守护者，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各种经验。这种企图很可能会圆满成功，它也可以失败，这时梦者就会醒来，显然，他正是被梦所唤醒的。因此，也有这样的时候，当那个杰出的伙伴，即责任在于保护小镇睡眠的守夜人没有选择的时候，他就必须拉响警报，唤醒沉睡的小镇居民。

在结束讨论时我要指出，我在释梦问题上所花费的大量时间是值得的。经验表明，我们在研究梦的工作中不断了解到的，并使我们解释了梦的形成的潜意识机制，也会帮助我们去理解神经症和精神病的令人困惑的症状，我们的兴趣也在于此。这种契合不能不激起我们的莫大希望。



第二部分 实践任务

六、精神分析的技术

梦便是精神病（psychosis），它具有精神病的全部荒谬、妄想和错觉。一种短暂的、无疑是无害的、甚至具有益处的精神病，是以当事人的认可而开始，并以当事人的意志活动而终止。这仍然是一种精神病。

我们从中会认识到，即使像梦一样深刻的精神生活的改变，也能够得到消除并代之以正常的功能。那么，希望可怕的精神生活的自发疾病也能接受我们的影响并得到治愈，这是不是太大胆了呢？

对于这样的任务，我们已经掌握了许多初步的材料。根据我们的假设，自我的职责是，既要满足它与现实、与本我和与超我的依赖性联系所引起的要求，同时还要维护自己的组织，保持自己的自主性。我们所讨论的病理状态的必要前提条件：只能是自我相对的或绝对的软弱，以至无法实现自己的职能。对自我的最强烈的要求，大概是控制本我的本能冲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保持大量消耗于反贯注的能量。但是超我提出的要求也可以变得非常强烈和严酷，致使自我可以陷入瘫痪，也就顾不上它的其他任务了。我们可以设想，在此时出现的经济性的冲突中，本我和超我常常联合起来反对受到紧逼的自我，而自我则试图依赖于现实，以保持自己的正常状态。如果本我和超我过于强大，它们就会成功地瓦解和改变自我的组织，使自我与现实的协调关系受到妨碍乃至终结。我们已由梦看到：一旦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现实相分离，它就会在内部世界的影响下滑入精神变态。

我们的治疗计划就基于这些发现。自我为内部冲突所削弱，而我们又必须起用自己。这种情形好比一场内战，局面取决于外来盟友的援助。精神分析医生和



患者的受到削弱的自我必须共同以外部现实世界为基地，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敌人，即本我的本能要求和超我的良心要求。我们订立相互的契约。病态的自我答应我们尽量坦诚——即答应把自我觉知的一切材料交由我们处置，我们则向病人保证，听凭病人处理和使用我们的经验去解释受潜意识影响的材料。我们的知识要用来弥补患者的无知，使他的自我重新控制他失控的精神生活。这一契约构成了精神分析的情境。

当我们按约行事，就立即会感到失望，这首先给了我们的过分自信一个打击。如果患者的自我愿意与我们合作，那么，无论受到敌对力量多么强硬的胁迫，它都必定保持着对现实要求的某些连贯的和某些片断的理解。但是，不应该对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抱有如此的期望。它不会遵守这种契约，实际上它几乎不理会契约。它将很快抛开我们和我们提供的帮助，把我们当成不再有任何意义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从而，我们发现，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想法，即尝试把我们的治疗计划运用于精神病患者——放弃也许是永久的，也许只是暂时的，直到我们找到了另一个更好的适合于精神病患者的计划。

不过，还有另一类病人，他们显然特别类似于精神病患者——其绝大多数患有严重的神经症。他们的致病因素及其致病机制肯定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非常相似的。然而，他们的自我表现出了更多的抵抗和受到了更少的瓦解。虽然许多患者患有疾病并产生功能缺陷，但他们仍能够使自己应付现实生活。这些神经症患者会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将只对他们感兴趣，并将了解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和能用什么方法来“治愈”他们。

我们还要与神经症患者建立契约：一方开诚布公，另一方勿施于人。这看上去好像我们只是要做一个并不信教而聆听忏悔的神父。但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要从患者那里听取的，不仅仅是他所知道而对他人隐瞒了的事情，他还应该告诉我们他并不知道的东西。出于这一目的，我们要给患者对我们所指的坦诚做一个更加详细的说明。我们要他保证遵守分析的基本规则，这个基本规则会使他此后的行为有利于我们。患者不仅应该告诉我们他想说和愿意说的，像忏悔一样得到解脱，而且他同样应该告诉我们其他一切他自我观察到的，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的事情，即使这些是他讨厌说的，似乎对他是不重要的，或者实际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患者在接受这种要求之后不再进行自我谴责，那他就将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材料——思想、观念和回忆——这些材料已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常常是潜意识的直接派生物，从而使我们能够推测到患者受到压抑的潜意识材料，使我们能够通过患者以信息来扩展他的自我对其潜意识的了解。

然而，这并不是患者的自我被动地和顺从地把我们所需的材料提供给我们，并相信和接受我们对材料的解释。还会发生许多别的事情，其中一些我们也许预见到了，另一些则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患者不满足于把



分析者看作实际上的帮助者和劝导者。此外，他还因他所遇到的麻烦以获取报酬，并且他本人会满足于那种向险峰攀登的向导角色。相反，患者把分析者看成是自己童年或过去的某一重要人物的再现或化身，结果把无疑用于原型的感情和反应转移到了分析者身上。事实很快表明，移情作用是个意想不到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它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的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重大危险的根源。移情是两极化的：它既包含着对分析者的积极的（温情的）态度，又包含着对分析者的消极的（敌对的）态度。分析者通常被患者当成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只要移情作用是积极的，它就会给我们以极好的对待。它会改变整个分析的情境，会把患者恢复健康、免除病症的理性目标置于一边，取而代之的目标是取悦分析者，赢得分析者的赞扬和喜爱。这成了病人合作的真正动力，他的软弱的自我变得坚强起来。在此影响下，患者会做到他平时做不到的事。他消除了病症，看上去已经康复——这仅仅是为了分析者。分析者本人也许羞于承认，他从事的是困难的任务，而没有任何随心所欲的权力。

此外，随着移情作用的关系，带来了两个更进一步的好处。如果病人把分析者看做自己的父亲（或母亲），那他就会把他的超我控制自我的权力给予分析者，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父母是他的超我的来源。现在，新的超我有了对神经症患者实施一种再教育（after-education）的机会。再教育能够矫正父母对他的教育造成的错误。但在这方面，必须防止滥用这种新影响。不论分析者多么想成为别人的老师、榜样和典范，以及多么想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别人，他都不应该忘记，这并不是他进行分析治疗的任务。实际上如果他随心所欲，那就将背离自己的任务。如果他这样做了，那就只会重犯父母以自己的影响压制孩子的独立性的错误，只会用新的依赖性去替代患者早年的依赖性。分析者在其治疗和教育患者的全部尝试中，都应该尊重患者的人格。分析者允许自己合理施加的影响有多大，取决于阻碍病人发展的程度。某些神经症患者保留了如此之多的孩子气，以致于在分析中只能被当做孩子对待。

移情作用的另一个好处也就是，在移情中，病人会以其独特的清晰性当面向我们展示他的重要生活经历。对此，要不是移情作用，患者向我们提供的很可能只是不充分的表述。患者几乎不是把它报告给我们，而是当着我们的面把它做出来。

现在来看另一面的情形。既然移情再现的是患者与其父母的关系，那它也会继承这一关系的两极性。终有一天，患者对分析者的积极态度会转换成消极、敌对的态度。这照例也是重复过去。患者对自己父亲的服从（如果谈到的是父亲的话），对来自父亲的赞赏的企求都植根于指向父亲的情欲。迟早这种要求会进入到移情作用中，并坚持要得到满足。在分析的情境中，这种要求只能遭遇挫析。患者和分析者之间真正的性关系则另当别论，甚至于更微妙的满足方式，像给予偏



爱、亲昵等等、也很少为分析者所赞同。这一拒绝会成为转变的诱因，很可能这种事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患者的童年发生过。

积极的移情作用所导致的成功治疗很容易有暗示（suggestive）之嫌。如果消极的移情作用占上风，那么上述的成功就会成为泡影。我们将惊恐地看到，我们以往的全部辛苦和操劳都已付诸东流。我们一度视为患者的持久的智力增进，即他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和对分析功效的信赖，转瞬间消失殆尽。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孩子，无力对他自己做出评判，盲目地相信任何一个他所爱的人，而不相信陌生的人。显然，这些移情状态的危险在于患者不理解移情作用的性质，强把移情作用当做新的现实经验，而不是当做过去经验的反应。如果他（或她）意识到了隐藏在积极移情背后的强烈性欲，他就会相信陷入了情网。如果移情走向另一极，那么他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忽视，他就会恨分析者，将其当成敌人，并准备放弃分析。在这两个极端的案例中，他都忘记了自己在治疗之始达成的契约，使之变得对继续进行正常的分析毫无用处。分析者的任务是，坚定地使患者摆脱危险的错觉，反复地向他表明他自以为新的现实生活不过是过去生活的反映。为免于患者陷入不接受任何证据的状态，分析者要当心不使爱和恨达到极端。这取决于患者对这些可能性的充分准备，和分析者不忽略这些可能性的初始迹象。依此谨慎处理移情作用，一般会有极好的效果。如果我们像通常能够做到的那样，成功地启发患者认识到移情现象的本来面目，那我们就解除了患者进行抵抗的有力武装，并会化危险为收获。因为患者绝不会再次忘记他以移情的形式所经验到的一切，这比患者以其他形式能够得到的经验具有更大的取信力量。

我们最不希望的是，病人不是去记住移情，而是装作与移情无干。对我们来说，理想的行为应该是，患者在脱离治疗时表现得很正常，而只是在移情作用中才显示出他的变态反应。

我们用来加强受到削弱的自我的方法有，扩大自我的自知，这是个出发点。当然，这并非是全部内容，而仅仅是第一步。丧失对自身的了解，对自我来说意味着丧失自己的权力和影响，这是自我受到本我和超我要求的围困和制约的第一个明确的标志。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提供的帮助是我们理智的工作和鼓励患者予以合作。如我们所知，这种初步的工作意在为下一步更艰难的工作铺平道路。即使在最初阶段，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工作的动力因素。为了治疗，我们从多种渠道收集资料——患者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和自由联想；患者在移情时向我们表明的内容；我们通过解析患者的梦得到的，以及患者的失言或动作错乱所泄露的材料。所有这些资料都会有助于我们解释病人遇到过而又被他遗忘的事情，和现在病人正遇到的而他又不理解的事情。但在所有资料中，我们务必在我们的了解和患者的了解之间做出严格的划分。我们不应立即告诉患者我们在初期屡次发现的事情，也不应告诉病人我们的全部发现。当我们要向患者透露由我们的解释得出的某一



了解时，我们应周密思考并等候我们认为是适当的时机。这一时机并不总是很容易确定。通常，当我们把解释和说明告诉患者时，他自己几乎已经得出来了，仅差一步之遥。当然，这一步事实上是关键的综合。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在患者还没有准备时，就把我们的解释全部告诉他，那不是不起作用，就是引起爆发的抵抗，而抵抗会使我们进一步的工作更加困难，甚至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的危险。但是，如果时机成熟，那患者常常就会立刻进一步确证我们的解释，并主动回忆他所遗忘的内部或外部事件。我们的解释越是符合患者遗忘的事件的细节，患者就越容易接受。于是，就这一特定事件而言，我们的了解也就成了患者的了解。

提到抵抗，我们便进到了我们的任务的第二个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自我凭借反贯注来防备自己受到来自潜意识和受压抑的本我的不良元素的侵害，如果自我要正常发挥作用，就一定要保持不受损害。自我越是感受到紧迫，它就越起劲地（好像很害怕地）依赖于反贯注，为的是使自己的剩余部分免受进一步的侵害。然而，这个防御性的目的根本不是我们的治疗所要达到的。相反，我们的愿望是，在我们的确切帮助下，自我变得大胆起来，敢于采取攻势，以重新夺回所失去的东西。我们在此才注意到抵抗我们工作的反贯注力量。自我会由于畏惧危险和不快乐而从与分析者的合作中退缩。但只要它不打算拒斥我们，那它就肯定会不断接受鼓励和安慰。把持续于整个治疗过程并随工作进展而更新的这一抵抗了解为压抑引起的抵抗，是不够正确的。我们将发现，它并不是我们面对的惟一抵抗。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即在分析的情境中，交战各方与我们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倒转过来了：自我变得反对我们的鼓动，而通常是我们对手的潜意识却成了我们的帮手，因为它具有自然向上的动机，并强烈要求冲破固定的前线进入自我，从而进入意识。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能够引导病人的自我克服抵抗，发展中的斗争就会顺着我们支配的方向并且借助我们的帮助进行。在自我与本我的斗争中，无论本我战胜了自我，还是自我最终解除了本我，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无论谁获胜，永久的危险解除了，自我的范围扩大了，心理的能量无需再浪费了。

克服抵抗是最费时间和最麻烦的，然而又是最值得做的工作。因为这一工作产生有利于自我的转变，使自我能独立承担移情的后果并适用于生活。同时，我们努力使自我避免受潜意识的改变。只要我们能在自我中检查出潜意识的派生物，我们就指出其不合理的根源，并促使自我拒绝这些影响。应当牢记，潜意识元素对自我的改变不应超出一定限度，这是我们帮助病人抵御潜意识侵犯的契约的先决条件之一。

随着我们对神经症患者心理生活的工作越发深入和了解，作为抵抗的根源的两个新因素更清楚地引起我们的密切注意。病人对这两个新因素完全无知，而在



订立治疗契约时，我们对它们也从未考虑过，并且它们不是出自病人的自我。尽管它们有不同的起源，但在其他方面具有类似性质，大致可包括在一个名称中，即“害病或要受苦的需要”。第一个因素可以叫做罪恶感或罪恶意识，但患者并没感到和有所知觉。显然，超我的抵抗部分变得特别强烈和残酷，患者注定不能好转，而是必须保持病态，因为他命该如此。这一抵抗实际上不妨碍我们的精神分析过程，但又使分析过程不起作用。它常常让我们消除了某一症状，却早已准备了另一症状取而代之，或者代之以某种身体疾病。罪恶感也能解释我们所见的某些严重神经症患者的治愈和好转：问题在于病人应该是痛苦的——以什么方式都无关紧要。患者明显地毫无抱怨地屈从厄运，忍受痛苦，但痛苦也流露了出来。为了防止这种抵抗，我们不得不限于患者意识到这一点，并努力逐步消除超我的敌意。

证明另一种抵抗的存在也并非易事，而且特别难以对付。有这样一些神经症患者，从其反应判断，他们的自我保存本能实际上是反向的。他们似乎在追求自我伤害和自我破坏。这类人最终有可能走上自杀道路。在这种人身上，产生了深刻的解除结合的本能，结果解放了指向内部的破坏本能的巨大力量。这类患者不能容忍我们的治疗，而且尽力反抗。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不能完全解释这类病例。

让我们再一次审查我们企图帮助患者治疗神经症自我所已达到的情境。这一自我不再能完成外界（包括社会）提出的任务，他已不能控制自己的全部经验，并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它的活动受制于超我的禁令，它的能量无效地耗费在逃避本我的要求上。此外，由于本我的不断闯人，自我的组织受到了损害，再不能进行任何适当的综合，它为相互敌对的冲动、未解决的冲突和怀疑所分裂。由此出发，我们遂让患者的自我参加精神分析解释的纯智力工作，使他能暂时补充心灵资产的空隙，把他内心的超我权力转移给我们。我们鼓励患者的自我与本我的每一个别要求进行斗争，并战胜与之有关的抵抗。同时，我们通过检查挤人意识的来自潜意识的冲动和内容，恢复自我的秩序，并追溯它们的起源，使之受到批判。我们以不同的职能，以教师、教育家和父母的权威和替身为病人服务。如果作为一个精神分析者，我们使病人的自我上升到正常水平，并把潜意识和压抑的内容转变成前意识资料，使这些资料重新归自我所有，那我们就为病人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患者身上也存在着某些有利于治疗的理性因素，如在其痛苦中具有动机力量的康复的需要，以及在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中可以在病人身上唤醒的智力兴趣等。更为巨大的力量是患者的积极的移情作用。但另一方面，反对我们的是消极的移情作用，即自我因压抑（即必须以不愉快对待加诸自身的艰苦工作）而引起的抵抗；与超我有关而引起的罪恶感以及由于本能组织的深刻变化而引起的害病需要。病情的轻重与否是由后两个因素决定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治疗



工作可以有利或不利的因素：如精神的惰性，不愿放弃自身固执性的力比多的迟滞，这些因素难以对治疗有利。而使本能升华的能力可以使病人从自己的粗俗的本能生活中解脱出来，对治疗有一定的帮助。其他如智力功能的相对力量对治疗也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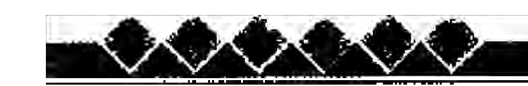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最终的治疗结果有赖于量的关系——即有赖于我们在病人心中动员的对治疗有利的能量与反对我们治疗的能量的对比，那我们是不应失望的。相反，而是应当感到完全可以理解。在此，上帝又一次站在强者一边。当然，我们的治疗并非总是成功，但至少我们总可以知道为什么不成功。那些并非出于治疗兴趣而跟随我们讨论的人，在这种承认之后也许就会轻蔑地转身而去了。然而，我们在此讨论的只是心理治疗的方法，暂时还没有其他方法。也许未来，可以用特殊的化学物质直接影响心理的能量，直接改变精神结构的分布，也许还会出现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治疗可能性。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掌握比精神分析更好的技术，因此，尽管精神分析还存在局限性，但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七、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范例

对精神的结构，对构成这一结构的成分、组件和机构，对活动于其中的力量，以及对它的成分所具有的功能，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一般性的了解。神经症和精神病都是些状态，结构的功能失调正是以这些状态得到了表达。我们之所以选择神经症作为研究课题，是因为只有它适合于我们研究的心理学方法。当我们试图影响神经症的时候，我们便汇集了相关的观察。这些观察给了我们一幅神经症产生过程及其产生方式的图景。

在开始描述前，让我们首先说明我们的主要发现之一。神经症（不像传染病）没有特殊的决定因素，寻找病源之类的刺激物是徒劳的。神经症易于转变为一般所谓的正常。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正常状态都很少不能指出带有神经症的特性。神经症患者也像其他人一样拥有大致相同的先天倾向，拥有同样的经验，拥有同样的事情做。那么，为什么他们却生活得如此糟糕，面临着更大的难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着更大的不幸、焦虑和痛苦呢?

我们没有必要因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困惑。完全可以把量的失调看做是神经症患者的不适和痛苦的因由。的确，人的心理生活采取的所有形式的决定性原因，都可以在先天的倾向和偶然的经验之间的互动中找到。一个特定的本能也许先天太强或太弱，或者一个特定的能力也许在生命中发育不全或没得到适当的发展。在另一个方面，外部的影响和经验会对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影响，而一个人的素质所能处理的也许是另一个人所无法企及的。这些量的差异将会决定结果



的不同。

可是，我们很快就会感到，这个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它太一般了，它解释的太多了。病因学适用于每一例心理的疾患、痛苦和无能，但是，并不是每一这样的状态都能被冠之以神经症。神经症拥有独具的特征，它们是特定种类的痛苦。或许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假定，在心理生活必须涉及的任务中，有一些特别容易导致不幸。因此，神经症现象非常鲜明的特性就会从这而来，而无须我们收回早些时候的主张。如果神经症与正常人的心理特点的确没有差别，神经症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正常人就有极大的价值。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正常人心理组织的“弱点”。

我们上述的假设得到了证实。精神分析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一种需要对付的本能要求不仅最容易失败或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一生还存在着一个时期专门或最容易发生神经症。本能的性质和有关的人生时期尽管是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因素，但我们将分别加以论述。

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论述这一生活时期的作用。神经症似乎只是儿童时期到 6 岁为止获得的，尽管其症状可以很久以后才表现出来。儿童期神经症的表现时间可以很短甚至被人忽略。在每一病例中，后期的神经症疾病都与童年的预兆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可能的是，所知的创伤性神经症（由于过度的惊吓或者严重的身体打击，像铁路事故、活埋等等）是例外，它们与童年期决定因素的关系至今未得到证实。阐明为什么在童年期的开始阶段容易得病并不困难。我们知道，神经症是自我的错乱，所以，儿童期的自我是脆弱的、不成熟的、没有抵抗力的，不能处理长大后很容易处理的事情，这是毫不奇怪的。在这种情形下，内部的本能冲动和外界的刺激可以作为“创伤”而活动，尤其是它们在中途与某种先天倾向性相汇合的时候，孤立无援的自我想借逃避（压抑）对它们进行防御，但这种方法变得无效了，而且对未来发展有永久性的妨碍。自我受到的最初经验的损害是极不相称的巨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我们只是有必要做这样的类比，用针来刺细胞分裂活动中的细胞体（就像在 Roux 实验中那样）和用针来扎最终出自这些细胞的成熟的动物，结果是不同的。没有人不带有这种创伤体验，也没有人能逃脱创伤体验引起的压抑。然而，自我方面的这种有问题的反应也许是这同一时期提出要达到的另一人生目的所必不可缺的。在这短短的几年内，幼小的儿童必须成为一个文明人，要以不可思议的简缩形式走过人类文化发展的漫长道路。这可能是遗传组织造成的，但如果没有后天的抚育，作为超我的先驱的父母的影响，用禁令和惩罚对自我活动加以约束，鼓励或强迫压抑的机构等这一类额外帮助，实现这一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神经症的决定因素中包括有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野蛮人很容易保证健康，文明人则不容易。所以，一个不受禁止的、有力量的自我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



生活的时代告诉我们，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这种要求是与文明敌对的。由于家庭的抚育代表着文明的要求，我们务必牢记人类种族的生物特性——儿童依存性的漫长时期——在神经症病因方面的巨大作用。

至于另一个特殊的本能因素，我们首先遇到的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有趣的分歧。从理论上讲，可以假设任何种本能都可以产生同一压抑和相应的结果。但是观察表明，就我们的判断而言，具有病理作用的刺激总是源于性本能。神经症症状可以说无一例外地不是对某种性冲动的代替满足，就是用以防止这一满足的手段。这些病症照例是两者的调和，而且符合潜意识中两个相反力量之间的运行法则。目前，我们理论中这一空白尚不能得到填补。我们的结论由于下列事实而变得更加困难了，即大多数的性生活冲动不是单纯的性爱性质，而是与破坏本能结合在一起的。然而，毫无疑问，在生理上表现为性欲的本能在神经症的起因中起着绝对主导作用——至于是否是惟一的原因，尚有待于确定。同时，务必牢记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其他的机能像性欲一样为人们激烈地和广泛地拒绝接受。理论必须依赖满足于下而揭示出来的深层联系的几点提示：首先，儿童早期，自我从本我分化出来，这也是早年性欲的旺盛时期，直到潜伏期才告结束；其次，这一短暂时期后来成为幼年健忘症的牺牲品很难是偶然发生的；最后，性生活中的生物变化（如上述提及的性机能的二相性、性兴奋的周期性的消失和女性月经与男性兴奋之间关系的转变），这些性欲的变革在动物向人类的进化中必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独立的数据有待未来的科学把它们结合成一种新的见解。此地的空隙不是心理学的，而是生物学的。也许可以说，自我组织中的弱点似乎在于它对性机能的态度，好像自我保存和种族保存之间的生物学的对立得到了心理上的表述。

精神分析的经验使我们深信这种说法，即儿童是成人的心理之父。出生后第一年的经历对人的一生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我们特别关注这一时期是否有可以描绘为主要经验的某些事件。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并非适用于一切儿童的某些影响，虽说也够普遍的了，如大人对孩子的性辱骂，来自稍大的其他儿童的诱惑，以及我们没料到的，儿童亲身耳闻目睹大人（父母）的性行为。在此时，大部分人总认为孩子们不感兴趣或不理解这一现象，或以后不会再记起来了。不难确定这种经验唤起了孩子的敏感性，并驱使孩子形成以后难以改变的释放性冲动的习惯到达何种程度。由于这些印象不是立即就是事后在记忆中受到压抑，所以，这些印象构成了神经症强迫行为的决定因素，从而使自我以后不能控制性的机能，而且很可能永远失去机能的控制。如果发生后一种反应，就会导致神经症。如果不失去控制力，各种性反常也会发展起来，或者，性机能将会成为完全不可控制的。这种机能不仅对繁衍后代极为重要，而且对整个生活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尽管这一类情况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兴趣却更集中于每一儿童注定要经过的一种情境的影响。这一情境是由于儿童由别人主要是父母抚养的较长时期这一因素而产生。我想到了伊谛普斯情结，之所以这样称呼，是由于其实质是在古希腊神话中的伊谛普斯王身上发现的，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将这一神话在戏剧中保存下来。伊谛普斯这位希腊英雄杀父娶母是无辜的，因为他不知道他们是自己的父母。这偏离了我们容易理解的精神分析事实。我们认为，这个杀父娶母的分析事实是不可避免的。

在此，我们必须分别描述男孩和女孩（男性和女性）的发展，因为现在首次在性别方面发现了心理表现的差异。我们在此遇见了性的两重性的生物事实之谜：它是我们要理解的一个最后的事实，不能用追溯到其他事实的任何企图加以解释。这是一个纯生物学的问题，精神分析对此无法阐述。在心理生活中，我们只是发现了这个巨大对立面的反映，但对以下的长期悬而未决的事实却难以做出解释：每一个体都不限于单一性别的反应模式，而是多少为异性的反应模式留有余地。正如男性和女性的器官得到充分发展，但常常有异性遗留下来的萎缩的无用器官的痕迹。我们在区别男女的心理差别时，用的只是显而易见的一种不适当的经验和传统的提法：我们把强壮的、主动的称为男性特点，把软弱的和被动的称为女性特点。而这种心理的双性化事实引起我们研究上的困惑，以致很难加以描述。

婴儿的第一个情欲对象是哺育他的母亲的乳房。爱起源于对得到满足的营养需要的依附。毫无疑问，婴儿最初不能区分母亲的乳房和自己的身体。当母亲的乳房必须与身体分开而转移到“外部”时，由于婴儿常常发现乳房不在，于是把一部分原始自恋的力比多贯注当做了一个“对象”。这第一个对象后来变成了儿童的母亲这一完整的人，母亲不仅哺育婴儿，而且照料婴儿，因而在婴儿心中引起了其他一些愉快或不愉快的生理感觉。由于母亲对婴儿的身体的照料，她变成了婴儿的第一个诱惑者。在这两种关系中，为儿童扎下了这样的根，即母亲的独特的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为孩子的整个一生建立了不可更改的第一个也是最强烈的爱的对象，并成为孩子以后一切两性爱情关系的原型。这种种系发生的基础远远超过个人的偶然经验，所以，是母亲亲自哺乳或是用奶瓶哺乳而从未享受母亲的爱抚，这种差异已变得无关紧要了。在这两种情形下，婴儿的发展都遵循着同一道路，也许在第二种情形中，婴儿以后的生长渴望还更强烈些。因为无论母亲哺乳期有多长，在断奶后，孩子总感到母亲的哺乳太短太少了。

这个前言并不多余，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对伊谛普斯情结的强烈性的认识。当男孩（从2～3岁开始）进入力比多发展的阳具欲期时，他对性器官开始产生情感，而且学会用手使其兴奋。他成为母亲的爱恋者，他开始通过对性生活的直觉或猜测而渴望占有母亲，他通过炫耀男性器官引以为荣地去引诱母亲。总之，他那早期觉醒的男性化使他追求取代父亲的地位而占有母亲。男孩一直把父亲视为



情敌，嫉妒父亲的健壮体魄和他的衣着所标志的权威。父亲现在成为妨碍男孩的敌手，甚至男孩想去之而后快。如果父亲不在，男孩就能与母亲同睡一床，而父亲一回家，他就得重新离开。父亲不在场他就感到满足，父亲出现他就感到失望，这已成为男孩深深感受的经验。这就是伊谛普斯情结的主题，古希腊神话已经将它从儿童的幻想世界转译成假托的现实。在我们的文明条件下，伊谛普斯情结注定是一个可怕的结局。

母亲非常明白男孩的性兴奋与自己有关。母亲迟早认识到放任自流是不对的。母亲认为自己禁止男孩摆弄性器官是正确的。然而，她的禁止并没有效，至多能改变孩子获得满足的一些方式。母亲终于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她威胁孩子，要割掉他满不在乎向她展示的性器官。通常为了使威胁更可怕可信，她扬言要让父亲来动手，她说要去告诉父亲，父亲会来阉割他的生殖器。令人奇怪的是，这种威胁只有当另一个条件或先或后得到实现时才发生效果。就事情本身而言，孩子并不相信阉割真会发生。但是，如果在威胁时，他能回忆女性的生殖器或威胁后不久他看到女性生殖器——女孩身上竟真正缺少这一有价值的部分，他就开始认真对待听到的威胁一事。于是他在阉割情结的影响下，体验到了童年生活的最大创伤①。

阉割威胁的效果是多重的和不可估量的。它们影响着孩子与父母的整个关系，并且影响儿童以后与男女的一般关系。儿童的男子气概是经受不住这最初的打击的。为了保存性器官，他不再敢占有母亲，他的性生活永远为禁令所阻止。如果他身上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强烈的女性成分，其力量就会因男性气概的屈从而增强。他对父亲也对母亲一样采取了被动的态度。阉割威胁确使他杜绝了手淫。但并没有使他放弃想象中的手淫活动。相反，因为这些现象是惟一满足性欲的方式，他比以往更加沉溺于其中。在幻想中，尽管他仍然继续以父亲自居，但同时或更以母亲自居。早期手淫幻想的这些派生物以及矫正结果，对后来自我以及性格的形成起着极大的作用。除了增强了他的女性倾向外，对父亲的害怕和憎恨也变得十分强烈了。男孩的男性气概退缩了，似乎转为对父亲的鄙视态度，这一态度将在人类社会中以一种强制的形式支配着他的行为。对母亲的性固着常常以对她的极度依赖的形式保留下来，持续而为一种对女性的依附。他既不敢冒险去爱母亲，

① 在伊谛普斯传说中，阉割也有一席之地。以梦为证，伊谛普斯发现自己的罪行之后而盲目地处罚自己，就是对阉割的象征性替代。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种系发生的记忆痕迹可以解释该威胁的特别可怕的作用——这一记忆痕迹来自于史前的原始家庭。当时，如果儿子作为同一妇女的竞争者而给父亲造成了麻烦的话，妒火中烧的父亲实际就要夺去他儿子的生殖器。割礼这一原始的习俗是对阉割的另一象征性的替代，它也只能被理解为是顺从父亲意志的表达（参见原始人的青春期仪式）。上述的民族当中和并不禁止儿童手淫的文明当中，那些事件所采取的形式还没有得到过考察。



也不敢让母亲爱自己，因为这样做，母亲就会把自己出卖给父亲而送去阉割。对于这种具有来龙去脉的整个经验，我们只对其一部分进行了有选择的描述 。这种经验受到强有力的压抑，由于潜意识本我的法则可能在起作用，此时一切活跃着的相互斗争的情绪冲动和蠢蠢欲动的反应都保留在潜意识中，并且准备在青春期后搅乱自我的后期发展。当性成熟的生理过程把新生活重新注入童年已被克服了的原有的力比多固着时，性生活将会受到抑制，并因缺乏同性而分裂为相互冲突的冲动。

当然，阉割威胁对男孩萌发的性欲的影响并不总是具有可怕结果，最终的影响依赖所遭受的损失和所回避的量的关系而定。可以看做童年期的中心经验，幼时的最大问题和长大后不适的主要源泉的这一整个事件，后来被完全遗忘了。所以，在精神分析工作中，在成人身上重建这些经验时，成人是极不相信的。的确，人们对这些经验十分反感，以致对这个犯禁的主题保持沉默，那些最明显的暗示也由于不理解而被忽略了。例如，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反对的意见，认为伊谛普斯王传说与精神分析的解释事实上没有任何联系，二者截然不同，因为伊谛普斯王并不知道自己杀的是父亲，娶的是母亲。在此所忽略的是，如果是在对材料进行诗化处理时做出的尝试，那么这种歪曲就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并没有加上更多的新异材料，而只是巧妙运用了主题所提供的因素。否认伊谛普斯情结是潜意识状态的合理表达，对成人来说，整个经验都开始于此。使英雄无罪或应该使英雄无罪的神谕强制力，是对命运的必然性的认识，这宣告了每个儿子都要经历伊谛普斯情结。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再次得到印证的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即另一个戏剧性英雄之谜，按照伊谛普斯情结多么容易就能够得到解答。因为王子遭遇的不幸超出了对别人的处罚，这与他自己的伊谛普斯愿望相吻合——因此，文学世界通常缺乏理解，表明了人类准备要牢牢掌握幼年的压抑①。

然而，在精神分析诞生的一个多世纪前，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iderot）就通过表达原始世界与文明世界之间的不同，见证了伊谛普斯情结的重要性。他是这样说的：如果幼小的未开化的人就剩下他自己，保留了他所有的愚昧，以及幼小儿童的贫弱理智加上 30 岁男人的狂热，那他就会勒死他的父亲，投怀他的母亲。我敢说，如果精神分析夸耀受压抑的伊谛普斯情结是惟一的发现，光凭这一点就可以说对人类做出了宝贵的新贡献。

小女孩的阉割情结效果则较为一贯，但同样深刻。当然，女孩不必害怕失去阴茎，但她一定会想到自己为什么没有。她一开始就嫉妒男孩生有阴茎，她的整

---

① 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字很可能是个假名，背后隐匿了许多未知的谎言。牛津的伯爵爱德华·迪·维尔，被认为正是莎士比亚著作的作者。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便失去了他所敬爱的和所钦佩的父亲，而他完全遗弃了他的母亲，因为母亲在丈夫死后很快又订了婚。

个心理发展可以说是在这种嫉妒阴茎的气氛下发生的。她开始徒劳地像男孩那样去做，后来她成功地做出了补偿自己缺陷的努力，最终导致形成了正常的女性态度。如果在阳具欲期，她想象男孩凭借手淫获得愉快，她往往不能获得充分的满足，从而把阴茎不发育带来的自卑感扩及于整个自我。通常她很快放弃了手淫，因为她不愿联想到兄弟和男伴的优越性，而且完全放弃了性欲。

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小女孩具有坚持要变成男孩的最初愿望，她最终将表现为同性恋，否则就在以后的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男子特性，如选择男子的职业等。女孩嫉妒的另一表现是放弃所爱的母亲，作为女儿，在阴茎嫉妒的影响下，她不能原谅自己的母亲，因为是母亲把她带到世界上来而缺少阴茎。由于对这件事的不满，她不再爱她的母亲，而用其他人（她的父亲）来代替母亲作为爱的对象。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爱的对象，最明显的反应是认同于这一对象，通过认同作用从内部取代这一对象。现在认同机制帮助了小女孩。以母亲认同取代对母亲的依附。像在游戏中表现的那样：小女孩把自己置身于母亲的位置，她试图用父亲取代母亲，开始憎恨从前所爱的母亲。这出于两个动机而使她嫉妒和使她因缺少阳具而感到耻辱。她与父亲的新关系是能满足于控制她的阳具的愿望，但由此最终导致了另一愿望，即要与父亲生一个婴儿作为礼物。因此，怀有婴儿的愿望取代了具有阳具的愿望，或者无论如何与这个愿望分裂开来。

有趣的是伊谛普斯情结和阉割的关系在男女之间应当采取不同的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对立的形式。在男孩身上，正如我们所见，阉割威胁使伊谛普斯情结趋于消失。而在女孩身上我们发现了相反的情况，正是由于缺少阳具，才迫使她们陷入伊谛普斯情结。如果她保持着女性的伊谛普斯态度（通常用“爱列屈拉情结”表示），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她将按照父亲的特点选择未来的丈夫，并准备承认他的权威。如果她能把对器官的爱推而及于器官的所有者，如同早年从对母亲乳房的爱扩及母亲本人那样，那么，她那不可遏止的占有阳具的渴望将可获得满足了。

如果人们问精神分析者，在他的病人的精神结构中，什么是他的经验的影响最难以触及的。回答将是：女人的企求阳具的愿望和男子的对自己性别的女性态度，当然这一态度的前提将会是阳具的丧失。



第三部分
理论成就

八、精神结构与外部世界

当然，我在第一章中提出的所有一般的发现和假设，都源于艰苦和细致的工作，对此我已在前面的章节中给出了实例。现在，我们也许很想对我们通过诸如此类的工作而实现的知识增长做出考察，并思考我们为未来的发展开辟了什么样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我们会注意到下述的事实，即我们常常不得不大胆越过心理科学的界限。我们涉及的现象并不只属于心理学，它们也有器质性的和生物学的侧面。因此，在努力建立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出了某些重要的生物学发现，并且不可避免地提出了新的生物学假设。

但暂时还是让我们仅谈及心理学。我们看到了，要划出心理常态和心理变态的分界线，在科学上并不是行得通的，以致这种区分虽然实际很重要，但仅仅具有世俗的价值。因而，我们能够通过研究心理失常来理解正常的心理生活——如果这些病理状态，像神经症和精神病，有根本不同的独特原因，那就做不到这一点。

通过研究睡梦中出现的短暂无害、实际又起着作用的精神异常，给了我们一把理解生活中长期和有害的精神疾患的钥匙。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断言，意识心理学很难理解梦，也就同样很难理解正常的心理功能。意识的自我觉知纯属自以为是，事实证明了，它根本不足以探测心理过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足以揭示心理过程的相互联系，也不足以认识心理过程失常的决定因素。

我们的假设是采纳一个精神结构，它是扩展于空间、暂且汇集到一起、为生活的迫切急需而发展起来的，它仅仅在一个特定的点和在某些条件下才产生意识现象——这个假设使我们能够在类似于任何其他科学、像物理学的基础之上建立

心理学。在我们的学科中，就像在其他学科中一样，问题是相同的。在经过检查而直接呈现给我们知觉的对象的那些属性（性质）背后，我们必须去探索某些内容，它们更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器官的特定感受能力，并更接近于被认为是真正的事态。我们无法达到真正的事态本身，因为很显然，我们推论到的任何东西都必定要被转换成我们的知觉语言，而我们要摆脱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本性和局限也就在于此。就好像我们在物理学中所说的："假如我们能看得足够清楚，我们就会发现，表现为固体的东西乃是由这样那样形态和大小的粒子所构成的，并且占有这样那样相对的位置。"与此同时，我们试图通过人造的辅助物来最大可能地提高我们感官的效率。不过，可以设想，所有这样的努力都不能影响到最终的结果。现实将总是保持"不可知"。科学从我们最初的感官知觉中得到的收获，就在于洞悉外部世界中存在的联系和依从关系。这些联系和依从关系能以某种方式被如实地复制或反映在我们的思想和认识的内部世界中，使我们能够去"理解"外部世界中的某些事物，去预见它们和有可能去改变它们。我们在精神分析中采取的步骤就与此十分类似。我们发现了填补我们意识现象中的裂隙的技术方法，我们运用这些方法就像物理学家运用实验一样。以此，我们推论了一些其本身是"不可知的"过程，并把它们引进了我们意识到的过程中。例如，如果我们说："在这一点上介入了潜意识的记忆"，那就意味着："在这一点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对它还不能形成观念，但它如果进入了我们的意识，它才能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描述。"

我们对进行这种推论和引进的合理性论证，以及相信它们的程度，其每一个体实例自然都是可以批评的。而不可否认的是，要得出一个具体结果常常是极其困难的——这表现为在分析者之间缺少一致性。问题的新奇性会因为缺乏训练而受到指责。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学科本身固有的特殊因素：因为心理学与物理学不同，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总是只能引起冷静的科学兴趣的事物。因此，我们对这一事实也将不会感到十分惊讶，即当一个女性分析者并不确信她自己对阳具的强烈愿望，那她也就不会强调这个因素对她的病人的重要性。错误的根源在于个人因素，但这样的根源从长远来看并不特别重要。如果一个人查阅关于显微镜的使用的旧教本，他就会惊奇地发现，当显微镜的技术还是刚刚出现的时候，它就对使用这种工具进行观察的人们的人格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对全部这些要求，直到今天也没有提出过疑问。

我不可能尝试去完整描绘精神结构及其活动。我会发现自己受到如下事实的阻碍，即精神分析还一直没有时间同等地研究所有那些功能。因此，我只满足于自己对在第一章中所谈到的内容逐一做扼要的重述。

我们生命的核心是由混沌的本我构成的，它与外部世界没有直接的交往，甚至只有通过其他作用的媒介，才会为我们自己的知识所理解。在本我中，肌体的



各种本能在起作用，它们本身是两种原始力量（爱欲与破坏）以各种比例相融合的混合物，并且它们通过与不同器官或器官系统的联系而彼此分化开来。这些本能的惟一驱力是获取满足，这被认为是出自器官借助外部世界的对象而发生于其中的某种变化。但是，像本我的愿望这样的本能，其直接的和肆意的满足经常会导致与外部世界的危险冲突和引来灭顶之灾。本我并不知晓为确保生存而产生的担忧，因而也不知道焦虑。或许更正确地说，尽管它能产生焦虑的感觉要素，但却不会利用它们。可能被假定存在于本我的精神要素之中或之间的那些过程（原发性过程），与存在于我们的智力和情感生活中、经由我们的意识知觉而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过程是大不相同的。它们不受逻辑的严格限制，因为逻辑会以不合理为由排斥其中的某些过程，并谋求消除它们。

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本我有它自己的感觉世界。它异常敏锐地觉察出在它内部的某些变化，特别是来自它本能需要的紧张性的波动。这些变化作为快乐——不快乐系列中的感受而变成意识。无疑很难说这些知觉是通过什么方法和借助于什么感觉终端器官而发生的。但已知的事实是，自我觉知——一般感觉和快乐——不快乐的感情——以专横的力量制约着本我中的事件变迁。本我服从于不可抗拒的快乐原则，但本我并不是单独如此。看来其他精神作用的活动也只能修正快乐原则，却不能取消它。快乐原则究竟何时和怎样才可能得到克制，这仍然是理论上最为重要的问题，并且还没有得到解决。快乐原则是要求减少，也许实际上是要求消除本能需要的紧张（即达到无忧无虑的境界），这一考虑导致快乐原则与两种原始力量（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仍未确定的联系。

心灵的另一构成部分是我们最为了解的和最容易认识到的　　那就是众所周知的自我　　它是从本我的表层中发展出来的，本我的表层通过适应于接受和排斥刺激而直接与外部世界（现实）相接触。自从有了意识知觉，它就不断影响到本我的越来越大的领域和越来越深的层次。但它一直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一直带着它的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印记。自我的心理功能就在于把本我中的（事件的）变迁提到更高的能动水平（也许是通过把变动不居的能量转变成受约束的能量，可相当于前意识状态）。自我的建构功能就在于把思想活动引进到本能的要求和满足本能的行动之间，思想活动在确定了它当前的方向和估价了先前的经验之后，就努力利用试探性行动去预测所规划的行动过程的结果。以这种方式，自我就会做出决定：获得满足的企图是力求实现呢，还是加以拖延，或者也许它根本就不必要，因为本能的要求是危险的而完全受到了压抑（在此我们就有了现实原则）。就像本我单一地指向获得快乐一样，自我主要考虑的是安全。自我义不容辞地担负着自我保存的任务，而这正是本我所忽视的。它（自我）运用焦虑感作为信号，对威胁着自身完整的危险发出警告。因为记忆的痕迹，特别是言语残余能够变成意识，起着与知觉相同的作用，所以就有引起混乱的可能性，导致对现实



的误解。自我通过建立现实检验来使自己避开这种可能性。由于睡眠状态的独特条件，这种现实检验才得以在梦中失去效用。自我寻求在机械力量占主导的环境中保存自己，会受到最初来自外部现实的危险的威胁。但威胁着它的危险并不单单来自外界，它自己的本我也是类似的危险根源，这是由于两个不同的原因：首先，过度强烈的本能会伤害自我，这与外部世界的过度“刺激”会伤害自我相类似。实际上，前者不能毁灭自我，但却能够毁灭自我特有的动力组织，使自我重新变成本我的一部分。其次，经验可以告诉自我，某些本身并非无法忍受的本能需要，其满足会带来现实世界中的危险，因此，这种本能需要也会成为危险。从而，自我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它必须既防止外部世界消灭自身的威胁，又要防止内部世界提出过度的要求，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它采取了相同的方法来防御二者，但它对内部敌人的防御是特别不利的。自我在起源上与这个内部敌人相一致，此后它们又以最密切的关系共同生存，结果自我极难逃避内部的危险。内部的敌人虽然能暂时受到压制，但却一直作为威胁而存在。

我们已得知，童年初期虚弱的和不成熟的自我在其努力避开那个生命时期特有的危险时，是怎样受到加之于它的压力和长久伤害的。儿童通过他们父母的关心而得到保护，以防止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着他们的危险。他们为这种安全感付出的代价是对失去爱的恐惧，失去爱会使他们面对外部世界的危险，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当一个男孩发现自己处在伊谛普斯情结的境况中，从原始根源得到加强的阉割危险对他的自恋构成威胁的时候，上述的因素就会对冲突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迫于当前实际的危险和有其种系发生基础面回忆到的危险这两种影响的共同作用，儿童开始尝试进行防御（压抑），这暂时是有效的。然而，当后来性生活重新活跃，从而对过去受到拒斥的本能欲望带来强化时，在心理上就变得不适宜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就必然会认为自我控制早期性兴奋的任务是完全失败的，也就是当时它的不成熟对此还难以胜任。我们从自我的发展落后于力比多的发展当中，会了解到导致神经症的基本前提。我们无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儿童的自我不承担这个任务——就是说，如果儿童的性生活可以听其自由，就像在许多原始人中发生的那样，神经症就能够得到避免了。很可能神经症疾患的病因要比我们在这里描述得更为复杂，即便如此，我们也至少说明了致病情结的一个基本的部分。我们不应该忘记种系发生的影响，它以某种方式被表现在本我中，其形式我们还不能掌握。并且它必定会作用于自我，这种作用在早期比在后期更强而有力。在另一方面，我们逐渐认识到，那种压抑性本能的早期尝试，使得幼稚的自我产生支持外部世界而反对内部世界的强烈倾向。后一种态度是由禁止婴儿性欲所造成，它对个体后来为文化所做的准备不能不产生影响。被迫放弃直接满足的那些本能欲望不得不进入新的导向替代满足的渠道。在这些迂回的过程中，它们也许变得失去了性的特性，并且它们与其



起初的本能目标的联结也会变得更松散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预期得出这种论点，即我们文明的许多具有很高价值的宝贵财富，都是牺牲了性欲和通过对性驱力的限制而获得的。

我们不得不一再地强调这样的事实，即自我把它的起因和它所获得的最为主要的特性都归之于它与外部现实世界的联系。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自我又一次十分接近于本我的种种病理状态，是基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中断或松动。这非常符合我们从临床经验得到的认识——即精神病爆发的诱因或者是现实变成使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或者是本能变得异常强烈——由于本我和外部世界竟相对自我提出要求，两者肯定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如果自我与现实能够始终保持分离，精神病的问题就会是简单明了的。但这种情况绝少或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甚至只要远离外部世界现实，他就会陷入一种幻觉混乱的状态。一个人可以从愈后的病人那里了解到，当时在他头脑的某个角落（如其所说）还有个隐藏着的正常人，像个冷眼旁观者，观看着在他身边流逝着的病态喧闹。我无法确定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般情况都是如此，但我能报告出发病过程不很剧烈的其他一些精神病具有相同的表现。我想起一例慢性偏执狂，当每次忌妒发作之后，患者的梦境都会向分析者转达出爆发缘由的准确写照，而不受任何妄想的影响。这显示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当我们习惯于从神经症患者的梦去发现与他们醒着的生活不相容的嫉妒时，在这个精神病病例中，白天支配着病人的妄想却在他的梦中得到了纠正。发生在所有这些病例中的精神的分裂，我们可以认为大体是真实的。形成的两种精神态度取代了单一的态度——一种是正常的态度，注意于现实；另一种态度则是在本能的影响下，自我与现实相分离。这二者相伴并存，其结果依赖于他们相对的强度。如果后一种态度是强有力的，或变得强而有力，那就出现导致精神病的必要前提。如果关系正相反，那么妄想性障碍就会有明显的好转。实际上，这仅仅是退回到潜意识当中——大量的观察使我们相信，当妄想明显表露之前，它早已预先存在了。

这种看法，即假定在所有的精神病中都有自我分裂的看法，如果不能实际用来说明其他更类似神经症的状态，以及最终不能实际用来说明神经症本身，那它就不能吸引广泛的注意。我最早是在恋物癖的病例中逐渐确信这一点的，这种变态可以被看做是性反常行为之一。如众所周知，它是基于病人（几乎总是男性）否认女性没有阳具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他是极不合宜的，因为这证明了他自己有受到阉割的可能性。因此，他拒不承认他自己具有关于女性生殖器缺少阳具这种感官知觉，并坚持相反的信念。可是，未被承认的知觉并不是没有一点影响，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断言他真地看到了阳具，他拿其他的什么东西去加以代替——身体的一个部分或某一别的对象——并委之以阳具的角色，这是他不能没有的。替代物通常是他在看到女性生殖器的时刻实际看到的某种事物，或者



是能适当地作为阳具的象征性替代物的某种事物。此刻，把物恋的对象当成自我分裂来加以描述是不正确的，这不过是借助于移置作用而形成的妥协，在梦中就常有这种情况。但观察向我们进一步表明，创造出物恋的对象，是出于试图消灭阉割可能性的证据，从而能够避免对阉割的恐惧。要是女性像其他生物一样拥有阳具，一个人就没有必要担心会失掉自己的阳具。此时我们发现，有恋物癖的人发展了与没有恋物癖的人相同的阉割恐惧，并以相同的方式做出反应。因此，他们的行为同时表达了两个相反的前提。一方面，他们拒不承认他们的知觉事实——即他们看到了女性的生殖器没有阳具。另一方面，他们知晓女性没有阳具的事实，并从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两种态度并行存在于他们的整个一生，而却没有相互的影响。在此，才可以正确地把它称之为自我分裂。这种情形也使我们能够了解到，恋物癖怎么经常地得到有限的发展，它并不完全制约着对象的选择，而是或多或少地为正常的性行为留下了余地。实际上，有时它退而表示有节制的作用，或只限于暗示，因此，有恋物癖的人从没有做到过自我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完全分离。

绝不应该认为，恋物癖提供的是有关自我分裂的特例，它仅仅是用来探讨问题的一个特别便利的论题。让我们回到自己的主题上来，儿童的自我在现实世界的支配下，会通过人们所称的压抑来摆脱不合宜的本能要求。现在，我们将通过进一步的主张补充这一点。在这同一生命阶段，自我经常发现还要抵挡来自外部世界而使自己感到苦恼的某种要求，这是依靠不承认对这一现实要求的知觉而做到的。这种不承认经常地发生，而且不仅仅为有恋物癖的人所具有。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研究它们，均表明与现实相分离的尝试都是折衷的、不完全的。它们的不承认总是由一种承认所补充，两种相反的面独立的态度总是引起和导致自我分裂的局面，其结果再次依赖于二者哪一个能够具有更大的强度。

我们刚才论述过的有关自我分裂的种种事实，都不像它们起初出现时那么新奇了。这实际上是神经症的一般特征，它存在于主体的精神生活中，涉及到某种特殊行为，即两种彼此相反而又相互独立的不同态度。可是，就神经症来说，这两种态度之一属于自我，另一相反受到压抑的态度则属于本我。这一情况和另一情况（上节已加以讨论）之间的区别，基本上是地形学的或结构上的区别。在个体的例证中，要确定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个并不是很容易的。可是，它们通常有下列共同的特点，无论自我在其防御的努力中做了什么，不管它是否试图拒不承认外部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也无论它是否试图抵制来自内部世界的本能愿望，它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全面的无条件的。结果总是取决于两种相对立的态度，二者不论强弱胜负都同样导致了精神的复杂性。最后，惟一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依靠自己的意识知觉对所有这些过程取得的了解是非常少的。



九、内部世界

我们尚没有办法转达一组复杂的同时性事件的知识，而只有按顺序地加以描述。因而，这导致了所有我们的解说都只好开始于片面的简单化，直到它们能够得到补充，得到发展，并得到完善。

自我的图景可写照如下：它介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它接纳前者的本能要求，以便使其得到满足；它从后者引发出知觉，并作为记忆加以利用；它刻意自我保护，抵御来自两方面的过度要求；同时，它的全部决策都听命于修正了的快乐原则。自我的这幅写照实际上仅可应用于童年初期结束之时，即到大约 5 岁。就在这个岁数前后，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至少是部分地不再作为对象，而是通过认同作用被纳入了自我，变成了内部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个新的精神构成部分继续发挥着迄今为止是由外部世界中的人们（被放弃的对象）所起的作用：它观察自我，命令自我，评判自我，并以处罚来威胁自我，简直就如同它所取代的父母。我们把这个构成部分称做超我。我们能意识到它，是由于它作为我们的良心而起到的评判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超我常常表现得很严酷，真正的父母并未对此提供固定模式。超我要求自我不仅要说明自己的活动，而且同样要说明自己的思想和没有得到实施的意图，它似乎对这一切都有所觉察。这提醒我们，伊谛普斯传说中的英雄也会对他的行为感到内疚，并使自己受到自我处罚，尽管由我们和他自己审判的罪过是由不可违抗的神谕力量造成的。超我事实上是伊谛普斯情结的继承者，它只是在情结得到解决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为此，它的过分严酷就不是照搬现实的模式，而是与用来抵御伊谛普斯情结诱惑的力量相符合的了。对这一事实的某些怀疑必定是出自哲学家及其信徒的主张，即道德感并不是由教育逐渐灌输给人们的，或者并不是人们在其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而是从更深远的根源被注入给人们的。

当自我与超我非常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时，要区别它们的表现很不容易。但它们之间的紧张和疏远却会使它们自身显而易见。良心的责备引起的苦恼与儿童对失去爱的恐惧十分一致，现在，这种恐惧已为道德的力量所取代。另一方面，如果自我成功地抵制了超我的诱惑，并做了一些反对超我的事，自我就会感到提高了自信心和加强了自尊心，好像取得了某些宝贵的收获。在这一点上，虽然超我已经变成了内部世界的一部分，但它对自我仍旧扮演着外部世界的角色。在整个后来的生活中，超我都体现着一个人童年期的影响，即父母对他的抚养、教育的影响，和他对父母的依赖的影响—— 由于共同的家庭生活，大大地延长了人类的童年期。面总的来说，超我感受的不仅是父母的个人品质，而且也是对它自身



可发挥决定性影响的一切。如他们从属的社会等级的趣味和标准，以及他们所属民族的固有意向和传统。喜欢高度概括和明确区分的人也许会说，个体与父母相分离之后所面对的外部世界代表着现实的力量；他的带有遗传倾向的本我代表着有机体的过去；后来逐渐把外部世界与本我连结起来的超我，更多地代表着文化的过去，这似乎是儿童在早期生活的几年期间作为遗留经验所必须重复的经历。这样的概括不可能是普遍正确的。文化产物的某些部分无疑在本我中会遗留下它们的沉淀物。超我所起到的大部分作用是在本我中唤起回响，许多儿童的新经验将得到加强，因为它们是某些早期种系发生的经验的重演。

> 你所拥有的来自于你的父亲，
> 获得它使之成为你的。

因此，超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占据了一个中间的位置，它本身合并了现在和过去的影响。在建立超我的时候，可以说在我们面前就有一种方式，以这个方式，现在被转变到了过去……

[General Information]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242
SS[illegible]=11429531
[illegible]=